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卅日出版

# 佛學研究

葉恭綽題

第六十一期

上海佛學研究會印行

# 紅旗 第六十一期

## 目錄

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鬥任務（社論）

衝破五、「圍剿」與革命的職工運動的任務

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鬥爭

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

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

武斷欺騙和虛偽的傀儡

中國經濟的和財政的破產

波蘭階級戰鬥的新階段

樵

浪

毛澤東

洛甫

小山

陽春

列斯基

## 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鬥任務

中央最近發表了關於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在這一次決議中指出了四次「圍剿」的衝破與蘇維埃紅軍的勝利，清楚的分析了目前中國革命形勢之尖銳化與兩條道路之生死鬥爭——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完全殖民地化的道路與工農勞苦羣衆的獨立自由的蘇維埃道路，指出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的內容與我們的一切勝利的條件，向全黨具體的提出在反對五次「圍剿」中的戰鬥任務，號召全體同志及蘇區白區的勞苦羣衆在黨的領導和工農的紅旗之下戰鬥的動員起來，擔負歷史所給與他們的光榮的偉大的任務，澈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爲獨立的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對於這一戰鬥的指示和號召，每一個同志和每一個勞苦羣衆都應該看作與自己的命運亦就是整個中國民衆的命運是生死所關的，怎樣把這一戰鬥的號召與指示變成實際，怎樣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這不僅是工農紅軍與蘇區勞苦羣衆的任務，同樣是異常迫切的擺在白區黨的組織與廣大勞苦羣衆的面前，現在我們就要來說一說對於白區黨有些什麼戰鬥任務并且怎樣使這些任務實現。

我們要保證每個組織都能動員起來爲這一戰鬥的任務作生死的鬥爭，首先就必須使每個同志和每一個勞苦羣衆真正了解中央這一次決議內容不是僅從字面上來了解而是要了

解到這一決議的每一條文與他自己的工作有什麼關係，他怎樣來執行這一決議給與他們的任務。有些同志因為過去許多黨的重要決議沒有完全實現起來以為這是由於我們過去寫的太多了，說的太多了，而做的太少了，現在我們只要實際去做就夠了，這種意見初聽來似乎是很對的，其實是不正確的，我們不否認有些地方的組織常有空洞浮汎的指示，但這絕不能因此就以爲實際工作不需要黨的指示，事實上告訴我們許多地方的組織對於黨的重要指示完全是忽視的，這種組織好似大海中失掉指南針的船的閉眼摸稜，結果只有使工作更加困難，甚至陷入完全停頓的狀態。因此要實現中央給予我們反對五次「圍剿」的任務，首先就必須將這一決議深入到每個組織中去討論，規定每一個組織每一個人的具體任務，各級黨部與一切羣衆組織，應開展廣大的深入的宣傳教育鼓動工作，要消滅一切敷衍的官僚式的傳達，我們檢查工作的開始就要聽每個支部首先是產業支部以及廣大的下層羣衆組織對於這一決議的回答。斯達林同志說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就在於儘可能動員更多的羣衆來執行一定的任務，很明顯的各級黨部執行中央決議的一個標誌 就要看他能不能動員更多的羣衆。在這裏我們應該指出有些地方的絕不可容忍的現象，儘管五次「圍剿」已經是緊張萬分，而他們還在那裏等待，把中央決議停留在機關裏面，就是討論也只限於很少人的範圍，這種官僚主義的敷衍，我們絕不能認爲他是擁護中央決議，我們必須與這種現象作最殘酷的鬥爭。

目前的深刻的國民經濟的浩劫與民族的危機，國民黨的無恥出賣與紅軍蘇維埃的偉大勝利使我們有一切的順利條件來組織廣大的羣衆運動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我們應該用盡一切力量在工廠學校兵營碼頭及一切羣衆會集的地方進行最廣泛的動員工作，利用一切機會召集羣衆的會議和談話，向他們作各種各樣的宣傳鼓動和解釋，提醒每一個勞苦羣衆對於五次「圍剿」的警惕，使他們了解在爭取中國蘇維埃道路中的具體任務，準備和組織廣大羣衆的示威罷工遊擊戰爭與革命的譁變來回答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圍剿」。在這種廣泛的動員中我們應該緊緊握住以下的問題：

一、號召和組織廣大的勞苦羣衆首先是軍事工業，交通，碼頭的工人，例如鐵路，輪船，兵工廠，飛機廠，軍械庫，軍需處，糧食棧以及一切碼頭的工人來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在這些地方組織警備委員會，實際沒收和破壞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軍火，把沒收來的軍火來武裝自己，與帝國主義國民黨作最殘酷的鬥爭。

二、在廣大的羣衆中開展擁護紅軍蘇維埃的運動，我們應該繼續去年上海的光榮的例子，根據最近中央區與四川等地偉大勝利的事實，在廣大的羣衆中進行鼓動工作，組織紅軍之友與蘇區之友征調工人到紅軍中去，發動募捐與慰勞的運動，啓發工人及一切勞苦羣衆自動去擾亂敵人的後方，刺探敵人的消息，到鄰近蘇區的地方去參加和領導農民的游擊戰爭，來牽制和襲擊敵人。此外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將於本年十二月間舉行，

各地必須根據中央的通知，進行廣泛的羣衆運動，在廣大的羣衆中介紹蘇區內工農生活改善的情形，說明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及其作用，並廣泛的宣傳蘇聯與中國勞苦羣衆兄弟聯盟的口號，在這種宣傳鼓動之下組織廣大羣衆的選舉運動，使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真正成爲全國的性質。

三、抓住目前帝國主義瓜分共管與國民黨無恥出賣的事實，開展廣大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與民族革命戰爭，首先各級黨部必須切實檢查和執行中央關於下層統一戰線的那封信，利用一切力量開展反帝大會的運動，在大會閉幕以後各地必須努力建立當地的反帝組織並繼續召集地方性質的代表會，吸收羣衆中的積極分子到反帝組織中擔任工作，在廣大範圍內開展擁護紅軍蘇維埃的工作，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對紅軍的五次『圍剿』，把這一工作與反對日本進攻華北內蒙，反對美日干涉福建的蘇維埃運動，反對英法佔領川康雲貴威脅四川蘇區及日本向蘇聯挑釁緊密的聯繫起來，在各個碼頭組織沒收日貨的崗位，檢查和沒收帝國主義軍火的輸入，與各國反帝反戰的組織聯合一致反對帝國主義派兵和資助國民黨進攻蘇區，在各地成立反對飛機轟炸蘇區委員會，揭穿國民黨航空救國的欺騙，把這些運動與工農勞苦羣衆的切身要求聯繫起來，並在這一基礎上來擴大和充實遠東反戰大同盟的組織，建立和加強各地的分盟，對滿洲的人民革命軍，義勇軍及河北的義勇軍遊擊隊，各級黨部首先是滿洲和河北的黨必須給以堅強的領導和幫助。

四、集中一切力量來轉變工會的工作，各級黨部必須切實的改善和增加與主要的企業的聯繫，特別要注意那些最受資本進攻威脅的企業，這裏最主要的環子就是要在企業中加強和建立工會的赤色小組與黨，團的支部，我們必須切實的檢查各地對於中央關於產業支部決議的執行程度，開展最無情的鬥爭，反對組織中忽視這一決議的傾向，同時各地的組織必須集中所有的力量來爭取對於洶湧澎湃的罷工鬥爭的領導，組織工人階級的反攻，加強在失業工人中的工作與黃色工會工人中的工作。各級黨部必須清楚的了解對於每一個工人罷工和鬥爭的領導就是直接援助紅軍的作戰，我們要用一切力量來加強幾個中心城市的工作，首先是上海，天津，滿州和武漢。上海必須於最近期間恢復紗廠，烟廠的工會與建立碼頭的工會。

五、這次五次「圍剿」的開始，恰恰是廣大勞苦羣衆冬荒鬥爭的開始，整個農村的破產及許多產業的毀滅，加上今年的大水，與各種災難，帝國主義的砲火，與豪紳地主的踐踏蹂躪，非人的剝削，使千百萬的農民，災民，難民，城市的貧民及失業工人完全陷於飢餓，死亡，流離寒冷的苦境，對於他們只有一條革命的出路。各級黨部必須用一切力量加強鄉村中黨的組織與羣衆組織，保證對於廣大農民災民鬥爭的領導，在廣大的範圍內開展遊擊戰爭，創造新蘇區，直接援助和響應前線紅軍的作戰，克服我們在四次圍剿中的弱點，在鄰近蘇區的白區中和「圍剿」部隊的後方，創造我們的工作基礎，派

得力同志到那裏去開闢工作或加強當地組織的領導，這是白區黨在反對五次「圍剿」中非常重要的任務。

對於士兵的工作，首先是「圍剿」部隊中的工作必須有加倍的注意，各地組織必須堅決的消滅最近削弱士兵工作的現象。

要完成以上的任務，我們就必須大大的發展黨內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與反對羅明路線的鬥爭。對於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必須開展最無情的鬥爭，提高一切同志的布爾塞維克的警惕性來檢查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的動搖，澈底粉碎這種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因為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認為目前時局的中心不是兩個政權——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的政權——的尖銳對立，而是軍閥混戰，認為國民黨不敢派白軍去打紅軍，只能用經濟封鎖與狡猾的手段，污蔑紅軍蘇維埃的力量，以為「在物質上國民黨可以在兩三個月內掃盪匪區」，因此就否認國民黨的廬山會議與棉麥借款的中心任務是為着進行五次「圍剿」。這完全是對抗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企圖解除黨動員羣衆的武裝。可是在黨指出他的錯誤以後，他仍然表示不願意承認他的錯誤，而且加深了他的錯誤。對於這種機會主義的抵抗與掩飾，我們必須給以最嚴重的打擊。蘇聯的文豪高爾基說得好：「敵人不願意解除武裝，我們就必須消滅牠」。我們相信我們的黨有一切的力量來粉碎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勝利



的衝破敵人的五次「圍剿」，爭取中國蘇維埃的道路的全部實現。

其次，各地黨的組織必須堅決的爲着新的領導方式而鬥爭，澈底肅清官僚主義的腐朽的領導方式，集中最大的力量來鞏固和加強黨的力量，在廣大的羣衆中開展反對白色恐怖與叛徒的鬥爭，建立我們的堡壘於主要的企業中，加倍注意提拔幹部與徵收的工作，要堅決的打擊那種觀點，以爲徵收工作祇能用「號召」與「運動週」的方式，我們應該爲着經常的擴大黨的組織而鬥爭，首先要在重要的產業中心進行堅決的不懈的羣衆工作，創造和擴大我們的力量。

時機是萬分的緊迫了，粉碎五次「圍剿」的鬪爭，就是爭取中國獨立自由的蘇維埃道路。動員起來！給中央的號召以布爾塞維克的回答！

## 衝破五次「圍剿」與革命的職工運動 的任務

樵

澎湃洶湧的罷工與鬥爭的浪潮是中國革命形勢向前推進的主要因素之一。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與中國國民經濟的崩潰像萬斤重的巨斧打擊着中國的無產階級及廣大的

勞苦羣衆。資本的進攻普遍於各主要的生產部門及許多次要企業，其區域不僅限於上海一埠而遍及中國各大工業中心城市如天津，武漢，無錫，嘉定，南通，廣州，四川，滿洲，在這一資本總的進攻中，各處是實行減工，縮小生產，降低工資與取消花紅賞工加強生產之合理化以增加勞動的強度，減少生產的成本費、停工關廠把成千成萬的工人拋到街道，延長工作時間，更大批的引用女工童工及直接奴役工人如滿洲之十萬以上的土木工人及中國內地修築「勦匪」公路與建立飛機場的各種苦工，皆是強迫勞動，得不到什麼報酬，而身體上之自由同受到軍棍的限制。資本家，黨政，和黃色工會聯合向無產階級實行進攻的結果，使工人生活水平更降到飢餓的死線上，失業隊伍驟增，半失業的狀態更加嚴重，政治上的壓迫，野獸一樣的白色恐怖，威脅每一個「不安於室」不願坐而等死的工人。

但是，中國工人階級秉其革命的傳統，抖擻大革命時代英勇鬥爭的精神，在萬分艱苦的環境中開展着反攻的鬥爭。今年上半年（一月至六月）工人鬥爭的總數是一四一次，其中罷工者七十七次，請願者七十三次，去年同季爲一〇六次，鬥爭六十三，請願四十五次，參加的人數去年同季爲三〇一·一七〇，而今年則爲一一〇·七一四。在人數上來看似乎今年的人數要比去年少得多，但誰僅從這一點而得出工人鬥爭日趨低落的結論，那就是大錯而特錯！實際上在我們的統計表中（見鬥爭四十五期）有許多大的缺陷

：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的滿洲六十萬產業無產階級的鬥爭，差不多沒有包括進去，他是中國無產階級一支強大的隊伍，他有他的英勇的鬥爭：中東路哈長線的工人曾拒絕替日本運兵運械進攻義勇軍，並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幾次募捐援助義勇軍，吉海鐵路工人在磐石附近與農民作了聯合的奪取敵人的武裝，投入遊擊隊，瀋海鐵路工人自動投入義勇軍和大刀會，奉天省東邊各縣的失業工人和伐木工人自動組織和參加大刀會，紅槍會，紅旗會，投入自衛軍，進行堅決的反日戰爭，呼海路工人的抗日鬥爭和自動投入義勇軍，鶴立崗煤礦工人向哈爾濱挺進，在日本憲兵和鎗炮壓迫之下進行一個多月的鬥爭，要求發欠薪，許多煤礦工人投入赤色游擊隊。此外，如滿洲郵務局工人反對日本走狗「滿洲國」接沒郵政的罷工，哈爾濱電車工人幾次反對「滿洲國」軍警和白俄的鬥爭，所有數不清的事實證明滿洲的工人階級是在那裏英勇的鬥爭着。但關於這些鬥爭，我們沒有得到任何可靠一點的統計，這是第一。第二，在我們統計表中並沒有能夠將各大工業中心城市的工人鬥爭概括進去。第三，各個反動的通訊社控制着工人鬥爭消息之傳達與反動報紙之不肯發表這類消息，即發表一點消息而人數輒語焉不詳。第四，在業工人減少了，而失業工人鬥爭的消息幾乎沒有，如果說滿洲的無產階級之百分之六十處於失業，上海一埠有二三十萬失業工人，那麼這些失業者的鬥爭之多是可以想像的，而我們赤色工會在組織失業工人的工作中是沒有得到任何可觀的成績。

綜上所述幾個原因，可以證明我們統計之不完全與工人鬥爭低落論之無稽。這裏，我們不來詳細分析工人鬥爭的形勢，只想概括的指出，以產業而論，在工人鬥爭中佔領導地位的為紗廠，烟廠，以地域而言，當首推上海，次為天津，這是第一。第二，有少數的鬥爭一開始就是同盟罷工的形勢，如在滿洲的長春在數月前連續爆發了兩個大的同盟罷工，一為審業工人的鬥爭，參加者達六千人，堅持很久，一為十一個油坊的同盟罷工，在上海，絲廠三次總罷工，每次若達一萬人以上，打破了多年來的記錄，今春上海英美烟三廠的同盟罷工，同盟軍一萬二千人以上，此外就是至今還在繼續的太古海員的鬥爭。第三，大部份鬥爭多為自發的，佔主要地位的為經濟鬥爭，罷工形勢之尖銳，與國民黨軍警常演成武裝的衝突，武漢民生紗廠的慘劇與南通大生紗廠的血戰，都是極顯明的例子。第四，雖然經濟恐慌情形嚴重與三位一體壓迫之殘酷，但不少的工人鬥爭是得到了勝利。自然在這些英勇的鬥爭中還存在着許多弱點：（一）有不少的一部的鬥爭停留在請願與怠工等較低的階段上，（二）在業工人與失業工人的鬥爭仍舊沒有很好的配合起來，（三）同一部門與相關的廠的鬥爭之聯繫不充分，（四）黃色工會控制大部份的鬥爭，而終為他所出賣。總起來說，由於赤色工會組織上的薄弱，還不能領導和組織全國的工人鬥爭，引進到較高的階段及與蘇維埃運動配合起來。中央在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曾着重指出這點，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因此，我們就來大概的檢

查一下赤色工會在大半年來究竟有些什麼進步，而最重要的，須得力於批評革命的職工運動的錯誤和弱點，從這個批評中得出我們在衝破五次「圍剿」中應該完成的具體任務。

此地，我不想跑得太遠，把衝破四次「圍剿」的整個過程中的革命職工運動加以分析，這在鬥爭四十七期，米夫同志的論文中說得詳而且盡，同志們儘可去參考。單就今年大半年來，赤色工會的工作狀況來說，自然得到一些成績，領導了一些工人的鬥爭，在滿洲自一月至六月有三十六次的大工人鬥爭，其中在黨與工會領導或影響之下者約有十六次，天津裕元紗廠六千人的鬥爭是在我們指導之下爆發了起來，北平財政印刷局反對南遷的鬥爭實在我們領導之下取得了勝利，第一次在平綏鐵路上組織了千餘工人的赤色工會，驅逐了黃色走狗，張垣電燈工人的鬥爭受到革命的領導而達到勝利的復工，在南通大生紗廠數千工人的鬥爭中有過我們的活動和影響，上海英美烟廠第一次大罷工由我們領導而得到部份的勝利，滬西鴻章紗廠的鬥爭，恆豐紗廠的罷工，都有過我們的領導和影響。所以在領導鬥爭上來講赤色工會是得到了一些成績，在廣大工人羣衆中黨與赤色工會的威信和政治影響提高而擴大了，這是今後開展革命職工運動之順利的條件。但是目前這些成績較之客觀的鬥爭形勢仍然是差得太遠了！

而且，赤色工會目前的狀況是非常嚴重的。這表現在：

一、赤色工會產業基礎的微弱與縮小，至可驚人。以上海之紗總而論：在去年十二月初的時候尚有會員將近千人，論單位則在二十以上，滬西的重要紗廠內，都有我們的基礎，如內外棉，日華等。今年春檢查紗總工作的時候，會員的數量已降得很多，許多重要保壘概行失去，至今年之八月則上海紗總會員又繼續縮小，論單位，僅有七個，滬西各紗廠，大都失去。烟總由九百多會員降至今目前之不可容忍的地步，尙且不能完全找到。在河北，赤色會員較去年略有增加，其工業中心天津近遭受破壞，組織上自不能不受影響。在滿洲之三大工業中心如哈爾濱僅有赤色會員××人，小規模的印刷工人殆居其半，奉天則僅有××人，最近的情形不知道，大連僅在開關之中，總計全滿僅有××赤色會員。在武漢方面，工作至今沒能創立起來。

這些都證明我們沒有在鞏固原有陣地基礎之上來發展自己的組織而是敷衍因循，沒有真正的進行艱苦的廠內活動，在鬥爭中來壯大自己。

二、隨着產業基礎的削弱，就是會員的減少。在上海，今年春，據工聯負責同志的報告尙有××赤色會員，到現在僅存××人，不但沒有大的發展（即是有些新的發展，也沒有很好的鞏固起來，會員之流動性甚大），而且有些下降。綜合白區各中心城市之赤色會員的數量來看，則赤色工會到現在還是一個極狹隘的組織。這證明我們沒有堅決執行國際屢次關於轉變赤色工會為群眾工會的指示及奪取工人階級大多數這一主要的戰

略的任務。

三、赤色工會在組織上及其他各方面之不能開展是由於沒有根據廠內活動的原則，在工廠內建立起戰鬥的赤色小組。以上海紗總而論，則除了××，××等數廠有工會小組能開開會外，其餘各廠內並沒有像樣一點的赤色小組，下層的基礎不固，工會的整個工作也就難於振作起來，有些地方，就是上層機關也並不健全。

四、廠內的工作是這樣的沒有開展起來，那麼失業工作又怎樣呢？一句話，我們在失業工人中的工作，還沒有真正的開始。據說，今年春，在上海工聯失業部領導之下的失業委員會，到過三千失業的羣衆，在某些弄堂裏，進行過一些工作，但不知怎的這個失業委員會已不復存在，而會員呢，連關係很久都沒有找到。最近工聯所組織的失業工作委員會和團在碼頭上成立的碼頭失業工人委員會就應該是我們轉變這一工作的起點，加強對他們的領導以開闢和推展開失業的工作。

五、青工女工工作的忽視，至今沒有改變過來。我們的團的工作是沒有堅決採取青年化的路線，而在許多情形之下只是黨的工作方式的再版，最近團關於全國青工鬥爭的報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報告中說到的是一般的工人鬥爭，並沒有專門講青工鬥爭，且是張冠李戴的辦法拿來湊數交卷，至於在那些地方，那些廠內組織了青工的鬥爭青工委員會，青工代表會沒有一字提及，這證明我們白區團的領導及團的組織還沒有真

正把青工工作當作一個工作做，青年團對於青年工人的義務是該這樣嗎？很明顯的，不是這樣。女工工作依舊被人忽視，此病之傳染廣而且深。在罷工前不問女工的意志，以爲「我們男工罷了下來，還怕女人家不幹！」這簡直是取消了進行任何女工工作的必要。今年絲廠前後幾次的總罷工，該給我們許多教訓和刺激了罷，然而在實際上還是見不到對這一工作之緊張的情形。這次，省委的同志也都同意了成立絲廠工會籌備會的問題，可是允諾自允諾，而所謂絲廠工會籌備會雖經多少次的督促，至今仍無頭緒，這又是什麼現象！

六、在黃色工會中的工作，與建立赤色反對派是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可是我們在黃色工會中的工作是薄弱不堪言狀。在這方面遇到了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是對黃色工會的力量估計過高，認爲他們這些工賊有無限的威權來進行拍賣工人鬥爭的事業，在英美烟廠今年第二次大罷工的時候，有些同志以爲我們無法爭取對鬥爭之獨立的領導，黃色工會力量過大，只主張由我們派人監督黃色工會，這自然是一種向黃色工會投降的策略。另一方面便是對黃色工會力量與活動之忽視：在上海，今年好幾次大的罷工鬥爭中如英美烟廠的鬥爭，我們始終不去了解黃色工會的活動的策略，認爲他們的鬼臉已徧被羣衆認清，不會受其欺騙，在這次恆豐的鬥爭中，問到黃色工會的情形時，則答以他們只在工頭中有影響和勢力，然而鬥爭終被黃色工會出賣了，我們



才恍然。在福州七日汽車的鬥爭中，我們的同志認爲黃色工會已完全破產，對於新組織起來之機器工會亦不加注意，而結果不得不承認「……：我們最初沒有估計到黃色工會能夠這樣迅速的巧妙的打進來，在一切工作佈置上事先都未曾注意到這個問題，而事後也不能緊緊抓着黃色工會每一弱點去打擊他，揭露他的欺騙，所以結果黃色機器工會得以在這一鬥爭中提高牠的地位，造成群衆對牠更濃厚的幻想」（見福州市委的報告）。在滿洲，情形雖有些特別，就是一部分的黃色國民黨工會被日本帝國主義所破壞，而一部分工會是黃色領袖所解散，有些捲款而逃，而另一部分領袖留在滿洲，投降了日本和滿洲國。但不管怎樣，我們不能同意滿洲省委負責同志謂「黃色工會概被封閉，沒有了」的結論，這是不完全符合實際情形的武斷結論。太平洋職工祕書處在致滿總和省委的信中明明白白說「赤色工會在奪取羣衆中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在黃色工會和官辦工會內工作」，接着並且具體指出應該「在現有之黃色工會內（北寧路，郵務，印刷，及海員工會）建立革命職工反對派……：在日本和滿洲國官辦的工會內（松花江海員公司）也應工作，在內部建立革命職工小組……」。看見黃色工會發抖與看不見黃色工會及輕視牠的活動都是非常有害的。目前，黃色工會的活動是加強了，更積極的工作着以配合資本的進攻和法西斯蒂的壓迫，在這個時候，看不見黃色工會與忽視牠的活動及在黃色工會工人中的工作的「左」的情緒尤其應該給以無情的打擊。

講到革命職工反對派的情形，算是一點沒有開始。「革命職工反對派的主要任務是依據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之上，聯合有組織與無組織的工人，獨立領導經濟鬥爭，到改良主義的，加特力教的與類似的工會中去工作，使職工會會員羣衆，同叛變的職工會官僚分離開來，使後者孤立，建立把共產黨同羣衆聯結起來的羣衆組織」（見十二次全會的決議）。這樣的反對派在中國還沒有真正開始設立。在上海郵務中我們本有不少的力量，但沒有很好的組織起來。在上海××報館中，我們也有過很大的堡壘，但是我們沒有奪取××報工會幹事會的決心而形成強有力的反對派，結果反爲黃色工會所謀。其餘在英美烟廠，經過團的關係建立得有××人的反對派，終以得不到好好的領導而瓦解，這些例子是告訴我們，在建立反對派的工作上存在着不可允許的疏忽，有時是站在羣衆和羣衆鬥爭以外空喊。

七、上面這些缺點和錯誤自然就不能不影響到赤色會的戰鬥力，這在領導工人羣衆的鬥爭中看得非常明顯：我們僅能抓着最小一部份的鬥爭，且有時尙不貫徹到底；第二，許多大企業裏的工人鬥爭多帶自發的性質，鬥爭起後，多爲黃色工會所出賣，我們連找到鬥爭的線索都很困難，第四，在那些有我們產業支部赤色小組的企業裏，我們沒有對準着各該廠的具體情形與工人羣衆之迫切要求去有計劃的準備鬥爭，即以這次英美烟廠和恆豐紗廠的鬥爭來說，我們犯了許多錯誤：提出來的條件空泛而不切實，簡單的機

械的抄寫赤色工會的綱領。不過在提出要求這一點上，也不僅我們上海的工會和黨，就是其他地方的工會也犯了許多通病：故意的把羣衆的要求條件提高起來，與將羣衆一般的要求同時提出，條件本身模糊，空洞以至於對不同對象而提出的不同要求，混亂的把牠寫在一起而向着一個對象提出，使羣衆不知道到底爲什麼具體要求內容而鬥爭以及不知到底向那個對象而鬥爭；把政治的要求機械的加到經濟要求上面以及機械的與黃色工會所提出的要求對立起來。

這裏，政治鬥爭與經濟鬥爭之聯繫有特殊偉大的意義。這是說，我們要把每個罷工提到高的水準上去，把經濟的與政治的要求共同聯繫起來。政治要求不應當是經濟要求底機械的附屬品，應該是有機的從經濟鬥爭中生長出來，在提出政治要求以及領導罷工進入更高的政治水準時，我們絕不要忘記經濟要求，也不能把牠擺在第二位。可是我們在實際上常常能看到這類幼稚的辦法，不管工人羣衆的情緒與鬥爭開展的程度，隨我們之所欲提出一大堆政治要求，或死板的停留在經濟鬥爭上，這都是不正確的。甚至到現在還有把工人自己該做的事體如組織工會的問題也向資本家提出作爲罷工的條件，更是荒唐之至。

在恆豐和英美的鬥爭中，又可以看出第二個毛病，就是上層機關專來寫些空洞的決定而無實際的工作，以爲我們的決定本身就是一種了不得的力量，沒有了了解，祇有我們

決定奪取了廣大羣衆而爲他們所擁護的時候才成爲一個實際的物質的力量，或者以爲我們的決定只要少數的先進工人了解了便可依靠他們來進行鬥爭。這裏，實又反映着命令主義的遺毒，而命令主義沒有不遭受可恥的失敗的。省委在英美鬥爭爆發的時候便決定要組織多大的罷委，多大的糾察隊，在恆豐鬥爭的時候，我們的紗總便慷慨決定要組織三百人的罷委等等，都沒有能夠實現出來，其主要原因便是我們沒有進行極艱苦的羣衆動員工作，而以自己之決定和計劃自慰。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同志眼光大來些，只要幹大的，倒忘掉了組織各廠各車間的小的鬥爭。最後便是我們始終不了解戰場上的情形而臨機應變的提出策略，如恆豐這次鬥爭中，工人已經大部分復了工，我們仍舊在上面替他們「推測」式的提出大堆要求及如何開展鬥爭，這種落空的戰術之不會得到效果，那是沒有絲毫奇怪的。

所有這些在領導鬥爭中的錯誤和弱點之主要來源是我們沒有堅苦的廠內工作與對廠內情形的不了解及脫離了羣衆。今後革命職工運動的整個轉變就要從廠內工作開始。

赤色工會的這些錯誤和弱點是值得我們在這裏詳加批評，構成這種嚴重現象的原因，第一是黨沒有真正面向企業和工會工作，如河北省委在大半年來沒有一次專門討論過工會的工作，除在文件上空喊以外。黨的職工部是取消了，黨的工會工作也是跟着取消，認工會工作只是全總河北辦事處的事情，實際上把辦事處變成了黨的職工部，這種作

風，一方面固減低了黨對工會工作的注意，另一方面却又妨礙了真正的建立群眾的工會和堅決採取羣衆的路線來開展工會的工作，在滿洲的情形沒有什麼大的差別。大半年來，省委對工會工作從未有專門的文件，只有附帶的說說，就是在全國無產階級之首都的上海黨對於工會工作的注意到現在還是不充分的。

黨之不注意工會工作，從對於產業支部的工作來看也可以證明。中央關於產業支部的決議發下去已將近一年，而河北省委雖處於天津的產業支部非常嚴重的情形之下，也從不想好好地討論，只是當一般的文件看看，就此置之高閣，滿洲省委只是『初步的』討論過，也沒得出具體的辦法來，但是，『哈爾濱的產業支部情形是嚴重極了』，這類的咒語有什麼用呢？江蘇省委該有好的榜樣給人看吧，然而也是與河北和滿洲省委同爲阿兄阿弟，但省委負責的同志却以沉痛之音，哭訴着『上海沒有一個真正的產業支部』，這自然是一種驚慌失措的估計，但我們的產業支部沒有做到應有的程度及大部分尙沒有成爲在廠內組織和領導工人羣衆鬥爭的堡壘，不能說不是事實。不從產業支部做起，則今後工會的工作是不會有什麼起色，那是無容置疑的，這是第二，第三，我們的工會始終沒有學會怎樣將秘密工作與公開活動配合起來，至今仍陷於狹隘的範圍中，變成了一個比黨更加狹隘的組織，這種僵局不打開——而這種僵局之打開是要在羣衆鬥爭中才有可能——則赤色工會之變爲羣衆的組織終將是一個幻想。第四，工會的生活之不健全

與領導機關之不鞏固，及領導幹部之犧牲。第五，工會的領導方式之脫離羣衆，命令主義的殘餘，數目字的呆板的領導不能啓發而且妨礙着會員羣衆的積極性與自發性，不着實際的空喊「組織模範的罷工」。轉變這一領導的方式是工會工作轉變的先決條件。

最後，我們不能不着重指出革命職工運動中各種不良的傾向更加障礙着工會工作的改善與發展。關於這一點，我們下面再講。

五次「圍剿」已經開始了。這與資本的進攻是不可分離的，我們要爭取完全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白區勞苦羣衆反帝和反國民黨的鬥爭，與蘇維埃運動很密切的配合，歷史提出了許多偉大而緊迫的任務，擺在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的職工運動的前面。這要求我們用一切力量來克服上面這些錯誤與弱點，發揚我們的成績，以保證掀起白區內工人鬥爭的巨浪來衝破敵人的「圍剿」。這裏，除了一般的應該百倍加強工會工作，加緊領導工人的鬥爭與罷工，提到政治上的高度來回答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和資本的進攻，在克服上面的錯誤和弱點基礎上以推進全盤的工作外，我們在這裏先提出幾個具體的任務來：

一、建立和加強軍事工業及交通工業中的工作。這裏，首先要打進各兵工廠，將在這方面失去了的陣地（如上海）很迅速的恢復起來，成立支部和赤色小組來動員兵工廠

的工人不遺一槍一彈去進攻紅軍和沒收自己所造的武裝來武裝自己。在輪船上要成立船上小組與船上委員會，組織羣衆的偵察，監視運輸的東西，我們向海總黨團提議立即檢查外洋委員會和長江委員會的工作，並進行這一工作之專門的具體的佈置，務須做到不運一槍一彈一架飛機入口，不運一兵一槍一彈一架飛機入內地進攻蘇區，在碼頭上開展極大的羣衆工作，成立碼頭籌備處，以組織碼頭上的工人（在上海即有十四萬之多）來沒收進口的武器，在鐵路上利用平綏路的經驗開展極大的工作，首先必須在上海恢復鐵總的工作。

二、加強失業工人中的工作，首先在上海工聯領導之下新成立起來的失業委員會須立即進行廣泛的羣衆的工作，發動他們的日常鬥爭，從這些鬥爭中徵調失業工人到鄉村中去領導農民的鬥爭，首先是隣近蘇區的農村的鬥爭及加緊組織大批失業工人到紅軍中去的工作。團應該加緊青年工人的動員，要把這一工作放在每日的工作日程上。

三、開闢在經濟上軍事上極關重要的中心工業城市（如武漢……）的工作。

四、在一切工廠內，鐵路上……開展極廣泛的羣衆工作來擁護紅軍，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要求將勦赤費與棉麥大借款全數救濟失業工人和災民。

自然這些工作是最低限度的，我們應該到處組織強有力的工人鬥爭，每一個成功的罷工都是給紅軍以莫大的幫助而削弱敵人的力量。這裏，仍需要我們轉變整個工會的工作

作。

中央在關於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會着重指出：

「集中黨的注意力，在最受資本進攻威脅的企業中去進行堅苦的羣衆工作，組織工人階級的反抗，採取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這也正是我們最大的弱點之一——作者特誌），以孤立反革命派與增強我們與羣衆的聯繫，必須具體的開始建立羣衆的赤色工會與爭取國民黨工會工人的工作」。

要完成這些任務，我們必須打擊革命職工運動中各種不良的傾向，如有人竟謂城市工作無法進行，只有到鄉村去組織游擊戰爭才有辦法，這裏，實際上是取消城市工作，放棄組織城市無產階級的任務，這與中央的決議和黨的基本路線相違抗；又有人說，我們不能抓住工人羣衆的鬥爭是由於工人對我們赤色工會失望及害怕連累，致工人活動份子不願與我們發生關係，實際上這只是證明我們工作的萬分不夠，決不是如叛徒們所武斷宣傳的，共產黨和赤色工會已爲工人階級所唾棄了；再有人說，工人羣衆不要求有自己工會的組織，雖認黃色工會爲「打頭工會」，但跟着黃色工會走可不吃官司，這裏，很明顯的在侮辱中國的工人階級；還有人認爲中國白色恐怖這樣嚴重，要變赤色工會爲羣衆的組織，那是癡人說夢，這至多只是一個宣傳的口號；否認赤色小組的任何作用及在實際上不建立赤色小組——這些不良的情緒與傾向之剷除乃是我們在轉變革命職工運



動以衝破五次「圍剿」中最必要的條件。

九月二十九日

## 粉碎五次「圍剿」與反傾向鬥爭

浪

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中着重指出，必須「開展黨內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與羅明路線的鬥爭」，因為這是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先決條件。

爲的要說明目前反傾向的鬥爭，我們先說一說一般地我們黨內機會主義的來源及反傾向的意義，這不是「多餘的」，尤其是因為現在有些機會主義企圖把他們的離開黨的路線的傾向看作是「偶然的」錯誤。同時有些同志未能明白機會主義的害處，或者對於機會主義表示調和態度，使我們不能不從頭說起。

列甯和列甯主義者屢次說過并證明過，布爾塞維克黨，是在反對各種傾向，反對各色各樣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在兩條戰綫的鬥爭中，生長起來和鞏固起來的。這種鬥爭所以必要，第一，因為機會主義是妨害我們和敵人作戰的，是要把我們引到失敗的道路上去的；第二，因為機會主義的動搖，是有深刻的社會階級根源，這些動搖，在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的每一階段，每一個歷史轉變關頭，都會產生的，直至資本主義的最深刻的

根源完全消滅為止。列甯說得對：

「俄國是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中最落後而最多小資產階級的國家中之一國。因此工人的羣衆運動，不是偶然的而是必不可免的產生了這個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派別」（見「工人運動中的思想鬥爭」，列甯全集第一版十二卷下冊四六七頁）。

機會主義，小資產階級的這些動搖的兩個「淵源」，列甯認為就是「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以民主空談去掩蓋其對資產階級的卑躬屈節）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口頭上是威嚴的，吹牛皮的，實際上完全是散漫的，虛浮的，無頭腦的）（見「新的時代，舊的錯誤的新花樣」，列甯選集卷五，一八三頁）。這兩個「淵源」在不同的時候表現出不同的花樣，有時成爲公開的右傾機會主義，有時成爲「左」傾機會主義。

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所以能夠時常深入無產階級的隊伍中，卽斯達林同志所說的「無產階級政黨內部的矛盾」，是在兩種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這就是：第一在階級鬥爭環境中，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散佈其影響，無產階級中那部份最不堅定的階層（卽無產階級政黨中最不堅定的階層），常受此影響而向其投降。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與社會上許多不同階層之間，並沒有萬里長城隔着。第二，因爲工人成份之複雜，其中有各種不同的階層：有的是世世代代的工人，這是無產階級的基本

舉來，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可靠的柱石」，有的是不久從小資產階級中出身的，這種階層將自己的習慣，意識，動搖都帶到工人階級隊伍裏來，這一階層是「一切無政府主義，半無政府主義和「超左派」之最便當的基礎」，有的是工人貴族，工人階級中之上層份子，他們總是希望和資產階級妥協，這一階層正是「一切公開的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最適當的基礎」（見斯達林著的「論反對派」，中文版一四六——一四七頁）。因為上述的情形，在無產階級政黨中，在一定的時候，必然會產生各種機會主義的傾向，黨內的分歧，反機會主義的鬥爭。關於這一點，斯達林同志寫着：

「自然，在階級鬥爭發展中每一個轉變關頭，在這個鬥爭每一次加緊與困難加強之下，無產階級各個階層間的觀點，習好和感情之差別，必然立刻反映到黨內來，引起許多分歧的意見，而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又必然使這些分歧更加劇烈起來；無產階級政黨內的鬥爭，便是跑出這個分歧的出路。

這些就是黨內矛盾與分歧的根源」（「論反對派」一四八頁）。

無產階級政黨為堅持其本階級的整個階級的利益，為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見解、政策、策略等等，必須進行無情的鬥爭，以克服這些矛盾與分歧，反對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祇有這樣才能使無產階級的政黨發展和鞏固起來。「這就是說，以鬥爭來克服黨內的分歧，乃是本黨發展的規律」（同上，一四五頁）。

無產階級政黨的這種發展的辯證法，不但在蘇聯，而且在其他各國，在我們中國，也是正確的，完全適用的。中國是半殖民地的國家，比革命前的俄國更要落後，因此在革命中將有更大的困難，將有更多的動搖，更繁複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傾向，甚至有更多的變節者。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對於我們更加迫切，需要更大的布爾塞維克的堅決性與頑強性。

克諾林同志在共產國際十二次全會上的演說中着重的指出，中國『革命運動達到了高度的規模』，在中國『布爾塞維克已經最後形成了。這個事實有首要的意義』。我們的黨如何獲得了這種偉大的勝利呢？這顯然是由於我們黨在與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作了長期的鬥爭，執行了正確的國際路線，布爾塞維克的路線之結果。

我們曾經反對了陳獨秀主義，盲動主義，托洛斯基主義，立三主義，羅章龍右傾機會主義，兩面派的調和主義等等的鬥爭，這已經是人人知道的事實。正因為我們作了這些鬥爭，正因為我們肅清了我們黨內已形成的各種機會主義派別和小組織（特別是從四中全會以來）使我們黨在布爾塞維克的道路上大踏步前進。無論在黨員數量上，成份上，理論與思想水平上，黨與工農勞苦羣衆的聯繫，對於羣衆鬥爭的領導，在羣衆中的政治影響與組織上鞏固這個影響，黨對於蘇維埃紅軍的正確的領導等等，都獲得了莫大的進步。

近年以來我們黨所獲得的最大成績之一，就是我們粉碎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帝國主義國民黨對於紅軍的四次「圍剿」是在國民黨出賣了上海十九路軍士兵與勞苦群眾的一二八的抗日戰爭以後，這次的進攻繼續了約一年之久，在本年二三月間國民黨軍隊在黃陂東陂的慘敗之後，就被我們衝破了。四次「圍剿」的衝破，是由於紅軍的英勇善戰，紅軍戰鬥力的加強，蘇區與非蘇區的廣大的勞動羣衆對紅軍蘇維埃的同情與各方面的擁護（精神上和物質上），以及主要的是我們黨的正確的領導，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的執行，堅決的反對了與克服了我們隊伍的各種機會主義的動搖。

在反對四次「圍剿」的鬥爭中我們黨內各種機會主義動搖的主要的表現就是：第一，對於兩個世界，即資本主義世界與社會主義世界的對立估計不足，對反蘇聯戰爭危險估計不足，因此忽視了或放鬆了反對這種危險的鬥爭與擁護蘇聯的戰鬥任務。第二，對於中國兩個政權的對立的了解或估計不足，由此產生了各種「左」右傾的機會主義見解，把軍閥戰爭看作是主要危險，不了解各種軍閥對紅軍一致的進攻，沒有看見帝國主義直接干涉中國革命，有些人以爲「滿州事件，完全是爲了日美衝突」。這自然不能正確的提出與執行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對紅軍進攻的主要任務。第三，過分估計我們敵人的力量，而不相信革命的力量，紅軍的力量，由這裏表現出悲觀失望，主張縮小紅軍，由紅軍化爲地方武裝或遊擊隊（湘鄂西的潘家珣等——後來成了公開的反革命），或在

敵人進攻中實行「總退却」解散紅軍（鄂豫邊的沈宗源）等的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也有看輕國民黨的進攻的危險，以爲國民黨已經不敢進攻紅軍了，或者把國民黨看作是進攻紅軍中的「偏師」（鄂豫皖同志），這種似乎「左」的估計，同樣是使我們不去執行衝破敵人「圍剿」的迫切任務的有害的機會主義。第四，不了解或忽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及其意義，這首先表現於職工運動中的機會主義，以爲危機中不能罷工或工人害怕「鬥爭」，以此掩蓋其對於領導工人鬥爭的消極，不去發動一切工人的經濟與政治鬥爭，加強與鞏固工人階級在反帝與土地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其次表現於所謂「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或蘇區沒有無產階級等等的機會主義的估計。第五，在反帝鬥爭表現出兩個不可容許的極端，或者是完全採取關門主義不去爭取反帝的公開與半公開活動，不去爭取與領導廣大的羣衆的反帝鬪爭在下層統一戰綫基礎上來實現我們的主張，或者是完全公開而降低我們的主張，做了國民黨的尾巴。第六，把革命發展不平衡，「了解」爲工人運動落後於農民運動，或者北方的革命運動落後於南方，因此忽視無產階級在革命中鞏固着的領導，忽視在北方爲建立蘇維埃與紅軍而鬥爭的意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這些就是在反對四次「圍剿」中我們隊伍所表現的各種機會主義的動搖。我們曾經在我們黨內開展了堅決的無情的鬥爭，反對與克服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這種鬥爭充滿

於我們的刊物中，文件中，會議中，黨員羣衆中，黨的領導機關中以及我們的實際工作中，在這種鬥爭中我們揭破了與粉碎了一切有害的與黨的路綫對抗的機會主義觀點，實現了國際和中央布爾塞維克的路綫與策略，使我們黨在紅軍中，蘇維埃中，在工農羣衆的鬥爭中的領導都加強了，我們的工作方式與領導方式改善了，我們黨的團結與戰鬥力增大了，我們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大大的進步了，即此，便保證了四次「圍剿」的粉碎與我們的偉大的勝利。雖然我們在工作中還有不少的弱點與錯誤，妨害了我們爭取更大的成績，但是我們所得的勝利是不可估計的，而這個勝利是布爾塞維克路綫的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且爲每個同志所應當明白了解的。

但是，我們能不能說：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已經做得充分了而可以減輕這種鬥爭呢？機會主義的動搖已經完全克服而不至在我們黨內發現呢？不，絕對不能這樣說。反機會主義鬥爭不是到處做得很充分，機會主義的動搖，並沒有完全克服，而且在新的鬥爭環境之下，各種機會主義動搖又在我們隊伍表現出來，同時在許多情形之下在新的形式中重復着舊的動搖，因此不但不能絲毫減弱我們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而且要加強這種鬥爭，反對離開黨的路綫的一切傾向，首先是悲觀失望的右傾，目前最危險的機會主義，以執行擺在黨的面前的新的任務。

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被我們粉碎了。四次「圍剿」的粉碎使我們的力

量在各方面都加強了，敵人的力量在各方面都削弱了，這使得國內階級力量的對比有新的有利於我們的變動，使革命形勢更加發展與尖銳化，使得解決從民族危機與經濟浩劫中的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出路的問題極端尖銳起來，『在中國前面放着絕對的問題，或者被帝國主義瓜分共管而成爲完全殖民地，或者是獨立自由領土完整的蘇維埃中國。這個問題的解決，將在最短促的歷史時期中』（中央關於五次『圍剿』的決議）。帝國主義用一切力量經過其忠實走狗國民黨去實現中國的完全殖民地化，國民黨不惜用任何的投降出賣，任何的代價去取得帝國主義的幫助，動員一切反動力量來準備與實行新的大規模的五次『圍剿』，這就是要使帝國主義瓜分共管中國使中國成爲完全的殖民地的。我們的任務就在於爭取危機中的革命的出路，而衝破五次『圍剿』，便是爲這個革命出路的鬪爭，爲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鬥爭。因此，衝破五次『圍剿』有莫大的意義。五次『圍剿』中帝國主義是直接的作用更大了，五次『圍剿』是比以前四次更加劇烈和殘酷的決戰。但是我們有比以前更充分的取得勝利的條件和完全粉碎五次『圍剿』的一切可能，而動員我們一切力量使這種可能變爲實現，澈底衝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這就是我們黨目前的中心任務，而其餘一切任務都是附屬於這個中心任務的。

爲執行目前這個中心任務，爲衝破五次『圍剿』必須反對我們隊伍裏各種機會主義



的動搖，這些動搖主要的就是對目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對革命力量的不信任的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傾向。

目前最鮮明的機會主義傾向就是羅明路線。羅明路線是退却逃跑的路綫，取消蘇區等等的路綫，這個路綫由於過分估計敵人的力量，看輕革命的力量，不相信紅軍和工農勞苦羣衆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能夠戰勝帝國主義國民黨。這種路綫，與黨的進攻路綫，沒有絲毫相同之處，而且是完全相反的。羅明路線的首領羅明同志對於閩西上杭，永定等處做了長期英勇的革命戰鬥的工農羣衆描寫成爲「十分恐慌，沒有辦法」，「不得不暫時妥協屈服」。這顯然是機會主義對羣衆的估計，羅明同志從這種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出發，認爲什麼人也沒有辦法，就算是「列寧復活」也好，他說：

「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斯達林同志，或請列甯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羣衆大演說三天三晚，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澈底轉變羣衆的情緒」。

既然羅明同志認爲把世界上最好領袖「一齊」到閩西去，「也不能澈底轉變羣衆的情緒」，那麼像羅明同志這般機會主義者還有什麼辦法呢！最好只有退却逃跑而已。這就是羅明路線的實質。羅明路線「公開走上了取消黨取消羣衆革命團體的取消主義道路」（蘇區中央局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羅明同志的路綫對於閩西的工作發生了極有

害的作用。同時江西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峻，古柏等同志擁護與實行了羅明路線，主張放棄蘇維埃根據地，主張紅軍上山，反對擴大紅軍，根本取消反帝運動等等，而且根據他們這些機會主義路線而形成了反黨的小組織。這些都表示出羅明路線是如何危險了。因此必須在全黨來開展反對羅明路線的最無情的布爾塞維克的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才能保障黨的統一，才能解決衝破五次「圍剿」的最負責的任務。

機會主義動搖的另一種表現，就是對於敵人「圍剿」與階級鬥爭尖銳所引起的困難表現投降，屈服，認為我們沒有辦法去征服困難。這是對敵人力量過分估計與不相信我們力量的羅明路線的一種形式。中央蘇區有些同志公然說，蘇區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地主富農的手裏，說蘇維埃機關都為地主富農所把持，甚至像何叔衡同志那樣說：「各級蘇維埃政府成為地主富農壓迫工農群眾的工具」，說中央蘇區三百萬人口中有二百萬受地主富農的壓迫——所有這些，簡直是對土地革命與蘇維埃政權最大的污蔑，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胡說。如果像他們所說的一樣，那麼，蘇區便談不到什麼土地革命了，蘇維埃政府也就和國民黨政府「一樣」了，蘇區的羣衆也如國民黨統治下一樣受「壓迫」了，這難道不是最大污蔑與胡說嗎：這樣的說法，只能幫助我們的敵人來污蔑我們的。

機會主義在敵人殘酷的進攻之下，在新的困難面前，完全表示張惶失措，絲毫看不

見我們成績，不知道土地革命的利益是落在最大多數的貧農中農手裏，蘇維埃政權是工農勞動者自己的政權。正是因為這樣，羣衆能夠這樣積極參加土地革命與革命戰爭，保護蘇維埃政權，這些事實又粉碎了一切機會主義的胡說，宣告了機會主義的觀點的全部破產。

自然我們不否認我們的困難，反之，我們正確的指出我們的困難，認定我們的困難是可以克服的，因為我們的困難是發展中的困難，「這就是說，我們的困難本身就包含着戰勝這些困難的因素」（斯達林）。同時我們指出困難，為動員我們的力量去克服困難，不像機會主義者一樣，認為沒有辦法而去向牠投降。關於這一點，列甯說的非常正確：

「但是，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是永遠「困難的」，而他們（即指馬克思主義者——浪）與自由主義者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不把困難的當作沒有辦法的。自由主義者把困難的工作稱為沒有辦法的工作，為的要掩蓋他拋棄這個工作。工作的困難使得馬克思主義者趨向於更密切的團結最好的份子以克服困難」（列甯全集十二卷下冊，五七八頁）。

列甯這段話，似乎是為着現在的何叔衡同志等而寫的。何叔衡同志的觀點，是自由主義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不是我們的觀點。反對這種觀點，必須用全部力量去做鬥

爭，尤其是因爲這種觀點，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只在中央蘇區才有，而在另的地方，在湘鄂西也同樣發現的。湘鄂西有些負責同志因爲看見反革命份子鑽入蘇維埃機關，便懷疑整個蘇維埃都是反革命份子把持的，甚至認爲「要宣佈省蘇維埃的罪惡」。這也是同樣對蘇維埃的污蔑。這些同志不了解，反革命份子所以能夠鑽入蘇維埃機關，是由於我們的警惕覺性不夠，由於我們反對反革命派的思想與政治鬥爭不夠。我們的任務在於加緊反對反革命派，而不是減弱或破壞蘇維埃的威信，這種威信是要在群眾中提高的。像湘鄂西同志那樣的觀點，是破壞蘇維埃的威信，反對蘇維埃制度的本身，而不是反對革命的罪惡，這只有利於反革命的。這是失敗情緒的反映，不相信自己力量，過分估計敵人的力量的表現。這種觀點甚至發展成爲取消主義的，比方湘鄂西一些同志主張解散黨與一切羣衆組織，另起火灶，這是最有害的機會主義。

最後，機會主義動搖的明顯的表現，就是狄康同志在「鬥爭」上各篇文章中所發揮了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的觀點，主要的也是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過分估計敵人的力量，輕視革命力量，首先是對於紅軍的力量不相信，而表現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的動搖。試看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吧。

第一，狄康同志把軍閥戰爭作爲時局的中心，忘記了中國兩個政權的對立，是目前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因素，因此他在「廬山會議的大陰謀」（「鬥爭」四九——五〇期）

一文中認爲「廬山會議的結果，最重要的就是嚴密的封鎖蘇維埃區域——其餘的決議……都只是軍閥混戰的準備」。照狄康同志看來，廬山會議的中心問題，除了封鎖蘇區之外，「都是軍閥混戰的準備」，而不是準備五次「圍剿」。這顯然是沒有看出兩個政權的對立，不懂「圍剿」紅軍蘇區是爲目前決定南京反革命政策的廬山會議的主要任務。廬山會議的目的，是計劃五次「圍剿」，甚至國民黨軍閥也公開承認的。八月七日的申報上登載某軍事專家的談話，其中說：

「廬山會議的內容……軍事部份規劃特別精密（一）海陸空軍建設費九萬萬元分三年；（二）「清赤」定九月一日開始」。

廬山會議對於軍事部份「規劃特別精密」并決定軍費九萬萬元，試問這是否僅僅爲了「封鎖」，爲了「有組織的飢餓政策」，爲着軍閥混戰呢？不是的。這顯然是爲「清赤」，就是說，進行五次「圍剿」。這樣一來，我們的狄康同志，甚至比軍閥的估計還要「進步」了，甚至軍閥不敢和不能掩蓋的事實，狄康同志也掩蓋起來了，這雖屬駭人聽聞，然而這是事實！

當然，廬山會議也是決定了「嚴密封鎖蘇區」，國民黨劊子手反對蘇區民衆無所不用其極，甘冒一切罪惡，但是封鎖不是國民黨目前主要手段，而主要的手段却是軍事上的進攻。爲了這個目的，國民黨所以用九萬萬元的大宗款項去建設海陸空軍，「組織軍

官團，重新訓練自己的軍官，調遣新的大批部隊入贛，招收與訓練新的十五師軍隊，用一切收買與利誘的方法，團結反革命的各派軍閥，一致的向蘇維埃與紅軍進攻」（中央決議）。如果僅僅爲經濟上的封鎖，那麼上述的軍事上的準備是「多餘的」了！

然而，不管國民黨如何用全力去準備他的武裝力量，而狄康同志却認爲國民黨反對紅軍蘇區「最重要的」是封鎖。試問這些武裝力量有什麼用處呢？在狄康同志看來，也許是爲了軍閥混戰吧。狄康同志在這裏是有他的機會主義的「邏輯」的，有他的「解釋」的。正因爲狄康同志把軍閥戰爭作爲時局中心，對於兩個政權估計不足，忽視五次「圍剿」，所以發生他的機會主義的觀點，所以他在許多文章中着重說明軍閥的矛盾「爭奪」，「混戰」，把國民黨的各種大借款和國聯的「技術合作」，都看作是「準備着新的軍閥混戰」，是「開發西北」等等（「鬥爭」四八期「瓜分混戰下的中國西部」，五一期「斥汪蔣通電的狂吠」和「狗搶骨頭吃」各文）。而不是首先爲進攻紅軍。這就是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我們反對狄康同志這種觀點，不是否認軍閥間的矛盾，不是否認軍閥戰爭的可能與事實，而是反對他看不見兩個政權的尖銳的對立，只看見軍閥戰爭，不懂得在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中，大規模的軍閥戰爭是不可能的，因爲紅軍與蘇維埃的勝利是帝國主義國民黨整個反動統治的致命的威迫，所以他們聯合一致的去進攻蘇維埃紅軍，他們企圖在

進攻紅軍中去解決或緩和他們內部的衝突，這就是問題的中心。這就是狄康所不了解的。雖然狄康同志在一些文章中說過軍閥一致進攻紅軍的話，但問題的實質，不因此而有所改變，因為他既然對於兩個政權尖銳對立及革命形勢估計不足，那麼，這種說話，都是無內容的。

這就是狄康同志的第一個機會主義的觀點。

第二，因為狄康同志不了解兩個政權的對立，所以他否認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他在「廬山會議的大陰謀」一文中說：「國民黨的白軍不敢開到前敵去打」，說「他們不敢叫大隊的兵士去打，却只敢「封鎖」，「包圍」，步步為營」。狄康同志這種見解，顯然是否認五次「圍剿」的，是與中央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相對抗的。如果白軍「不敢開到前敵去打」，如果國民黨「只敢封鎖」，試問還有什麼五次「圍剿」呢？還有什麼衝破「圍剿」的任務呢？狄康同志的見解不能武裝我們去執行粉碎五次「圍剿」的鬥爭任務，而是解除我們反對「圍剿」的武裝的，這是最有害的機會主義的觀點。

在帝國主義國民黨瘋狂準備五次「圍剿」以及正在各方向紅軍作絕望的進攻的現在，狄康同志的觀點，客觀上是掩蓋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罪惡的，這祇有利於我們的階級敵人。這顯然是右傾機會主義。

在表面上看來，狄康同志的錯誤似乎是「過分估計了革命形勢」，似乎是很「革命的」的，狄康同志在自己給編輯委員會的聲明書中正是企圖這樣去說明他的錯誤的來源的。然而，這只表面上的，而在實際上是極右的，替階級敵人反對蘇區紅軍，反對已經解放的工農羣衆，實現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與中國成爲完全的殖民地等等的罪大惡極作辯護，是對革命形勢的估計不足，是對於我們的力量不信任，這裏沒有一點革命的精神，如果我們進一步去研究他在同一文章所犯的更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時，更可以明白看到。

第三，狄康同志在「廬山會議的大陰謀」中居然說：「照物質上的力量比較起來，白軍真可以兩三個月『盪平赤匪』。然而不，他們不敢叫大隊的兵士去打……」。這不但是機會主義的過份估計敵人的力量和不相信紅軍的力量，這簡直對紅軍的力量力的污蔑！簡直是蔣介石劊子手和一切反動派武斷宣傳的俘虜！須知正是蔣介石屢次無恥的說：三個月內完全「肅清共匪」，這種武斷宣傳叫喊了好幾年，然而帝國主義國民黨不但不能「肅清」，甚至不能阻止紅軍的發展與蘇維埃革命的前進，這不是紅軍力量強大的最好的證明嗎？顯然是的。

試舉數目字來看吧。一九三一年紅軍消滅了敵軍三師五旅十五團共約六萬人以上；俘虜敵軍五萬二千人；繳獲機、步、砲共四萬四千餘枝，無線電機八架；俘敵師長三，旅長二，團長二，副師長一。一九三二年消滅敵軍六師十二旅六團共約十萬六千人以上



；俘虜敵軍七萬一千餘人；繳獲機、步、鎗五萬四千六百枝，飛機兩架，大砲二百九十門，無線電機五架；俘虜敵師長二，副師長一，旅長六，副旅長一，團長十四，營長二，參謀一。一九三三年上半年消滅白軍四十一團六營十連約共四萬五千人，擊潰白軍八師三十三團十九營九連約共十二萬八千人，總共消滅和擊潰白軍十七萬八千人；繳獲步槍三萬一千四百七十一枝，重機關槍五百二十六枝，輕機關槍二百七十餘枝，短槍四百三十七枝，無線電機五架，迫擊炮六十九門，俘虜白軍官兵三萬七千二百三十餘人，打死師長二，旅長六，團長十，副團長一，俘師長一，師參謀長一，旅長三，副旅長一，團長六，司令一，副團長二；擴大十三縣的蘇區。

從這些數目中可以看出，紅軍消滅敵人的數目是年年增加，就是說紅軍的力量是年年增大的。比方一九三一年紅軍消滅了敵人六萬人，一九三二年則消滅了十萬六千人以上，幾乎增加一倍，而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已經消滅和擊潰了敵軍十七萬八千人，即比一九三一年增加三倍了。紅軍俘獲的敵人，繳得的槍械軍用品也是年年增加的。這些鐵面無情的事實，嚴格的粉碎了機會主義污蔑紅軍力量的估計。此外，說到紅軍的「物質力量」時，我們不能限於槍械和戰鬥員的數量，我們還要估計到紅軍的戰鬥力，紅軍的技術，蘇維埃紅軍的根據地的擴大與鞏固，擁護紅軍的千千萬萬的勞苦群眾等等，這是紅軍的活的無限力量的來源。在這一方面，紅軍的進步是非常之大的。最後，紅軍作戰

經驗的豐富，政治上思想上階級成份上的大大提高與改善，我們黨的領導之加強，也要增大紅軍的物質力量的。馬克思說過：『當思想也把握了羣衆時，思想也成爲物質力量』。

紅軍力量的加強，是粉碎了四次『圍剿』和應該成爲粉碎正在開始的五次『圍剿』的主要條件之一，這是機會主義者狄康同志所沒有和不願意看到的。在他看來紅軍所以衝破了敵人的『圍剿』（其實他不承認有『圍剿』），無非因爲國民黨『不敢打』，如果國民黨『敢打』，那麼『真可以兩三個月盪平赤匪』！這樣看來，國民黨未免太『寬容』了！請看悲觀失望的機會主義者的邏輯會弄到什麼地步！這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的學說沒有絲毫相同之點。

第四，與狄康同志上述的錯誤有連帶關係的，就是他否認國民黨的恐怖屠殺政策。他說：在所謂『收復匪區』『國民黨的槍砲和大刀的力量其實是微小得很。他們只能夠（？）用一些狡猾和奸詐的手段來『緩和人心』，等待着更好的機會，再進一步的實行完全恢復地主和豪紳資太家的十足的舊式的剝削』（見『臨死的呼號』，鬥爭四十八期）。

狄康同志顯然否認了國民黨的恐怖政策和槍砲作用，這實際上也是掩蓋了國民黨屠殺民衆的罪惡。無論國民黨用怎樣的欺騙（無疑的，國民黨的欺騙是很多的，而且是最

無恥的)，但是，除了槍砲大刀和最殘酷的恐怖屠殺之外，國民黨是無法維持其血腥統治的，這不僅在白區，就在所謂『收復匪區』也是一樣。試看國民黨在鄂豫皖及其他一些『收復區域』所用的恐怖政策與焚燒屠殺的事實，就可以明白。狄康所謂『只能夠用一些狡猾和奸詐的手段』，是做了蔣介石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武斷宣傳的俘虜，或者甚至還要壞些，因為他完全否認了國民黨的軍事。這也是沒有絲毫列甯主義的氣味的。正是列寧自己說過：『階級是欺騙不了的』。這當然不是說壓迫階級不會欺騙，我們不要揭破反動的欺騙，不，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剝削階級非有欺騙不行，我們應當在一舉一動中去揭破剝削階級的欺騙。列甯這個論點是說：關於階級間的問題，是由階級鬥爭，由力量，直至由武裝力量來解決的，如果事實已經發展到國內戰爭的話。

第五，狄康同志以機會主義來曲解我們的反帝鬥爭的任務，把反帝國主義看作是單純的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他在《鬥爭》四九——五〇期上的『國際反帝大會——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一篇文章裏說：

『中國工人，中國的一切革命團體，除開其他的準備大會的工作之外，必須着重注意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的問題。每一個工廠的工人，每一個革命團體……都要經過反帝大會，經過國際反帝調查團，經過各國勞動者和革命者的代表，表示我們對於國民黨外債政策的抗議，我們要請世界各國的工人和革命者，一致起來』

反●對●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等●借●給●國●民●黨●政●府●鉅●大●的●外●債●……」（着重點是狄康同志自己加上的）。

狄康同志把反對國外的外債政策，看作是反帝大會的唯一的或主要的任務，這是機會主義的降低我們的主張和任務，與我們黨的見解沒有相同之處。我們黨認為「對於這次大會必須根據中央過去關於救國會會議及統一戰線的兩封信，以及最近許多指示着重指出注意提出以下的問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向蘇聯挑釁，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共管中國的所謂『技術合作』，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德國法西斯蒂恐怖政策及中國的法西斯蒂，武裝民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英法進佔西康及雲貴，反對五次『圍剿』，反對國民黨向帝國主義大借款及購飛機進攻蘇區民衆，要求將這些借款與飛機全部拿來抗日，由民衆自由管理，創立武裝的民衆反日義勇軍，援救現有的義勇軍，擁護蘇維埃政府的宣言，要求一切反帝的自由與民主權利，要求釋放一切政治犯……」（中央緊急通知）。

我們看見在這次反帝大會問題上狄康同志和黨的見解也是完全不同的，中央把反對國民黨借外債及購飛機進攻蘇區民衆，作為這次反帝大會的一個任務，而狄康同志認為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是反帝大會的全部的任務。這裏分歧是極明顯的。自然，我們不是反對把國民黨的大借款的問題，作專門的分析，這種分析是必要的。我們也不認為

每篇文章都要說到像中央通知中所列舉的一切問題，這是不需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去提出這個問題，在什麼立場上去分析這個問題。狄康同志的錯誤在於問題提法本身的錯誤，把反帝大會看作只是反對國民黨的外債政策，使我們在反帝大會許多中心問題與政治任務，化爲烏有。狄康同志雖然也企圖加上一個附帶說明，來表示他似乎注意到其他的政治任務，然而對於問題的本質不會有什麼改變，因為他所說的是『其他的準備大會的工作』，而不是反帝反戰的鬥爭。狄康同志的觀點，是要降低我們的主張和政治任務，是機會主義的走方便路。這不是布爾塞維克的事情。

這些就是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的觀點。狄康同志這些觀點與對黨的路線的動搖，是有他的根源，狄康同志曾經犯過非常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些錯誤不但沒有完全改正，而且在一定時候重複表現出來。比方在四次『圍剿』開始的時候，他起草了一個文件，完全忽視了擁護紅軍蘇維埃的任務，現在這個錯誤又重新發現，而且加深了。狄康同志的動搖是有系統的，而在現在的表現實際上是羅明路線的一種形式，是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

但是，狄康同志是不願意了解自己的錯誤的。自從中央指出了他的錯誤以後，他曾經寫了一個聲明書到黨報編輯委員會，其中說到他『流露了』一個錯誤，原因在於『過分估計了革命形勢』（着重點是他自己加的）。這完全是爲掩蓋自己的錯誤的。第一他

沒有指出他的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系統的；第二他沒有承認他的錯誤是有害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是與黨的路線相對抗的，首先是與中央關於五次「圍剿」的決定不相容的；第三，他不承認他對革命形勢估計不足，不相信紅軍的力量，不相信革命的力量；第四，在小組會上討論反對五次「圍剿」的決議時，他完全不提自己的錯誤，其實就是堅持自己的錯誤。我們必須無情的打擊這種機會主義的掩蓋錯誤一切企圖，澈底揭破狄康同志的一切機會主義錯誤。

但是狄康同志這些機會主義的觀點能夠在「鬥爭」篇幅上多次發表出來，這表示出編者對於機會主義的腐朽的自由主義及缺乏布爾塞維克的警惕性，中央在決定中這樣指出和採取加強「鬥爭」的政治領導的辦法，是完全正確的。

在新的時候，在階級鬭爭極端尖銳，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大舉進攻蘇區與紅軍的時候，使我們隊伍中一部份不堅定的份子必然會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動搖，羅明路線及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就是目前這種動搖最明顯的表現，這給我們一個信號應如何集中布爾塞維克的火力去打擊「左」右傾機會主義，首先是反對目前最危險的羅明路線與狄康同志的觀點。開展反機會主義的兩條戰線鬥爭，克服一切動搖，克服對機會主義的自由主義，這就是順利的執行衝破五次「圍剿」的一切戰鬥任務的前提。我們黨已經在反對一切傾向中如此進步了，我們已經粉碎敵人的四次的進攻，我們相信在

國際與中央的正確路線之下，我們能克服我們隊伍中的任何動搖，克服一切困難，而動員千千萬萬的勞動羣衆「不但能夠擊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而且能取得蘇維埃在全國的勝利」！

## 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

毛澤東

### 一 偉大的勝利

查田運動在黨與中央政府的號召之下，已經廣泛的開展起來了。如果說，查田運動過去還僅僅在開始的階段上，那末在六月的八縣查田大會後七月一個月的工作，便已超過了去冬以來大半年中所做的成績。一般說，在開會的八個縣中，查田運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形勢，查田運動已經成了一個廣大的羣衆運動。瑞金與博生成績最大，兩縣共查出了二千幾百家地主富農，勝利，雩都，會昌，汀東，長汀，石城，寧化各縣，亦都有了初步的成績。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區鄉，廣大的羣衆鬥爭發動了。蘇維埃工作中，黨的工作中，許多過去停滯着的狀態，現在都活潑起來了。蘇維埃中的壞份子許多被洗刷出去了，暗藏在農村中的反革命份子，受到了嚴厲的鎮壓。一句話，封建殘餘勢力，在廣大羣衆面前遭受了慘敗。在這個基礎上，各種工作更加開展了。在查田有成績的區域

，擴大紅軍與擴大地方武裝，推銷經濟建設公債與發展合作社，秋收秋耕與發展勞動互助社，以及俱樂部夜學小學等文化建設事業，都得到極大的成績。一切工作進行更加順利了。在羣衆活躍的基礎上，大批積極份子自己創造成爲各種工作的幹部，許多工農積極份子加進了黨，被吸引到蘇維埃工作中來。最好的例子是瑞金的壬田區。壬田區的查田運動在中央政府工作團幫助之下，五十五天中發動了全區的羣衆，澈底消滅了封建殘餘，查出了地主富農三百餘家，槍決了羣衆所謂「大老虎」的十二個反革命份子，鎮壓了反革命活動。在羣衆面前檢舉了蘇維埃工作人員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一些份子，清洗了一些混進蘇維埃來的階級異己份子出去。全區查出土地二萬七千擔，全區二萬餘勞苦羣衆差不多平均每人重新得了一擔二斗谷土地，分配了豪紳地主的無數財物給予羣衆。依靠於羣衆積極性的空前提高，五十五天中擴大紅軍七百餘人進瑞金模範師去，沒有一個開小差，節省谷子賣給紅軍，達到了一千九百餘担，全縣沒有任何區比得上他。在各鄉的要求下，全區担任推銷經濟建設公債四萬元，地主罰款富農捐款已收得七千五百元，承認繼續去籌的一萬元。合作社迅速的發展了，文化教育建設如俱樂部識字班夜學也增加了。黨員數量擴大，黨的領導加強了，工會工作也進步了。全區另換了一種新氣象，由瑞金的一個落後區，五十五天中變換了地位，成了與武陽區相等的一等區了。我們現在要問：壬田區爲什麼得到這樣大的成績呢？那我們應該指出：由於他們認識了查田任



務的重要，由於他們的動員方式，階級路線與羣衆工作，都是堅決執行了中央局與中央政府的正確指示他們做了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工作。在任務的認識上他們懂得查田運動與革命戰爭的密切聯系，因此他們認真的做這個工作，抓緊了查田運動的領導，有計劃的去佈置當地的工作，在動員方式上，他們在全區十一個鄉中，抓緊了最落後的與比較落後的七個鄉的工作，在這七個鄉中動員了黨，動員了團，動員了鄉蘇，動員了工會與貧農團及其他羣衆團體，經過他們去動員廣大的羣衆。在階級路綫上，堅決執行了依靠雇農貧農與聯合中農的策略，廣大的發展了貧農團。他們說明了查田不是分田，查階級不是查中農貧農僱農階級，他們『講階級』的工作做得很充分。當着鵝鳳鄉的地主富農恐嚇中農，使部分的中農發生恐慌的時候，我們的同志找了幾個中農來作個別的談話，經過他們去傳達其他的中農，鵝鳳鄉的中農立即穩定起來，接着積極的擁護蘇維埃的查田政策，從受地主富農欺騙轉變到與貧農工人一致聯合進攻地主富農。壬田區的同志亦曾錯誤的處置了幾家成份，但他們迅速的改正了錯誤。關於領導羣衆鬥爭的工作首先他們做了廣泛的宣傳，不是開全區全鄉會，他們開的是村子屋子會，這樣去接近更廣大羣衆，向他們作了多次的宣傳鼓動，所以全區羣衆都明瞭查田查階級是自己的責任，自己的利益。其次調查階級成份，發動了多數人去查，詳細搜集了各個成份的材料證明給羣衆看，所以沒有發生羣衆不滿意的。其次通過階級成份，是首先經過了查田委員會的分

析決定，提交貧農團討論通過，送達區蘇批准，再到被沒收人的村子裏召集本村群眾大會，解釋明白，舉手贊成，然後進行沒收。在分配財物與土地上，工作人員都能了解自己應做模範不拿東西，而把東西完全分給羣衆，沒收的村子多分，其他的村子少分，得到了羣衆的完全滿意。土地也迅速分配了，別地拖延很久才分的現象，壬田區是沒有的，所以迅速發動了羣衆。他們打進落後大村子的辦法也是正確的，他們不畏懼這些大村子，他們也不用蠻幹的辦法去對付，他們對大村子是集中了火力，做了更多的宣傳，從爭取當地積極份子着手，團結他們，教育他們，經過他們去發動其他的羣衆。他們很耐心的去做這種村子裏的工作，表面上看是遲慢的，但實際上是迅速的，他們在五十五天中把壬田區所有落後大村子一概發動了，很短時間消滅了這些村子的落後。柏坑鄉的一個村子打不進去，原來那裏有兩個著名『大老虎』一向在作怪，他們就採取了不同的辦法，首先捉到這兩個壞東西在當地開巡迴法庭審判他，經過羣衆的熱烈擁護槍決他，那裏的羣衆鬥爭就像烈火一般燃燒起來了。他們開了十次羣衆審判大會，三次巡迴法庭，都是經過了極廣泛的羣衆路線，本鄉的人多到，別鄉的人每村派代表，小鄉十幾人，大鄉四五十人。所以每一次公審與裁判的結果，都立即傳播到了全區各鄉各村中去，不但使各個鄉村的羣衆都覺得今天審判的這個人該罰該殺，而且使他們立即想到自己地方的那些同樣作惡份子也該處治他。壬田區的查田運動真算得全蘇區的模範！瑞金九堡區的

工作也有極大成績，他們是首先抓緊三個鄉去做，召集各鄉的查田委員會委員到區蘇開丁三天訓練班，講明了動員方式階級路線與爭取羣衆的方法。他們在沒收分配問題上創造了一個好辦法。他們的辦法是：要去沒收一家地主了，就號召本村本屋的羣衆一同去，在羣衆大會上舉出沒收分配委員會，在羣衆的監視下進行沒收，沒收的東西堆在一個大坪上，再經過羣衆的同意立即分配給應得東西的羣衆。吃得的東西又是一個處置，就是殺豬煮飯讓羣衆大家吃一頓。這個辦法在九堡區收了極大的成效。他們的沒收分配委員會不是經常組織的，而是臨時組織的，更加密切联系了羣衆（關於土地的沒收分配，仍由經常的土地委員會負責）。一切東西不挑到鄉蘇去，不待集中了若干家然後分配，免去了拖延時日與被別人偷了去的毛病。九堡區在其他的路線上方法上一般也是正確的，所以能夠發動廣大羣衆自己動手查階級。他們辦到了沒有一個地主富農到鄉蘇區蘇來鬧成份，與過去查田時的情形完全相反，過去總有許多被查的地主富農到蘇維埃來橫鬧，說把他們查錯了。不但本人，甚至鄉代表貧農團負責人也有來替他們求情討保的。這次當然不是地主富農不鬧了，而是要鬧也鬧不起來了，他們的同宗，他們的親戚，沒有一個人贊助他們，地主富農軟了勁，沒有鬧的可能了。這件事證明九堡區發動羣衆的工作做得極充分，不然是辦不到這個地步的。

所有這些光榮模範的例子（這種例子別地還不少），給了黨與中央政府的號召以布

爾塞維克的回答，證明了中央局與中央政府的指示的絕對正確性。那一處完全執行了這些指示，那裏就立刻取得偉大勝利。但是誰違背了這些指示，忽視了這些指示，那裏的工作就犯了錯誤，沒有成績或者成績很微弱。讓我再拿事實來證明。

## 二 有些地方放棄查田運動的領導

查田運動的戰鬥任務，在中央局查田決議發出之後，在中央政府查田訓令及召集八縣查田大會之後，查田運動在各縣的開展，並沒有普及到一切地方，這如福建全省查田的成績還只當得博生一縣的成績，勝利零都會昌石城每縣的成績，還只當得瑞金最好的成績，還只當得博生一縣的成績，各地有許多區的查田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甚至縣查田委員會，亦還有幾個縣沒有去抓緊全縣的查田工作（會昌，零都，石城，甯化）。許多區與鄉的查田委員會，區鄉主席不做主任，藉口別事忙，放棄查田不管。黨對查田的領導，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地方，都明顯的表示出黨的堅強領導作用，黨員群眾的大多數在支部與區委的領導下做了很多布爾塞維克的勇敢戰鬥工作。但在一切查田沒有成績及成績微弱地方，就表現出黨部忽視查田運動，這如會昌縣委在中央局查田決議發出後差不多兩個月沒有討論過一次查田工作，直到七月底才開了一次會討論查田。瑞金的下肖區委在一個時期中，對查田運動完全放棄不管。瑞金城市區委雖為查田開過一次會，却沒

有推動四郊支部去注意查田的領導，各個支部沒有爲了查田運動開過會的。在別的地方如零都，勝利，石城，甯化，縣委與許多區委，同樣沒有用火力去注意查田工作。黨與中央政府說：『查田運動成爲發動羣衆深入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澈底解決土地問題與肅清封建半封建的有力方法』（中央局決議），『查田運動是各地蘇維埃一刻不容再緩的任務』（中央政府訓令），『查田運動是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一環』（八縣大會總結）。我們的許多同志却在說：『忙得很，沒有工夫照顧查田運動』。黨的決議說：『一切以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敷衍態度來對查田運動，是最有害的』，這些同志却還是以官僚主義形式來對待查田運動。

### 三 有些地方竟對地主富農投降

在查田運動開展了的地方，也還表現許多個別的仍是嚴重的錯誤，那就是這些地方黨部中蘇維埃中還常常遇見到個別的同志，在查田運動這個激烈的階級鬥爭面前，表現了他們的機會主義動搖，這主要在當着查田運動激烈發展的時候，他們丟棄不了姓族與地方的關係，包庇同姓同村的地主富農成份。或者錯誤的分析階級成份，把地主當富農，富農當中農。有些裁判部的工作同志，在他們的極端疏忽中接受了地主富農假冒羣衆名義對於查田積極份子的誣告。另一方面我們有些保衛局與裁判部的同志，又沒有能夠

跟着羣衆查階級鬥爭的開展，去積極鎮壓反革命，甚至當着羣衆請求捉拿與槍決抵抗查田的地主富農份子時，還有不接受羣衆請求的，瑞金的裁判部就是做了許多這樣錯誤的例子。

#### 四 侵犯中農的傾向是最嚴重的危險

「左」的機會主義傾向，在七月查田中，又在很多地方發生了。這裏應該着重指出的就是侵犯中農的傾向。雖然在中央局的決議上早已明白的寫着：「必須特別注意與中農羣衆的聯盟，中農是革命後蘇維埃農村中最廣大的基本羣衆，一切我們的處置與策略，必須獲得他們的贊助與擁護。每一個貧農團與蘇維埃的決定，必須是在一村或一屋的羣衆會議上得到中農羣衆的擁護，一切中農羣衆的呼聲，必須注意聽。并須嚴厲的打擊任何侵犯中農利益的企圖」。在八縣大會的結論上指出：「查田的目標是查階級，而不是再分田」。「聯合中農應從不侵犯中農的利益做起」，「在查田的開始，應普遍宣傳蘇維埃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的政策。在查田進行中，應審慎決定那些介在中農與富農之間的疑似成份，不使弄錯」。但是這樣的指示，並沒有為許多地方的同志們所注意。瑞金城區的查田，一起始就接家按畝去查，查得中農恐慌，竟有中農跑到蘇維埃來請求改變自己成份，他們請求改為貧農，他們說：「中農危險得很，捱上去就是富農，改為貧農咧

，隔富農就遠了一點」。這樣沈痛的呼聲，還不值得我們傾聽嗎？黃柏區洋古鄉的同志向羣衆說：「查階級不查別的，只查中農富農地主階級」。踏逕區的同志，插起牌遍查，查得一部份中農恐慌逃跑躲到山上。博生縣的某些鄉中，同樣是插牌子遍查，同樣發生了中農恐慌的事。八縣大會的結論早已說了：「那種說到查田就以爲應插牌子的意見，是不對的」，但全未爲這些同志所注意，這種插牌子遍查的方法每縣都有發生，這是異常嚴重的情形。他們把查田與分田混同了。不錯，分田是應插牌子的，是要一坵一坵查清數目然後拿了去分的，但若把這個辦法應用到查田運動上來，那就混亂了農村中的鬥爭目標。過去我們曾經指出：「查田與分田必須嚴格的分別，這種分別，不但爲了鞏固農民的土地所有權，使他們不起分田不定的恐慌，而且是爲了查階級鬥爭的勝利。必須集中全力，特別是聯合中農，去對付地主富農的反抗，這種時候，決不應在農民自己的隊伍中發生任何的紛擾」（八縣大會結論）。這樣的策略，是我們領導查田鬥爭中整個策略最重要的一部份，可是還爲許多的同志忽視了。這種忽視，一刻也不能再忍耐下去，那些經過指導還故意在做這些錯誤的，當地的上級蘇維埃須給他以嚴厲的處罰。要在黨內團內開展思想鬥爭，反對任何黨員團員侵犯中農利益違犯聯合中農策略的思想與行爲。已經做了錯誤，如已經沒收了中農的土地財產的地方，蘇維埃人員要向當地中農羣衆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把土地財產賠還他。去年與國會賠還許多中農的土地，取得

了中農羣衆的滿意，是一個寶貴的教訓。

### 五 貧農團的關門主義與忽視雇農的領導作用是錯誤的

「貧農羣衆是黨和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澈底進行土地革命的堅決擁護者」，「依靠貧農」是我們查田運動及一切土地鬥爭的重要策略之一，而貧農團則是查田運動中有極偉大作用的團體。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已經指出過去貧農團的關門主義傾向是錯誤的，應該廢除介紹制，向貧農工人打開大門，一切男女老少的貧農工人均可報名加入。但是許多地方仍然沿着舊辦法不改，仍然非有介紹不能進貧農團，甚至在瑞金踏選區當着尙未入會的貧農羣衆跑來參加貧農團會議的時候，貧農團負責人居然拒絕他們參加。博生的竹峽峽區，七月一個月中貧農團沒有發展一人。在一切查田有成績的區鄉，貧農團是廣大的發展了，而在沒有成績或成績微弱的區鄉，那裏的一個表徵，就是貧農團的關門主義狀態。雇農在查田運動中的偉大的領導作用，同樣爲許多同志所不認識。黨的決議說：「雇農羣衆是城市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弟兄，是土地革命中的先鋒隊，因此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必須與工會取得密切聯繫，經過工會來發展與組織工人羣衆的積極性，使他們成爲查田運動的先鋒」。我們的同志，依照這個指示去做的，仍然不最多數。這裏主要的方法，是使農村工人加入貧農團，而在其中成立單獨的工人小組，經過這些



工人小組，去團結貧農積極份子，發展貧農團，推動查田運動前進。黃柏區山河鄉的經驗是可寶貴的，當我們的同志兩次召集貧農團開會不成的時候，就去開了一個農業工會與手藝工會的會員羣衆聯合會，發動了幾十個工人積極起來，每人帶領一個貧農份子加入貧農團，第二天貧農團再開會果然一齊到了，開展了山河鄉的查田運動。山河鄉這個經驗應該把他運用到一切農村中去。這裏工會的上級領導機關，應該給下級工會以積極的指導，要把查田任務看成爲工會的重要任務之一。

## 六 關於富農問題的不正確觀念

農村鬥爭中整個我們的策略，是依靠着貧農，堅決的聯合中農，並使雇農起先鋒隊作用，團結所有一切力量，去消滅地主階級與反對富農。關於富農問題，黨已經正確的說了：「必須把地主和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的消滅地主殘餘鬥爭中，決不容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七月查田中，雖然還沒有發現公開主張消滅富農的理論，但是把富農份子當做地主全部沒了他的家產的就已經在許多地方發現了。這一錯誤的來源，是由於抹煞富農的勞動力。當着我們說「沒有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而有地租等等剝削的是地主」的時候，有些地方就把在生產中用了有相當多的勞動的份子，認爲是「附帶勞動」一類。把他當地主看待。有些地方，則把富農兼有高利貸剝削的認爲是「高利貸者」而照

着「消滅高利貸者」的辦法去對付這種富農。有些則算陳賬，算到革命前若干年上去，一人在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幾年前請過長工的，也把他當作富農，或者僅僅只請過一年兩年長工前後沒有請過的富裕中農份子，也放在富農一類。更加嚴厲的是過去與國某地方的例子，那裏的辦法，拿剝削的種數去分別地主與富農的成份，三種剝削的叫地主，兩種剝削的叫富農，比如請了長工，收了租，又放了債，則不管他家裏有幾多人勞動，總之他就是地主了。還有「反動富農」這個問題，在許多地方弄得頗糊塗。武陽區一家富農兼商人，七個人吃飯，因過去他家有一人加入A B團，在兩年前被殺了，兩年之後那裏的同志一定要全家沒收他。在別的許多地方，同樣發生許多這類的事情，把富農在暴動前不十分嚴重的反革命行為如參加「收三成租谷」之類（瑞金），暴動後幾年他也沒有做過反革命的活動，羣衆的多數對他不要懲辦，而我們有些同志，則一定要沒收他。正確的說，我們對待這類份子的辦法，在鞏固了的區域與尚未鞏固的邊區，應該有策略上的不同，在邊區，無疑要採用嚴厲辦法，鎮壓一切包括富農在內的反革命份子。在中心區，則要分別情形決定，暴動前有過嚴重的反革命行為，或暴動後還在做反革命活動的，自然應該堅決的沒收他，否則不應該沒收。有些一家中祇沒收他本人以及同他反革命行為有直接關係的份子，其他的人則不沒收。這樣處置才是正確的處置。

## 七 工農檢察部沒有負起自己應有的責任有些并且做出了錯誤

我們的工農檢察部的同志，許多不認識查田運動開展中正是開展思想鬥爭，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污腐化與消極怠工，驅逐階級異己份子出蘇維埃去的最好時機，對於這些工作做得異常不夠。許多我們工農檢查部同志，在這個激烈的階級鬥爭面前，表現了自己的消極動搖，自己的官僚主義與形式主義。甚至如瑞金市蘇工農檢察科長，包庇市蘇裁判科長的極大貪污行為（私用公款千餘元）。渡頭區的工農檢察科長對於區蘇主席放棄查田運動不管，也不去批評他與檢舉他，工農檢查部的檢舉運動，有些地方又走到了別的錯誤方向，把戀愛問題當作腐化，把拿了地主的東西當作貪污對於這樣的份子進行檢舉甚至公審，有些地方把犯了輕微錯誤的開除職務。不去有系統的發動自我批評，開展思想鬥爭，把這種艱苦的工作省去，而代之以簡單的懲辦主義。不消說，蘇維埃工作人員中那些犯了長期與嚴重錯錯的份子，是應該堅決洗刷出去的，但是錯誤不到這種程度的也給予撤職處分，則是過分了。關於階級異己份子的問題，普遍的祇講成份，不講工作，只要是出身壞，不管他有怎樣長久的鬥爭歷史，過去與現在怎樣正確執行黨與蘇維埃的路線政策，一律叫做階級異己份子，開除出去了事。完全不錯，我們要堅決洗刷那些階級異己份子，那些成份壞又加工作壞的（包括地主富農，消極怠工，貪污腐化等等）無疑應該洗刷乾淨，但如果不是這樣也把他洗刷出去，那就是過分的了。

## 八 關於查田鬥爭的領導藝術

瞭解了任務與路線，但沒有領導羣衆鬥爭的布爾塞維克的藝術，查田運動是仍然不能開展的。本文的開頭已經說了壬田區等處許多很好領導鬥爭的例子，但在另外許多地方却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不少的錯誤。有些地方對於地主富農集中的落後大村子不知道用各種方法去發動鬥爭，即如有種大村子只有首先捉拿著名兇惡即羣衆所謂「大老虎」的那些豪紳地主份子，才能開展當地的鬥爭，我們的同志却沒有這樣去做。關於用分配沒收來的財物去發動羣衆鬥爭這個最好的方法，還有許多地方不知道採用。在瑞金踏逕區的瓦子鄉，甚至把東西只發給查田幹部與貧農團會員，其他不發，理由是自己不積極的不應分東西。有些地方沒收的東西分配得很慢，甚至沒收了一個多月還未發給羣衆。沒收的土地分配得更慢，不少地方的同志不知道去動員蘇維埃的各部，動員各個羣衆團體，不知道動員所有的黨員團員，在各個羣衆團體中，各個村屋中，去起核心領導作用。工作推不動，就說這裏本來沒有辦法的。有些地方當着羣衆查階級的鬥爭已經發動起來了，許多羣衆都來報告地主富農請求去查去沒收時，我們的同志不能立即抓緊羣衆這個熱潮去領導羣衆開展鬥爭，把查階級的工作開展到各個村子裏去。有些地方，則在查了一番之後，羣衆的鬥爭熱情不能繼續向上高漲，表現了停頓狀態的時候，我們的同志不能用各種方法去激勵羣衆，使鬥爭繼續高漲，一直領導到消滅一切封建殘餘的地步。許多地方當着經過了查田運動，羣衆鬥爭熱情蓬勃發展起來了的時候，不知道把這種熱情

組織到別的戰線上去，比如不當着羣衆得了東西得了土地的時候，即在那時的羣衆大會上，或在其他一切有利時機，鼓勵羣衆去當紅軍，去買公債票，去進合作社，鼓勵羣衆去加緊秋收秋耕的工作，去建立俱樂部識字班，發展夜學與小學。把這種最好的時機放過去，另等上級對於這些工作的督促來了，才又重新開頭去做宣傳鼓勵，這種落在羣衆鬥爭熱情之後的尾巴主義的領導，乃是最有害於革命工作的。

另一方面在許多別的地方又發生了少數人蠻幹的惡劣現象。我們曾經着重的指出：要反對對於爭取大多數羣衆的忽視與命令主義的工作方式，只有耐心的艱苦的去發動羣衆爭取羣衆的工作，才能取得大多數羣衆的擁護，達到消滅封建殘餘的目的。這樣的羣衆工作，是執行階級路線的唯一保障。查田運動的開始，必須在一切村屋中做廣大的宣傳，向羣衆說明查田運動的必要，說明查田不是分田，查階級不是查中農貧農雇農階級，特別重要的是把什麼叫做地主富農中農向羣衆分析清楚。村屋的羣衆大會應該不只開一次特別是那些落後的村屋應該多去開一次，應該不讓一個革命羣衆不聽到我們的宣傳。爲了達到這個目的，應該首先在鄉蘇代表會，工會，貧農團，女工農婦代表會，及其他羣衆團體中，向一切積極份子解釋明白，經過他們去向廣大羣衆作宣傳。查階級應該不是少數人去查要發動多數人去查。通過階級成份不但在貧農團鄉蘇與區蘇通過，而且要在被沒收人的村屋中開羣衆大會，取得羣衆的同意，才能進行沒收。分發財物，要

發給本村本屋羣衆，取得本村本屋羣衆的滿意。所有這些，都是爲了爭取羣衆的大多數。黨與蘇維埃工作人員，每個時候，每件工作，都不要忘記羣衆的大多數。我們要面向羣衆，是在要面向羣衆的大多數，我們的工作要深入羣衆，是在要深入一切大的小的村莊一切大的小的市鎮裏的羣衆。要厲嚴反對少數人幹的關門主義命令主義錯誤辦法，可是我們的同志許多地方並不是這樣去做的，在瑞金，許多區鄉中沒有向羣衆講過一次階級（沒有分析過什麼是地主富農中農）。在瑞金及別縣的許多地方都發現不經過宣傳就動手去查，以至地主富農跑出來造謠欺騙中農，說什麼本鄉地主富農多得很，或者說本鄉有幾百家地主富農要查（瑞金），而我們的同志，還不知用明白的「講階級」辦法，去打破這種造謠。廣昌的地主說：「查田運動是中央政府要過去欠債的人把債還與中央」，我們同志沒有立即去攔穿這種鬼話。在踏逕區的幾個鄉中，除了不做宣傳之外，查階級只是查田委員會的幾個人去查，通過階級不但不經過羣衆大會，連貧農團也不經過他們說：羣衆靠不住，羣衆不會分析階級，階級成份提到羣衆大會去通過是要發生糾紛的，還是只由委查田員會通過靠得住」，這個踏逕區同志的理論，真算得天下奇聞！好幾個地方沒收地主時，不在白天而在晚上，唯一的理由是怕地主跑掉了。有一處地方開羣衆大會，用了「全區大會」的辦法，可是到的不上兩百人，三個人輪流從上午演說到下午，不讓羣衆休息，也不讓羣衆喝水吃飯，說是怕羣衆跑掉了，這樣蠢幹的辦法，又

算奇聞的一種。

#### 八 開展兩條戰線鬥爭克服自己錯誤爭取查田運動的澈底勝利

無疑的，查田運動是在廣大地域內開展了。但當着這個運動前進的時候，當着我們正確估計了已得成績奠定了運動發展的基礎的時候，我們還要警覺地注視運動中途的障礙物，只有發動兩條戰線鬥爭的火力去清除這些障礙，才能推進查田運動更加迅速的前進。開展反右傾的思想鬥爭，反對對查田運動嚴重意義的估計不足，反對對地主富農的妥協降降，反對羣衆鬪爭的尾巴主義領導，是每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同時要把侵犯中農的危險喚起全體黨員的注意，『要嚴厲打擊任何侵犯中農利益的企圖』，因為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經明顯表現出來的十分嚴重的危險。對富農的不正確觀念，也無疑要影響到中農上去，一切命令主義的蠻幹，對於聯合中農是最大的危害。兩條戰線鬥爭的火力掃蕩了查田運動道路上的一切障礙物，查田運動就可以大踏步前進，他的澈底勝利就有了充分保障了。

(完)

## 論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

洛甫

我們蘇區的黨在最近時期內，不論在軍事戰線上，經濟戰線上，或是在查田運動的

戰線上，都得到了極偉大的勝利。但是在文化教育的戰線上，則特別表現了我們的落後。

在我們黨內存在着一種機會主義的思想，以為現在是革命戰爭的時期，現在是一切應該服從戰爭的時期，所以蘇維埃區域內的文化教育的工作應該取消，學校應該停辦，一切蘇維埃政府的文化教育經費都應該拿來放到戰爭上去。這種機會主義思想的結果，造成了蘇區內文化教育工作的特別的落後，甚至使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教育都變成了無人顧問的機關。

犯有這種機會主義思想的同志，顯然根本不了解蘇維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同國民黨的完全不同，根本不了解文化教育教育工作同革命戰爭有何密切的關係。

國民黨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的是把全中國大多數的被壓迫民衆，放在文盲，閉塞與愚昧中間，這樣使中國的豪紳地主與軍閥官僚更容易欺騙與剝削他們，使他們變為統治階級的工具。在國民黨全部財政的支出方面，用在文化教育上的不到百分之一。如南京政府今年歲出預算照國民黨自己所說的為一萬六千一百五十萬元（其實不止此數）。其中用於教育經費者不到一百零六萬餘元。但這還不過是在紙頭上。拿用教育經費充作其他用途的事，在國民黨方面，是不算希奇的。沒有一個國民黨學校的經費，不是拖延到好幾個月的。近年以來，就是僅有的一些學校，也大半關門停辦了。



就是那些少數的文化教育機關，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同樣是欺騙民衆的工具。正像列甯所說的

「舊式學校時常表白自己是造就人材的，培養科學智識的機關，然而我們知道這是一種騙人的話，因為舊式社會是建築在有階級——被壓迫階級與壓迫階級——的基礎上的。所以一切舊式學校當然是根據於階級利益和精神的，所給的智識僅有利於資產階級和他的子孫，因為每種教材都是依着他的利益而編定的。」

「在這些學校受教育的工農子弟，也不過是爲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資本家要教育他們無非是培養一班馴服的奴隸，使他們能善於工作出多的利潤，同時不敢於反抗自己。」

但是由於中國國民黨經濟的總崩潰，就是在國民黨教育機關中所培養出來的少數科學的與技術的知識份子，也找不到應用他們知識技術的所在，以至發生了「知識份子的生產過剩」。

同國民黨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完全相反，蘇維埃政權的文化教育政策，是在使每個蘇維埃公民受到蘇維埃的教育。這種教育不是在愚弄民衆爲剝削階級服務，而是在啓發民衆，使民衆爲自身的解放而鬥爭。這種教育決不是封建時代的教育，不是資產階級的教育，而祇能是無產階級的教育，即是馬克思與列甯主義的教育，即共產主義的教育。

因爲祇有馬克思列甯主義，才能武裝我們的頭腦，使我們爲中國工農民衆的最後解放而鬥爭，並且使我們的鬥爭能夠得到勝利。

正像一些機會主義者，認爲中國革命目前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所以我們蘇維的德謨克拉西，只能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一樣，有些機會主義者也認爲在中國革命目前的階段之上，我們的文化教育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企圖把我們的教育限止在反封建反迷信等資產階級的教育之上。關於這一基本問題，就是我們一些領導同志中也是沒有明確了解的。在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員會第一號訓令上，關於蘇區文化教育的任務會說：

「蘇區當前文化教育的任務是要用教育與學習的方法啓發群衆的階級覺悟，提高羣衆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打破舊社會思想習慣的傳說，以深入思想鬥爭，使能更有力的動員起來，加入戰爭，深入階級鬥爭，和參加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這裏關於蘇維埃文化教育的任務的解釋是模糊不清的，這裏沒有明顯的指出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來教育廣大的工農群衆。因此在我們現在微弱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已經在不少的地方表現出這種資產階級教育的傾向，把蘇維埃的教育做了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並且正是這種傾向，給「爲了戰爭應該取消教育」的機會主義思想以理由與根

據。

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教育，來教育全蘇區廣大的勞苦羣衆，這種鞏固無產階級在思想上的領導作用的教育不但不妨害革命戰爭，而且也是革命戰爭偉大勝利的必要條件。

毫無問題的，蘇維埃革命運動，本身就是一個極大的學校，牠吸收千百萬過去在黑暗中生活着的勞苦羣衆，走向光明，牠教育他們互相團結起來爲了推翻剝削者的統治，爲了自身的解放而鬥爭，他們在經濟的政治的鬥爭中了解到共產黨領導的正確，從實際經驗上相信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正確，並且他們在鬥爭中拋棄了他們舊社會的思想·習慣與傳統。這對於蘇區內千百萬工農勞苦羣衆是最好的教育。

不但在蘇區內的工人中間，即在蘇區內廣大的農民中間，馬克思列甯主義有着極大的權威。在每一個蘇維埃的工會的以及其他羣衆的機關內，差不多沒有一個地方沒有馬克思與列甯的遺像或是寫他們名字的紅紙條，這裏雖是有不少滑稽可笑的現象，如把馬克思列甯當做菩薩一樣供奉，然而對於馬克思列甯的尊敬與崇拜是到處一樣的。

在鬥爭中來教育蘇區內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自然是我們最主要的教育方法。正像在共產國際綱領中所說的：

「要大批培養共產主義的認識，要推進社會主義事業，就應該大批改造人，這種改造只在實際運動中，革命中方才可能。所以工人階級之需要革命，不但因爲除

革命以外沒有別的方法可以推翻統治階級，並且還因為推翻舊制度的階級只在革命中方能清除本身所帶的舊社會的全部污穢，而能創造新的社會。」（中譯本，二十二頁）。

在蘇維埃運動中，我們正在「大批改造人」，培養成千成萬的管理家，組織家以及技術家與思想家。但是這一任務的完成，是同我們的文化教育工作不能分離的。單單從革命的實際中，使羣衆相信或崇拜馬克思列甯主義自然還是不夠的。對於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信仰，就是在工人階級中，也還不能消滅封建的，資產階級以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對於農民那更不用說了。他們現在相信馬克思列甯主義，只是因為他們從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政權手裏，取得了土地的自由。這就是說，我們「除了用革命實際所給與的鮮明的訓練之外，又應該經過有系統的宣傳，把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的基本原則與方法深入於廣大羣衆的意識中。」（共產國際關於宣傳工作的提綱，見「鬥爭」十三期）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也就是在此。

鬥爭與教育，對於我們是不能分開的。在蘇區黨內過去存在着所謂「狹義經濟論」，實際上是想把鬥爭與教育分開的機會主義的思想。沒有思想上的教育，我們的鬥爭就會失去方針，我們就會走向錯誤的道路。我們是要在鬥爭中加緊我們的文化教育工作。譬如在進行查田運動中，我們開闢了短期的查田運動訓練班，召集了查田運動大會，開

時經常不斷的把查田工作團召集回來，再給他們進一步的教育工作。這裏，我們看到了鬥爭與教育的一致，正因為這樣，所以在蘇維埃政權底下，湧現出了成千成萬工農的幹部。

不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提高工農羣衆的文化程度與政治水平，使他們能夠運用各種科學，技術及管理的工具，蘇維埃社會的建設是不可能的。就是拿蘇維埃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來說吧。官僚主義的產生，不但是由於一部份階級異己份子或機會主義者，把持蘇維埃的政權機關，而且也是由於我們自己文化教育程度的落後，所以反對官僚主義不但應該洗刷蘇維埃機關中的階級異己份子，而且也應該提高羣衆的文化教育的水平。資產階級國家內所施行的「普及教育」，是爲了要使工人知道更好的利用工廠中的機器，更多的爲資本家生產剩餘價值。在我們蘇維埃國家內，文化教育的發展是爲了工農羣衆更好的管理自己的國家，建立蘇維埃的新社會。

但是有系統的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化教育工作，我們還沒有開始。甚至我們教育人民委員會第一號訓令內沒有提出進行十七歲以下的男女的義務教育，是我們蘇維埃教育的中心任務，因此，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教育部還沒有定出一個蘇維埃教育的學制出來，依照這個學制來有系統的進行我們的教育工作。同時在訓令上也沒有以消滅文盲看做蘇維埃社會教育的中心目標。

工農的民衆革命不但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且也消滅了他們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我們沒收了國民黨的學校，圖書館，我們建立了我們自己的印刷廠與我們自己的書局。自地主資產階級對於文化教育的壟斷消滅以後，我們已經有着極大的可能，來大規模的發展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工作。這將給全中國民衆看到：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下面，工農羣羣才能每一個受到新的教育，消滅他們在文化上的落後。這種鐵的事實將證明出：蘇維埃政權不但能破壞舊的文化教育，而且能夠建設新的！

經過義務教育與社會教育，使每一個蘇維埃的公民受到蘇維埃的必要的教育，這是我們蘇維埃政權的基本政綱之一。雖是由於戰爭的環境，敵人的封鎖，以及各種物質上的困難，我們不能立刻完成這一任務，然而我們應該以完成這一任務，作為我們的戰鬥的目標。可是一直到現在，由於我們沒有明確的了解以及機會主義的了解，使我們沒有向着這一目標堅決的不動搖的做去。所以我們現在有的許多物質上的可能，並沒有拿來使用，甚至我們的教育部有了極少數的教育經費，也不知道去盡量的利用。

以共產主義的教育去廣泛的教育蘇區內成千成萬的工農勞苦群衆，是革命戰爭的勝利，蘇維埃政權的發展與鞏固的必要的保障。同時必須在這種普通教育的基礎之上，創造工農，尤其是工農階級自己的政治上的，軍事上的，經濟上的以及文化教育上的較高的專門人才，以供給革命戰爭以及蘇維埃的各方面建設的需要。我們必需毫不遲疑的說

：革命戰爭的開展，以及蘇維埃各方面的建設，要求我們造成我們自己的知識份子，尤其是工人知識份子。正像共產國際綱領上所說的：

「人類新社會組織者的作用，需要無產階級本身在文化上的成熟，無產階級對於自己本身的改造以及新的工作人才的造成，使之能夠運用各種科學，技術及管理工具，以推進社會主義建設與新的社會主義文化。」（二十二頁）

一直到現在，在我們一小部份同志中間還存在着一種錯誤的傾向，認為我們只要工農出身的幹部，至於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的養成，那簡直沒有必要。所以比較高的師範學校與高等學校的設立，還沒有開始。過去中央教育部所設立，後來又因為「戰爭的需要」（？）而自動取消的那個列甯師範，實際上是成人的初等小學校。這種師範學校在目前我們極端缺乏教員的情形之下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然而要經過這種學校來提高蘇維埃的文化教育的程度，顯然是不可能的。這種現象已經在興國等社會教育比較發達的縣份內存在着。要消滅這種現象，創辦較高級的師範學校或高等學校，實為必要的條件。

這種高等學校的建立，在蘇維埃目前的條件之下，不是不可能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已經有了半年的歷史，蘇維埃大學已經有了牠的雛形。這種學校在各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當然還有繼續創辦的可能。這種學校的招收學生，雖是一般的經過各地選擇，但必須經過入學試驗的手續，使每一學校保持牠的文化教育的水平。

但是爲了發展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工作，爲了養成工農自己的知識份子，舊的知識份子（不論牠的出身是地主或是富農）的利用是絕對必要的。對於這一必要，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清楚了解。就拿教育人民委員會第一號訓令，關於這一問題來說吧。

「不要那些地主富農資本家出身而思想不正確工作不積極的份子做教育部的工  
作。思想正確，工作積極，有革命鬥爭歷史，而非工農份子出身的，自然不拒絕他們做文化工作，但須開明履歷，報告上級文化部以至本部，經過審查與批准。」  
這裏可以看出我們文化教育的領導機關，對於利用舊的知識份子的問題是不完全了解的。他們要求每一個舊的知識份子都是老布爾塞維克（因爲「思想正確，工作積極，有革命鬥爭歷史」的知識份子自然應該是老布爾塞維克！）。甚至就是那樣的份子，也只是「不拒絕他們做文化工作」，而且還要「開明履歷」，還要「報告上級」，還要「經過審查與批准」。經過這樣的限制之後，當然不會有一個過去的知識份子到文化教育界上來做工作了。

列甯同志關於這個問題，曾經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不僅要恐嚇資本家，使他們感覺到無產階級國家的強大力量，使他們不敢妄想積極反對無產階級國家，我們還要打倒消極的反抗（無疑地，他是更加危險，更加有害），我們不但要壓服任何的反抗，我們應該強迫他們在新的國家組織的



範圍內工作。「趕跑」資本家還是不夠的，應該（在趕跑一錢不值的毫無希望的反抗者以後）叫他們作新的國家的工作，對於資本家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及職員等第一部份上層份子，都應該如是做去」（「二月到十月革命」，二百八十四頁）

比外列寧還常常說：「我們需要從資產階級那裏去學習許多東西」。聯邦共產黨曾經係照列寧的指示，很有成效的利用了舊的知識份子「叫他們作新的國家的工作。」我們的同志中以「左」的空談拒絕舊的知識份子的利用的路綫，當然同列寧的指示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

我們蘇區在革命以前是一個文化落後的區域，然而舊的知識份子一直到現在還有不少。這些知識份子現在大都隱藏不出，或者做些體力勞動，或者擺小攤頭過生活。對於這些知識份子，我們從沒有想拿來利用。我們懼怕他們，怕他們鬧反革命，我們不相信我們自己有控制他們的力量。

甚至在我們的黨內，這種黨員知識份子不論他們工作是否積極，因為他們成份不好，也有不少遭到開除的。關於這一問題雖是中央局曾經有過專門的指示，但是下級黨部依然重複着這一錯誤。「吃知識份子」的現象，依舊存在。

這種「左」的傾向必須立即糾正。我們不但應該盡量利用這些知識份子，而且爲了吸收這些知識份子參加蘇維埃的文化教育工作（其他工作也是如此），我們還可給他們

以優待，使他們能夠安心的爲蘇維埃政府工作。我們的師範學校或高等學校還可招收一些舊的知識份子，給他們以新的訓練，使他們爲我們工作。對於特別努力工作的份子，蘇維埃政府還可以給他們以特別的獎勵。一些過去犯過錯誤或參加過反革命活動（不是主要人物），現在編在苦工隊中的知識份子，也應該利用他們的所長。如他們工作努力，可縮短他們的處罰時間，以至恢復他們的公民權。我們決不希望他們變成布爾塞維克，但是我們要利用他們的所長來教育我們，造成我們自己的知識份子。當然爲我們所利用的知識份子中的反革命活動，是不會消滅的，但是我們決不因此就不去利用他們。我們相信我們有着一切力量去防止他們的反革命活動，而且我們的新的策略對於這些知識份子可以發生比較良好的影響，使他們的一部分甘心爲蘇維埃政權工作。

我們蘇維埃政權正確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實施，更可以從國民黨區域中吸收更多的高級的知識份子來爲蘇維埃工作。這些所謂「廉潔的」「清高的」知識份子將看到只有在蘇維埃政權下，他們才能發揮他們的特長與天才。

最後，文化教育的發展，尤其是社會教育，如消滅文盲（就是使不識字的工農份子，能看普通的書報與文件，能寫普通的信件，單單識一二百字或能夠識自己的名字不算消滅了文盲），俱樂部，夜學等工作，必須盡量經過社會團體與群眾的協助與努力。如青年團，工會，少先隊，工農劇社，赤色體育會，消滅文盲協會，赤色教師聯合會，赤

色學生聯合會（後面二個組織還沒有成立），在這一方面都應該用極大的力量，完成一定的文化教育上的任務。少共中央局關於各級少共對於各級蘇維埃政府教育部的協助運動，可以說是這一動員的開始。

在文化教育的戰線上，我們同樣需要布爾塞維克的有力的動員。我們要以思想的武裝，武裝全蘇區的工農勞苦群眾，去戰勝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九月九日）

## 武斷欺騙和虛偽的傀儡

小山

——反對法西斯蒂的所謂民族文化運動——

為挽救垂死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並維持其帝國主義走狗的地位，萬惡的國民黨，正在劊子手蔣介石藍衣社控制之下，企圖以法西斯蒂的殘暴的匪賊統治，找求其反革命的『出路』。劊子手蔣介石正在帝國主義的命令和援助之下，向着不可戰勝的中國工農紅軍與蘇維埃，開始了他的拚命而絕望的第五次『圍剿』，而且在這次『圍剿』之中，向着各方伸展着他的法西斯蒂的魔手。

文化戰綫上的國民黨法西斯蒂的挺進軍，不消說的，是這次『圍剿』的一個部份。在反對并粉碎國民黨匪的第五次『圍剿』運動中，阻止並粉碎國民黨法西斯蒂在文化戰

線上的進軍，應該而且必須成爲左翼文化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

國民黨的六年血腥統治，對於摧殘並破壞文化運動所採取的手段，早就在實際上是法西斯蒂的殘酷的暴力手段，而直到現在才掛起『爲三民主義文化的迅速實現和實際執行起見，應當極端容納法西斯蒂的精神，排斥文化上一切非組織的自由主義的現象』的招牌，和自招『凡有助長一切反動文化的人或物的標的，當不計代價而使之破壞消滅』的口供的緣故，是想在牠的絕望的第五次『圍剿』中，有組織的散播法西斯蒂的反蘇維埃革命的武斷宣傳並使牠的屠殺和瘋狂的棍棒政策合理化起來，企圖在意識上，在文化上來阻止并閹割廣大工農以及一切勞動羣衆的革命情緒和鬥志。

國民黨法西斯蒂的劊子手們，爲了掩蓋並合理化牠在文化上的匪賊的暴力行爲，無恥的宣傳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法西斯蒂在意，德二國中的匪徒行爲的前例說：『墨索里尼爲要維持法西斯蒂的統治，推翻一切有礙意大利極端的民族主義發展的一切文化，而創造（？）法西斯蒂的文化，才能使法西斯蒂的統治愈趨鞏固（？）』。最近取得政權的希特勒黨，也極力建立希特勒黨的法西斯蒂文化，乃不惜焚書毀圖，以摧殘舊文化（？）因爲不能摧殘舊有的文化，則新文化不能建立起來；新文化不能建立，新的理想的社會就不能存在或發展』，而最卑鄙的是他把這法西斯蒂的摧殘文化的匪賊行爲，去與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相比較而使之並立起來，好像法西斯蒂的摧殘行動也有布爾塞維

克黨所領導的文化鬥爭一樣的革命意義。但是，國民黨法西斯蒂必須知道：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你們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的「文化」政策，是完全的匪賊行爲，是摧殘并摧毀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是鎮壓一切代表者及進步傾向的理論和文化，是使整個人類再一次的墮落到宗教權威和迷信的深淵之中，是剝奪工農以及一切勞苦羣衆在文化上的享受和創造的機會，而把發展文化的所有的物質條件，儘情控制在地主資本家的手中，使居民的絕對多數禁壓在監獄與屠殺之中。希特勒的德國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就是這樣的一個實例。但是，蘇聯不是這樣的，在蘇聯自然禁止一切地主資產階級的各種顏色的文化運動和思想，剝奪他們文化上的一切享受和利用，但這爲的是居民的絕對多數的工農以及一切勞動羣衆，能夠充分的享受并利用文化上的一切設備，爲的是使一切勞動羣衆能夠充分的自由的參加并創造共產主義的文化，使人類的文化發達到最高峯；決不是像法西斯蒂那樣把人類前進着的文化倒拖到中世紀以前的黑暗時代去！因此，企圖以這種武斷宣傳來合理化法西斯蒂在文化上的匪賊的暴力行爲，是徒然的，反而把法西斯蒂的罪惡愈益暴露而已！

國民黨法西斯蒂一方面這樣宣傳并鼓吹法西斯蒂在文化戰線上的匪賊行爲，同時并裝出努力發展文化的樣子，架起拯救民族危機「舍我其誰」的招牌說：

「在目前，我們的民族國家，已瀕於死亡之綫（但這是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賣

國統治的結果！），挽救民族的危亡，復興國家的任務，是非常迫切的。這誠然有待於各方面的努力，而改造文化，毫無疑義的是許多任務中的主要任務之一，但要改造文化，先要明白文化的現狀，尤其要明白那些有礙於民族的發展的文化，要給以無情的摧殘，在目前中國社會中，我們應該反對的文化主要的有下列幾種：

- 一、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國主義」。
- 二、危害我民族生命之「共產主義」。
- 三、不顧民族生存爭圖個己發展之「個人主義」及「個人集團」。
- 四、阻礙民族意識發展之「鄉土觀念」「家族觀念」以及
- 五、資產階級獨佔的虛偽的「德謨克拉西」——「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等濫調。
- 六、消蝕民族意識之「黃色國際社會民主主義」。
- 七、反對民族思想的「無政府主義」與無原則的「恐怖主義」。
- 八、戕賊民族生命力的墮落的淫蕩的自殺的「頹廢文化」。

以上八種，據說是國民黨法西斯蒂「應該堅決反對的，因其立場與形態雖各有不同，而其為害民族則一也。我們要創造民族的新生命，首先要肅清這些妨害民族生命的微生物」。

國民黨法西斯蒂拿着「民族」二字的幌子，大吹大擂的擺起反對上述那些種類的思

想或習慣，企圖引誘並欺騙尚被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所蒙蔽着的羣衆，引起他們好像走進到與國民黨統治不同的境地的幻想，而死心塌地的爲中國法西斯蒂——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去當砲灰，做匪賊的搶掠殺戮的工具。對於這種陰險的欺騙的武斷宣傳，我們必須一刻不忘記的戮穿牠的面孔。

在中國法西斯新蒂們所列舉的上述八種之中，除了他們用死力來作絕望的摧毀和破壞——第二種即所謂「危害我民族生命之共產主義」之外，其餘的幾條，不消說的是一種裝飾品和武斷宣傳。

首先他們說要反對「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國主義」的文化，這是最無恥的爛言！事實勝於雄辯，在國民黨六年的血腥統治之間，國際帝國主義不僅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在中國建築起了愈益鞏固和雄厚的力量，以壓榨中國工農勞苦羣衆的血汗，而且在文化上也是愈益開展其影響，基督教天主教等等所開辦的教會青年會學校與「慈善」機關，是在國民黨特別保護之下到處橫行而擴大着，對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先遣隊基督教等等，國民黨不僅不能反對，而且法西斯蒂的唯一領袖蔣介石劊子手都成爲基督教的信徒而洗禮磨頂於帝國主義牧師之前！但是，問題還不祇此，滿洲，熱河和華北，現在是整個的送給日本帝國主義去發展其帝國主義文化了，而國民黨還在請求國際聯盟來向全中國各省發展其帝國主義的文化！國民黨法西斯蒂是以破壞並鎮壓反帝運動，投降帝國主

義，出賣民族利益爲其職務的，竟不知廉恥的高唱什麼「反對侵略我民族利益之帝國主義文化」，真是臭到透頂了！

國民黨法西斯蒂說要反對封建文化，要打破「地方觀念」，「家族觀念」，這又是一個欺騙。固不論國民黨統治下何健大帥下令尊孔祀孔，韓復榘下令祭孔掃孔墓以及陳濟棠下令讀經，戴季陶拜佛念經，就是法西斯蒂的本尊蔣介石，也在積極的提倡什麼忠孝仁義的「道德」，在努力宣傳曾國藩的「教義」等等充滿着臭不可當的封建遺臭。所以國民黨法西斯蒂除了只喊反對封建文化以欺騙羣衆外，最多最多只能做到一些「反對纏足」那種對於目前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沒有多大關係的封設殘餘的枝節的文化而已，更何說「國粹」是法西斯蒂進行他武斷宣傳的一個重要工具呢？

國民黨法西斯蒂說要反對「德謨克拉西」，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無政府主義等等，對的，法西斯蒂是要獨裁的，是要反對非法西斯蒂的一切觀念形態的，但是，這一切不過是爲要反對並摧殘法西斯蒂的主要敵人共產主義者文化運動時的一種手段而已。他所以反對社會民主主義，是因爲社會民主主義者還要說幾句馬克思的話來欺騙羣衆，他所以反對「德謨克拉西」和無政府主義，是因爲這二者還要說幾句自由和平等的空話有不利於法西斯蒂的絕對專制而已。

因此，國民黨法西斯蒂的主要目標，完全是朝着我們共產主義者的文化運動，是爲



了要使中國廣大工農勞動羣衆，永久的被壓榨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重重鞭撻之下，才拚命的進行其所謂法西斯蒂的文化運動，組織起「幹社」一類的「文化」機關，作欺騙的武斷宣傳並以全力來封鎖和摧殘中國左翼的文化運動。

這在中國法西斯蒂所要「創造」的新文化原則上，也可看出來的：

「一、以民族至上主義作為這一文化的最高原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民族主義的年代，如果沒有民族，就沒有社會（？），沒有階級（？）沒有一切（？），我們必須擁護民族的利益，作為我們生存的基礎。

二、必須具備有最勇敢的精神，最偉大的氣魄。這種精神，這種氣魄，是以毀滅一切，克服一切的，絕對擯棄頹廢畏縮猶豫消極的傾向，以最積極的態度，犧牲的決心，為民族爭生存。

三、必須具備有流血的決心——換言之，必須有一種空前的暴力，去摧殘一切民族敵人，絕對排斥懦弱虛偽的人道主義。

四、必須有一種堅強的自信，極端打擊悲觀主義，失敗主義，逃亡主義，取消主義等一切傾向。」

這是中國法西斯蒂所謂「新文化必須包含的幾個原素」，但除第一條不通的述敘之外，其餘三條完全是表白法西斯蒂瘋狂的殺人狂的態度，不成爲「新文化的原素」，於

此，也可以知道，法西斯蒂是根本不懂得文化的，所以要掛起文化運動的招牌，爲的是欺騙和摧殘真正的革命文化而已。

中國法西斯蒂說他們要以「民族至上主義作爲這一文化的最高原則」，而共產主義者的文化運動是「危害民族的」，所以他們要用「流血的決心」，「最勇敢的精神」，「最偉大的氣魄」，而且以一種「空前的暴力，去摧殘一切民族敵人」。

但是，人們可以問一問：在日本帝國主義積極併吞東三省熱河華北和進攻中國其他部分之時，這些「最勇敢的精神」和「最偉大的氣魄」到什麼地方去了？中國法西斯蒂和國民黨各派在這敵人犯妄進攻之際，不但向真正的民族敵人投降屈膝求饒，而且反把「最勇敢的精神」「最偉大的氣魄」來摧殘且進攻真正爲中國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而鬥爭的反帝運動和中國蘇維埃紅軍！法西斯蒂口頭上說要爲「民族爭生存」，實際上是爲民族求死滅，不是已經很明白了麼！無恥的中國法西斯蒂，無論怎樣努力來掩蓋自己的投降，然而事實是不能由花言巧語所能夠洗滌的！

文化這個概念，在中國法西斯蒂的錯亂的腦筋中，是被弄成爲一種三不像的東西了的。只要看一看他們上面所說的話就可知道，同時所謂「民族文化」或所謂「民族至上主義文化」只要看一看法西斯蒂們所下的定義，人們就會笑落牙齒。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間（？）的文化——牠在某一民族，便成爲某一個民族的

文化（好一個空虛的重複！）換句話說，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牠在社會組織的自然（？）過程中，生出了無數的產物，如學問，藝術，道德，法律，經濟，宗教等。『社會主義月刊第七期七六頁』

這個莫名其妙的定義，據說作者還是翻了中華百科辭典和文學術語辭典之後才「創造」出來的東西——或者這就是「民族至上主義文化」的典型罷！——真是難乎其有的「一種堅強的自信」啊！

任憑法西斯蒂怎樣掙扎，但是對於文化的盲目所犯的這種錯誤，混亂和顛能將是不可避免的附屬於法西斯蒂的議論之中。因為說到文化的類型，是不能離開社會發展的類型的規定的，各民族在其各時期發展階段上，儘管有他特殊的特徵，但文化的類型却是一致的，因此封建文化，資本主義文化以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文化，才是所謂文化發展所必須採取的類型。民族文化或民族至上主義的文化，根本就不能成爲一個文化的類型，那是再明白不過的。所以中國法西斯蒂儘管高唱「民族至上主義的文化」，其實質乃不問可知的是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殖民地文化而已，再沒有別的出路！因此就從文化本身來說，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不僅不需要法西斯蒂的這種東西，而且必須把牠剷除的！

儘管中國法西斯蒂怎樣反對，但是共產主義的文化却是一個歷史的必然，儘管中國

法西斯蒂怎樣武斷的說共產主義是「危害民族的」但是只有共產主義者才能真正拯救中國民族於沒落的深淵之中，儘管中國法西斯蒂怎樣陷誣中國共產黨不要民族，但是爲中國民族徹底的解放與統一而鬥爭，却是全中國的工農群衆所知道的，是中國共產黨目前階段的基本政綱之一，蘇維埃的中國，這就是中國民族真正從帝國主義重重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的獨立與統一的新中國。而左翼的革命文化運動，就是在這中國共產主義者領導之下，爲創造中國蘇維埃的工農大衆的文化並同時準備發展到共產主義的文化去的文化運動。只有這一文化運動，才是真正的革命的文化運動！

但是，法西斯蒂的所謂文化運動，根本就是武斷宣傳的政策，就是揮動棍棒與大施屠殺的護符，對於法西斯蒂在文化上的這種匪賊行爲，不消說的是必須用群衆的力量來克服的。共產主義的文化運動必須立刻起來爲擁護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絕對自由，反對法西斯蒂的恐怖手段，去在各工廠，學校，農村和各種羣衆組織或機關之中，建立廣大基礎上的下層統一戰線，敏捷的活潑的來反駁法西斯蒂的對文化領域的每一動作，嚴厲而迅速的揭露法西斯蒂的無恥的武斷宣傳，揭穿墨索里尼意大利和希特勒德意志摧殘文化的面目，同時要用最大力量來擴大蘇聯社會主義文化的勝利和偉大的成績，使廣大的羣衆真正爲參加中國蘇維埃文化的創造而鬥爭。同時，這一反法西斯蒂的鬥爭必須與反對帝國主義進攻中國和反對第五次「圍剿」緊密的聯繫起來。

（括弧內皆引自『社會新聞』）

九月十五日

## 中國經濟的和財政的破產（續完）

陽

春

### 四 財政與金融的危機

財政與金融和工業農業商業有密切的聯繫。帝國主義經濟既在中國大大地加強，民族工業商業農業既已日益破產，帝國主義又公開地瓜分中國，水旱大災又是空前的厲害，那麼財政與金融的狀況，當然要非常險惡。但國民黨為掩蓋牠的崩潰，故意弄出許多假賬，故意將預算表決算表發表不全（如南京政府一九三三年的預算表只有行政費，沒有軍事費；只有支出而沒有收入的一項。湖南省政府的預算只有收入的發表而沒有支出）。本來國民黨軍閥無所謂賬目，他們將所借的內外債將所搜括的工農血汗隨便『揮金如土』，裝入腰包，存入外國銀行。財政部長或會計員只是『小舅子』之類，所做的賬，只是『混賬』！不過我們從各方面零碎的材料，依然可以看出中國財政與金融上的概況。

南京政府收入的來源：（一）海關稅，鹽稅，統稅，烟酒稅，印花稅，各省省政府所交之稅收，國家銀行的利潤等等。其中當然包括鴉片稅苛捐雜稅很多；（二）國內公

債。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自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十五年間）共發行六億四千萬元。國民黨統治時期（自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一年五年之間）共發行九億元。去年上海戰爭後，南京政府幾乎不能按期還債。即把還債時期延長一倍，每年約還一億元，利息統改爲六厘，而且停止借債。但至今年藉口「抗日禦侮」又發行二千萬元之愛國庫券。這些內債的發行，政府實收不過五成至七成，收買公債的人大半是上海銀行家，他們發了財，而且多存在銀行庫中充作基金。將來金融風潮一來，或政府倒台的時候，這些公債都要由存款的和持鈔票的民衆担任。（三）外債。除上面已說到的許多外債外，最近宋子文又在英國借五百萬鎊。（四）盜賣北平的古物已成公開的祕密。傳說：這些古物是賣給美國資產階級，有九千萬元之多。當然有一部份不大值錢的東西是運到上海來做牠的掩護。（五）廢兩改元。每元的法定量爲〇・七一五兩，可是新銀幣的純銀量只〇・六九九二三〇五兩，實體價值與名目價值之差額爲〇・〇一五七六九五兩。現在上海造幣廠每日可出十萬元左右。固然可以得些利潤，但因爲有這樣的差額，很多銀子就向外國流出（四月份流往美國者約三千萬盎司）。（六）鐵路上不但沒有收入，反而還要虧本。這由於鐵道整個的系統專門營私舞弊（如鐵道部將南潯路購買材料費三十幾萬元騙到手，什麼東西也不給）；許多車頭車輛爲軍閥扣留不能運貨運客；軍閥混戰和爲進攻蘇區濫用鐵路而不加以修理等等。根據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所發行的「統計月報」去年十一

十二月號合刊所記載的數目字：自一九三一年十月份至一九三二年十月份全國各鐵路總收入爲一七〇，四一七，六五六·四一元，總支出爲一七一，三〇二，七四二·七八元，這裏要虧短八八五，六八六·三七元。南京政府支出和虧空情形：（一）一九三二年南京政府總預算是：『軍務費仍占歲出總數百分之四七以上。債務費占百分之二五以上。財政費及補助費各占百分之八以上，教育文化費占百分之二以上，國務費外交費各占百分之二以上。建設，黨務，實業，內務，司法，蒙藏等費均不及百分之一』（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報』）。南京政府會計年度本是從本年七月一日至次年六月三十日止。但預算表竟遲至本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才發表一個僅有歲出而不載歲入的總概算。這裏應注意的是歲出的半數是軍費——進攻紅軍的費用和其他軍事費用，四分之一的費用是奉還帝國主義的外債賠款和國內公債。國民黨天天大喊『建設』，但建設費不及占總額百分之一！（二）根據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報告，自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三二年六月三十日止，總決算收入與支出都是六八二，九九〇，八六四·一五元，就是說民國二十一年以來第一次『收支相抵』。自一九三〇年七月至一九三一年六月也是『收支相抵』。這兩年的『收支相抵』當然是誰都不會相信的。（三）依據財政部的報告，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南京政府虧短八千萬元，自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則虧短一億零一百萬元，自一九三〇年以來有蔣馮閻軍閥大混戰，白軍屢次被紅軍打敗，日帝國主義侵

佔滿洲，攻打上海，東北海關被奪，稅收大減，費用大增，反而弄到「收支相抵」，這完全是自欺欺人。這是第一點。政府機關去年上半年祇發三成薪水，鐵路工人欠發工資六七月，軍餉或完全不發或欠餉好幾個月，學校教員拿不到錢而餓飯。以如此破產的財政狀況國民黨還不要臉地說「出入相抵」。這是第二點。照最近報紙所載有如下可注意的幾點①去年全國海關稅收短少三千六百萬兩，今年中國民衆購買力更弱，進出口貿易一定減少，稅收必然隨之而減。②前訂每月軍費一千三百五十萬元，不敷甚鉅。③教育部每月照預算原有四萬二千元，現在每月實發二萬一千元，只百分之五十。④南京補助各省市的經費多拿不出來。例如自去年十二月起停發江西十二萬五千元，補助南京市每月十萬元，最近減半發給。⑤重新丈量各地農民土地，土地比田契所載的數目更少的并不補給農民；若超過田契則須照地價繳錢，例如上海每家自耕農要出五十元之譜。當然農民無法繳款，正在相持中。⑥大借外債。各省水災爆發，中國經濟財政狀況當然一天壞一天。

南京政府的財政報告，只能包括一部份的中國。我們還應該將幾個省份裏的情形說一說：

一、廣東 ①省銀行決議續發新毫券四百萬元。前曾發行航空券五百萬元。是勸銷的，但只銷去八十萬元，現議決再發行一千萬元，將勸銷手續改爲各縣派銷（強迫推銷



——引者），限一年銷完（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申報」）。今年三月四日省政府通過發行大洋鈔票一千二百萬元（今年四月「中行月刊」）。②省政府訓令各縣縣長禁止二十元以上之銀幣出境。但本年財政年度粵省之預算出入平衡（今年五月二十四日大美晚報）。換句話說是強迫派款，採取通貨膨脹政策，所謂「預算出入平衡」還是空中樓閣。到七月以後看收入支出是否能照預算這樣「順利」。

二、福建 ①「各機關經費積欠四五個月，所有職員自廢歷秋節後迄未領到分文，甚至地方法院監獄因無錢發給廚房而宣告停炊」（去年十一月十六日申報）。②據今年五月四日國民黨機關報晨報說「閩省自省府改組後……以強有力之手腕制止駐軍截留稅收，提高捐稅課額後，收入日有起色。……全年收入計有八百萬元……房鋪捐仍在竭力整頓，……將房鋪捐改為房鋪稅……決定設立整理田賦總處，籌備田地清丈，並辦理土地陳報，調查官有土地，及立戶過割更正糧額各事。……至於支出一節現在各項經費，當能按期發付……」福建政權除閩西閩北為蘇維埃區域外是在十九路軍軍閥手裏，他們去年因利用士兵抗日做了「民族英雄」，吞吃了八百萬元的捐款慰勞品，又得了蔣介石五千萬元的賄賂，暫時還有錢揮霍。同時福建一部份雜色隊伍（如陳國輝部）已解決了。捐稅比較統一些，但福建經濟恐慌日益深刻擴大，羣衆情緒因紅軍勝利而更形高漲，罷工罷市農民暴動（如將樂）不斷發生。以上所說的推行房鋪稅和整理田賦將使工農鬥

爭越發劇烈，況且去年福州全體商店因房鋪捐的徵收，而舉行大罷市，現在福建軍閥將「捐」字改爲「稅」字而企圖繼續搜括。

三、江蘇 ①根據去年六月江蘇省政府報告說省庫收入只三百數十萬元，而支出須一千四百數十萬元，不敷一千餘萬元之鉅。因此省政府全體辭職！今年六月的消息每月收入五十萬元，支出八十萬元，每月虧空三十萬元，而且稅收一天天地減少。②上海市是直屬南京政府的，自閩北被日本帝國主義毀滅後，財政狀況非常惡劣。前年度終了，市庫已虧短一百十餘萬。去年七月至十月三個月間即虧短五千萬以上。最近市政府在北四川路徵收房捐，商店全體罷市反抗。

四、安徽 因省庫收入毫無，而中央協款又不能如期拿到，要以救國捐名義，恢復皖省三十二厘金局卡（今年五月二日大公報）。

五、湖北 ①去年十月十三日申報載「鄂省財政困難已極，積欠政教各費達三百餘萬元，連同各項借款共一千五百二十一萬餘元」。②擬發行善後公債三百萬元，作築路及「剿匪」之用（今年四月出版的中行月刊）。

六、四川 川省捐稅的繁重在全國各省中要算第一，因在過去二十年之間大小內戰統計有四百七十七次最近五年中軍費耗去十一億七千五百萬元，上半年除各種苛捐外各軍閥又弄到了四千餘萬元的「勦赤」捐今年六月二十四日報載四川有十九縣抗捐大同盟

成立，有幾萬民團參加抗捐，劉文輝派兵往剿，被民團打敗。

七、甘肅 據去年十二月三日申報載：甘肅一有軍隊九萬五千人，軍馬三萬三千餘匹，每年全省應支軍費一千八百萬元以上，除向省政府支取八百六十五萬元外，所差將近千萬元，完全直接取於農民，人民賣妻鬻子，以填其慾壑……財政之收入每年則僅八百八十萬餘元而支出每年共一千一百一十八萬元，軍費佔全部支出之百分之七七·四……」今年五月間甘肅新主席朱紹良宣稱：因連年災歉，去年一年財政上只收到預算額的半數，盼望中央補助，但中央財政亦極困難，能補助多少，亦頗難說。

#### 中國金融的危機：

一、濫發紙幣，中國紙幣，不論是帝國主義的銀行，南京或國民黨軍閥的銀行或資本家銀行都有發行之權，紙幣政策在中國行之已久，紙幣風潮幾乎每年都有。如幾年前平津漢口中國交通兩銀行的停兌，西北，勸工，工商及若干省銀行紙幣之不值一錢，最厲害的是山西七千萬至一萬萬元的鈔票和張學良時代滿洲所發行三十億元的奉票四十億至八十億吊的吉林官帖和無從調查的黑龍江官帖現在幾都等於廢紙，現在廣東所發行的鈔票（上面已說過），漢口四省農民銀行發行一角二角五角的流通券（不兌換紙幣）以及其他軍閥資產階級銀行的鈔票（上海各銀行紙幣發行總額根據去年七月間調查有三億五千萬元——兌換的）將來勢必至於變為奉票晉票第二，理由下文再說。

二、銀號錢莊商號工廠的關閉：各省銀號錢莊商號工廠的倒閉的消息，幾乎每天報紙都有，簡直沒法統計，這種倒閉當然由於營業衰落，虧空很大，這樣率速到與牠們往來的商號錢莊，同時銀行信用緊縮，不敢放款，使游資更多。以存款做投機事業和收買政府公債失業隨之激增。

三、農村經濟破產（第三章已說過）亦是金融危機之一。

四、金銀外流：中國的金融的勢力，本來被帝國主義操縱，今年六月一日社會主義月刊（反動報紙）說「外商在中國設立銀行，擁有巨大的銀行資本——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金磅，一三·〇〇〇·〇〇〇兩；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戈爾登——這巨大的外國銀行的資本，遠遠超過於本國銀行資本的總數十倍以上，僅由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一年二十年之間中國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存入外國銀行計二十億元，照去年十月六日中國評論週報紀載一九三一年中國金子流入外國的有值一億銀兩之多。中國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黃金已經運到外國去了。現在內地銀子紛紛向上海流入（上海若有全國流通現銀的半數）同時因為銀價漸高，又因廢兩改元，不值得把銀子交給造幣廠，改鑄為元（上面已經說過）因此近來銀子大批地外流（主要是向美國流出），對外貿易入超每年有五億數千海關兩。照各方面的估計：全國流通貨幣（現金鈔票及其他金寶勳產等）總值共有十七億元。照去年駐滬

的金融專家外人H. H. H.的估計中國共有二十二億元現款，按四億的人口計算每人只有五元半華幣，但按一日本人最近估計：中國由國際收入的每年約十六億海關兩而向國際付出的為二十一億海關兩，每年損失五億海關兩，其原因是由於滿洲的被日本帝國主義奪去，致出口貨大減，和在海外的華僑向中國的匯款減少。如果這種估計正確的話，那麼兩年以後，中國所流行的貨幣只是不兌換的紙幣了！

蘇區紅軍日益擴大鞏固，國民黨區域日形縮小，再加以目前空前的大水，國民黨政府收入必然銳減，其離山窮水盡的時期不遠矣。

結論：國民黨的「理財」政策只是出賣民族利益，舉行內外債，增加捐稅，勒種公賣鴉片。盜賣古物等等。然而賣國的結果只是使工農的反帝反國民黨的情緒更加高漲，借內債只是挖空銀行的基金促成金融恐慌；借外債如棉麥借款，使中國農村破產更甚；增加捐稅，只是更加摧殘農工商業，加重民衆的剝削；勒種鴉片使中國糧食問題更難解決，更激起民衆的反抗；盜賣古物是有限制的，工廠不能生產古物；甚至中國資產階級報紙說：政府天天想如何增加捐稅，這是像等不及金雞的生蛋而要將金雞殺掉！中國工農兵勞苦羣衆已有好幾十年受盡帝國主義和軍閥官僚地主資產階級層層的剝削壓迫。他們已有過半數陷入於失業餓飯流離死亡之中。帝國主義國民黨目前所加於中國工農的剝削壓迫屠殺，只是引起羣衆更堅決的去做革命鬥爭，使中國革命形勢更加尖銳，使蘇維

埃革命運動更猛烈地發展。主要問題是要我們的黨千百倍地努力領導革命爭取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以至到全國革命的勝利！

(完)

九二

## 波蘭階級戰鬥的新階段

列斯基

最近期間國際形勢上的變更，使得資產階級波蘭的帝國主義矛盾的糾葛，更加緊張了。

表現這些矛盾的尖銳化的主要動力，就是德國的希特勒政變。

希特勒的取得政權，對於波蘭資產階級的影響，是帶着二元的矛盾的性質的。德國法西斯蒂專政的特殊方式，激刺着波蘭的資產階級，他們認為這是對付革命運動所值得模倣的榜樣。

波蘭資產階級的階級同情——是在希特勒主義方面的。對於這個主義最崇拜的，就是國家民主黨，他們認為這是比墨索里尼的專政「更高一個形式的」專政。對於波蘭法西斯主義的統治派，同對於國家民主黨一樣，希特勒主義，首先是預防正在生長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內戰爭的模範。希特勒的取得政權，加強着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法西斯反動，同樣也使得波蘭原來就很猖獗的法西斯恐怖更加尖銳化。

別方面，希特勒專政使得波蘭和德國之間的對立，更加尖銳化起來。德國帝國主義和波蘭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掀動了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羣衆，帶了搗毀的性質。兩個國家的資產階級，還有社會法西斯蒂參加在裏面，都企圖造成「民族統一」的戰線，來打破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戰線。波蘭的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法西斯主義同樣的出來扮演「獨立波蘭」的擁護者的角色，而「抵抗希特勒進攻的危險」。波蘭的社會法西斯主義，很狡猾的要想在褊狹愛國主義的潮流上，加上一些自衛的，甚至於反法西斯的色彩。法西斯的波蘭，突然的變成了「民權主義的堡壘」「人道主義的負擔者」，以及其他種種美德的代表，他們的目的，固然是要把羣衆的注意，從自己的國家裏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上移開。

皮爾蘇斯基政府，企圖利用波德的對立，來削弱自己的競爭者——國家民主黨，而把資產階級的一切集團都聯合在自己的領導之下，鞏固自己的陣地。他們的陣地本來因爲資產階級的營壘的內部糾紛而削弱了。這一次皮爾蘇斯基派搶到了反德煽動的發起人的地位，這種反德煽動的開火向來是國家民主黨擔任的。像在德國國會裏一樣，波蘭國會裏的一些資產階級的集團，在對外政策上表現了原則上的一致。

「四強公約」，加強了德國帝國主義的作用，引起了波蘭資產階級的恐懼——他們害怕波蘭的西部邊界會要修改。波蘭的資產階級報紙，又在大聲疾呼的說起修改凡爾賽

條約的危險，帝國主義的波蘭的存在和牠的強國主義的傾向，都是根據於這凡爾賽條約的。波蘭的資產階級很懷疑法國政府的不准德國改變東部邊界的申明。

雖然沒有什麼形式上的責任，然而有了「四強公約」，比較沒有這個「四強公約」的時候，對於法國——「修改主義」的壓迫就要大得多。希特勒派在但澤的勝利，被認為是用強暴力量取消「波蘭走廊」的一個嚴重的步驟。德國可以希望意大利方面，部分的還可以希望英國方面贊助牠的這個要求。「走廊」問題對於法國資產階級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比德奧的「合併」的作用要小得多，這個「合併」將要使得德國帝國主義在多腦河和巴爾幹半島上的力量對比大大的改變而有利於德國帝國主義。因此，法國資產階級，受着洛迦諾條約束縛——那條約是沒有保障波德疆界的，——現在對於保護「走廊」的問題，就表現一些溫和的態度。照皮爾蘇斯基派的報紙的意見，法國甚至於準備在這個問題上犧牲自己的忠實同盟國——波蘭的利益，而只要保持整個凡爾賽條約的更重要的陣地。

希特勒是把德國資產階級的強國主義和他們的反蘇聯計劃密切的聯繫着的，他取得政權之後，德國帝國主義在資本主義世界地位就增高了。希特勒主義要想在反蘇聯的聯盟裏，做一個衝鋒隊的角色。法西斯的德國，在一般的反蘇聯的力量佈置裏面，佔着了重要的位置。因此，英國壓迫波蘭而求得和德國的接近，柏林和瓦薩有波德接近的祕



談密判，希特勒對波蘭表示愛好和平的姿勢，而同時，着重的指出「和平的」改正德國東部邊界的必要。

波德邊界的修正，也是德國代表團的那個哄動一時的覺書的前提。希特勒政府的殖民地計劃，是要破壞資產階級波蘭的領土的完整的。「胡庚堡的覺書」——「瓦薩報」說——是反對着波蘭領土的不可分割的。就算同意他們的那種解釋，說這次祇是奪取蘇維埃的烏克蘭，那末，波蘭的作用也仍舊不過是德國的殖民地」。這正是反蘇聯營壘內部的波蘭和德國資產階級的侵略利益互相妥協的困難。

波蘭帝國主義的國外矛盾的緊張，反映着凡爾塞制度的危機，和波蘭裏面的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同時并進。

自從資產階級的波蘭存在以來，從來沒有今年這樣的罷工戰鬥的規模，這是對於資本家想要取消集體合同，減少本來就很少的工資，消滅社會保險費的殘餘的總進攻的回答。罷工的浪潮比去年的範圍更大了。二三月間，罷工波及了全國主要的工業部門——煤業和紡織業，在洛慈和貝洛斯克之類的中心城市裏形成了同盟罷工；佔領工廠，同情罷工，街道上的羣衆戰鬥，這些都綜合在一起，一直要引導到無產階級的全國規模的總同盟罷工。

春天罷工的革命性質表現在工人羣衆反守爲攻，表現在他們比去年更加堅持，表現在他們的堅決爭取街道，尤其是共產黨員的領導作用。

這幾點，在洛慈的紡織工人總罷工裏表現得最明白。洛慈的紡織工人，提出恢復一九二八年的集體合同的口號，來和工廠主減低工資的企圖對抗，這就是要求增加工資。單是集體合同的原則，就團結了散漫的紡織工人隊伍，而使他們成爲整個的階級團體，把各個個別工廠裏的鬥爭變成廣大的戰線。這鬥爭，並且是爲着要求承認工廠代表團，和反對政府所着手的取消社會保險法的。最後，罷工工人絕對的反對法西斯式的仲裁。

這一次的罷工，在時間上超過了以前的洛慈紡織工人的罷工。單是十二萬工人堅持一個多月的罷工（從三月六日到四月五日），而且戰線上的任何一個陣地都沒被失業工人所破壞，單是這件事實，就表明着整個洛慈無產階級的意識上的深刻的轉變。

羣衆經常在運動之中，因此，總同盟罷工可以像雪崩似的迅速而開展出來，克服着罷工工人之中的動搖。工人和女工的隊伍去停止沒有立刻參加鬥爭的工廠。街道上的羣衆大會時常有五千到九千的羣衆，示威遊行的參加者時常有兩萬到四萬。罷工工人的口號：『大家到馬路上去！』實現了百分之一百，——這是資產階級的報紙也承認的。示威的結果，轉變到了巷戰。

罷工事實上是共產黨員領導的。他們是發動的人，他們在政治上組織上準備了罷工

，集中力量在決定勝負的企業裏；他們舉行了一天的洛瑟全市工人一致的同情罷工，他們組織了下層的羣衆的統一戰線，造成了罷工委員會的網，這樣，不管社會法西斯蒂怎麼樣，始終把罷工領導到了勝利的結局。共產黨員第一次能夠推翻波蘭社會黨和工廠主的協定，——推翻了那個罷工三天之後，波蘭社會黨的領袖就同工廠主訂立的合同——而領導全體罷工工人繼續罷工，一直到工廠主簽訂了一九二八年的集體合同。

×

×

×

×

貝洛斯多克紡織工人的英勇的三天總同盟罷工，也表現了極端堅決的特點，這次罷工發生在三月半，加入了洛瑟紡織工人的鬥爭，而要求恢復一九三二年六月的工資。這兩個罷工的主要特點是很相像的，雖然貝洛斯多克共產黨員的積極性比較洛瑟的要小些。

八萬礦工的示威總罷工，在春天罷工浪潮的開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去年礦工的鬥爭只是抗議性的總罷工的序幕，那末，今年的礦工罷工却促進了紡織工人的總罷工。別方面，在洛瑟紡織工人罷工的影響之下，多白洛夫的礦工在三月二十到二十一舉行了第二次的罷工。這一次的罷工，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共產黨員所領導的了，而在第一次的礦工示威罷工裏，却還是社會法西斯蒂占着上風，他們竭力想打消羣衆的戰鬥情緒。共產黨員在進行之中能夠消滅以前的缺點，而用組織罷工委員會作爲下層統一

戰線的機關的方法，鞏固了自己的陣地。

這三個巨大的階級戰鬥所引起來的團結運動，發展了羣衆的規模。洛慈，貝洛斯多克和格羅特諾的同情的總同盟罷工，證明着擴大戰線到工人階級的新的隊伍方面去的可能，只要聯繫着日常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貝洛斯多克的三次同情紡織工人鬪爭的總同盟罷工的例子，是工人羣衆之中革命緊張性的特殊的徵象。

正確的配合罷工和佔領個別的工廠，在擴大春天的罷工浪潮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年的初期，這是佔着優勢的鬥爭方式。工人認為這是壓迫工廠主的方法，而且是反對破壞罷工的最好的保障。工廠主也同樣的估計了這種方式，認為「這是極端的破壞神聖的私有財產」。

「罷工，同佔領工廠配合着，——洛慈的「真理」報，這是洛慈工廠主的機關報，在五月二十那天這樣說，——在全國爆發了起來，波及到遙遠的荒僻的地方，那些地方直到現在從來不曾有過尖銳的工人與僱主之間的衝突。工人的暫時佔領工廠，是兇狠的破壞私有權。這種罷工的每一點鐘，都在搖動國家的正當秩序和政府的威信。」

波蘭共產黨，堅決的打擊那些老爺脾氣的輕視這種自發的鬥爭方式的一切傾向。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不在於那種學院主義的把「低級的」鬥爭方式同高的方式對立起來，

而在於配合鬥爭方式的全部複雜性，使得「方式的提高成爲經常的趨向」——像列甯所說的。

社會法西斯蒂也出來反對佔領工廠，他們說這種鬥爭方式大原始了。「意大利式的罷工方式的流行和時髦，——波蘭社會黨，「工人」報說——是因爲現在革命的機會比以前少了」（？）同時，波蘭社會黨領袖却同情那種真正最原始的抵抗方式——絕食，這對於資產階級是最沒有危險的。

社會法西斯蒂，還竭力的想把佔領工廠這個新的鬥爭方式停止在消極的甘地主義的抵抗範圍以內；共產黨就努力反對他們這種傾向，而使得罷工工人積極化，引起隣近工廠的團結運動的加強和擴大鬥爭的戰線的把那佔領的工廠變成動員廣大羣衆的中心。應用這種策略的模範的就是多白洛夫區佔領兩個礦坑的時候所開展的運動。工人守在礦坑裏十天。在共產黨員的影響之下，他們停止了絕食，選舉了罷工委員會，而同別的礦坑弄好了關係，我們的組織領導了好些大會和示威遊行，辦理了幫助罷工工人和他們家屬的事情，在最重要的工廠裏，都通過了贊助他們罷工的決議，建立了罷工委員會的網，而引到了多白洛夫礦工的第二次罷工。

x x x x x  
大多數的罷工的結果都是勝利的，或是部分的勝利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法西

斯政府逼不得已的要給許多讓步。洛慈的工廠主簽訂了合同，包括全部的紡織工業，事實上是增加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的工資，承認了工廠代表團的權利。在上西里西亞區域的煤礦工業裏，集體合同延長了五個月。多白洛夫和克拉科區域的煤礦主取消了減低百分之十五的工資的決定。全國總同盟罷工的威嚇，使得政府延期取消所謂「英國式的禮拜六」。

春天罷工的成功結果，鞏固了羣衆對於自己的力量的信仰，而非常之大的擴張了共產黨的影響。共產黨員能夠在政治上利用這種成功而發動反法西斯大會的羣衆運動和五一的示威，尤其是在多白洛夫區域，那裏我們的強有力的戰鬥的運動包括了無產階級的基本羣衆。這種正在生長的影響的組織上的鞏固，却比較的壞。像洛慈選舉工廠代表的時候，共產黨員所得到的那種勝利，只能夠算很少的例外。

勝利的開展罷工鬥爭，是克服那種狹愛國主義的潮流的最好的方法。貝洛斯克紡織工人的總罷工，給了階級一致的榜樣，在那次罷工裏，建立了波蘭工人和猶太工人的鞏固的戰線。在日常的階級鬥爭裏，波蘭共產黨在羣衆之中提高真正國際主義的精神，發展他們同別國無資產階級鬥爭團結的情感，尤其對於德國的無產階級。

紡織工人和礦工的幾次總同盟罷工，有很大的國際意義。這些罷工，是對於波蘭資產階級的進攻的答覆，波蘭的資產階級正因為希特勒反對正在生長的革命的勝利而興奮

着呢。在這些罷工裏，波蘭的無產階級打擊了波蘭社會黨，第二國際和托洛斯基派的小嘍囉的失敗主義理論，他們認爲希特勒的勝利要使得整個國際工人運動退後好多年。波蘭的資產階級和他們的社會黨奴才，希望德國無產階級的暫時退却會自動的引起波蘭工人階級的退却。他們計算錯了。波蘭罷工鬥爭的規模，證明無產階級羣衆進到了部份進攻的戰鬥，這是革命危機接近的信號。這種規模，使得反革命的反蘇聯的根據地——資產階級的波蘭的國際地位降低了。結果，波蘭的資產階級就只能夠改用更軟化的，繞圈子的進攻方法。

波蘭的經濟恐慌爆發了鮮明的經濟崩潰的信號。大批的工廠企業的縮減，已經使得礦業停滯起來。破產的農村退回到自然經濟的形式。雖然耕種的面積縮小了很多，然而糧食的價錢還在跌下去。在許多區域裏，尤其是西部白俄羅斯和西部烏克蘭，鬧着非常之厲害的飢荒。

資本進攻到處都是。法西斯總長所領導的聯合政府的經濟會議，提出了減低生活程度和生產支出的口號。礦工和紡織工人又在新的打擊之下。企業家的讓步或者取消，或者祇剩得紙上空文。五十萬的國家職員，鐵路工人也在其內，爲着「救濟」國家預算的緣故，過着飢餓的生活。法西斯政府又在着手取消社會保險費了。法西斯的恐怖一天天

的厲害起來。

工人群眾英勇的保持着自己的勝利。最近，貝·洛·斯·多·克·，託·馬·塞·夫·，海·努·夫·卡·的·工·人·，就表現了堅決和英勇的榜樣。個別的罷工接連不斷的發生，發出了新的，更廣大的罷工浪潮的信號，這一次應當有鐵路工人，五金工人，農業工人的參加。這種浪潮之間的過渡期間，本來是動員新的戰鬥的力量，現在越來越短了；而且個別罷工的爆發，比去年年底要容易得多，動搖也要少得多。

在這方面，農民的革命運動還比較落後。去年夏天波及許多縣的大騷動之後，來了一陣散漫的運動，直到現在，才又開始深刻的波及廣大的勞動農民。

洛普赤茨克，爾日沙夫斯克，蘭楚茨克縣的真正羣衆的戰鬥，就是這種運動的信號。甚至於六月二十日的官場消息，也說起克拉科地方有部份武裝的農民群衆和警察的隊伍發生衝突，在許多鄉區裏，兩方面都有受傷的和打死的，說農民企圖奪取被捕的人等等。

羣衆基礎的迅速擴大，革命鬥爭方式的尖銳化，使黨要比以前更有力的認識工人戰鬥，農民戰鬥和民族解放戰鬥之間的聯繫的必要，這種聯繫，將要決定引導羣衆到直接爲着政權而鬥爭的問題。

（江源譯自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真理報」）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出版

定	價
每	期
五	分
每	月
一	角
半	年
五	角
五	分
全	年
一	元
郵	費
在	內

---

編輯者 中華書店

出版者 中華書店

發行者 中華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世界佛教居士林

## 募資購請佛經佛像啓

竊本林新建圖書館已告落成除徵求圖書外擬購請國內各刻經處各書坊經書圖像各全份查各刻經處各書坊所出圖書目錄約共需洋三千元之譜今擬集同人分認募集伏望 諸方善信隨喜捐助以便集有成數即向各刻經處購置俾圖書館得以早日布置以供社會人士閱覽其捐助在十元以上者敬刻芳名懸掛館內永為紀念如蒙樂助捐款請逕交本林收支處當掣給收據為憑並登報鳴謝以楊仁風伏維慈鑒

本林謹啓

林址：上海閘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六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平湖孫透雲香號度製名香

本號開設平湖北寺內百有餘年發明上品菩提香虔造上品經香正沉線香蘭花香白芸貢香陀羅尼香末安神盤香安息盤香劉海牌辟蚊盤香不惜工料有益衛身味妙清香價廉物美馳名中外有口皆碑近年來各省寺院各佛教團體紛紛來購應接不暇或因遠購不便故為便利起見特將寄售處開列於下務祈賜顧諸君認明劉海商標就近購買庶不致誤特此通告此啓

(寄售處) 佛學書局總分局上海  
徐志誠蘇州淨心蓮社杭州功德林  
海鹽蓮社無錫佛經流通處如皋經  
香流通處紹興佛學會青島佛學研  
究會

### 閱過本報請轉送他人功德無量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二四六八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佛學研究

葉恭綽題

第六十二期

上海佛學研究會印行

# 紅 旗 第 六 十 二 期

## 目 錄

- 立即把反對五次『圍剿』的運動開展起來  
爲保證紅軍在思想上的絕對一致而鬥爭
- 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  
經濟建設的初步總結
- 宋子文的辭職與國民黨的財政破產
- 國民黨的統制經濟是什麼？
- 十九路軍閥的『生產大衆政權』與土地政綱
- 共產國際執委給英國獨立工黨全國行政會的信
- 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的前夜
- 關於新的領導方式（續紅旗五十九期）
- 罷工戰鬥的新的普遍的方式

# 立即把反對五次『圍剿』的運動開展起來

(社論)

帝國主義國民黨對紅軍與蘇區的五次『圍剿』，已經開始了。在中央蘇區，紅軍已與敵軍周渾元部隊接觸，把周敵的軍隊消滅了三團以上。在四川，紅軍已將劉存厚所部十六團完全擊潰和消滅，所餘殘部不過三團，新佔領渠縣、營山、萬源、宣漢、綏定等縣，直逼萬縣，使帝國主義國民黨狼狽萬分。英勇的工農紅軍給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迎頭痛擊！這是粉碎五次『圍剿』的先聲。

然而決勝負的戰爭還在前面。

帝國主義國民黨正在動員一切力量，以進行更大規模的戰爭。帝國主義者加派軍艦到中國，只在上海一處，十月份的入口軍艦，比九月份增加一倍以上，而英美法日等軍艦，正在集中於福州、九江、萬縣等鄰近蘇區的水面，準備隨時直接干涉紅軍與蘇區。隨着英、美、法、德給國民黨大借款與軍械之後，日本也正在與南京談判幫助國民黨進攻紅軍的大借款及軍火的接濟。

國民黨把自己的主力集中到蘇區周圍，每天都有成千成萬的軍隊經過南昌派到前線去進攻紅軍。國民黨把歲收的幾乎全部用去『圍剿』紅軍。據十月三十一日『晨報』，

今年歲收總額爲六八〇・四一五・五八九元，而支用數目，軍務費用達四一五・六〇〇・〇〇〇元，債務費計二四一・八四一・八〇四元。債務費也是用在軍事上的，而軍費完全是爲進攻紅軍的。

不僅如此。國民黨中央決定從十一月一日起在各地依次舉行所謂「剿匪」宣傳週，以欺騙民衆，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準備進攻紅軍與蘇維埃。在上海國民黨市黨部與市政府發起從本月六日起進行這種宣傳週，召集什麼各界大會，利用飛機散發傳單，在電車上，郵件上貼標語，口號，又用影戲，反動報紙，化裝演講，播音演講，募捐以及汽車，腳踏車游行全市，以進行反對紅軍的武斷宣傳。

帝國主義國民黨對於五次「圍剿」，是用全副力量去進行的。

但是，我們怎樣對付五次「圍剿」呢？我們的組織在反對「圍剿」上做了什麼工作呢？可惜，至今還沒有做過什麼認真的動員，甚至有些地方連絲毫的準備都沒有。比方，江蘇黨的組織祇在常委稍爲討論了中央關於五次「圍剿」的決議，可是沒有把這個決議傳達支部中，至於動員群衆來反對「圍剿」，那是談不到的。有些省委甚至中央的決議還未討論過。這些現象是再不能容忍了。這祇能由我們一些組織對於反對五次「圍剿」的最負責任務表示消極來解釋的。

紅軍的戰鬥力量與積極性，比以前大大的增強了，蘇區與白區廣大群衆對紅軍的擁

護更加熱烈而堅決了，敵人的力量更加削弱了。這有無數的事實可以證明，這又說明我們有一切可能來粉碎五次『圍剿』。問題就在於我們要把可能變為現實，在於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動員羣衆，領導羣衆，把白區的罷工鬥爭，反帝運動，以及農民、災民，失業者的鬥爭與紅軍的行動配合起來，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為蘇維埃中國而鬥爭。

關於反對五次『圍剿』的任務，已在中央的決議和『鬥爭』五十五期的社論中說得很明白。十一月二日的緊急通知又指出了為開展反對五次『圍剿』運動的具體工作。為執行這些任務，我們需要什麼呢？

首先，我們應當把上述的中央決議與指示即刻拿到支部中和一切羣衆組織中去討論，規定具體的工作，動員羣衆為這些工作而鬥爭。在討論中必須避免像江蘇省委所採取過的那種辦法，由報告人作五六分鐘的報告，不加以具體的討論，不和自己的實際工作聯繫起來。這樣的辦法是要不得的。

第二，動員黨、團、工會、及一切羣衆組織，以進行反對五次『圍剿』的鬥爭，并把這些組織的行動配合起來，不能像現在的江蘇一樣『各自為政』，就是說黨應當切實領導一切工作。沒有這種領導，則我們的工作（反對五次『圍剿』也在內）是不會開展的。

第三，立即開展反對進攻紅軍的廣泛的宣傳鼓動，來回答國民黨所謂「剿匪」宣傳週。經過我們的及我們影響下的刊物大量散發宣言、傳單、標語、口號、抗議、通電，來宣傳紅軍的勝利，揭破反動派的每一個武斷宣傳，號召羣衆以罷工、示威、罷課、車間會議、羣衆會議等來反對進攻紅軍。組織與派遣宣傳隊到工廠、工房、學校、兵營、農村中去作擁護紅軍的鼓動。動員參加國民黨召集的有羣衆參加的一切會議，來揭破國民黨的任何欺騙，奪取被欺騙的羣衆，使這些會議成爲反對國民黨和擁護紅軍蘇維埃的會議。

第四，用一切力量去發動羣衆鬥爭，來回答五次「圍剿」以「反對減工」，「反對關廠」等口號去組織工人的罷工，發動碼頭、鐵路、輪船工人不運軍火進攻紅軍，要求將進攻紅軍的軍費救濟失業工人，災民、難民。現在比任何時候要牢記着：「在白區的每個罷工都給紅軍的行動以直接幫助」。利用帝國主義新進攻與國民黨新的投降出賣，去號召與組織武裝民衆的民族革命戰爭，要求「一切軍隊北上抗日」，反對派兵進攻紅軍。把蘇維埃紅軍對日宣戰通電與抗日作戰協定普遍到一切羣衆中與士兵中。組織與領導農民、飢民的抗捐抗稅、分糧吃大戶與游擊戰爭，來反對「圍剿」紅軍。現在在白區組織一切羣衆鬥爭去援助紅軍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有力和更加迫切，因爲國民黨將大部份軍隊調去進攻蘇區，後方異常空虛，每一個羣衆鬥爭的發動都給國民黨進攻紅軍以絕大



的打擊。

第五，加緊秘密工作，鞏固黨的組織。敵人的五次「圍剿」與對我們黨的進攻是不可分離的。國民黨的所謂「剿匪」宣傳週，公開提出「偵察」，「扭送」，「告發」等的進攻，動員一切叛徒，探狗，法西斯蒂匪徒，來破壞我們的組織。我們應把秘密工作提到最高度。但是，這不能了解為「不動」，如像某些同志所表現的。這是說，我們要把秘密工作與公開半公開的活動適當的聯繫起來。同時應加強反對白色恐怖與法西斯蒂，反對叛徒等的鬥爭。

爲着順利的完成這些任務，必須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首先反對對擁護紅軍消極怠工，對我們力量不信任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反對「左」傾空談。兩條戰線的鬥爭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堅決的轉變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肅清官僚主義，脫離羣衆等現象。實行具體領導與工作檢查。應把反對五次「圍剿」的鬥爭，當作是考查黨的一切工作的主要尺度。

這就是開展反對五次「圍剿」運動的關鍵。我們應當抓着這個關鍵，以布爾塞維克的毅力，堅定性，把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的運動立即開展起來！

## 爲保證紅軍在思想上的絕對一致而鬥爭

王稼 蓄

共產黨中央已經明白的估計了目前的政治形勢，分析了『五次圍剿』中敵我力量對比，指出了黨的緊急任務，領導着全黨和全中國的民衆，來爲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爲獨立自由的蘇維埃新中國而鬥爭。

在執行共產黨的總路線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決戰中，工農紅軍有其特殊重要的光榮的任務；爲要使紅軍能夠勝利的完成黨給它的任務。必須使紅軍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保證紅軍尤其是紅軍中的黨在思想上的絕對一致，打擊一切對『五次圍剿』的機會主義觀點和對黨的進攻路線的動搖。

最近在紅軍討論中央的『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決議』時，發現了一些機會主義的曲解與觀念，對於這些曲解與觀念必須開展無情的思想鬥爭。

機會主義者，對於我們的偉大勝利及敵人的慘敗是估計不足，因此便懷疑和否認『五次圍剿』的徹底和完全的粉碎，懷疑和反對黨的正確估計；張如心同志在紅校的討論會上，認爲在『四次圍剿』當中，進攻紅軍的敵人並未全部消滅，因此『四次圍剿』只在質量上，而不在數量上是給我們粉碎了。

張如心同志不了解在「四次圍剿」中，國民黨到處得着慘敗，紅軍得着光榮的勝利，直到中央紅軍在東黃陂的空前勝利，白軍一師全部覆沒，蔣介石得着「生平未有之隱痛」以後，敵人的「四次圍剿」宣佈了它的全部慘敗的完結；張如心同志以「學者」的「哲學把戲」——數量與質量——來模糊同志們的頭腦，他不了解我們所得的勝利與敵人力量的削弱已經達到這樣程度，使敵人不能在「四次圍剿」的原有計劃和原有力量的基礎上，來繼續向我們進攻，而不得不取守勢，重新佈置重新計劃重新組織和調動力量來準備新的進攻——「五次圍剿」，這正是目前新形勢。固然，我們並未有消滅四次進攻紅軍的全部敵人，這正因為我們工作中還有重大的弱點與缺點，「防害我們得到更大的勝利」，「防害我們在粉碎「四次圍剿」中實現中心城市的奪取，及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之實現」。（中央決議）張如心的「哲學把戲」是對我們的勝利估計不足，是巧妙的否認「四次圍剿」的徹底的完全的粉碎，否認目前的新形勢，機會主義的內容是很明顯的了。

另一種錯誤，便是認為「中央局的四月間的估計，在基本戰綫上粉碎敵人的「四次圍剿」，但「四次圍剿」還沒有總結：與現在的估計是一樣的。」（三軍團某同志），「北面戰綫的「四次圍剿」已經完全粉碎了，但南邊戰綫的「圍剿」並沒有粉碎」（贛南的同志）。

這種觀念，是不了解整個勝利的局面，而只是看到局部的現象，北面戰線上的偉大勝利，使國民黨整個要重新佈置『圍剿』，『緊接着東黃陂慘敗之後，蔣介石曾經幾次企圖依據他原有的力量，不變更『四次圍剿』的總計劃，向我們作新的進攻』，所以中央局當時估計是正確的必要的，但是後來蔣介石的『這一切企圖都是失敗了，使蔣介石不能不暫時的改變積極的進攻為城防的政策，而在新的基礎上調遣新的軍隊，組織新的力量以較長期的準備，來進行新的『五次圍剿』』。（中央決議）形勢的變更，使我們需要變更我們的估計，不顧形勢的變更，而固執過去的估計，便是錯誤，擁護黨過去的估計，而反對現在的估計，這是機會主義的愚笨。

由於對我們偉大勝利估計不足，所以即使承認四次圍剿已經徹底完全的粉碎，但認為：『『四次圍剿』的終結與『五次圍剿』的開始，不是由於我們的勝利，而是由於敵人進攻部署與計劃的改變』。（三軍團某同志）這種說法，是奇特和謬誤極了，假若沒有我們的偉大勝利與蔣介石的慘敗，使他們不能再在『四次圍剿』的原有計劃上來繼續向我們進攻，蔣介石便不需要變更進攻部署和進攻計劃。上面的說法，祇有代替敵人宣傳，否認敵人的慘敗，取消我們的勝利，此外別無其他作用。因為對於目前的形勢的估計的不正確，便產生了驚惶失措，悲觀失望的情緒與觀念：『敵人做了這麼多堡壘『打到那一天才能打完』，『敵人飛機更多了，又放毒瓦斯，我們沒有什麼辦法對付他』，

「贛南我們的力量太弱了，主力紅軍不來，沒辦法打勝戰」，「四次圍剿」打破了，又來了個第五次，將來又有第六第七第八次圍剿，不知打到什麼時候才完結」等等：這些觀念，都是不了解目前敵我力量對比，誇大敵人的力量，投降困難，散佈失敗情緒，削弱紅軍的戰鬥力，直接是幫助了敵人。

我們是處在決戰前面，紅軍中的政治機關，必須加緊他的工作：廣泛深入的開展思想鬥爭，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機會主義，來保障紅軍在思想上絕對一致的來保障戰爭的勝利，但我們必須深入的解說中央的決議，耐心的教育全體戰士，不疲倦的說服犯錯誤的同志，才能真正保障黨的路線執行和思想鬥爭正確的發展，政治工作的不深入和官僚主義（如紅校學生在測驗中答覆：「粉碎了敵人」四次圍剿」是因為黨執行了羅明路線」等）與思想鬥爭中的非布爾塞維克的傾向和懲辦主義（如紅校的例子）只會產生惡果，這是政治工作的恥辱和罪惡。

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障行動的一致，才能保障戰爭中統一意志的實現，思想上的任何動搖甚至最微小的動搖，都是有害於戰爭的勝利。

（九月十日）

# 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

毛澤東

——在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我們這次開兩個經濟建設大會——南部十七個縣的與北部十一個縣的。這種爲着經濟建設而開的大會，以前是沒有開過的，今天是第一次。目前的形勢是：敵人的四次『圍剿』已經被我們完全粉碎，而五次『圍剿』接着就要到來；全世界革命與戰爭的大風暴是逼近着我們了，帝國主義大戰與反蘇聯的戰爭，是在瘋狂般的準備着；帝國主義是在瘋狂的壓迫中國，日本佔領了中國四個半省還正在向內蒙古一帶發展他們的強盜戰爭；國民黨四次『圍剿』慘敗後，正在佈置新的第五次『圍剿』；全中國的革命鬥爭與革命戰爭是取了一種新的形勢而大踏步的開展着：這時候我們在這裏開經濟建設大會，這就指明了我們要討論的是什麼，我們的經濟建設是爲着什麼，我今天的報告就在解釋這一點。我的報告分作下面兩部份來說：

## 一 四次『圍剿』的粉碎與新的五次『圍剿』

一 我首先來說粉碎四次『圍剿』中我們所得到的勝利

我們要說：

第一，是敵人部隊的大數量消滅。

四次『圍剿』是澈底粉碎了，總括一年來中央蘇區，鄂豫皖，四川，湘鄂西以及湘贛，湘鄂贛，閩浙贛各蘇區紅軍。消滅敵人部隊總數在十五師以上。比過去粉碎敵人三次『圍剿』時的勝利更大了，敵人的武裝力量，受了一個最嚴重的打擊，敵軍全部中下級軍官，都十分畏懼紅軍，怕與紅軍作戰，而白軍士兵的動搖及對革命的同情，則在日益增長。

第二，是紅軍的堅強與擴大。

紅軍已經成爲無敵的鐵軍了。紅軍編制的改變，軍事技術的提高，政治上的堅定，都比過去有了極大的進步。紅軍的擴大，比較過去是增加了一倍，我們已經建立了大規模的作戰軍。

第三，蘇區是更加鞏固了。

在四次『圍剿』中，工農羣衆的階級覺悟與擁護革命戰爭的熱忱是更加提高了。查田運動的深入，工人鬥爭的發展，使得蘇區內部的封建殘餘勢力，受到嚴重的打擊。羣衆的文化教育運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經濟建設運動開始了發展的新形勢，蘇維埃的工作更加改善了，他在羣衆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蘇維埃的旗幟，映入了全國勞苦羣衆的

心目中。

第四，是擴大了蘇維埃的領土。

中央區閩贛省的建立，四川幾百里新蘇區的開闢，湘鄂川賀龍同志那方面又發展了一個大蘇區。

第五，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革命運動也是極大的發展了。

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去中國四個半省，國民黨投降帝國主義，訂立了中國與日本的賣國協定，使得廣大群眾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運動大規模的開展了。因為國民黨的壓迫屠殺，農工商業的破產，資本家與地主更加殘酷的剝削工人農民，使得工人的罷工鬥爭，農民災民的反抗捐稅鬥爭，農村暴動與遊擊戰爭，大大的發展了。

二 同志們：我們已得到了極大的勝利，但是這些勝利是依靠着什麼得來的呢？

我想大家都明白，是依靠於：（一）紅軍的英勇善戰；（二）蘇區與白區廣大工農羣衆的革命積極性；（三）共產黨正確路線的領導。這三個重要條件，才粉碎了敵人的四次『圍剿』，取得了上面所說這些偉大的勝利。這些勝利給予了帝國主義國民黨以極大的打擊，一方面使革命力量更加增大了，取着鐵的強流的形勢向前猛進着，另一方面使得反革命力量更加削弱，更加感覺他們的危亡迫在眼前，使他們不得不重新佈置一個



大規模的進攻，企圖挽救他們將死的統治。

### 三 因此敵人瘋狂的在佈置他們的第五次「圍剿」：

爲了佈置這一次「圍剿」，使國民黨不得不更加投降於帝國主義。蔣介石在出賣了東三省熱河華北之後，更以許多賣國條件同美，英，法，意，德，各個帝國主義國家訂立了密約，借得大批金錢和軍火，重新調動部隊，訓練新兵，拉攏各派軍閥（但軍閥間的衝突與戰爭是無法避免的），正在積極的佈置對於蘇維埃和紅軍的第五次「圍剿」。

## 二 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

### 一 爭取一切有利條件去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

中國革命現在是處在這樣的緊急關頭，即是說：帝國主義把中國滅亡呢？還是革命戰爭消滅國民黨驅逐帝國主義把中國變成蘇維埃中國呢？帝國主義國民黨決定了滅亡中國的進路，他們已經採取了五次「圍剿」這個辦法，要在五次「圍剿」中把中國完全瓜分或者共管，使中國幾萬萬民衆，變成帝國主義的牛馬奴隸，變成印度人和高麗人，使中國變成完全的帝國主義殖民地。這是一個絕大的危險，這種危險，在我們的頭上威脅着。同志們，我們能聽任他們這樣做嗎？不能，我們要爭取革命的出路，我們的出路是戰勝帝國主義國民黨，使中國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成爲新的自由獨立的工農兵

蘇維埃共和國。這裏重要的關頭，是澈底粉碎他們的五次「圍剿」。爭取粉碎五次「圍剿」的勝利。仍然是依靠於紅軍，依靠於羣衆，依靠於堅決執行共產黨的進攻路線。但我們必定要用我們的一切努力去爭取一切比較過去更加充足的條件，才能粉碎五次「圍剿」，才能取得比較過去更加偉大的勝利。

爲了爭取這次勝利，我們要做許多的工作。我們要猛烈擴大紅軍，要在中央區及隣近幾個蘇區六個月至十個月內辦到擴大廿萬個新戰士上前綫去，使各個戰線上的紅軍集團更加壯大起來，能夠擔負着打擊蔣介石幾十萬白軍的任務。要開展廣泛深入的查田運動，激烈發展農村中的階級鬥爭，去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去最後的消滅封建殘餘勢力，使廣大農民羣衆更加熱烈的歡喜的參加革命戰爭，要普遍實行勞動法，啓發工人鬥爭，更加提高工人羣衆對於革命戰爭的積極性。要經過今年的選舉運動，改選各級蘇維埃，從鄉蘇直到中央一律實行新的改選，使整個蘇維埃政權鐵一樣的鞏固起來，更能擔負組織與指揮革命戰爭的偉大事業。要注意邊區和新發展區域的工作，使革命戰爭得着便利條件迅速向着中心城市發展，要發展羣衆的文化運動，提高羣衆的文化水平與政治水平，使革命戰爭得到一個精神上的有力的工具。除此以外，還有極其重要的一項工作，而爲我們此次所要着力討論的，這就是經濟建設方面的工作。我們要猛力開展經濟建設運動，要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看成爲粉碎五次「圍剿」的最基本的條件之一——供給革命

戰爭一個必不可缺少的物質上的條件，這次經濟建設大會的召集，就是爲着這個目的。

## 二 偉大的經濟建設任務是擺在我們面前了！

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蘇維埃動員羣衆，立即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的經濟建設事業。爲什麼？整個的爲着革命戰爭的勝利，爲着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與供給；爲着改善羣衆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羣衆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爲着在經濟戰綫上把廣大羣衆組織起來，並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着新的羣衆力量；爲着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專政的蘇維埃政權，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爭取整個革命戰爭首先是粉碎五次「圍剿」的戰爭的澈底勝利：都須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這是每個蘇維埃工作人員應該立刻認識清楚的。過去有些同志認爲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那裏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誰要談到經濟建設，就被罵爲右傾。同時認爲在革命戰爭環境也沒有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只有在和平的安靜的環境中才能進行，目前是談不到的。同志們，這些意見是對的嗎？不對的。說這些話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完全的保障，長期的戰爭就會感覺疲弊。你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與商業，我們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因爲敵人的封鎖，奸商的操縱，使我們蘇區的對外貿易，受

到極大妨礙。鹽價很貴，有時買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很利害。這些情形立即影響到工農的生活，使工農生活不能得到更大的改良，這不要影響到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線去嗎？工農如果對於他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要影響到我們的擴大紅軍動員羣衆參加革命戰爭嗎？所以這種以爲革命環境不應該進行蘇維埃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有這種意見的人，也常說服從戰爭，不知道取消經濟建設去服從戰爭，不是服從了戰爭，而是實際上削弱與影響了戰爭。正是爲了服從戰爭，需要進行各種必須的經濟建設工作，因爲經濟建設是革命戰爭的極端需要不可缺少的條件，祇有開展了經濟戰線方面的工作，發展了蘇區的經濟，才使革命戰爭得到一個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夠更加順利的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一百萬紅軍，把我們的戰線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鐵軍毫無顧慮的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們的紅軍戰士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份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才使我們廣大羣衆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的去當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必須這樣幹才叫做服從戰爭，否則不是服從戰爭，而是使戰爭缺乏一個決定勝負的條件，這種機會主義觀點，是完全不對的。現在各地蘇維埃工作人員中，還有許多人不明瞭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還沒有把經濟建設任務真正的担在自己的肩膀上，因此，這些同志還沒有用盡一切力量去執行中央政府的號召，百倍的努力

去開展經濟戰線上面的運動。這譬如還有許多政府主席團沒有着重討論經濟建設問題。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拿工作能力較差的去做國民經濟部的工作。合作社的發展還只在開始的階段。調劑糧食的工作也還只在一部份地方做起來。各地還沒有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宣傳到廣大羣衆中去——這是十分緊要的，還沒有在羣衆中造成爲着經濟建設而鬥爭的熱烈的空氣。這種情形，都是由於不認識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來的，我們這次大會，首先要對這種錯誤觀點給他一個嚴厲的反對，要消滅這種忽視經濟建設的機會主義錯誤觀點。我們要經過大會同志們的討論與會後回去的傳達，要在整個蘇維埃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羣衆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空氣。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地位，一致的努力起來去推銷三百萬以至五六百萬的經濟建設公債票。去發展合作社運動，號召一百萬人進合作社，其中有五十萬人進消費合作社，五十萬人進糧食合作社，去普遍建設谷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城去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都要去設立糧食調劑支局，使我們的糧食，一方面在蘇區內有餘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把蘇區多餘的糧食（有計劃的，不是無限制的）運輸出口，賣得高價，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換得現洋購買必需品進來。努力去發展農業生產與手工業的生產，使明年的收成更加增多，使錫砂，木頭，樟腦，紙

張，烟葉，夏布，香菰，薄荷油種種特產恢復過去的產量，並把他們大批輸出白區去。比如鑛砂，就是一種很有希望的工業，因為帝國主義軍事工業的需要，這個鑛砂出口是有極大希望的，我們要準備幾千幾萬人去開鑛砂礦，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農具與石灰的製造，又是十分需要的。再從出入口貿易的數量來看，蘇區出口第一個大宗是糧食，中央蘇區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擔穀子出口，三百萬羣衆中每人平均輸出谷子一担以換得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罷，這筆生意是什麼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極端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太的農民五角錢一担谷子賣與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担，賺去了八倍。又看三百萬羣衆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少說都是商人在那裏壟斷，我們蘇維埃沒有去管過。商人在這中間進行的剝削真是大得利害，譬如商人到嘉應州買鹽，一塊錢買七斤，運到蘇區來，一塊錢買十二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像這樣的事情，蘇維埃再不能不管了，以後是一定要管起來，我們的對外貿易局在這方面要盡很大的努力。三百萬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借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小部份用去發展生產，大部份用去發展出口入口貿易。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并且要使之出口賣得高價，同時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蘇區羣衆，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

，抵制敵人的剝削，使蘇區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羣衆生活，大大增加蘇維埃財政收入，使革命戰爭的物質基礎確切建立起來，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鬭爭，是革命戰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但是我們問一問，這些經濟建設工作在激烈的戰爭環境內，是不是做得到呢？我想只有會機主義者才會說這是做不到的，我們不說修一條鐵路通龍岩，暫時也還不說修一條汽車路通贛州，我們不說糧食完全專賣，也不說一千五百萬鹽，布生意都由政府經管不准商人插足，我們不是這樣說，也不是這樣做的。我們說的做的是發展農業與手工業生產，輸出糧食與錫砂，輸入食鹽與布疋，暫時從二百萬資本再加上羣衆的股本做起，這是不應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嗎？這些工作我們已經開始做了，並且已經做出了成績，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過了增加兩成秋收的預計。手工業方面，農具與石灰生產在恢復過程中，錫砂生產開始了恢復的形勢。烟，紙，木頭亦開始有點生氣了，糧食調劑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績。食鹽入口亦開始有部份的工作了。這些開始的成績，即是我們堅信將來發展的基礎。機會主義者說要到戰爭完結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現在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很明顯的錯誤嗎？

因此亦就明白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是環繞着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爲着他的，是爲着環繞着他的，是服從於他的

，而自己不是中心。那種以爲經濟建設是當前一切任務中間的中心任務，同樣是機會主義的觀點。革命戰爭要求蘇維埃進行必要的經濟建設事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這是錯誤的想法。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後，才說得上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爲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內戰爭中企圖進行和平的將來應有而現在不應有的，將來的環境許可而現在的環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這只是一種瞎想，當前的工作是戰爭迫切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爲着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如果同志們中間有這一方面錯誤觀點的，那就應立刻給以糾正。

### 三 經濟建設中的領導方式問題：

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要迅速的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要在這次大會得到解決的，因爲同志們回去，就要立即動手去做，並且要指導省蘇，縣蘇，區蘇，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鄉與市基本蘇維埃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糧食局，貿易局，採辦處，這些機關裏的同志。他們是負擔着實際工作，他們是親自動員羣衆組織合作社，調劑與運輸糧食，管理出口與入口貿易的實際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對，工作時如果不能採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辦法，那就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個口號各項工作不能得到廣大羣衆擁護，不



能在今年秋冬與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整個計劃，因此我要向同志們指出下面的幾點：

第一，是要從組織上去動員羣衆：這裏首先各級政府主席團，與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的同志，要把發行的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發展生產，發展貿易這些工作經常的放在議事日程上面去討論，去解決，去督促，去檢查。其次，要推動羣衆團體，這裏主要的是工會與貧農團。要使工會動員他的會員羣衆都加入經濟戰線上來。貧農團是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票一個有力的動員羣衆的基礎，區蘇與鄉蘇要着力去領導他。其次，經過以村子，屋子爲單位的羣衆大會去做經濟建設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與經濟建設的關係提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羣衆的生活，增加鬥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號召羣衆購買三百萬公債票，發展一百萬人的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號召他們爲着這些口號而鬥爭，把羣衆的熱忱提高起來，假如不經過這樣的從組織上去動員羣衆與宣傳羣衆，即是說，主席團與國民經濟部財政部，着力抓着經濟建設的工作討論檢查，不注意推動羣衆團體，不注意開展羣衆大會做宣傳，那末要達到目的是不能的。

第二，動員羣衆的方式，應該不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

，拋到糞缸裏去，沒有一個同志喜歡他。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布爾塞維克的工作方式，即羣衆化的方式，即是最能接近羣衆而爲每一個工人，農民所歡喜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機會主義消極怠工，這是極壞的現象，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鬪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表面上不是怠工，好像在那裏努力幹。實際上，命令主義的發展合作社，合作社是不能發展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失去合作社信任，反而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令主義的推銷公債，不管羣衆了解不了解，買得這樣多買不得這樣多，祇是蠻橫的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幹，結果是羣衆不歡喜，公債不能好好的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羣衆，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表現出來的羣衆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票，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第三，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大數量的工作幹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幾萬人，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他們是經濟戰線上的指揮員，而廣大羣衆則是戰鬥員。機會主義者常常嘆氣沒有幹部，同志們，真的沒有幹部嗎？蘇區千百萬土地鬥爭中，經濟鬥爭中，革命戰爭中鍛鍊出來的羣衆湧進來了無數的幹部，怎麼好說沒有幹部呢？丟掉機會主義的觀點，幹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最後我還要說到經濟建設不但同戰爭總任務不能分離，同其他的任務也是不能分離的。只有深入查田運動，才能更加開展農村中的階級鬥爭，發展農民的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走入經濟建設的陣地上來。只有堅決實行勞動法，才能改善工農羣衆的生活，使工人羣衆積極迅速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只有正確的領導選舉運動與跟着查田運動的開展而開展的選舉運動，才能更加健全蘇維埃的機關，使蘇維埃更有力的領導革命戰爭，領導各方面的工作，領導經濟工作。從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羣衆的政治文化水平，這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重要性。至於不要一天忽略擴大紅軍的工作，那應該不待說了，大家都明白，沒有紅軍的勝利，經濟封鎖是要更加利害的。另一方面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羣衆生活，無疑要更加增長擴大紅軍的潮流，使廣大羣衆大隊伍的開向前線上去。總起來說，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一切的條件，假如我們還爭取了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把這一切的條件服從於戰爭，那末對於五次「圍剿」的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於我們的。（熱烈的鼓掌）

## 經濟建設的初步總結

亮平

隨着革命戰爭的猛烈開展，保證革命戰爭物質需要的經濟建設的工作，也日益發展與擴大。我們的黨已經不止一次的指出，目前蘇維埃的經濟建設，是服從於我們革命戰

爭的中心任務，祇有井底之蛙的機會主義者，才會忘掉目前經濟建設對於革命戰爭的正確關係，而把經濟建設當作目前的唯一任務。但是這一情形，並沒有絲毫減輕經濟建設工作在目前革命戰爭環境中的重要性，正是因為經濟建設工作是戰爭動員中的重要一部份，經濟建設工作的開展，充裕物質的供給，造成戰爭勝利更優越的條件。所以藉口戰爭而忽視經濟建設的主張，也同樣是祇見個別的樹而不見整個森林的機會主義觀點。

只有從革命戰爭形勢的細心的分析中，我們才能夠正確的了解目前經濟建設的主要工作，而加以切實的執行。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經濟建設工作在最近半年以來，無疑義的是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這些成績與革命戰爭的需要相較，還是非常不夠的，爲着更有力的推進經濟建設的工作，我們就不能夠不檢閱過去的工作，從這上面來得到經驗和教訓。

### 經濟建設的基本工作——努力提高生產。

首先我們說到提高生產的問題，爲着充裕革命戰爭的物質供給，在基本上，我們就應該提高土地的生產，在我們黨的號召之下今年的春耕運動，夏耕運動，秋收秋耕運動無疑的是得到了不少的成績，全蘇區米谷的生產，據一般的估計，雖然沒有完全增加兩成，可是平均至少的一成以上，此外今年雜糧（豆、麥、薯蓣、菜等）的種植，有了大

批的增加。現在我們就應該積極準備冬耕運動，設法解決種子，農具，肥料（種肥田子石灰供給等）水利，（修濬河道建造灌溉工具等）等問題，普遍的建立犁牛合作社與勞動互助社，準備我們明年春耕能夠得到更大的成功。此外我們在今年冬季，還應該培植樹苗，以便在後年春季我們可以很好的進行植樹運動，在提高土地生產方面我們要特別的指出種植棉花的問題，在敵人加緊封鎖的情形之下，我們中央蘇區因歷年來少產棉花，所以棉布供給，感覺了很大的困難，我們除加緊向外採買設法製造他種棉織品（如蔴紗等）並設法製造棉花（如從稻草製棉花）等等以外，還應該用很大的力量，在蘇區種植棉花，今年植棉之所以未能完全成功，主要的是因為我們沒有選擇很好種子，沒有選擇適宜土質，並且沒有採用正確耕種方法。現在我們除採辦大批優良棉種外，應該立刻普遍的進行植棉的宣傳，把植棉的意義和方法，通俗的向農民解釋明白，使我們明年的植棉運動，能夠得到很大的成功。爲着進一步發展土地的生產，我們現在就應該創設農事試驗場，來設法提高農業生產的技術。

在工業方面因爲敵人連年的封鎖，我們蘇區紙、烟、木頭，樟腦、鉛砂各項主要的生產，都表現低落的狀態。在一般的發展工業生產的任務中，我們應該特別注意鉛砂與紙兩項的生產。紙的生產，數年以來，不斷減少，以至最近當出口與自身消費的需要增加時，紙的供給有不敷之勢。我們應該很好的把紙業工人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合作社，

來解決紙業工人的失業問題，來提高我們紙業的生產。

在帝國主義瘋狂的準備戰爭的形勢之下，他們很迫切的需要錫砂，因為錫砂是製造軍用品的重要原料。現在南昌，九江以至廣東的國民黨的販子們，爲着搶奪向帝國主義出賣錫砂的利益，正在那裏像野狗爭肉似的亂咬。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錫礦是在我們蘇區裏面，我們應該用力發展錫砂生產，以其出口來加緊打破敵人經濟封鎖，並且我們要用很大的力量，來保護這樣重要的錫礦的生產。

隨着革命戰爭的進展，我們的煤、鐵、硫磺等生產的發展與初步化學工業（雖然現在只能用一些土法子）的建立，是應該引起我們極大的注意與切實的進行的。過去我們對於工業生產的提高，沒有很好的注意，這上面應該來一個有力的轉變。

### 合作運動

在提高整個蘇區經濟狀況和改善勞苦羣衆生活的過程中，合作社的發展，無疑的是起着極主要的作用，合作社在從前應該成爲經濟上組織羣衆教育羣衆發揚羣衆革命的積極性，使他們更興奮的參加革命戰爭與蘇維埃建設的一種組織。合作社的發展，在我們工農民主專政下面，不但對於羣衆生活的改善，工農聯盟的鞏固，而且對於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與將來革命轉變的保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如果在南北部經濟建設大會（

八月十二日八月廿日)以前，合作社的發展是很緩慢的，那麼在大會以後，發展的速勢，是快的多了。在大會以前，全蘇區消費合作社只有四百〇六個，社員八萬三千人，股金九萬元，糧食合作社，在大會以前，只有五百十三個，社員十一萬〇二千人，股金九萬元，在大會以後各縣合作社的開展情形，雖然還沒有整個的報告與統計，可是我們從瑞金與國等縣例子，已經可以看到合作社發展速度的增高，例如，瑞金在八月以前，祇有九千的消費合作社社員，一萬一千元股的股金，那麼在八月以後一個月中，社員就增加了五千三百人，股金增加了五千五百元，糧食合作社在八月以前是很少的，在八月以後，社員增加到六千八百人，股金增加到八千九百元，這就是說在八月以後的一個月中，消費合作社與糧食合作社社員增加了一萬多，差不多等於從革命以後到八月以前整個時期的發展數目。與國在大會以後的一箇月中，消費合作社社員，增加一萬四千六百人。這一增加的數目，也差不多等於以前整個時期發展的數目。這樣發展的速度，無疑的是迅速的。這是我們經濟建設上一個極大的成功。

在合作社的發展中，我們不但要有社員數量的迅速增加，而且我們現在最主要的還是要求我們合作社能夠切實的廣大的進行營業與工作，能夠滿足羣衆的需要而更快的發展起來，而且能夠使各縣各區，都能夠迅速的往前發展。我們要使每一個消費合作社社員的股金能夠切實的進行商品的流轉，要使每一個糧食合作社的股金能夠切實進行糧

食調劑的工作。自然，在合作社的工作上，我們是得到了一些優良的成績，例如王田區（中央國民經濟部選為合作社的模範區）的消費合作社，能夠經常供給群眾以鹽布醫藥等必需品，價格較市場為廉，而且還能夠使一元的股金每年能得七毛多的盈餘，以至王田區的羣衆，有說「寧願當了自己的衫服來加入合作社」。武陽區的合作社，一元股金分了十五毛紅利，云集區分了一元半大洋，上杭才溪區甚至連做豆腐都組織了合作社，這些都是我們合作運動中的光榮的例子。

可是我們應該很明白的指出，我們合作社的極大一部份還是不能很好的工作，而且甚至發生像踏逕區沙心區那樣可恥的現象。因為合作社負責人的貪污，以及我們區政府負責人對於合作社工作的忽視，踏逕區落村鄉的消費合作社，以前有五千毛小洋的資本的，現在祇剩一千多毛，沙心區的消費合作社，以前有四千餘毛資本，現在也蝕去一半以上，樟腦合作社的一百餘元資本完全蝕光，這樣的事實，不但妨礙本區合作社的發展，而且還影響其他區鄉的合作社的發展。可是根據我們工作的經驗，我們如果能夠對貪污與怠工份子進行嚴厲的鬥爭，把工作壞的合作社，發動羣衆起來改造，那麼當地羣衆還是很踴躍的願意加入合作社的。所以改造工作不好的合作社的工作，健全合作社的工作，是發展合作社的重要的關鍵。

我們的糧食合作社一般的說，還是沒有很好的切實的工作起來，還是沒有起它糧食



調劑的作用，所以應該很好的把糧食合作社的工作真正的建立起來。我們的生產合作社還是很少（在經濟建設大會前全蘇區只有七十六個，會員約一萬人）。真正的信用合作社可說還是沒有一個。而這種信用合作社對於供給農民的急需和提高農工業生產，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爲要使任何形式的高利貸在蘇區沒有發生的可能，那麼信用合作社的建立是絕對必需的，這將引起農民熱烈的贊成與擁護。在提高生產上，利用合作社（如犂牛合作社農具合作社等）也須普遍的建立起來。總結這一時期的合作社工作的經驗，我們應該指出在我們工作中還存在着好多錯誤與缺點，有些合作社還不能切實的工作，在有些區域（如會，尋，安，甯化，贛閩省等）合作運動簡直還沒有很好的開始。我們現有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工作，還是非常的少，在有些合作社內還發生貪污的現象，和這些現象作嚴厲的鬥爭，發揚社員自身的積極性，吸收廣大工農羣衆進合作社，這是保證合作運動健全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我們黨的同志應該在合作運動中起更大的領導的作用。

### 糧食調劑的工作

由於敵人的進攻與劫掠，由於地主殘餘的搗亂，奸商富農的投機操縱，以及由於去年我們對於糧食調劑問題的不注意，所以在今年春夏間，曾經發生了一些糧食的困難，經過了我們黨的動員，與各地蘇維埃工作人員的努力，在羣衆的熱烈擁護之下，我們迅

速的解決了糧食的困難。在解決今年春夏糧食困難的中間，我們的糧食調劑局是起了相當的作用，根據十二個糧食調劑分局（還有四個分局未有確切報告）的報告，在四、五、六三個月中間，他們能夠有四十萬元的商品的週轉，並得到盈餘一萬元，糧食調劑總局，從四月到八月的五個月中，有二十七萬元的商品流轉，並得到七千餘元的盈餘，這就是說，在我們中央蘇區內，每月已經有了二十萬元的糧食的商品流轉，是經過了我們國家調劑的機關，自然這一數量在我們蘇區全部糧食的商品流轉中，還佔據極小的地位。但是調劑局的這一工作對於糧食價格的調劑與政府的紅軍的給養的解決，是起了相當的作用，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今年糧食收集運動的三項主要工作中（糧食的儲存，糧食價格的調劑，糧食的出口）糧食調劑局已經開始做了相當的工作。例如：儲糧的谷倉已有部份建立，新谷上市後的糧食價格有了相當的提高，在谷價素稱低廉的區域（如公略，萬太）每担谷子的最低價格只跌到一元七八角，而且還是短時期的，很快就到二三元以上。現在一般的價格，每担谷子大多是在三元以上，像去年那樣一元大洋能買二擔以至三擔谷的現象。在今年是沒有看到，這上面固然有其他的原因，（如公債的發行，土地稅收谷，農民不輕易出賣糧食，紙幣跌價等）但是糧食調劑局的調劑的作用，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至於糧食的出口，那麼還僅僅在開始。

調劑局雖然有這些成績，但在他的工作中，還是有很多的缺點，首先，糧食調劑局的組織還是不普遍，而且薄弱，縣分局共只成立十六處，其餘的縣份或是正在籌備成立，或是完全沒有建立，像閩贛省這樣重要的地方，糧食調劑局的組織，一直到最近才開始進行建立，至於重要圩場上的調劑支局，到現在還不過二十餘處。其次，各地調劑局還不能夠很活潑的抓緊群眾的需要來發展其營業，同時對於糧食合作社的聯繫與領導，可說還沒有建立起來。因此糧食調劑局，還不能起牠應有的巨大的作用。

我們估計，今年秋收的增加，不能完全得到兩成，（大約一成多）估計到紅軍擴大，與羣衆生活改善後糧食需要的增加，我們應該指出，假使我們現在對於糧食調劑，沒有用力的準備和進行，那麼糧食問題明年還是有緊張的可能。爲着保障紅軍的給養，和滿足羣衆的需要，使得以後不致發生嚴重的糧食困難，那麼糧食調劑局必須用全部力量來完成儲糧二十五萬擔的計劃，各縣區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必須領導糧食合作社很好的切實的進行調劑糧食積儲糧食的工作。

### 發展對外貿易與打破經濟封鎖

對外貿易的工作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環，可是牠在打破敵人封鎖的戰線上，却佔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經濟封鎖在敵人五次「圍剿」的戰略中，無疑的是佔着

重要的地位，譬如蔣介石在其最近的訓詞中這樣的說：「將「匪」區嚴密封鎖是我們（指國民黨）一個最重要的戰略」，反革命政府看到我們蘇區，不產鹽布及其他工業品，所以除加緊軍事進攻（這自然是主要的）以外，還加緊對日常必需品特別鹽的供給的封鎖，企圖建立縱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鎖網，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天只賣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把群眾的糧食，搜掠到反動的堡壘裏去。帝國主義國民黨企圖以這樣毒辣的封鎖政策，來破壞蘇區的經濟生活。但這一政策無疑義的要引起白區工農羣衆的更深刻的階級仇恨，促進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的崩潰。

在蘇聯國內戰爭的時期，帝國主義除在軍事上進攻并幫助白黨反革命以外，也進行了殘酷的經濟封鎖，使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的三年中，蘇俄對外貿易，差不多全部停頓。可是國民黨對我們的封鎖，是和帝國主義對蘇俄的封鎖，有些不同的地方。第一，因為現在白區的工農羣衆甚至商人，是迫切的需要和我們進行商品的交換，第二，因為我們紅軍的偉大勝利與遊擊隊的積極行動，使敵人不能很好的把封鎖線建立起來，而我們以各種可能來打破牠，第三，軍閥的貪利及其內部的矛盾，使他們不能澈底進行統一的經濟封鎖。因為這些原因，所以我們如果能夠以更大的努力，利用各種方法，那末經濟封鎖的打破，是可能的，我們應該用很大的力量來實現這一可能，使我們能夠得到必需品的供給。

我們應該嚴厲的指出，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的工作，還沒有引起蘇維埃工作人員（特別是邊區）的嚴重注意，我們貿易局的組織，還是很薄弱。兩月以來經過貿易局的進口還不上十萬元，這只能說是一個開始，我們還不能夠隨着紅軍的勝利和蘇區的開展來建立并發展對外貿易的關係，我們還不能夠靈敏的活潑的利用各種線索與道路來打破敵人的封鎖。我們貿易局的工作，需要極大的推進，貿易局與邊區政府應該在邊區領導合作社組織的廣大的發展，發動廣大羣衆，給他們以種種便利，來發展對外的商品流通，每一個邊縣應該建立貿易分局和許多採辦處，商人的貿易路線，我們也應該很活潑的利用。各邊區政府對於對外貿易工作的忽視，是再不能繼續容忍下去的事，應該澈底糾正過來。

在敵人殘酷經濟封鎖中，我們鹽的供給，特別感覺得困難。我們應該在紅軍的勝利中奪得大批敵人的鹽，從游擊隊的動作中，運鹽回來，我們現在就應該開始在蘇區內找尋并開發鹽礦，我們相信在這樣廣大的蘇區內，一定不會絕對沒有可開採的鹽礦的，除了上列這些辦法以外，我們最嚴重的還是要用力從發展進出口的中間，來解決我們食鹽的困難，我們應該很活潑的敏捷的利用各種可能來解決鹽布等各種必需品的供給，來打破敵人殘酷的經濟封鎖。

### 經濟建設資本與經濟建設公債

上述經濟建設工作的大規模的進行，必須有很多的資本。現在我們國家的財政，還不能供給我們以大量的經濟建設的資本，我們的銀行還沒有做起真正的銀行的工作，還不能很好的進行鞏固金融，與幫助經濟建設的工作，還不能借給我們以大批的資本。現在我們經濟建設所需要的資本，只有從羣衆熱烈擁護中去籌借，因此三百萬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與勝利的推銷，是經濟建設中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經濟建設公債的推銷，在有些地方，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如在瑞金的雲集區，福建的才溪區，紅坊區，以及興國勝利的有些區，在紅坊區因為他們能夠在黨的領導之下，經過各種羣衆團體進行深入的動員，所以在五天之內就能夠推銷一萬元。在雲集區，經過深入的政治動員，不過一個多月就銷去了三萬三千多元，興國傑村區的某鄉，公債還未發下，該鄉羣衆就已經熱烈的把所承認的四千二百元的數目完全推銷完了。在勝利縣，甚至有一個貧農自願買二十八元公債，一個中農自願買四十元公債的光榮的例子。

但是這樣光榮的成績，還不是普遍的，推銷公債中的強迫命令攤派的方式，是非常嚴重的。在瑞金，除雲集區稍好外，其餘大部份都是攤派的，雖然後來經過中央工作團與縣蘇的努力，有大部份的糾正。在雩都，甚至發生了更嚴重的現象。這一個攤派的方式，就是我們模範縣的興國，也不能完全避免，譬如我們接到一個貿易局工作人員的來

信，這樣的說，「他們要我推銷七元五角的公債，我將一切情形告訴了他們，他們說分了土地的無論老少都要攤派一元五角，你們五人分了土地共要買七元五角，他們就把簿子登記七元五角之數就走了，現在我想無法」，這是一個標本的強迫攤派方式的素描，這種方式，是脫離羣衆的，是妨礙工農聯合的鞏固的，我們應該堅決的打擊這種方式，把它迅速的克服過來。

在推銷公債中另外一種不好的傾向，便是對公債運動採取機會主義的消極，在會，尋，安，甯化等縣的推銷公債工作，大部份還沒有很好的進行。甯化的許多區，在經濟建設大會閉幕一月以後，甚至還沒聽到經濟建設公債的名詞，福建各縣財政部長在參加經濟建設大會回去以後，並沒有把推銷公債問題很好的傳達。對於經濟建設公債採取這樣機會主義的消極態度，是絕對不能夠再一刻忍耐下去的事，我們應該以嚴厲的打擊一切強迫命令的攤派方式，同時應該堅決的克服這種對經濟建設消極怠工的現象。

英勇紅軍在東線及北線上的偉大勝利，給了敵人的五次「圍剿」以初步的嚴重打擊，我們更加緊運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一切有利條件，我們要用加強這一光榮戰鬥中的經濟力量。我們應該從目前經濟建設服從於革命戰爭的正確關係上，來反對一切忽視經濟建設的觀點，像閩贛省那樣「對於經濟建設的任務，從來沒有注意」的現象，

是絕對不能容忍下去的了。這樣的觀點對於革命戰爭是有害，是很明顯的（例如在最近東方軍的勝利中，閩贛省不能從此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不能開展對外的經濟關係，不能與紅軍以迫切的物質供給，福建省部份的也是如此）。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我們應該用力克服這些錯誤的觀點，堅決打擊官僚主義的工作方式，熱烈動員廣大的羣衆爲着戰爭的勝利，來加緊進行我們經濟建設的工作，這樣，我們的勝利，是有把握的。

九月三十日

## 宋子文的辭職與國民黨的財政破產

柯 孚

國民黨政府的財政部長和國民黨的賣國能手——宋子文已經辭職了。宋子文辭職的主要原因，當然是國民黨的財政的破產，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國民黨的財政破產到了什麼程度呢？

試舉一些數目字來說吧。本年，一九三三年度南京政府的預算概數：國家歲入總額爲六八〇・四一五・五八九元；而歲出總額則爲八二八・九二一・九六四，收支不獲平衡，至達一四八・五〇六・三七五元（見「晨報」十月三十一日）。實際上，國民黨的支出額還要多些，就是說，收支不平衡還要更大。像「晨報」這樣反動的報紙，是不能



告訴確實的數目字的。不久以前，該報所發表的一九三三年的預算概數，是出入相抵，不多不少，而現在又說收支不平衡。這說明『晨報』有意謊報，

但是，無論如何，國民黨的財政收支不平衡，是非常之大，一定會比『晨報』所說的更大。如果國民黨所缺少的數目，只是一萬四千餘萬元，那麼，爲什麼借了兩萬萬美款，一萬萬元英款，法國一千萬，德國二千萬借款，舉借內債一萬萬元之後，還要向日本進行大借款呢？這樣來看，國民黨的收支的差額，至少有五萬萬元。這是一種空前的財政浩劫。

有了這種財政浩劫，使國民黨自號爲『財政名家』和不久以前在國際聯盟講壇上大放其『收支平衡』的『理財』空砲的宋子文，不能不辭職而去了。

試問國民黨的財政爲什麼會破產到這種地步？原因在那裏？

國民黨的財政破產，是與整個國民經濟的浩劫，民族危機，帝國主義的掠奪，革命危機有連帶關係的，一句話說：這是國民黨統治的結果。

由於國民黨的經濟浩劫，工業、農業、商業的破產，普遍全國的水災、旱災、風災、蝗災等，使絕對多數的居民陷於赤貧化，失業、飢餓、流離、疾疫、死亡。雖然國民黨加重對勞苦羣衆的剝削，然而從這些一貧如洗，吃樹皮草根過活的人們身上所能榨取

，終屬有限。據「社會新聞」所載，全國百分之九十的居民陷於飢餓線下，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要減少國民黨的收入，增加其財政上的困難。

正因為國民經濟的浩劫，生產的大大縮小，如絲廠的全部停業，紗廠減百分之五十，麵粉、樹膠等工廠生產量半數以上的銳減，農業中整部門的毀滅（如青蠶茶葉等）與全般的衰退，使得民衆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仰給入口，而入口之中，米麥等食品佔大部份，只在去年米麥麵粉的入口綜值爲二萬萬零六百萬海關兩。像農業國的中國，有如許的空前的米麥入口，這是最可注意的事實。由於上述原因，使貿易上的入超，年年增加，據十月三十一日「晨報」的統計，自民國十二年至去年止，僅僅十年之間，入超之巨，已達二・八九二・八九九・三三四海關兩之可怖的數字，而本年上半年之入超，更達四八二・六四〇・〇〇〇元。如此類推，今年入超將比過去十年間平均數大四五倍。入口的激增，即國內的現金大大的流出，這不能不影響到國民黨的財政的困難。

由於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把五分之一的最多收入的土地送給日本，使國民黨失掉一筆極大的收入，而且爲着保護日本強盜已得的「權益」，及其進一步對中國的侵略，國民黨還要花費千百萬的金錢去收買與供養日本的直接走狗，如李際春輩及其匪軍，這無疑的給予國民黨的財政以直接的打擊。

由於帝國主義的掠奪與國民黨的投降出賣，及加緊對民衆的榨取，企圖把民族危機

與經濟浩劫的重担加在勞動羣衆身上，引起了反帝反國民黨的革命鬥爭的猛烈高漲，如罷工運動之蓬勃生長，反帝運動與抗日戰爭的發展，農民、災民、飢民鬥爭的普遍，尤其是紅軍的偉大勝利，蘇維埃革命在數千萬居民區域的成功，使國民黨失了其剝削的最大的來源，這自然要大大的減少國民黨的收入。比方，在抗捐軍所佔領的地方，在遊擊區域，農民暴動的地域，尤其是在蘇維埃領土內，國民黨是無法得到一點收入的。

這還不算事。在蘇維埃運動的擴大，紅軍勝利的進展，革命形勢之尖銳化之下，國民黨爲維持其垂死的血腥統治，動員其一切力量，首先動員其全部財力，購買一切殺人利器，擴充其陸軍空軍，加強其反動機器，以鎮壓一切革命運動，特別是進攻民衆的革命武裝和民衆政權——工農紅軍與蘇維埃。在這種情形之下，國民黨不但失了莫大的收入，而且增加龐大的支出。這又是使國民黨財政空前破產的一個因素。

國民黨收支的差額數，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來看看國民黨支出的用途。關於這一點，十月三十一日法西斯蒂的『晨報』有如下的一段話：

『考今日國家之歲出，實不能謂爲健全與合理。蓋民二十年軍務費佔歲出總額百分之三三·二〇，債務費佔百分之三八·四四，F、二十一軍務費佔百分之四二·五一，債務費佔百分之二八·四一；本年度則預計軍務費用達四一五，六〇〇・〇〇〇元，約佔歲出綜額百分之五〇・一四；債務費計二四一・八四八・八〇四元

，佔綜額百分之二九·一八，是直年年歲歲罄吾國家收入百分之八十左右於軍事之需與償債之用！國家歲出比率之不合理若此，謂足增事業之費而舉建設之成功哉！試看，國民黨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收入是用於軍費和還債的（實際上這些費用還要多麼？）

些，理由上面已經說過了！還債一項也是已經用在軍事的借款。而國民黨的偌大的軍費，完全為着屠殺民衆，首先是進攻紅軍的，這無須證明。至於收入的其餘的部份，完全是豢養國民黨的官僚政客。在這種事實面前，國民黨還在空喊什麼『建設』，這是再無恥沒有了！法西斯蒂的騙徒們，一面說這種歲出『不合理』，一面又說『國家苟不捨澈底勦匪（？）之政策，則似不應以一時之財難，而自壞國家之大計』（同上）這是法西斯蒂的最大的武斷宣傳，也是國民黨財政破產的一個原因。國民黨把民衆身上榨取來的血汗去屠殺民衆，這不但是『不合理』，這簡直是罪大惡極！

這就是國民黨財政破產的主要原因。

國民黨的財政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無論國民黨如何加重對民衆的剝削，大借外債與內債，大做賣國交易，終不能挽救其財政的破產，使得宋子文辭職而去，在宋子文辭職之后，國民黨任孔祥熙為財政部長。但是，財政人員之變更對於國民黨的財政不會有絲毫的『改善』，甚至『晨報』自己也承認：『財長之人選雖更；而財政的難題，

初不以是而紓」。我們可以斷定，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只有加深國民黨財政破產的現象，使國民黨的財政更加沒有辦法。

但是，能否說，國民黨會「自動崩潰」呢？不，不能這樣說。國民黨也會用一切方法，企圖去找尋財政危機的出路，這就是進一步的出賣民族利益，盡量掠奪勞動羣衆。雖然這要加深經濟危機與民族危機，要引起民衆更堅決的反抗，但是，非有我們的組織的革命襲擊，非有我們的領導，則國民黨不會「自動崩潰」的。

我們的任務在於利用國民黨財政破產事實，去發動羣衆的鬥爭，向最廣大的羣衆說明，國民黨財政破產的原因，指出國民黨的罪惡的財政政策，號召羣衆反對國民黨的壓迫與剝削，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借外債與拿民羣的血汗去進攻紅軍與蘇區，要求將進攻紅軍的軍費去救濟失業工人、飢民、災民、援助抗日義勇軍，充教育基金和公共事業的建設。在這個基礎上去開展一切羣衆鬥爭，來反對五次「圍剿」，要求把全國軍隊北上抗日，這就是在國民黨的財政破產中我們的迫切任務。

## 國民黨的統制經濟是什麼？

陽 春

國民黨的統制經濟當然是從牠們的主子——帝國主義那裏搬運來的。因此我們在沒有討論國民黨的統制經濟之先，應該研究帝國主義國家的統制經濟的實質。要曉得帝國

主義國家的統制經濟的實質，那麼，去年九月國際執委在他所通過的決議中所給我們的解釋是再好沒有了！「在所謂國家的干涉存在的地方，國家的補助和政府其他的方策的採用，並不是爲着創立對私人獨佔的任何國家統制，反而是爲着私人的獨佔者要創立對於國家的直接統制。第二國際的領袖不僅掩蓋金融寡頭政治之這一政策，反而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之下，直接擁護這一政策。……甚且爲資產階級製造最反動的強制勞動的計劃，而以資本主義制度下建立社會主義這一扒手的計劃來掩蓋」。其中的意義顯然是：（一）不是國家統制資產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統制國家；（二）要迷惑工人階級不去打倒資本主義，以爲統制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三）與無產階級不但毫無利益而且對他們更加剝削和壓迫。這就是帝國主義國家統制經濟的真相。

中國正在被帝國主義進攻瓜分，經濟命脈多在帝國主義的手裏，各省軍閥四分五裂，工業商業農業不僅非常散漫，而且日益破產，蘇維埃革命是在驚人地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請問誰能來統制中國經濟？統制經濟有什麼辦法？然而國民黨卻硬着頭皮，天天嚷着「統制經濟」，全國經濟委員會和棉麥統制委員會也像煞有介事地成立起來了，那麼，他們的「統制經濟」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下面所說的就是對於這個問題一個簡單的答覆：

一、新翻花樣的欺騙 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眼看到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恐慌日益擴大

，中國經濟更可怕地破產下去；另一方面，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一年順利地進行，由經濟落後的國家一躍而在生產上獲得全世界的第二位，擁護蘇聯的羣衆天天增加，中國蘇區的領土和他的政治影響天天擴大，所以他們就用最不要臉的武斷宣傳說：蘇聯的五年計劃是計劃經濟，美、意、德等所執行的經濟政策是統制經濟，三民主義就包含計劃經濟和統制經濟兩樣東西。同時又經常污蔑蘇聯說，因他過於注重重工業『使許多工農飢餓』；中國的統制經濟是要對資本家地主統制，使他們拿出一部份的利潤地租交給工農，以求分配的平均（十月一日晨報）。這些就是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爲實質而以『統制經濟』粉飾其外表的最無恥的欺騙的把戲。

二、加緊向工農進攻 經過統制經濟的機關，地主資本家與國民黨政府更加密切地勾結一起，用他們擴大的聯合戰綫來向工農進攻，具體來說，他們要聯合起來，以更低的价格收買農產品，使入不敷出的農民更加沒法生存，銀行家企圖以一部份無法流通的存款放到農村中去做抵押借款，以敲剝農民的骨髓，資本家更加要用開除減工，扣工資，加工時等手段，將經濟恐慌的重担放到工人階級的身上。十月四日全國經濟委員會爲統制棉業告國人書中說：『……斯界（指棉業——引者）從業人士……如有步趨不力者，國家亦當予以制裁，或竟捐棄，有所弗惜（就是說要用開除或懲辦職員——引者）……勞工不爭自身智識技能之增進而惟提高待遇之是驚……實足爲發展事業之障

礙」(就是說要更加增加工作之強度和將已在工人階級飢餓線上的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引者)。這些還不是國民黨地主資本家要進一步地向工農進攻的明顯的表示嗎!?

三、促進法西斯蒂獨裁 許多法西斯蒂國民黨報紙的論調都是借口「統制政治為統制經濟的先決條件」而簡接直接擁戴蔣介石劊子手為中國唯一的領袖，並且拚命地替墨索里尼和希特拉吹牛，說得意大利德國好象是「西方樂土」，口口聲聲「要以法西斯蒂救中國」。但從資產階級報紙刊物上也可看出墨索里尼雖然奪得政權已經十一年，而意大利的金融恐慌，工業衰落(如八百家絲廠已關閉了六百家)，工人失業農民困苦，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嚴重；德國自從希特拉上台以後，更是在國際上政治上經濟上江河日下。可見法西斯蒂並沒有也不能挽救意大利，德意志兩國，怎能挽救在各帝國主義鐵蹄之下的中國呢？(只有蘇維埃能將中國從最後的崩潰和貧窮之下挽救出來——斯達林)

四、賣國的烟幕彈 此次國民黨借了美國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既幫助美國資本家減少剩餘之棉麥，又把棉花以賤價賣給日本資本家，不但使中國棉麥價格大跌，農村越發破產，中國紗廠更加減少生產，更多工人失業，而且拿這一筆借款來進攻蘇區紅軍，當然更能增高民衆反帝反國民黨的潮流。因此，國民黨一方面大事宣傳借款完全用之於「復興農村」，同時施行「統制經濟」，首先「統制棉業」，以遮蓋他以賣國的錢來



屠殺紅軍和工農勞苦民衆的罪惡。不但如此，國聯對中國的「技術合作」是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到中國的「八國聯軍」（「技術合作」是由八個國家組織起來的）。換句話說就是國際共管。全國經濟委員會就是國聯底下對中國的執行機關。牠用這個「經濟委員會」的名義，是表示國聯對中國的「技術合作」只在經濟上幫助中國的「技術」，沒有政治作用；實際上，經濟委員會是國際共管中國的烟幕彈。

五、壓迫革命的手段 全國經濟委員會之下有公路水利等等的組織。孫科的談話是說，經濟委員會之使命在於改良國產米麥，拯救紡織工業，及復興江西「匪」區。馬寅初主張統制經濟首先統制米麥和金融。我們曉得公路的建築已擴大到七省，其主要目的當然是爲了加速運輸進攻紅軍等的部隊。統制糧食除了聯合加緊剝削農民外，是爲了封鎖蘇區。企圖統制金融是爲了要各銀行繼續不斷地墊借公債庫券做進攻蘇區紅軍的經費。同時要帝國主義和中國銀行借款給各省鐵路和招商局（例如英國借給國民黨以五百萬鎊鐵路借款和以庚子賠款投資於招商局，美國除與南京政府訂航空密約外，借款建築漳州至龍岩間的鐵路，中國銀行借款築浙江杭江鐵路等），使火車輪船更順利地裝運進攻紅軍游擊隊和革命的工農羣衆的白軍。這是「統制經濟」的主要內容之一。

我們的結論是：國民黨的「統制經濟」是企圖維持在華的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國民黨垂死的統治和促進中國完全殖民地化的手段之一，有加緊欺騙工農和壓迫革

命的種種作用。因此，我們必須要在文字上口頭上在工農羣衆中揭穿牠的毒辣的陰謀。同時更要運用廣大的下層統一戰線，向着帝國主義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綫迎頭痛擊；更要領導廣大羣衆破壞運輸白軍的鐵路公路，宣傳和組織交通工人，海員爲着反對運兵運械到蘇區去而罷工，搗毀蘇維埃隣區國民黨的糧食油鹽公賣機關，與蘇維埃紅軍一起粉碎第五次「圍剿」；更要向羣衆解釋：中國經濟的出路決不是所謂「統制經濟」，而是目前土地革命反帝革命自由的獨立的蘇維埃中國。（十月三十日）

## 十九路軍閥的『生產大衆政權』與

### 土地政綱

潘漢年

#### 一 新的欺騙與新的進攻

「閩西善後委員會是奉十九路軍蔡總指揮命令來辦理閩西地方的善後的，決心長期駐在閩西，肅清赤匪（？）實行民主主義的主張，來解決民衆的痛苦，是閩西各縣的最高行政機關」。（閩西善後委員會宣傳大綱）就是說：閩西善後委員會是十九路軍軍閥蔡廷楷分兵割據，壓迫和剝削閩西工農勞苦羣衆的反動統治機關，是維持破產沒落的閩

西國民黨政權的組織。他和其他國民黨軍閥一樣，要「運用龐大的軍事力量以消滅赤匪（？）的武裝」，（善後會的施政原則）因為閩西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一大部份已經推翻了國民黨政權，武裝了自己，成立蘇維埃政權，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澈底的分配了土地，十九路軍閥爲着維持與恢復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在努力執行蔣介石「抗日必先勦共」的理論與實際。但是三民主義這個名詞，國民黨政府這塊招牌，在中國廣大勞苦羣衆看來，是等於劊子手的血污穢臭的屠刀，蔡廷楷深知繼續應用這個可怕的法寶（三民主義）來進行宰割勞苦羣衆，很難奏效，他也知道蘇維埃政權是吸引了一切被壓迫的工農衆群，正是因爲蘇維埃政權的出現，存在與發展，一切被壓迫的羣衆，已經不是軟弱無能的綿羊，需要一個新的欺騙，才能掩蓋他要維持剝削壓迫制度的殘暴與兇惡。「樹立農工生產大衆政權」，「以耕地農有爲原則，實行計口授田」（閩西善後會施政大綱）這就是十九路軍閥表面上不同於蔣介石新的欺騙，進攻工農勞苦羣衆新的陰謀。現在我們揭穿真相來看看，究竟是一回什麼把戲。

## 二 什麼叫「農工生產大衆政權」？

十九路軍閥蔡廷楷，看到閩西蘇維埃政權如火如荼的日益發展，廣大工農勞苦羣衆堅決爲土地革命而鬥爭，他知道單憑軍事力量，不足以與工農紅軍及一切勞苦羣衆相抵

抗，所以同樣執行蔣介石在江西的「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辦法。不過七分政治的內容，已經不是純粹的三民主義了，因為三民主義在工農羣衆前面，已經赤裸裸的暴露了他，是絕對壓迫剝削工農，保護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符咒，蔡廷楷隱藏在「孫總理」遺教的假面具之下，組織了「閩西善後會」，在執行着第三黨與A B團結而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政綱。

現在我們來看「農工生產大衆政權」的階級基礎及其改良欺騙的意義：

「爲防止剝削和摧殘民衆的貪污土劣的復活，故以政權建築在生產大衆身上爲前提，使大衆得直接參加政權」（閩西善後委員會的施政大綱）。

因爲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土地革命的結果，是推翻了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澈底的消滅了封建「剝削」和「摧殘民衆的貪污土劣」，十九路軍閩進攻擾亂閩西各地蘇區的時候，爲着掩護豪紳地主的捲土重來，爲着緩和羣衆反對地主豪紳的復活，所以提出上面的口號。他們之所謂「生產大衆」就是包括地主、富農，土豪劣紳與農民，（中農貧農）在社會民主黨「中國問題」的小冊子上（十九路軍發行）批評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一段中，有下面的幾句話：

「……然而他們（指中國共產黨）所注意的祇有雇農與貧農。而將大部份革命的農業生產階級，拋出於革命範圍之外」。

清楚明白的告訴我們，被蘇維埃政權所拋棄的地主富農，在他們是認爲：「大部份革命的農業生產階級」。『以政權建築在生產大衆身上』，這是多麼陰險的欺騙，輕輕的『生產大衆』四個字，就把地主富農拖回來，在『大衆得直接參加政權』的口號下面，又復活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

沒有一種政權是兩個敵對階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和平合作，平分政權的。所以『生產大衆政權』，是故意混淆着階級關係，威脅農民羣衆在馴從地主資產階級的意志之下恢復過去壓迫與剝削的制度。

表現最清楚明白的，就是閩西善後會所製定的『區鄉自治委員會組織規程』。區鄉自治委員會是在閩西善後委員會或縣分會『指揮之下處理行政事宜』，這就是中國社會民主黨上海機關報『文化』雜誌上大吹而特吹的『新政治的實驗』，『新福建之初步建設』。

現在我們來看區鄉自治委員會的選舉辦法：

『區自治委員會由區民大會推選加倍之人數，呈請閩西善後委員會或縣分會圈定之』。

『區民代表大會之選舉，不分性別，除剝奪公權或受檢舉有共匪嫌疑未經審定者，與十五歲以下兒童與殘廢者外，皆享有選舉權』。（鄉自治委員選舉原則同上）

，見區自治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章第四節）。

這裏所講的區民大會，當然是包括在十九路軍槍桿掩護回來的豪紳地主資本家，他們依靠着閩西善後會的權力，選舉運動的進行，無疑義是被他們操縱包辦了，用欺騙利誘的手段，威脅工農群眾服從他們的意旨去選舉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的委員，這是所謂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選舉運動一定的結果。只有蘇維埃政權是公開的宣佈地主，資本家，富農是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因為他們是剝削階級，然而在中國社會民主黨認為他們是「革命的」，是「大衆生產階級」。

照他們選舉法的規定，凡是過去參加土地革命或分得土地的農民及其他農村勞動者，都有可能被地主富農指爲「共匪」，或嫌疑犯，隨時剝奪了選舉權。所以區鄉自治委員會的產生，名義上要經過區鄉羣衆大會的選舉，不過是一套「虛偽」的把戲。尤其是選舉法第十二條的規定：

「自治委員會由區民大會推選加倍之人數，呈請閩西善後委員會或縣分會圈定之」。  
更證明所謂「生產大衆政權」的區鄉自治委員會，只有豪紳地主資產階級才能當選。善後會惟恐當選之委員，有不能竭盡壓迫剝削廣大群眾之能事，所以還要「圈定」之！

這就是十九路軍閥要維持在閩西崩潰沒落的反動統治的欺騙。

### 三 代表地主富農利益的土地政綱

蔡廷楷正因為蘇維埃政權日益擴大，土地革命鬥爭的尖銳，蘇維埃的土地政綱是澈底解決中國農民問題的，得着廣大農民群眾熱烈的擁護和執行，以及鑒於蔣介石三次「圍剿」提出『土地歸還地主』的口號，進佔一個地方，立即恢復地主富農的政權，把蘇維埃已經沒收分配給農民的土地及生產耕具，全部歸還地主，富農也收復原有的土地，引起了廣大農民羣衆堅決反對，因此農民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犧牲殆盡，即有少數倖免，也不得不逃避他鄉，同時豪紳地主多數還不能也不敢立即回鄉，以致從農民手中奪回的土地，也無法管理與從事生產，被佔領的農村，變成人烟荒涼，無米無錢的絕地，反動軍隊也無法久駐。十九路軍閱得着這個經驗以後，在閩西不得不採用表面上比較左傾的社會民主黨的改良欺騙土地政綱，提出於農民群眾更危險的『耕地農有』，『計口授田』的口號，以求達到維持與恢復農村中代表地主富農利益的政權。

他們的土地政綱是：

『根據總理（已死掉的孫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以「耕地農有」為原則實行「計口授田」的方法使農民羣衆均享有耕田的權利，但未經分田之地區，（即國民黨統治的白色區域，土地革命還沒有成功的地方）最低限度亦應實行「二五減租」。』（善後會施政大綱）。

表面上看來，好像官冕堂皇，「使農民羣衆均享有耕田的權利」，比較蔣介石的「

土地歸還地主」的口號漂亮得多，但是我們來研究一下「耕地農有」的「計口授田」的辦法，騙人的西洋鏡馬上拆穿了！

「凡屬該鄉居民，依賴土地爲生者，皆按照其應得田地之數量授與之」。（見閩西善後會計口授田的暫行法）。

「凡公務人員（如官吏、教師、牧師、士兵、團丁之類）雖未回鄉居住，亦應即授予以應得之田地」（同上）。

照這個辦法，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土地完全被沒收，及無權取得任何分地的地主豪紳，立刻又恢復佔有土地的權利，而且在外鄉參加反動政府的豪紳地主（國民黨的官僚）及參加反動軍隊，警察的地主富農子弟們（在國民黨軍閥或團匪中的領導者），也佔有了土地。再加上單純的按照人口分田——即他們的「計口授田」，又是有惠地主富農的辦法，因爲按照以家爲單位來計算人口的時候，中農貧農一定是少於地主富農。

最後分配土地的領導權，——所謂授田委員會也是善後會指派或圈定的，無疑義他們是完全站在地主富農的利益上來執行分田。質量較好的土地完全落在地主富農手中，加以大批農民群眾在十九路軍閥屠殺檢舉之下，有分田權利的爲數是很少了，而且還要屈服在地主富農一切壓迫威脅之下，才能給你土地。

所以在「計口授田」的欺騙口號之下，把蘇維埃政權下農民所得的土地利益，完全



取消了，而是恢復與繼續農村中封建剝削的關係。

祇有蘇維埃統治之下，對於地主階級的土地是毫不客氣的沒收，而得到這土地利益的正是雇農，貧農與中農，這是澈底的土地革命消滅封建剝削關係。蘇維埃的「土地法」清楚明白的寫着：

「所有封建主、地主、軍閥、豪紳，以及其他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立即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實行分配，被沒收的舊土所有主，無權取得任何分田，僱農苦力勞動農民均不分男女，同樣有分得土地權」。

「地方蘇維埃應根據各個鄉村當地情形，選擇最有利於貧農中農的原則分配土地，土地可按照家庭勞動力的多寡，或同時又按照人口之多寡的混合原則，進行分配，但不僅應計算土地面積，而且應估計土地的質量」。

這裏不像十九路軍閥明明白白站在地主富農的立場，而又不敢公開承認，用「計口授田」含混的口號企圖欺騙蒙蔽勞苦羣衆。蘇維埃土地法是公開清楚的指出階級性的具體辦法着重的說明土地的利益是要落在雇農、貧農，中農的手裏。

就是這個「計口授田」的辦法，以什麼步驟來執行呢？在未會赤化的區域，是遙遙無期，祇提出「二五減租」的口號，企圖緩和廣大農民羣衆的鬥爭。

至於曾經被紅軍佔領，實行土地分配的地方，不得不：

「本會（善後會）依照先總理農民政策，實行「耕者有其田」以解決閩西收復地區之土地問題，擬定逐步推行之程序如次：

「第一步——暫保留赤匪（？）分田原狀，秋收時徵收土地稅，徵收稅額為田地產額十分之三，內提一成暫作救濟業主及難民之用，以一成為整理民團及辦理一切地方善後之用」。

「第二步——本會將歸來的業主與難民確實登記後，即按區鄉田地面積，計口授田與農民，重行平均分配」（善後會解決土地問題綱領及其步驟）

這個步驟的規定有什麼意義呢？第一，因為既經農民自動起來沒收地主階級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之後，豪紳地主遠避他鄉，尙未歸來，同時要從已經得着土地的農民手裏收回來，恐一時很難做到，怕農民堅決的反抗，所以祇得「忍痛一時」暫時保留原狀，一面等待豪紳地主歸來，一面加重征稅，（要繳納十分之三的土地稅）把稅收之一部份「暫作救濟業主與難民用」，——就是把搜刮農民担負之一部份，去慰勞曾被農民沒收驅逐的豪紳地主，把另一部份來辦理地主富農的武裝（民團）與具體進行新的壓迫與剝削。（所謂辦理地方善後）第二，從農民身上搜刮一筆經費之後，豪紳地主依靠着十九路軍閥反動武裝勢力，陸續回來了，便進行「調查戶口，編保甲，組織守望隊，點驗

團，整理民團」，開始進行廣泛的白色恐怖的報復運動，把積極領導土地革命份子，加以「共匪」罪名而屠殺，檢舉分得土地的一般的農民，或殺，或指為嫌疑犯，這樣來，進行第二步——計口授田的工作。這時候所有的農民羣衆（雇農、貧農及其他勞動農民）既失却鄉自治區自治的選舉資格，（他們選舉法上所規定的，見前。）受盡地主富農自治委員會的壓迫，同時把已分得的土地，被迫的歸還地主富農，重新回到殘酷的封建剝削下的牛馬般的生活。第三，優待地主富農回復了過去的地位，重新奪取了農民的土地，而且享受「善後委員會」的格外優待，在他們未回來之先，暫時保存蘇維埃「分田原狀」的時候，善後會要征收十分之三的稅額，在把土地歸還地主富農，「計口授田」之後，善後會主席蔡廷楷，特別出個佈告，減輕稅收一半。

這就是閩西善後委員會為保護和恢復地主富農利益的土地政綱。

第三黨與A B團結合而成的中國社會民主黨所提出「樹立出生產大衆政權」的標語，飄揚在蔡廷楷將軍的槍桿上，與蕭淑宇跪奏蔣介石的走狗建議書，南北互輝，彼此競爭着爭取反革命的出路！然而中國廣大工農勞苦羣衆，以血的鬥爭，揭破社會民主黨的「樹立生產大衆政權，朝着社會主義進前——達到世界大同」的欺騙與胡說，已經走上為蘇維埃而鬥爭的道路，推翻造成中國國民經濟總崩潰，變中國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的國民黨統治，爭取自由獨立的蘇維埃新中國，恢復與繁榮中國經濟，走向社會主義的

康莊大道！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

## 共產國際執委給

# 英國獨立工黨全國行政會的信

同志們！

我們接到了你們五月十八關於獨立工黨的德白萊會議所通過的議決案的信。這個議決案，沒有疑問的，表示着英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裏那反對資本的鬥爭之中的統一意志是在堅強的生長。依照你們所說的願望，我們來說一說自己的意見：獨立工黨怎樣就能夠幫助共產國際的工作。

這方面的重要步驟，就是已經開始執行的獨立工黨與英國共產黨之間的統一戰線：在反對資本進攻，反對德國的法西斯蒂恐怖，反對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鬥爭之中的統一戰線。這就是實際上同共產國際合作的開始。

在這方面的繼續開展的步驟，我們覺得應當是下列幾點：

第一，擴大並且鞏固獨立工黨和英國共產黨所已經有的共同鬥爭，就是對於英國的

和國際的無產階級鬥爭的一切重要和緊急的問題，共同出來表示意見，反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和世界的帝國主義，而吸引廣大的工人階層，工黨和工會的份子，到這種鬥爭的統一戰線裏來。

第二，真正的贊助英國共產黨的鬥爭：反對國民勞動黨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和反動的政策，反對工黨領袖的改良主義政策，反對工會領袖和第二國際的改良政策。

獨立工黨的黨員，根據自己的多年的經驗，在德白萊會議上，接着退出工黨之後又議決了同第二國際破裂。這兩個決議，在反對改良主義的鬥爭裏，都是必要的重要的步驟。然而獨立工黨不能夠只在組織上同第二國際破裂就停止的。如果獨立工黨認真的決定了參加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階級鬥爭，那末，牠要實行這個議定就沒有什麼別的办法，除非是經常的積極的鬥爭，反對國民勞動黨，反對改良主義和改良主義的領袖，反對那些宣傳改良主義思想而阻礙和破壞工人的階級運動的人。

的確，反對資本進攻的鬥爭的口號仍舊是一句空話，如果提出這個口號的政黨一點兒也不去動員工人實行羣衆的抵抗：反對減少工資，開除工人，減少失業津貼等等。然而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和工會的反動領袖，口頭上說他們是反對資本進攻的，事實上只在關心着怎樣使得資本家能夠進行對於工人的毫無寬恕的壓迫，而不致於遇見工人方面的抵抗。獨立工黨的黨員是知道這種情形的：有孟德主義的經驗，還有「工」黨（勞動

黨）政府的行動，正是「工」黨政府減少了失業津貼，實行了減少工資，實行了節省支出的綱領。

同樣，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也仍舊是偽善的空談，如果這個鬥爭沒有工人階級的統一戰線的組織，一開始就抱定了截斷法西斯進攻的道路的目的。然而各國第二國際的政黨，英國的工黨也在其內，用盡了牠們的一切力量，來阻礙大多數工人參加共產黨的統一戰線去反對資產階級和法西斯主義。第二國際的政黨，正在用自己的同資產階級合作的政策，用分裂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政策，替法西斯主義掃除道路。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例子還在各國工人的眼前。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反對法西斯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的口號之下，一貫的贊助了德國的一切反動政府，牠的藉口是這些反動政府比較公開的法西斯專政是「更小些的害處」，這樣阻礙了羣衆的反法西斯危險的鬥爭。同時，社會民主黨總是對資產階級讓步而使工人吃虧，牠想要表示給剝削者看：爲着實行進攻勞動者的生活程度的政策，并不需要用法西斯的專政來代替「民主主義的」憲法。

德國共產黨，屢次堅決的企圖號召勞動者，共同起來反對法西斯主義，建立無產階級的鬥爭的統一戰線，而這些企圖都被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破壞了，出賣了。因此，共產黨動員工人階級的大多數來實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羣衆抵抗（示威，政

治罷工）的努力，竟被他們麻痺化了。

第二國際的其他政黨，以及加入亞姆斯坦國際的，同第二國際聯繫着的工會領袖，也同樣走着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道路。

同樣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所準備的戰爭的鬥爭，在那些并不竭力去堅決的正直的動員工人階級實行不調和的反對「自己」國家的帝國主義的人口頭上，也仍舊是一句空話。然而第二國際的政黨，自己就澈頭澈尾的傳染着資產階級的褊狹愛國主義的思想，而利於自己的帝國主義的掠奪政策的成功。像上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都贊助了自己的政府，現在仍舊是一樣，他們正在贊助着血腥的對於殖民地和  
其他被支配民族的鎮壓和準備新的戰爭的政策。

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參加政府的時候，牠直接的執行資產階級的這個帝國主義的強暴政策，（在工黨政府之下，印度地方的血腥的壓迫和轟炸沒有武裝的人民）。同樣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之間的鬥爭，第二國際的政黨事實上也是參加資本主義世界的反蘇聯戰線的。

因此，談不上什麼認真的幫助共產國際的鬥爭，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危險的威嚇，——如果不是每一步都在暴露，都在反對改良主義者的有害的作用和他們的敵視工人階級的政策。

如果獨立工黨願意幫助共產國際的鬥爭，反對資產階級和牠在工人階級裏面的主要的社會柱石——第二國際，那末，獨立工黨就真正幫助階級的工人運動的發展。然而，如果獨立工黨的某一個代表，以爲第二國際和共產國際之間的深刻的原則上的差別，可以根據無原則的接近和調和的建立而蒙蔽起來，那末——我們公開的申明——這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的觀點上看起來，是最有害的迷途和不可容許的錯誤。要知道第二國際的行動不是贊助，而是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不是贊助，而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

獨立工黨的黨員應當明白的了解：第二國際的主要危險，是正在於牠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又不是公開的而是戴着擁護工人利益的假面具來幹的。如果像獨立工黨這樣的黨，不去暴露第二國際的真正性質，反而認爲牠是工人階級的真實代表，以爲工人的革命組織可以并且應當同牠調和，那末，這樣的黨就祇會使得第二國際的欺騙手段更加容易實行。

如果獨立工黨，再重複牠同其他幾個政黨在戰後所幹過的那種有害的企圖，就是想在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來做『沒有僞心的』調解人，如果獨立工黨的個別的領袖，要寫一些敵視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的文章，像芬納爾，白洛克威最近那篇文章似的，那末，這就不是幫助共產國際，而是幫助第二國際。這種企圖，事實上是妨礙在階級鬥爭的



基礎上去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和工人階級的統一。那第二半國際的作用就是這樣的，牠阻礙了急進化的工人的革命的發展，然後，重新回到第二國際的懷抱裏去。

現在，在你們的黨與共產國際之間可以建立怎樣的關係呢？

我們的意見是這樣的：雖然獨立工黨並不站在共產國際黨綱的觀點上，然而牠還是可以同英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實行真正的革命合作。我們方面現在申明完全有這種合作的決心，自然要有一個條件，就是保留同志的批評的權利，在這種批評有必要的時候。

在英國，非常之需要革命勢力的聯合。我們現在看見，你們黨的許多黨員正在研究共產國際的黨綱，而贊成聯合的革命黨。這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如果獨立工黨的黨員，真正向着接受我們的黨綱這方面發展，那末，在英國就有創造聯合的，堅強的，羣衆的共產黨的可能，可以適應英國的條件。

我們正站在世界史上的極偉大的戰鬥之前。正在完成着進到革命和戰爭的新的潮流的轉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階級鬥爭，都在很快的生長着。帝國主義者自己的營壘裏面，矛盾也在尖銳化起來。

資本主義世界的景象，暴露着資本主義制度的完全破產。同時，建設着社會主義的蘇聯，牠的經濟上技術上文化上的強大的發達指示着：祇要工人階級組織自己的力量，推翻資產階級專政而掀掉自己肩膀上的資本主義寄生蟲——剝削者，那末，在牠前面就

開闢着實際生活各方面的偉大創造的道路。

許多資本主義國家裏的革命前途，都開展着這種無產階級勝利的可能。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的力量正在生長。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共產黨就是爲着無產階級利益，爲着社會主義革命事業而堅決鬥爭的政黨。在德國，不管殘暴的法西斯恐怖，德國共產黨正在自我犧牲的順利的進行着鬥爭，沒有疑問的，牠將要給全世界做個榜樣，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旗幟的周圍，牠不但要團結那些在最近一次選舉裏投票贊成牠的五百萬工人，而且要團結德國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如果獨立工黨的確努力的來幫助共產國際的鬥爭，那末，這將要有極大的國際意義。

我們請你們通知我們：你們的黨是不是同意給共產國際這樣的贊助和幫助。

〔原註〕：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發表於『Daily Worker』。

（源譯自『共產國際』雜誌第一九——二〇期，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出版）

## 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的前夜

費仁

——國際執委十二次全會之後的世界形勢——

共產國際執委的第十二次全體會議（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到九月十五）已經過去

了一年了。第十二次全會的意義是非常偉大的。牠估計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終結，指出了世界資本主義以後的發展途徑，以及在這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接近的形勢之中各國共產黨的任務。

根據了經濟、政治、階級鬥爭的一切事實的分析，根據了革命高潮的生長，根據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的尖銳化，根據了資本主義世界和蘇聯之間的根本衝突的劇烈化，國際執委的第十二次全會這樣的說明了國際形勢的特點：

「這一切事實……表現着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發展過程之中的一個確定的轉變，敵對力量的一個特殊的推動，這在有些地方像暴風雨似的進行着，而在有些地方却停頓着。這些敵對的力量，在某些非常重要的關鍵上，已經在開展起來準備着衝突。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終結已經來到了。然而在最重要的以及有決定意義的資本主義國家裏，還沒有直接的革命形勢。現在進展着的，正是走向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的鉅大衝突的新階段，走向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的過渡期間。」（「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各國支部的任務」——第十二次全會關於庫西甯同志的報告的議決案）。

第十二次全會以後的一切事變的總和完全證實着這種估量的正確：現在國際形勢的特性正是「過渡期間」——換句話說，就是正在過渡到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

世界的大資本的機關報，都在公開寫着戰爭的不可避免和戰爭的逼近。資產階級，

在無產階級和殖民地民衆的革命爆發和暴動的危險前面，發抖着。事變的過程將要決定這個問題，——究竟是那一種形勢先發生；是戰爭轉變成革命，還是革命引起帝國主義者反對革命勝利的國家的戰爭。

第十二次全會之後的經濟政治恐慌的發展，很明顯的帶着戰前時期的痕跡。各國資產階級爲着爭取恐慌之中的出路起見，動員了最後的後備軍，而且他們所應用的「克服」恐慌的手段，同時就是準備戰爭的手段。

美國的拋棄金本位，本來是想鞏固美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地位的。然而沒有得到這樣的結果。雖然美金在跌價，而美國並不能夠爭取新的市場，也不能夠擴大的舊的市場。美國國外貿易裏的輸出和輸入的對比更加惡化了，這就證明美國的金融政策的破產。

固然，膨脹政策——多發紙幣的政策在美國造成了「熱鬧」的現象。商品的價格漲起來了。資產階級的報紙和社會法西派的報紙大吹大擂的鼓吹着，說美國是領導資本主義脫離恐慌的國家，說膨脹政策所引起的漲價可以推動工業的機器，說生產過剩的現象可以從此消滅。其實羅斯福的所謂復興政策，是用強迫手段消滅小生產，消滅那些非托辣斯化的生產，而以前已經占有無限權力的獨占資本的大主，因此更加強大起來；羅斯福的舉辦「社會工程」，禁止罷工，實際上減少工資等等，當然都是反對工人階級的政策。白呂讓——黃色工會國際的領袖和樊迪文——第二國際的領袖，却說這些都是「走

向社會主義的運動」，都是「社會主義的辦法。」（！）

羅斯福的「社會工程」和其他辦法的目的是：（一）準備戰爭的工作；（二）把青年工人封鎖在社會工程的營房裏去——因為青年是失業工人之中的最積極的份子——這樣來避免失業騷擾的危險；（三）用減少生產時間的方法來減低工人的工資。羅斯福的計劃，是剝削工人而爭取恐慌出路的計劃。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想實行這種辦法。社會民主黨稱讚這些辦法是「社會主義的」，正是預先在替自己的資產階級辯護這種政策。

然而膨脹政策不能夠給恐慌找着什麼出路。牠反而要巨大的減少羣衆的購買力，而使得恐慌更加尖銳化起來。美國膨脹政策的「熱鬧」，還有好些工業部門的膨脹（鋼業，汽車業等），充滿着非常之劇烈的新的破產危險。這種新的破產的預兆已經發見了：——七八月間物價又在跌落下去，生產又在減少下去。

美國，以及其他各國的膨脹政策（英國，日本等），同時就是軍事上的準備步驟的加緊。德國和日本的擴大生產（除開季節關係之外），都是和準備戰爭有聯繫的：軍器製造工廠的工作增加了，軍裝製備上的紡織工廠的工作增加了，積聚着軍事儲藏品，建築着，修理着戰術上的重要道路和橋樑等等。

德國法西斯主義誇口着失業的「消滅」。然而德國生產上的一切擴張，都只是爲着

戰爭的準備。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都在發寒熱似的開展着軍事工業，準備着鉅大的戰爭。這種工業爲着戰爭的目的而擴大，是不生產的擴大。這要使得被恐慌所動搖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戰爭爆發之前就弄得精疲力盡，而失業問題仍舊是不能夠解決。

資本主義世界裏，開展着空前的經濟戰爭。倫敦經濟會議的破產，首先就因爲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在奪取新市場和抓住舊市場的鬭爭之中，都不能夠也不願意拋棄猛烈增加關稅的政策，甚至於實行着完全禁止輸入的關稅政策；他們都不能夠也不願意拋棄傾銷政策，貨幣政策，以及資本主義的自給商業政策。經濟的和關稅的萬里長城，高高的建築起來了。

曼努伊斯基同志在第十二次全會上，就指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已經在恐慌的打擊之下粉碎了，變成了「民族的國家的碎片」；「十一次和十二次全會之間的時期的特點，就在於世界經濟分裂成爲各個部分的过程達到了很大的規模」。

而在十二次全會之後，世界經濟分裂成爲各個部分的过程，以及世界貨幣制度的紊亂，都更加向前發展了。同時，那些經濟上的自給政策，造成自足經濟的那些辦法，都明顯的表現着準備新的戰爭的性質——所謂經濟的國家主義和商業的專制主義。

然而引起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終結的，并不僅只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而還

有革命高潮的生長，資本家國家和殖民地上的階級鬭爭的極端尖銳化。第十二次全會以後的事變的整個過程，都表演着階級鬥爭的繼續開展。

德國希特勒的上台，不過證明着階級矛盾的極端尖銳化。德國資產階級在反對正在生長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鬥爭之中，完成了法西斯主義的專政。這是對於正在生長的無產階級革命的預防的反革命。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專政的任務是企圖消滅共產黨，打消無產階級的力量而準備戰爭。然而法西斯主義不能夠粉碎共產黨。共產黨在極秘密狀態之下團結着無產階級和勞動者的力量，爲着推翻法西斯主義專政，爲着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破產的形勢之下，對於共產黨形成了極好的條件，可以爭取無產階級和勞動者的廣大羣衆，而爲着政權，爲着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

波蘭、捷克斯拉夫、英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在第十二次全會之後，都發生了工人羣衆的罷工鬥爭，證明着革命高潮的繼續生長，雖然這種高潮是不平衡的。波蘭農民暴動的騷動，西班牙土地革命的高潮，中國蘇維埃區域的鞏固和擴大，紅軍偉大的勝利，印度北部的農民暴動的爆發，證明着殖民地民衆的革命高漲。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的羅馬尼亞鐵路工人的暴動，斯特拉斯堡的巷戰，表示着鬥爭的極端尖銳。同時，帝國主義的軍隊——海陸軍裏面：「靠不住的份子」的發現也更加多起來了。去年十二月間瑞士工人和兵士的暴動，荷蘭海軍裏的暴動，都指示着羣衆的革命的憤怒，在這方面也在

爆發起來了。革命高潮的發展是不平衡的，這證實着第十二次全會的估量；現在形勢之中的『轉變，敵對力量的一個特殊的推動，在有些地方像暴風雨似的進行着，而在有些地方却停頓着』。革命高潮生長的過程，群眾革命鬥爭的性質，都帶着過渡到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的色彩。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破產，他們的公開轉變到法西斯主義的營壘裏去，這都極明顯的證實着斯達林同志對於社會法西斯主義的估量——社會法西斯主義是法西斯主義的親兄弟。『民主主義』國家的向着法西斯主義發展，同時也就促進着社會民主黨的法西斯主義化的過程。

第二國際是在經過着自己的解體的過程，然而牠還沒有分解成爲各個個別的政黨，這是因爲還沒有大戰。第二國際解體的過程——是一種過渡的現象，證實着第十二次全會對於現在這個過渡階段的估量的正確。社會民主黨仍舊是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之中的主要的社會堡壘。他們用盡一切方法在各國幫助『自己的』資產階級準備戰爭。

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的發展，在十二次全會之後，也非常之明顯的證實着全會對於這個問題的估量。

在這個期間，凡爾賽制度的繼續崩壞更加發展了。希特勒的上台使得歐洲的戰爭危險十分緊張起來。德國帝國主義公開的要求合併奧國，佔領波蘭『走廊』和但澤，擴張



自己的勢力範圍到多腦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凡爾塞和約上的軍備問題條款，已經破壞了。法國，波蘭和小協約國，與德國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正在加緊的準備着。

現在各國帝國主義的武裝競爭在世界史上真正是空前的猛烈。戰爭可以在隨便什麼時候爆發起來。英國帝國主義懂得這種形勢，所以出來組織反蘇聯的戰爭——企圖聯合歐洲各國進行反蘇聯的戰爭，以避免帝國主義者之間的戰爭。「四強協定」就是英帝國主義的這種企圖。

凡爾賽制度的繼續崩壞正是這過渡到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的過渡期間的特點。

十二次全會之後的一切事實的總和，很厲害的促進了這個過渡的進展。德國帝國主義的加緊武裝，直到最近的爲着這個問題而退出國聯，以及德國與法國之間，德國與波蘭之間，德國與小協約國之間，德國與意大利之間，意大利與法國之間的矛盾的總和，極端明顯的證明着這種過渡的迅速發展。

遠東方面的矛盾是更加尖銳化了。日本攫取了滿洲之後，又攫取熱河和華北的一部分。華盛頓會議的協定完全消滅了。日本，美國，英國和法國等除了一致進攻中國革命以外，都在加緊建築軍艦，各自準備着互相之間的戰爭，各自鞏固和擴大自己在遠東尤其是在中國的陣地。爲瓜分與重分中國而鬥爭。英國和日本的經濟戰爭（印度等處的日貨問題），法國的佔領海南九小島，南美洲的戰爭——英美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的反映

，都證明着帝國主義者的爭奪殖民地鬥爭的急進和緊張。

世界最主要的帝國主義強國——英國和美國之間的軍備競爭和經濟鬥爭，更加加強了。

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一切矛盾，經濟的鬭爭，軍備的增加，以及階級衝突的尖銳化和殖民地的暴動，尤其是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國際帝國主義的直接幫助所謂五次「圍剿」——所有這些矛盾的性質，都證明着「走向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的鉅大衝突的新階段，走向革命和戰爭的新階段」的過渡是在加速的進行。

反蘇聯戰爭的準備正在極端的加緊起來。最近，日本在滿洲的瘋狂的挑戰行動和狂妄的武斷宣傳，以及倫敦會議以來日本參謀部和德國法西政府的祕密談判，都是極明顯的事實。同時，好些大資本主義的國家——在經濟恐慌和羣衆鬭爭的壓迫之下——又不能夠不互相搶奪着蘇聯的定貨單。美國的準備承認蘇聯，就是因爲羅斯福的一切「復興」政策不但不能夠緩和恐慌，反而引起了更加劇烈的工人鬥爭和最近的農民罷耕運動，所以美國企圖在對蘇聯的政策上牽制日本帝國主義，而自己搶到幾十萬萬的蘇聯定貨單。這當然不是說，美帝國主義就不在準備進攻蘇聯的戰爭。相反的，美國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一樣是要爲着自己的利益來進行準備反蘇聯戰爭的步驟。——鞏固和擴張自

在太平洋上以及全世界的霸權。法國最近對於蘇聯的政策——也是針對着德國法西主義的，也是要把反蘇聯戰爭的準備更加適合牠自己的獨霸歐洲的利益，而不讓德奧意等帝國主義趁勢擴張在歐洲的勢力。

歐洲方面，希特勒上台之後（『四強協定』的簽字等等），一般事變的過程使得一些小國明白了英法的把戲完全是只爲他們自己的利益的，他們時時刻刻在準備着犧牲小國。因此，這些小國開始尋找蘇聯方面的幫助，因爲祇有蘇聯是真正爲着和平而鬥爭的國家。總之，兩個世界在對立着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和社會主義的世界。從東方和西方，都在準備着——加緊的準備着——反蘇聯的戰爭。只要有相當的機會和條件，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都想要用一致進攻蘇聯的戰爭來拖延自己之間的戰爭。

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和鞏固是帝國主義從東方來進攻蘇聯的陰謀的一個極大的打擊，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形勢，不但要打破帝國主義經過國民黨來瓜分中國——殖民地化中國的計劃，而且要大大的削弱國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般勢力。這使得「革命引起帝國主義者反對革命勝利的國家的戰爭」就要在中國直接的表演出來。那時候，在國際帝國主義之前的革命敵人——組織成爲國家的革命勢力——就不僅只是蘇聯，而加上了在決定勝負的廣大區域裏首先勝利的蘇維埃的中國。

曼努伊斯基同志說：「中國在粉碎資本主義的穩定上，表演着極重要的任務，強大

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太平洋上的矛盾，和日本與美國之間的一切敵對的衝突的神經，都在這裏極其緊張的尖銳化起來；革命的中國喚起安南，印度，菲列賓，馬來半島以及其他殖民地民衆的覺醒，這是世界帝國主義的整個殖民地制度的解放運動的中心，在東方，經過蒙古共和國與蘇聯連結着的，有巨大的蘇維埃區域和擊敗國民黨一切攻擊的勝利的紅軍的中國，民族革命運動抵抗着日本的進攻而達到了空前的深入和擴大的中國！

## 關於新的領導方式

洛甫

——再談學習領導群衆的藝術——

見『紅旗』五十九期上我說到我們領導羣衆的主要方法是在說服羣衆，使羣衆相信我們的主張的正確，使羣衆執行我們黨所提出的每一任務。

從許多黨部的文件上以及許多同志的言論上，已經可以看出關於說服群衆的問題，已經引起了一般同志的注意，反對強迫命令的聲浪，是更加叫喊得響亮！

雖是這樣，但是強迫命令的方法，依然到處存在。『反對強迫命令』，許多還祇是在黨的文件上，同志的口頭上。在實際工作中的顯著的進步，還是沒有看到。

請問原因在那裏呢？

第一，是在於我們沒有羣衆的宣傳鼓動工作。

沒有羣衆的宣傳鼓動，我們就沒有法子去說服羣衆，沒有法子說服羣衆，那結果還是只有強迫命令之一法。

在宣傳鼓動方面，我們一直到現在還帶有極濃厚的刻板性與一般性。我們不管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人，總是那一套我們所說得爛熟的老話，從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起到擴大紅軍，經濟動員止。雖是在最近，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上，在宣傳鼓動的形式與內容方面有了微弱的轉變，但是對於怎樣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則，還是沒有清楚的了解，因此我們不能依照一定的原則去轉變我們的工作。

拿江西「省委通訊」第二十七期上所發表的「八一宣傳工作的總結」來說吧，這裏我們看到許多關於「木標語」、「竹標語」、「壁標語」、「紙標語」等等赤裸裸的數目字，但是對於羣衆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內容，那我們還是沒有法子知道的，譬如這裏說到在「八一」紀念宣傳比較充分，如宣傳隊普遍在有系統的建立和訓練，宣傳品數量上的增加與方式的改善，均有了進步。」然而到底對於這些宣傳隊的訓練是怎樣的，他們怎樣出去宣傳的，羣衆是否了解或滿意他們的宣傳，在宣傳中有什麼經驗，以及宣傳隊應該如何改善工作，那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關於宣傳品的形式與內容也是如此。對於我們同志重要的，只要有宣傳品發出，至於這些宣傳品有沒有人看，要得要不得，那就可不管了。

下級黨部宣傳工作的報告上，也是拿這些數目字來表示他們工作的優劣，而上級黨部也拿這些數目字來決定下級黨部工作的優劣。大家這樣習慣了，至於在這些數目字下到底的什麼內容，如何改善牠們的內容，那是大家所不管的。

這是宣傳鼓動工作方面惡劣的傳統，要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必須同這種傳統做堅決的鬥爭。

要使我們宣傳鼓動工作，變成活潑的具體的羣衆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問題，實際上即是怎樣去接近羣衆，怎樣開始向羣衆說話，怎樣使羣衆相信我們所說的，而且能夠執行我們的任務的問題。

要達到這一目的，我們首先必須具體了解我們宣傳鼓動的對象。我們在開始宣傳鼓動時，必須知道聽我們講話的是工人、農民、紅色戰士，或是城市貧民，而且也應該知道他們的文化水平與思想上的準備的程度。同工人講話我們是一個樣子，同農民講話，我們應該又是一個樣子。而且在工人中還有各種各樣的工人，在農民中也有不同的階層，因此對這種工人或農民講話是這樣，對別種工人或農民講話又是另一個樣子。千篇一律的宣傳鼓動，是不會發生什麼好的效果的。『真理報』的社論曾經這樣說過：

「人們按照一定的樣本，標準，公式去做鼓動工作。人們不是隨地都會應付個別工人、女工、農夫、農婦。在鼓動工作中，難道人們不是往往把某企業中一切工

人都看作一個不可分開的整體，即同樣接受每句話，每個證據，每個觀點的整體嗎？然而有用政治鼓動的實質，却在於把這個鼓動傳達每羣人中間去，使牠能為每個工人所了解，從他的識智程度出發，從他對於社會生活的某方面，對於某些問題的興趣出發」。

我們現在的宣傳鼓動工作，却是把所有的人都看做一個模型裏製造出來的東西，我們對於他們說同樣的話，要求他們同樣接受我們的主張。要「把這種鼓動傳達每羣人中間去，使牠能為每個工人所了解」，像『真理報』所說的，當然是沒有可能的。

其次，我們對於宣傳鼓動的對象的了解也不是一般的。比如，我們知道我們宣傳鼓動的對象是工人，甚至某處的某一種工人，如贛江的木船工人，這還是不夠的。我們必須進一步了解他們的生活，情緒、興趣、與要求。我們的宣傳鼓動就應該從他們的切身問題開始，從這些他們有興趣的，懂得的，要求得到解決的問題說起，把這些問題緊密的同我們所達到政治任務聯繫起來，那羣衆不但會了解我們所說的，而且會執行我們所提出的任務。

比如拿我們對於一部份失業的木船工人做擴大紅軍的宣傳鼓動來說吧。如若我們一開始就說：目前帝國主義國民黨開始了對於我們蘇維埃與紅軍的五次『圍剿』，所以我們每一個工農份子應該加入紅軍，去回答敵人的五次『圍剿』，你們木船工人就應該報

名當紅軍，當紅軍是最光榮的。這種宣傳鼓動，我想一定得不到很好的成績。木船工人聽了這類宣傳鼓動，當然不會清楚了解，不會自動的積極的報名當紅軍。但是如若我們從他們的失業問題講起，說明他們失業的原因，怎樣才能根本解決他們的失業問題，把加入紅軍與打破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圍剿」同根本解決他們的失業問題密切的聯繫起來，那木船工人就會了解我們所說的，就會自動的積極的報名加入紅軍。

把羣衆的切身的問題，同黨的基本口號密切的聯繫起來，這是布爾塞維克動員羣衆的基本原則之一。我們過去宣傳鼓動工作的錯誤，就在於不知道應用這一原則。我們常常把我們的一些基本政治口號不斷的叫喊，而不知道如何使這些口號變成羣衆自身的，羣衆所深刻了解的活躍的有血肉的口號。

要達到這一目的，並不是容易的事，這與我們整個領導方式的轉變不能分開的。在官僚主義命令主義的領導之下，我們決不會知道這一部份人，或那一部份人，這一地方的人，或那一地方的人的生活、情緒、興趣與要求。要了解許多問題必須要有最具體的領導，必須我們有非常靈敏的階級的感覺，感覺到羣衆每一脈息的跳動。

一千零一次的背誦黨的基本口號，是完全不夠的。這裏需要把這些口號具體化，把這些口號在不同的環境，不同的人羣中執行起來。這就要求我們考察、研究、探索、揣摩和熟知各種人羣的生活與要求的特點，把我們的總的政治口號與路線同羣衆這些日常



的甚至細小的生活問題密切的聯繫起來。

我們以後就要拿這一標準去考察我們宣傳鼓動工作的優劣，並且以後我們的宣傳工作的轉變也應該向着這個主要方面去進行。這樣，才能使我們的宣傳鼓動變為真正羣衆的宣傳鼓動，變為能夠說服羣衆的宣傳鼓動。（關於宣傳鼓動的其他問題，將專文討論）。

第二，要說服羣衆，除了羣衆的宣傳鼓動之外，還應該在實際上來解決羣衆中所發生許多困難問題。

我們實行了地土法與勞動法，我們大大的改良了工農羣衆的生活，我們是已經滿足了羣衆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新的進攻與新的封鎖，在羣衆中造成了新的痛苦與困難。如像食鹽布疋的缺乏，蘇區生產品的不能出口，都會使羣衆的生活惡化。此外，在羣衆日常生活中還有許許多多羣衆需要解決的問題，如像犁牛、工具、肥料、水利，種子等。我們要必須在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使羣衆相信我們是處處爲了他們的利益，爲了改善他們的生活而鬥爭的。這種日常的堅苦工作，最容易取得羣衆對於我們黨的信仰，便利於我們去說服他們來完成我們所提出的任務。

拿擴大紅軍來說吧，查田運動深入的區域，經濟建設比較有成績的區域，擴大紅軍也最有成績；這已經是大家所知道的真理。再譬如優待紅軍家屬工作做得好的地方，同

樣的，擴大紅軍工作比較容易，進行歸隊運動也比較好。一切事實都證明，只有我們真正細心的了解羣衆的困難，耐心解決他們的困難，爲保護他們的利益而鬥爭時，說服羣衆，動員羣衆工作，才能順利的進行。

但是這一簡單的真理，却不是爲每一個我們的同志所了解的。有些同志當他們不能動員羣衆時，常常罵羣衆不好，至把強迫命令網綁當爲對付羣衆的唯一辦法，然而他們始終沒有去想一下，不能動員羣衆的基本原因在那裏，他在大大改善羣衆的生活上做了什麼堅苦的工作。有些地方發生這樣的情形，爲了要進行擴大紅軍的突擊，我們組織了耕田隊給紅軍家屬耕田，但是紅色戰士出發前方後，我們就把這一工作冷淡下來。至於經常的解決紅軍家屬所發生的一切困難問題，那更是說不上。這種情形，同樣是不好的。改善羣衆的生活，解決他們的困難問題，這是我們的經常的耐心的工作，而不簡單是一個臨時的突擊工作。

只要一看我們各級黨部的議事日程，我們就可知道我們每一次會議所討論的，還大都是擴大紅軍，推銷公債等，對於當地羣衆的某一具體的切身問題的討論是很少的。近來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有了轉變，但這種轉變還是異常不夠。無疑的，有系統的改善羣衆的生活與完成黨的基本任務中間的一致性，我們還缺乏深刻的了解。

第三，在每一宣傳鼓動之後，在說服羣衆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善於組織羣衆。首先

在我們的動員工作中，我們往往把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分離開來。我們在宣傳鼓動之後，不知道立刻組織羣衆，做組織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利用宣傳鼓動工作，來組織羣衆，比如關於推銷公債的問題，我們召集了羣衆會議做了宣傳鼓動工作，我們不知道當場就由羣衆自動認購公債的數目，並且經過羣衆，組織某鄉的推銷公債委員會，經過這個委員會去更廣泛的推銷公債。或者我們不做任何宣傳鼓動工作，而把羣衆關在會場上強迫他們購買，或者由一個同志拿了花名冊挨戶攤派。

其次，我們不知道經過不同的組織去組織羣衆，經過這些不同的組織去動員羣衆。比如我們的青年團，這是共產主義的青年羣衆的組織，我們應該經過青年團去組織最廣大的勞苦青年羣衆。然而，事實上青年團員的數量遠落後於黨，許多青年羣衆沒有被吸收到青年團中去。如像在四方面軍中，青年佔所有紅軍數量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青年團却只佔全青年羣衆的百分之二十五強。

顯然的，我們是把許多不同的羣衆團體，也看做了和黨一樣的東西。我們在那裏的工作方式也看做是第二黨的工作方式。在青年團中這種第二黨的工作方式依然存在。這種方式甚至在兒童團中也是存在着。此外，如像我們的互濟會，我們的「反帝擁蘇」，也往往不能清楚了解到他們特殊的性質與任務，以不同的立場與方法去組織羣衆。在「反帝擁蘇」中討論是擴大紅軍，推銷公債，在互濟會中討論的也是這一套。黨提出創造

工人師，少共國際師，互濟會也照樣提出創造『反對白色恐怖連』，『反帝擁蘇』則提出創造『反帝擁蘇連』。這種千篇一律的工作方式，到處都可以看得到。至於怎樣經過互濟的反帝的立場去團結廣大群眾在牠們的組織中，怎樣應該適當的在他們的組織中去傳達黨的影響，執行黨的任務，那就很少注意。正因為這樣，許多羣衆組織，沒有他們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他們的會員許多是登門造冊式拉來的，這些會員除了知道必須交納『互濟捐』，『反帝捐』外不知道爲什麼要加入這樣的組織。

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我們黨內曾經發生過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說黨應該取消這種羣衆組織，把我們的力量更能集中於黨的工作，而了解黨正需要經過這些羣衆組織來團結更廣大的羣衆在黨的周圍。

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們黨對於羣衆組織的領導還存在着兩種極端的傾向，或者是由我們同志去包辦，把羣衆組織變成第二黨，或者是根本不管。在許多縣區的黨，甚至放棄了對於蘇維埃青年團與工會的領導。

我們現在大家認爲動員整連整營整師的模範赤少隊加入紅軍是擴大紅軍的最好辦法。然而我們對於赤少隊的領導則是極端的忽視，所以在經過五、六、七，三個月的動員之後，整批擴大紅軍的成績，是非常的微弱。不整理與擴大赤少隊，加強黨對赤少隊的領導，不迅速的恢復模範隊的組織。那動員整連整營的模範隊去加入紅軍，豈不是紙上

的空談！

經過黨團來領導各種羣衆組織，在我們同志中間還沒有清楚了解，甚至有些同志把蘇維埃的黨團，當做了黨與團的代表，根本不知道黨團是什麼一回事。或者形式上組織了黨團，根本就不起作用。正因為黨還不能經過黨團來加強黨對於羣衆組織的領導，所以各羣衆組織的工作的轉變，還是沒有達到應該有的程度。

最後，尋找出新的組織形式來動員羣衆，也是特別重要的，比如利用新戰士去組織擴大紅軍的突擊隊，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與國的同志曾經創造了許多擴大紅軍與歸隊運動的新方法。過去少先隊動員整連整營少先隊到前方去配合紅軍作戰，這樣來爭取他們加入紅軍，這裏，我們要極大的發展同志與羣衆的創造性，靈敏的抓住每一新的方式，來動員羣衆。一切呆板的固執、遲鈍、墨守成規，都是新的動員羣衆方式的最大敵人。我們不但要知道如何發展羣衆的積極性，而且要知道如何組織這些羣衆的積極性。因此，我們就說到最後的第四點，即是爲了要能夠很好動員羣衆，我們必須利用每一個過去的經驗，研究這些經驗，把這些經驗來普遍的應用。

我看到不少我們的黨部對於各種工作的檢閱的報告。但是這些檢閱照例的祇是指出「政治動員不夠」，「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不深入」。如若是關於紅軍的，則一定還要加上「對於擴大紅軍的重要性估計不足」，「沒有充分的羣衆動員，強迫命令的方式非常

嚴重」，「沒有充分執行優待紅軍家屬條例」等等，這樣的一個「檢閱」，就算了事。過了三個月於是又來了這一套，又來重複一次過去所說的，有些同志甚至把一套話說的爛熟，所以在檢閱工作時，他可以不聽，他可以睡覺，但是輪到他講話時，他却可以滔滔不絕，講他媽的兩三點鐘，這種「檢閱」當然對於工作具體幫助是很少的。

我們要使同志們知道如何不用強迫命令的方法，而能夠動員羣衆，那簡單的告訴他們不要強迫命令羣衆，而要去說服羣衆，是不夠的，這一真理，就是我們重複它兩三千遍，強迫命令的方法依然還是會存在下去。這裏，對於我們下層同志的謾罵與責備，并不能改善事情的實質，這是需要我們黨的領導機關，不斷的以新的具體動員羣衆的辦法，去告訴同志，詳細的研究每一新的羣衆所創造出來的經驗，去告訴同志如何來應用這一經驗。

比如我們批評八月份擴大紅軍中犯了寒熱病的錯誤，所以我們以後應該同這種寒熱病的現象作鬥爭，這種批評，對於以後的工作不會有絲毫的幫助。因為這種批評是籠統的抽象的表面的批評，對於八月份實際的擴大紅軍的情形，沒有絲毫的具體的分析與研究，因此不能真正了解擴大紅軍落後的真正原因，來幫助以後工作的轉變。

就是拿興國動員模範師整師加入紅軍的經驗來說吧。這一經驗，說來似乎是大家都知道了，實際上，真正能夠知道這一經驗的，還是極少數中的少數。我們江西省委始

終沒有把這一經驗，寫成通俗的小冊子，普遍的散佈到全蘇區去。至於研究這一經驗，指出在這一經驗中還有什麼缺點，還有什麼地方應該改良的，使這一經驗與教訓集合起來，供給各地黨部，那更是沒有看到。

許許多多我們下層的同志與羣衆所創造的寶貴的動員羣衆的經驗，我們是白白的放過去了，我們有的一些同志只滿足背誦聖經式的千篇一律的自我批評，而對於生活的新鮮的經驗，則採取了漠視的態度。這種傾向，是使我們動員羣衆工作不能迅速前進的極大原因。

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應該成爲我們黨改善我們對於羣衆的領導方式的有力的武器。這種自我批評應該具體分析我們在領導羣衆中的經驗，指出我們自己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使我們以後能夠更好的領導羣衆，這種自我批評有牠的時間性，特殊性，與連續性。牠一層深一層的向着取得領導羣衆的藝術的方向前進。自我批評的價值也就是在這裏。

或者是懺悔式的背誦聖經式的自我批評，或者沒有自我批評。許多地方的負責同志，把動員紅軍，推銷公債中所發生的嚴重現象都推在下層同志身上，似乎他自己絲毫也不負責任的。他從沒有想過，他爲了糾正這些錯誤中除了一般的空洞的指示外。到底做了什麼具體的工作，到底給下面同志提出了什麼具體的辦法。這類缺乏自我批評的現

象同樣是妨害我們改善我們的動員羣衆工作的。

至於張如心同志在『紅校鬥爭』第七第八期上的『自我批評』，那只能說是張如心同志的流水賬，同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還相差十萬八千里。

把每一新的經驗，每一具體的動員羣衆的辦法告訴同志，發揮同志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開展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我們學習領導羣衆藝術的主要方法之一。

不疲倦的，頑強的，堅持的在上面我們所說的幾方面努力，那我們可以斷定我們在領導羣衆的藝術上，必然會有迅速的進步，我們必定能夠動員更廣大的羣衆參加戰爭，爭取五次戰爭的完全勝利！

九月二十四日

## 罷工戰鬥的新的普遍的方式

江源譯

——『共產國際』雜誌第一九——二〇期（一九三三）社論——

共產國際執委第十二次全會上，庫西甯同志在自己的報告裏這樣估量了最近時期的罷工鬥爭的特點：

『在大多數國家裏的罷工運動，現在有這樣的特點：就是發生了罷工戰鬥的新的方式（着重點是我們加上的——編委），鬥爭方法更尖銳了，而鬥爭方式更革命



了，經濟的罷工轉變到真正的革命戰鬥」。

在罷工鬥爭的新的方式之中，最近在好些國家裏，那種佔領工廠的罷工的比重大大的增加了；在這一種罷工裏，罷工工人許多天，有時候許多星期，不肯離開工廠和作坊。最近這一年，這種特別的新式的罷工在日本，中國，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西班牙，尤其在波蘭，很廣泛的流行起來。佔領工廠的罷工現在成了國際的現象。波蘭的經驗，在羅馬尼亞得到了很好的應用，自然，這可以而且應當利用到別的國家裏去，只要那裏有必要的條件。

佔領工廠的罷工是羣衆自發的實行起來的，這是在鬥爭的過程裏，在罷工運動很緊張的時期，在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基礎上發生出來的，可是也是因為失業，恐怖政策，法西斯主義的關係而使得進行罷工戰鬥遇到日益增加的困難。罷工時候的佔領工廠，是反對企業家鬥爭的一種補充辦法。實行這種更加尖銳化的罷工方式，罷工工人和我們的組織是要使得企業家沒有利用工賊的可能，逼迫他來進行談判，並且使他因為擔心自己的機器，以及因為工人留在工廠裏而發生的物質上的損失，而更快的對工人讓步；再則，這是要不准他開除工人或是關閉工廠，這是要用佔領工廠的事實去影響廣大的工人社會，而引起對於罷工工人的同情運動。

佔領工廠和作坊的罷工的爆發，大半是因為開除工人，或是企業家要關閉工廠，淹

淺礦坑。可是，最近這樣的罷工的增多也有因為拖欠工資的（洛茲的維德塞夫工場等），因為減少工資的（雅西的鐵路工人等），因為要求增加工資的（日本「亞美加薩啓」——譯音——公司的海員等等），而且有時候，例如在羅馬尼亞，經濟要求聯結着政治的要求。也有個別的罷工，工人的佔領工廠是爲着要去關車而把留在那裏工作的工人吸引到鬥爭裏來（日本「亞薩希·蘇萊多」化學工廠）。

大多數這樣的罷工，發動工人羣衆的廣大的積極性，而使得工人得到勝利。佔領工廠的罷工，由於當時的情形和相當的領導，在革命的內容上有最複雜的最豐富的方式；固然，有些時候，工人因爲要影響一般的輿論，所以一面罷工一面又宣佈絕食，而不表現必需的積極性，僅只限於不離開工廠，不吃東西，這樣，有時候弄得自己的身體完全衰弱；然而這不是典型的；最多的是佔領工廠而並不絕食的罷工，這却可以發動極大的積極性，吸引罷工工人的家屬，以及其他工廠的工人來加入鬥爭；有時候，甚至於結果是罷工工人和失業工人同警察實行巷戰；警察當然大半總要來干涉罷工，企圖用暴力來把罷工工人拖出工廠去的。

我們可以在各國看見佔領工廠的罷工的革命行動的鮮明例子。

譬如波蘭，在帕昆央尼茨地方的克魯塞和恩德爾紡織工廠的罷工，跟着就發生罷工工人同警察的九小時的巷戰。工人留在工廠裏，用石頭，銀棍子，鹽酸，消防隊的自來

水管來作戰，他們的自我犧牲的鬥爭引起了別的土地工人的同情運動（罷工，示威，同警察的流血的衝突）。

大家都知道的佔領工廠的罷工戰鬥是：在「郭爾滕吉亞」工廠，在彼得洛珂華，在洛慈的維德塞夫工場和史列塞洛夫工場，在華沙的國主電話廠——那一次同軍警的衝突打死了四個工人，還打傷了許多人。

在羅馬尼亞，雅西，布加萊斯多和克路裏的鐵路工人罷工，引起了廣大工人羣衆的運動，跟着就發生了街道上的羣衆示威，以及布加萊斯多的二十四小時的巷戰，當時政府不但要用機關槍，甚至於用了大砲，因為否則就不能夠攻下工人所建築起來的「堡壘」。

在日本，當著名的東京總市電車工人罷工的時候，工人佔領了通過地洞的甬道，用電車堵塞起來，而在地洞口裝上了電網，放上了極強的電流。經過了四天的罷工之後，工人得到了完全的勝利。

這樣佔領工廠的英勇的罷工鬥爭的例子，還可以指出很多呢。

佔領工廠的罷工引起全城勞動羣衆的極大的高潮，他們時常湧到罷工工人所佔領的工廠那裏去，在工廠大門口舉行戰鬥的同情示威等等。時常爆發同情的罷工（波蘭，在帕昆央尼茨的克魯塞和恩德爾工廠罷工，陳斯託霍夫造紙廠罷工的時候；西班牙，在郭

多的蘇袋廠罷工的時候等等)。尤其是應當注意的，是羅馬尼亞的鐵路工人的鬥爭（布加萊斯多和克路瓦），那裏配合着佔領鐵路工場和巷戰。這一次罷工鬥爭，鼓勵了最後的最糊塗的勞動者階層，而促進了別的無產階級隊伍的戰鬥的成熟；這次鬥爭在羅馬尼亞是第一次應用羣衆鬥爭的新的方式和手段，直到公開的國內戰爭的成份都有在內，（聯絡軍隊士兵，在巷戰裏應用電網，用工廠鍋爐裏的滾水澆那些憲兵和軍隊等等），因此，培植了整個的革命運動。

同時，在改良主義者和非革命份子的影響之下，有許多佔領工廠的罷工表現了新的消極的鬥爭方式：罷工工人佔領工廠之後宣佈絕食，這不但使得罷工工人衰弱下去，削弱鬥爭的意志，而且妨礙積極的鬥爭方式的應用，例如吸引其他工廠的工人來參加罷工，組織示威等等。絕食的罷工，雖然一般的說來，並不這麼廣泛的應用，然而始終在有些國家裏（例如捷克斯拉夫），最近確有增多的傾向。在波蘭，消極鬥爭方式的罷工——工廠裏的絕食——就有罷工舉行過，這是表示對於淹沒莫爾替美和克里孟託夫礦坑的抗議的；再則，在陳斯託霍夫造紙廠，在薩塔讓紡織廠，華紗和格羅特諾的市政工人等，都組織過絕食的罷工；在捷克斯拉夫，絕食罷工發生在沃斯特拉夫的礦坑，白留斯克的畢爾礦坑，珂爾文的礦坑；在日本——大阪的「尼洪珂爾諾」鐵廠，「塔卡爾福庫沃卡」礦坑，神戶的「啓斯維古密」商店等；在中國——北平學校的教職員等等。

這些宣佈絕食的罷工，包含着消極的成份，却並不是罷工鬥爭表現佔領工廠的那種新方式的特點和典型。

共產黨和赤色工會，應當用一切方法，使得這種絕食式的罷工方式不致於應用。對於并不絕食而佔領工廠的罷工，却應當完全是另外一種態度。

這一種罷工，表現着從沒聽過的尖銳化的階級對抗形勢之中，勞動羣衆的發動力和積極性的生長。因此，甚至於絕食的罷工，有時候也引起這個工廠周圍的廣大運動，而且不只是罷工工人的妻子，還有附近工廠的工人也來參加。例如，在陳斯託霍夫造紙廠裏發生了絕食罷工的時候，附近的兩個工廠，「華爾沙」和「斯特拉多謨」的工人，示威的離開了自己的工廠而跑到造紙廠那邊去。在克里孟託夫和莫爾替美礦坑的絕食罷工的時候，在共產黨的號召之下，六個其他礦坑的工人宣佈了一天的同情罷工。這證明只要共產黨對於罷工有正確的策略，甚至於消極的絕食而佔領工廠的那種罷工方式，也可以成爲工人羣衆更積極的鬥爭的出發點。

這就是爲什麼大資產階級的報紙，關於佔領工廠的罷工發出警號來，而堅決的要求中央政府要有堅決的對付這種「任性」的辦法。有些國家裏（波蘭，日本），社會民主主義的領袖，有時候甚至於各種宗教的神甫，沒有辦法來阻止羣衆的鬥爭了，而要想引導羣衆離開積極的罷工戰鬥，就竭力的「贊助」絕食罷工的這種最消極的鬥爭方式，證

明這種罷工運動的方式在法律上是合理的，合法的。然而不願這樣的理由，接近政府的波蘭報紙「LISKO」，在五月二十三日說，政府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不同的，牠已經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任何一種佔領工廠房屋的行動，不管工人是消極的，還是在這佔領的地方表現什麼積極動作，都是對於法律秩序的破壞」。這個資產階級的波蘭報紙，以及捷克斯拉夫的社會民主黨，都說這種鬥爭方式是「共產黨和革命黨鼓勵」的結果。這個報紙完全同意政府方面的意見，說是「現在的恐慌時代已經太艱難了，實際生活本身所造成的複雜形勢已經太麻煩了，再不應當輕意的引起新的困難和新的麻煩」。

我們看見，在波蘭以及在其他國家裏，政府大半都用極端的辦法來對付佔領工廠的罷工工人，然而在罷工運動和革命鬥爭一般的高漲形勢之中，這些辦法也不能夠給政府所希望的結果。

因此，共產黨應當把佔領工廠的罷工這種新的方式，也吸收在自己的鬥爭方式的軍器庫裏面，然而不要絕食，而要領導工人羣衆對於這種罷工的熱情，組織他們，擴大罷工鬥爭到別的工廠裏去，發動那裏的同情罷工，利用佔領的工廠來開羣衆大會，作為組織街道上的羣衆示威的出發點。共產黨員，領導着佔領工廠的罷工，能幹的配合佔領着工廠的罷工工人的鬥爭和其他的罷工，以及街道上的鬥爭，應當永久注意到鬥爭的重心在於鬥爭的擴大的尖銳化。凡是佔領工廠可以成爲擴大鬥爭到其他工廠和組織街道示威

的時候，例如，因為裁減工人，因為關閉工廠或是宣佈工廠罷業的威嚇，直到在市政府和資產階級國家特別着重的工廠裏，罷工時候政府立刻就要用工賊和兵士去的地方，——凡是這樣的時候，共產黨都應當自己去發動佔領工廠的罷工。可是，在沒有廣大的群眾贊助這種鬥爭方式的時候，應當避免冒險的佔領工廠。例如，日本人造絲工廠「亞薩希·賽它」罷工的時候，因為罷工的拖延，罷工工人之中有了疲乏的情緒，而「革命反對派」却提議佔領工廠，於是二十個最好的積極份子去佔領的時候，立刻就被警察逮捕了。結果，這次罷工因為沒有積極幹部的領導而失敗了。由我們提議的佔領工廠的罷工，也同其他的一切罷工一樣，應當要有極細緻的準備。

凡是佔領工廠的罷工沒有轉變到廣大鬥爭的前途的時候，沒有磨礪反對資本家的武器的必要條件的時候，以及佔領反而會變做隔離罷工工人的方式的時候（例如地底下的礦坑），那末，共產黨應當向羣衆解釋佔領這個工廠的不適宜，而改用其他的鬥爭方式。這要看具體的條件而定（例如礦工可以佔領礦坑上的房屋和院子）。

在組織總同盟罷工的時候，佔領工廠每一次都要適合黨的基本方針——擴大罷工鬥爭的戰線，祇有例外的形勢之中才可以使罷工工人留在工廠裏，而且只爲着要不准工賊進去（例如，在最重要的市政企業裏——電氣站，自來水廠等等）。

對於佔領工廠的罷工工人表示同情的同情罷工，不應當使得這些表示同情的工人又

留在自己的工廠裏，而必須號召這些表示同情的工人到街道上去，到那些罷工工人所佔領的工廠區域去示威等等。

在有些國家裏（西班牙，意大利），一部份被開除的工人或是失業工人，有時候闖進以前做工的工廠就開始工作起來，隨後就向工廠主要工錢。更有力量的，是要被開除的工人自動回廠同沒有開除的工人表示對他們同情而罷工，互相配合起來，要求恢復被開除的工人的工作。而且，這時候宣佈佔領工廠的罷工，時常是適宜的。

在中國，佔領工廠的罷工有時候跟着就用原始的鬥爭方式——搗毀機器和車床（上海吳淞的永安紗廠，無錫的和通絲廠等等）。我們的任務——是要解釋：因為非常的剝削把工人弄到極端絕望的地步，所以最落後的工人就應用這樣的鬥爭方式，應當引導他們的戰鬥到罷工鬥爭的更高的程度。

表現在絕食的消極情緒——共產黨和職工反對派必須給以堅決的打擊，這種絕食使得罷工工人的身體完全衰弱，以致於沒有繼續鬥爭的能力。必須向羣衆解釋這種鬥爭方法是不適宜的，甚至於有害的。

自然，如果共產黨和赤色工會用盡了一切方法勸告工人不要絕食，然而他們始終宣佈了絕食，那末，這樣的罷工也應當贊助，同時，竭力設法使得絕食停止，而罷工得到積極的戰鬥的性質，像波蘭莫爾替美和克里孟託夫礦坑那次罷工就做到了這一點。如果



佔領工廠不能夠動員別的主廠的工人，如果這個辦法已經在削弱他們的力量，那末共產黨就不應當讓罷工工人過於長久的留在工廠裏。共產主義者應當竭力在相當的時候「用一種鬥爭方式去代替別種鬥爭方式，而且方式的提高應當是經常的傾向」（列甫）。假使鬥爭沒有積極結果的前途，那就像其他的一切罷工一樣，必須推選適當的時機來結束這個鬥爭，儘可能的使罷工工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益。

自然，必須出去反對那種以爲佔領工廠的罷工是罷工鬥爭的「低級」方式的觀點；很明顯的，這種佔領工廠的罷工，像羅馬尼亞的鐵路工人罷工，波蘭和其他國家的許多戰鬥的罷工，不是低級的，而是罷工鬥爭的更尖銳化的方式。然而同時，必須反對把每一個佔領工廠的罷工都理想化（不管牠的方式和條件），反對把每一個佔領工廠的罷工都認爲是罷工鬥爭的高級方式。應當堅決的打消一種有害的觀點，像有些捷克斯拉夫的共產黨員所暴露的，他們認爲絕食的罷工，是一種鬥爭的英勇的高級的新的方式。黨也應當解釋那種意見的全部錯誤——就是以爲鑛坑的罷工工人留在地洞裏可以造成他們反對國家政權的優越條件（捷克斯拉夫）。

同樣，必須解釋：在現在這個革命發展階段上，佔領工廠的罷工同其他的鬥爭方式配合着，雖然是更尖銳的罷工方式，但是離得一九二〇年意大利那樣的奪取工廠的形勢還遠呢，那樣的奪取工廠只要有充分強大的共產黨，就可以從監督生產轉變到武裝暴動的

。監督生產的口號只有在革命形勢存在的時候才可以提出來，那時候直接爭取政權的問題就已經發生了。

社會法西斯黨和法西斯黨的努力，是想要不讓罷工發生，假使罷工始終發生了，那就想使得罷工變成最消極，最安靜，而不危害資產階級制度的性質。共產黨員的責任，却在於最大限度的使得佔領工廠的罷工工人羣衆積極化，使得這種罷工成爲革命鬥爭的真正的工具。

佔領工廠的罷工的規模和意義，首先要靠共產黨方面的正確領導，要靠黨部和革命工會方面表現最大的積極性。最主要的危險，是在佔領工廠的罷工的時候，其實其他一切罷工方式也是一樣的，採取任其自然的辦法，希望這種罷工自然而然的成爲被佔領的工廠以外的鬥爭繼續發展的出發點，認爲罷工工人的留在工廠裏是目的本身。

估計着佔領工廠的罷工的特殊條件，必須在準備佔領工廠的罷工的時候，尤其是這種罷工已經開始之後，把最大限度的力量都放到組織幫助罷工工人的事情上去。

在佔領工廠的罷工的時候，像波蘭的經驗所指示的，並不是所有罷工工人都應當永久留在工廠裏。黨和革命的職工反對派，應當使得工廠的積極幹部和罷工委員會的一部份，出來在外面動員羣衆的幫助。

在佔領了的工廠裏，必須根據下層統一戰線，選舉戰鬥的領導機關（吸引婦女和青

年的參加），要建立廣大的工人自衛隊去抵抗警察的進攻，像羅馬尼亞的鐵路工人，波蘭的「郭爾滕吉亞」，日本的「尼洪納魯洛德」等等的例子。在街道上的示威之外，還應當在佔領了的工廠的院子裏舉行熱鬧的示威，唱革命歌，掛起紅旗等等。應當努力去組織罷工工人之中的互相幫助，就是幫助那些得不到家裏送來東西的工人。

罷工工人的留在工廠裏，必須利用來做最大限度的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的工作（舉行談話會，出版牆報，像東京總市電車工人罷工時候的例子等等），而且可以利用來組織上鞏固黨和職工反對派。

革命的戰術，在於善於配合勞動羣衆的革命鬥爭的各種方式。共產黨應當集中自己的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擴大罷工運動的戰線，集中散漫的罷工，加強在業工人以及失業工人的羣衆示威運動，而且研究和運用別國的經驗，竭力去把鬥爭提高到更高的政治程度。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版權所有

定價大洋伍分

編輯者 中華書局

出版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 世界佛教居士林

## 募資購請佛經佛像啓

竊本林新建圖書館已告落成除徵求圖書外擬購請國內各刻經處各書坊經書圖像各全份查各刻經處各書坊所出圖書目錄約共需洋三千元之譜今擬集同人分認募集伏望 諸方善信隨喜捐助以便集有成數即向各刻經處購置俾圖書館得以早日佈置以供社會人士閱覽其捐助在十元以上者敬刻芳名懸掛館內永為紀念如蒙樂助捐款請逕交本林收支處當掣給收據為憑並登報鳴謝以揚仁風伏維慈鑒

本林謹啓

林址：上海開北新民路國慶路口

平湖 孫透雲香號 名香 虔製

本號開設平湖北寺內百有餘年發明上品菩提香虔造上品經香正沉香蘭花香白芸貢香陀羅尼香末安神盤香安息盤香劉海牌辟蚊盤香不惜工料有益衛身味妙清香價廉物美馳名中外有口皆碑近年來各省寺院各佛教團體紛紛來購應接不暇或因遠購不便故為便利起見特將寄售處開列於下務祈賜顧諸君認明劉海商標就近購買庶不致誤特此通告此啓

(寄售處) 佛學書局總分局上海  
徐志誠蘇州淨心蓮社杭州功德林  
海鹽蓮社無錫佛經流通處如皋經  
香流通處紹興佛學會濟島佛學研  
究會

閱過本報請轉送他人功德無量

# 新醫西藥刊

## 本 期 要 目

新醫與舊醫·····	余雲岫
肺病之新療養法·····	謝筠書
腦膜炎·····	王完白
沙眼問答·····	劉以祥
幾種賜保命之研究·····	陳澄

二卷三期 (第六十三號)

上海新醫藥刊出版社

# 紅 旗 六 十 三 期

## 目 錄

福建的事變與我們的任務（社論）

共產國際給英國獨立工黨的信

兩年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

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

爲新區邊區工作的布爾塞維克轉變而鬥爭

「……是劉湘統一四川，還是紅軍來建立四川蘇維埃？」

德國法西斯蒂選舉的「勝利」和中國的國民黨言論

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勢略論

反對向困難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

答楊幼麟同志

## 福建的事變與我們的任務

（社論）

社會民主黨A B團，第三黨及十九路軍軍閥等的集團，於本月二十日在福州開了所謂「人民代表臨時大會」，成立了所謂「人民政府」，發表了他們的政綱，舉起了反對南京政府和國民黨的旗幟，而開始了公開的政變與所謂「獨立」運動。

爲明瞭這次福建事變的實質，爲認識牠的真相，我們首先要知道這個事變的原因。福建的事變是在兩個政權尖銳的對立與反動統治內部日益崩潰瓦解的情形之下產生出來的。

國民黨的血腥統治，造成了中國民族的奇恥大辱，不但出賣了滿蒙，而且出賣了整個的華北。中國六分之一的人口，在日本強盜直接宰割之下，康、藏、雲、貴在英法的鐵蹄蹂躪之下。國際聯盟在「技術合作」名義之下監督着中國。在民族危機與經濟浩劫的條件下，工農勞苦羣衆日益陷於失業，飢餓，災難，死亡之途。這種情形推動羣衆走向反帝反國民黨的堅決的革命鬥爭，罷工運動繼長增高，抗捐，抗稅，災民農民的鬥爭普遍全國，尤其是蘇維埃革命在廣大地域的勝利，甚至包含遼遠的川陝之大部份區域，紅軍粉碎了敵人四次進攻，現在正在實行衝破五次「圍剿」。所有這些都構成了中國革命形勢之尖銳化與往前發展，使得國民黨的統治更加破產與崩潰。



爲了挽救自己的垂死統治，國民黨不惜用任何代價去投降帝國主義和出賣民族利益，企圖得到帝國主義的更大的幫助，去鎮壓反帝反國民黨的一切革命鬥爭，首先是進攻唯一的反帝武裝——工農紅軍與蘇維埃政權。在反對民衆革命，反對蘇維埃政權這個基本問題上，一切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各派走狗，都是一致的。但是在蘇維埃領土的擴大，帝國主義進一步的瓜分中國之下，帝國主義間的分贓鬥爭更加劇烈了，而反映國際帝國主義的利益各派軍閥間因爭奪日益縮小的地盤而起的衝突，也更加尖銳了。這又使得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更加削弱。

正因爲國民黨統治更加削弱與崩潰，紅軍蘇維埃的力量更加強大，革命形勢更加生長，使得反動統治不但加緊屠殺工農勞苦羣衆，而且以各種各樣的新的欺騙手段，武斷宣傳等等來愚弄羣衆，阻止羣衆的革命化。以蔣介石劊子手爲首的法西斯蒂匪黨之出現與猖狂，以胡漢民爲首的所謂「新國民黨」的努力，以馮玉祥爲首所謂「抗日政權」之嘗試等等，就是反動統治的武斷宣傳的新花樣。而這次十九路軍和陳銘樞，李濟琛輩在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動統治的一種新的欺騙。

不僅如此，這次福建事變的產生，還有他許多特殊的條件。福建與中央蘇區相隣，而且蘇維埃在福建的西北統治着，閩南的紅軍游擊隊是在迅速發展。反帝鬥爭，罷工，示威，農民運動在急劇高漲，尤其是今年夏秋間紅軍東方作戰軍在連城，閩北給了十九

路軍堅決的打擊，這是福建反動統治的致命的威嚇。爲的要阻止蘇維埃在福建的勝利，爲的要準備新的力量以便在有利的條件，繼續進攻紅軍與蘇區，鎮壓福建的革命運動，十九路軍軍閥及依附他們的A B團和第三黨份子，不能不以暫時對紅軍「休戰」的企圖，拋棄破產了的國民黨的旗幟，舉行政變，在新的欺騙把戲之下，來挽救福建的反動統治。這是此次事變的主要原因。

福建是日美帝國主義在中國劇烈爭奪的一個區域。由於日美衝突之加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急進，更促進了這次福建事變的爆發。而福建事變又將加速帝國主義侵略中國。首先是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公開聲明干涉福建，這當然不是因爲十九路軍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而是主要的害怕羣衆的反日反帝鬥爭的發展及「第三國」，即美國勢力的擴大。日美帝國主義者都想把福建的統治者拉到自己方面來，以爲自己的掠奪工具，日美的衝突是更加尖銳了。

十九路軍閥政客，第三黨A B團，在上述的條件之下，開始莫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企圖獲得羣衆的信仰，提高其反對蔣介石，廣東和福建內的敵對的軍閥的地位，增加他們現在或將來與南京妥協的政治資本。爲了這個理由，他們認爲對紅軍採取暫時的防守政策，以及對羣衆給予各種口頭上的「允諾」，對他們是有利的。但是他們不能而且不願意實行這些「允諾」的。在形勢一經變化，紅軍稍有不利的形勢或獲得更大的勝利

，階級鬥爭更加尖銳，以及十九路軍士兵更加革命化等，都要使福建統治者立即露出他們的原形，拋棄他們一切的「允諾」，實行更殘酷的屠殺羣衆和進攻紅軍蘇區。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福建事變爆發以後，南京政府利用這次事變，企圖團結各派軍閥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來對付十九路軍閥政客，尤其是借口「人民政府」是什麼「容共」，「赤化」，「共產色彩」等來加緊進攻紅軍蘇區，并在上海及其他各地實行戒嚴和白色恐怖，「嚴令京滬平漢各地軍警機關嚴爲防範，不問其所持理由爲何，凡有逾軌行爲，一律依法（？）嚴辦，決不寬貸」。南京反革命這些武斷宣傳，又是爲着掩蓋牠目前的新的投降出賣，牠的統治的崩潰，反動統治內部的分裂及其屠殺民衆的罪惡。

除了自欺欺人的南京軍閥官僚和反動派以外，誰也不會相信福建「人民政府」是「容共」，「共產色彩」。甚至帝國主義法西斯蒂的「上海德文日報」也說：「現爲人民政府政治主席之陳銘樞與十九路軍領袖蔡廷楷，依其過去的歷史，實未嘗沾染共產之色彩，即所謂人民政府主席李濟琛亦未蒙有此種嫌疑。」（見二十四日「大美晚報」）。事實上，十九路軍閥與陳銘樞李濟琛輩之反對共產黨和屠殺革命民衆與南京劊子手一樣。李濟琛之屠殺廣州公社固不必說，就是蔡廷楷輩之活埋與槍殺十九路軍革命士兵，轟炸蘇區民衆和鎮壓福建抗日羣衆，這是有目共見的。南京騙徒們的武斷宣傳是爲污蔑共產

黨，加緊進攻紅軍蘇區，及進行他們的軍閥戰爭而已。

福建的事變，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一派，用新的欺騙，以民族改良主義的武斷宣傳來愚弄羣衆，緩和羣衆革命情緒，阻止羣衆走向蘇維埃的道路，以此來奪取反動統治中的領導權，去挽救地主資產階級的最後的崩潰。所謂「人民政府」的綱領，其用意也是這樣。

「人民政府」的「最低限度綱領」說要「消滅帝國主義在華之宰割」。如何去達到這個目的呢？只是「廢除不平等條約」，「首先實行關稅自主」。至於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進行民族革命戰爭，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消滅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沒收帝國主義一切企業，銀行，礦山，交通工具，以便在經濟上政治上澈底消滅帝國主義統治的主要問題，完全不提。這顯然是民族改良主義的綱領，這個綱領，國民黨早已說得爛熟了，其結果如何，是人人知道的。十九路軍軍閥，不但不會反對帝國主義，而且曾經出賣上海戰爭，并在福建鎮壓反帝鬥爭，因為他們也是帝國主義走狗。

該綱領又說：「立行耕者有其田，實現計口授田」，這也是國民黨的老調，一句騙人的空話。因為農民要得到土地，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推翻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實行土地革命，沒收地主土地來分配，才有可能，蘇區的經驗，完全證明了這一點。在代表地主資產階級統治的十九路軍軍閥之下，這完全是夢想。他們不但不會「分配土

地給農民」，而且要鎮壓爲土地而鬥爭和已得到土地的農民，如十九路軍之進攻蘇區紅軍以及閩南遊擊隊，就是最好的證明。

在該綱領中所說的什麼「改良農工生活」，是一個騙局，因爲他們已公開聲明保護「華僑資本」，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利益；後者的利益，是與工農勞苦羣衆的利益絕對相反和衝突的，保護這些剝削者的利益，只有使勞苦羣衆生活日益痛苦而已。

關於政權問題，該綱領的主張，不外是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什麼「實行普選」，「召集生產人民代表大會，解決國是」，「最高權力屬於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的商學兵代表大會」，只有成爲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工具，如蔣介石所玩過的所謂「國民會議」，「國難會議」等的把戲一樣。

對於「人民身體居住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出版之絕對自由」，他們不但不會實行，而且加以剝奪。福建有多少革命的示威，罷工，集會是被十九路軍閥禁止和鎮壓了！有多少革命的出版與言論被取締與破壞了！有多少的革命羣衆與領袖被拘捕與屠殺了！這也是大家知道的。

至於苛捐雜稅，不但不會廢除，反而會增加，政治犯不會釋放的，或者當一些政治犯釋放時，新的被捕者又將充滿牢獄，武裝民衆不會實行，而是要繼續解除遊擊的武裝，對紅軍蘇區的進攻不會停止，而且在十九路軍比現在集合更多力量的時候，來加緊進

攻我們。這都是無須證明的。

從以上的敘述中可以看出，「人民政府」的政綱完全是一種欺騙羣衆的改良主義的政綱，雖其中包含有一些羣衆的迫切要求，但這是他們不能和不願意實行的。只有工農羣衆自己才能爭取實現。爲什麼？因爲現在的政府仍舊是代表着像其他地方的國民黨政府所代表的階級，就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因爲十九路軍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一種力量；因爲所謂「人民代表臨時大會」的主要角色，盡是軍閥，官僚，政客及各色各樣的上層知識份子與革命叛徒。因此，對於「人民政府」必須有這樣明白的認識，不許有毫絲的幻想，在這一點上任何的動搖都是罪惡。我們必須一開始就在黨內和羣衆中克服任何的幻想。

這種幻想，是否可以發生呢？很可能的。第三黨和社會民主黨之流，看到了國民黨更加瓦解，估計到目前南京政府日益倒台，蘇維埃運動日益擴大，爲了挽救地主資產階級的整個的統治，爲了阻止羣衆走向他們的先鋒隊所指出的革命道路，所以採取更大的武斷宣傳，對南京和國民黨取反對地位，應用「左的」社會與民族改良主義的詞句，口號，政綱，使他們可以得到反對共產黨，反對革命比國民黨更大的力量和有效的方法。無疑的，他們的活動，他們的力量任何的增加是中國革命進步上一種新的非常危險的障礙物。因此，忽視這次的事變，不去揭破他們的陰謀，也是莫大的錯誤。

福建事變，使中國政治生活發生了新的變化，首先是反動營壘中起了新的分裂，反動統治的力量將更大的削弱，這對於我們是有利的。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新的形勢來開展我們的鬥爭。爲了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執行下列的主要任務：

第一，必須加強黨的布爾塞維克的意識，一切黨的組織和同志們必須澈底明瞭十九路軍領袖們和第三黨 A B 團等的政治謀陰的特性，必須使群眾了解這次福建事變的真相，團結他們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去進行革命的鬥爭。我們必須指出：革命形勢日益尖銳與發展，蘇維埃紅軍強固與壯大，國民黨統治加速的瓦解與崩潰，必然會發生地主資產階級各派軍閥集團以層出不窮的新的武斷宣傳來欺騙羣衆，這次福建的事變，就是這樣的企圖。必須拿具體事實來揭破『人民政府』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證明他的營壘內的各個派別，都與帝國主義利益聯繫着的，如陳友仁的親日，蔡廷楷等之親美，還有英國帝國主義工具的一部份西南軍閥政客官僚等等。他們是不能和不願意反對帝國主義的。應當把我們黨的革命立場在羣衆中清楚的與『人民政府』對立起來。用最大的力量來揭破各種反革命派別，要向羣衆說明必須打倒罪大惡極，賣國禍首的國民黨和南京政府，爲蘇維埃的政權而鬥爭。

第二，抓住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的新的侵略，國民黨新的出賣，『中日直接交涉』，以及揭破『人民政府』的反帝的假面具，來開展廣大的反帝運動。要明白告訴一切勞

苦羣衆，只有武裝民衆的民族革命戰爭，才能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只有共產黨才是反帝運動的唯一的領導者與組織者。我們不能限於一種鼓勵而是主要的要求建立反帝的羣衆組織，進行民族革命戰爭，實行抵制日貨，沒收日貨來救濟失業工人與城市貧民，使反帝運動成爲積極的羣衆運動，把這個運動與工農羣衆的日常鬥爭聯繫起來，並保證工人階級在這個運動中的領導作用。必須努力傳播蘇維埃政府對日宣戰的通電與蘇區完全肅清了帝國主義的勢力，號召全國士兵和十九路軍士兵來擁護蘇維埃政府與紅軍的抗日作戰協定的號召，參加反帝鬥爭和土地革命，反對進攻紅軍蘇區。

第三，我們應當廣泛的宣傳蘇維埃紅軍的勝利，發動最廣大的羣衆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擁護蘇維埃政權，擁護蘇維埃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抗日作戰的提議，在福建應當利用一切順利的形勢，以工農羣衆和士兵的力量來達到蘇維埃政府抗日作戰協定的實行，利用反動統治的崩潰與福建的事變及羣衆對蘇維埃的積極擁護的機會，開展廣大羣衆運動，要求立即停止進攻蘇區，把全國的軍隊開去抗日與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侵略，立即實現武裝民衆及民主的自由，我們必須把爲實現我們的要求的鬥爭發展到極度。只有工農士兵羣衆的擁護，才能保證反對福建和一切反動軍隊對蘇區紅軍的進攻。

第四、動員廣大的羣衆，爲民衆的民主權利而鬥爭，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反對



法西斯蒂藍衣社綁架，暗殺和追逐革命戰士的盜匪陰謀與暴行，反對他們摧殘一切文化，教育，新聞，影戲等等中世紀的黑暗政府，和最無恥的所謂『文化統制』，反對南京劊子手『藉口』閩變而宣佈的軍事戒嚴，同時揭破『人民政府』的『民主』假面具，把蘇區已經實現的民衆一切自由解放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和牠對立起來。

第五，在福建除了上述的任務之外，必須執行下列的迫切任務：首先，黨的組織的任務有莫大的重要。我們必須嚴格遵守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如果我們能獲得一個公開的或半公開的最短時期，黨的機關和最主要的最負責的幹部必須嚴守秘密。應當使領導公開的羣衆工作和黨的祕密工作這樣配合起來：當敵人突然進攻我們的時候，他們決不能消滅我們的組織。對於這個問題的最大的警覺性，有莫大的意義，這可以保持我們的組織和同志，以進行將來的工作。同時必須加強黨的領導，鞏固與擴大黨的組織，將先進的工人，雇農，貧農大批的吸收到我們隊伍裏來。

其次，利用一切可能最大限度的開展羣衆工作，領導與組織工農勞苦羣衆和士兵的革命鬪爭，首先要組織與加強赤色工會，在敵人佔優勢的工會加緊我們的工作，奪取被反動派欺騙下的工人羣衆。工人的目前的要求必須放在第一位，爲這些要求而鬥爭，不許幻想『人民政府』的『改良』；同時把這些要求與中國政治形勢，福建事變，反帝鬥爭與粉碎五次『圍剿』等的偉大任務聯繫起來。必須組織工人糾察隊，武裝工人，建立

行動委員會，準備與領導罷工。

最後，農民中的工作，是極端重要的。組織農民委員會，以農民委員會為抗債，抗稅，抗租，搶糧，分糧，奪取與分配地主豪紳富農的土地之鬥爭機關。利用「人民政府」分土地的「允諾」來粉碎牠的假面具和發動農民自己的行動，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以農民群眾的行動才能實現土地革命。要用最大的力量在黨的領導之下組織武裝的「農民自衛軍」進行遊擊戰爭和土地革命。

派遣同志深入農村去組織農業工人的工會，組織與領導農民運動，這種運動應當超過福建現在和將來的反動政府的「允諾」，或讓步的範圍。他們的「允諾」或小小的讓步，祇是爲了宣傳，決不會改變基本農民羣衆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地位。要根本改變農民的現狀，祇有由農民羣衆自己的鬥爭，準備手裏拿着武器去鬥爭，才能獲得。同時應把反日反帝運動與農民鬥爭聯繫起來。

在福建，我們有極順利的條件，我們有一切可能來揭破福建統治者的假面具和新的欺騙，來開展革命運動到較高的階段，必須普遍的宣傳蘇維埃政權，告訴羣衆武裝暴動與組織蘇維埃之必要。只有蘇維埃才能保證民族的解放，才能解決羣衆的土地，糧食，自由和工作的問題。當然，我們不是要發動過早的武裝暴動，而是要用一切力量組織與團結羣衆在我們黨的領導之下，進行革命鬥爭，使得在決勝負的鬥爭中，我們將為勝利

者。

## 共產國際給英國獨立工黨的信

同志們！我們明白的回答了你們黨的大會關於獨立工黨怎樣就可以贊助共產國際的工作的問題之後，我們接到你們黨的全國評議會（註一）的一封信，這封信裏說了好些全無根據的責備共產國際的話，並且提議：「召集一切準備在革命的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合作的團體的全世界大會」。

我們認為這個提議是不會有絲毫益處的。如果獨立工黨的全國評議會，像牠在自己的信裏所說的那樣，召集了各國社會民主黨的「獨立派」的小團體的全世界大會，那末，這件事情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不過是一種復活不光榮的第二半國際的失敗的企圖；最近在巴黎開會的這類團體的會議，就很明顯的表示了這種情形。我們懷疑：這個意見就是在獨立工黨自己的黨員裏也不會受着歡迎。要知道獨立工黨的德白萊大會上，全國評議會擁護了「包括一切的國際」的主張，而反對聯合共產國際，但是，大會的大多數却通過了向共產國際請求的議決案。我們以為，獨立工黨的黨員現在也還願意根據自己的黨的大會的決議，而不願意加入什麼新的國際——那樣的新的國際只有破產了的舊的政策。

全國評議會所提出來的「左派社會黨的全世界大會」的主張，其實根本上就是獨立工黨的舊意見，從一九二〇年起就是這樣主張的。那時候，也是在英國工人階級急進化的形勢之中，獨立工黨退出了第二國際，而且獨立工黨的全國評議會曾經由沃爾赫德和克里福德愛蘭簽名，寫了一封信給我們，這封信，一方面詢問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別方面通知我們說：獨立工黨「請瑞士社會黨設法召集各國社會黨的左翼代表會議，來討論恢復統一的包括一切的國際的可能問題」。

事實上的經驗很快就告訴我們，這種「左的」主張的結果是什麼：一九二一年，英國獨立工黨參加了組織「左派」社會黨的維也納（註二）聯合的工作；而兩年之後（一九二三年），這個第二國際把脫離了叛變的第二國際的急進化的工人，又送還了第二國際的懷抱。

當時第二半國際的這種手段，在歐洲的許多國家裏，能夠很長久的阻礙左傾工人同共產國際結合戰鬥的統一戰綫去反對資產階級。在英國，正因為這種手段的緣故，所以使得在獨立工黨影響之下的工人，反而去贊助工黨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政策；所以使得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能夠很容易的出賣總同盟罷工（一九二六年）；所以對於已經開始了的有系統的資本進攻，準備好了許多次的投降。

所有這些，英國的工人階級是出了很大的代價的。那時候，「左傾的」改良主義者

口頭上說了許多關於「足夠生活的工資」的話，甚至於說到「我們時代的社會主義」，然而事實上，絲毫也不去組織工人實行羣衆的抵抗資本家和政府對於工人的每天的進攻；幾百萬工人從工廠作坊裏開除出來，失業工人的生活惡化了，失業津貼減少了，實行了所謂「需要檢查法」（註三），勞動者的工資毫無寬恕的減少了等等。窮困和政治上的反動——這就是工黨政策給英國工人階級的禮物，而並不是什麼「足夠生活的工資」和社會主義。

現在，這個資本進攻已經不能夠那麼平穩的進行了。工人羣衆不能夠再忍耐了，他們憤恨極了，忿怒極了，他們要鬥爭，爲着一塊麵包，爲着自己的事業鬥爭。他們再也不相信什麼「對的是福特」（註四），而不是馬克思」之類的話了，而獨立工黨的刊物却時常在說着這類的話。

英國工人階級的急進化是現在的事實，必須從這個事實做出實際的政治結論來。我們共產主義者提出這樣的任務：組織羣衆的戰鬥，擁護工人的日常生活利益，引導工人階級的大多數脫離改良主義者的影響，團結無產階級的戰鬥的戰線；組織國際的統一戰線的行動，去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戰爭危險，反對資產階級對於工人生活程度的進攻。然而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共同大會——像獨立工黨的領導機關所提議的——能夠給現在日益窮困的工人羣衆什麼呢？除開幻想以外，什麼也不能夠給。要知道社會民主黨的

領袖不願實行反對資本家進攻的鬥爭。他們願意繼續自己同資產階級的階級合作。同他們去開共同的大會，只會使得工人的注意力離開爲着他們的利益而實行羣衆鬥爭的必  
要。

這樣的大會能不能擴大和鞏固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呢？不能夠。社會民主黨的袖領害怕工人羣衆的戰鬥的統一戰線。他們在各國都禁止自己的黨員參加同共產黨聯合的任何工人統一戰線的戰鬥行動。他們拒絕共產黨方面屢次的統一戰線的提議。他們從工會裏，從勞動黨（註五）裏，開除共產黨員和其他贊成統一戰線的革命工人。他們分裂整個的工會，等到共產黨員在組織上去團結被開除的份子，他們反而大聲疾呼的說我們同志在分裂工會。最近一次在巴黎開會的第二國際的會議，更加表明了這個國際的敵視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

所有這些，都證明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決不能夠同資本家奴才去開上層的會議來建立。這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應當在各國，經過革命工人和改良主義工人在當地，在工廠裏，在工會裏的日常的合作，經過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政治反動的親愛的共同鬥爭的開展，而鍛鍊出來。這個任務無條件是可以實現的，是必須實現的。

對於實行這個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的任務，獨立工黨的贊助共產國際工作，可以是極寶貴的。然而獨立工黨全國評議會寄給我們的信的某些部份，全國評議會的著名委員（

白洛克威、孫德赫謨周威特等）最近幾個月來的言論，獨立工黨的個別的領導份子的破壞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使得我們有理由可以害怕德白萊大會所決定的「贊助共產國際」的決議會被破壞。因為這個緣故，我們不能夠不提出下列的問題：

第一，現在，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極明顯的在全世界工人的面前暴露了第二國際的政黨怎樣在爲着法西斯主義的利益而出賣工人階級的事業，獨立工黨全國評議會不去號召工人實行堅決的反對第二國際的鬥爭，反而責備共產國際，說「牠妨礙了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動，只有這樣的一致行動，才能夠打倒法西斯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力量」——這是什麼意思？

這種責備完全違反了無可爭論的事實。

誰在希特勒統治產生的時候，堅決的要求工人階級的一致行動去打倒法西斯主義的力量呢？難道不是共產國際向社會民主黨提議的嗎？誰在德國實行了真正的鬥爭去反對國家社會黨奪取政權的呢？德國的一切政黨之中，只有一個德國共產黨實行了這種鬥爭。德國共產黨很嚴重的向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全德國總工聯會提議實行統一戰線的反法西斯主義的行動：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日——爲着反對普魯士地方政府的政變，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和二月二十八——爲着反對希特勒的專政。不但如此，德國共產黨組織了好幾次戰鬥的行動，社會民主黨的工人黨員也參加了的，例如：反對巴本政府減低工資百

分之十的非常法令的羣衆罷工，留倍克地方爲着要求釋放被捕的社會民主黨員而實行的總同盟罷工，在法西斯蒂來封閉工會房屋的時候，共產黨員同「國旗隊（註六）隊員實行了共同的戰鬥（在法蘭克福，在杜塞爾多夫，在謨諾威爾，在哥尼斯堡等等）。而社會民主黨和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經常的用警告，威嚇的手段。禁止工人參加這種親愛的共同鬥爭。不但如此，社會民主黨的總長和警察總監還用警察的力量鎮壓了工人的幾百次反法西斯主義的行動。這是事實。

然而獨立工黨全國評議會却寫着：——共產國際「認爲在共產國際之外的工人團體是自己的仇敵」。不對的，我們只把社會民主黨的領袖，改良主義工會的領袖，認爲是仇敵，而並不把工會的團體和社會民主黨的工人當做仇敵。全國評議會又說：共產國際認爲第二國際的政黨是「同法西斯蒂以及最反動的資本家沒有絲毫區別的」仇敵。這也不對，我們向來就說明的：他們之間是有區別的。第二國際的政黨並不公開的擁護資產階級專政，並不像法西斯蒂那樣公開的擁護，而是在民權主義的掩蓋之下來擁護。牠們用自己的全部政策——幫助資本進攻的政策，替法西斯主義肅清了道路，然後法西斯蒂自己來完成這件事情。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贊助了白魯寧政府和巴本政府，認爲這是「比較小的害處」，他們贊助了非常法令，而白魯寧和巴本政府的非常法令，使得民衆大大的窮困，以至於其中的幾百萬人絕望地盲目的受了希特勒武斷宣傳和預約的欺



騙。

德國總統選舉的時候，社會民主黨固然不是贊助希特勒的，然而牠贊助興登保；而興登保就是把政權交給希特勒的人。在希特勒的國會裏，也并非社會民主黨提出法西斯主義的外交政綱的，那是希特勒提出來的，社會民主黨「不過」投票贊成罷了。

這樣，法西斯蒂同社會法西斯蒂之間是有區別的。然而這種區別的性质是這樣的，只要社會民主黨工人看出了這種區別，他們就同英國獨立工黨的黨員一樣：他們也要背朝着第二國際，而面向着共產國際了。但是，獨立工黨全國評議會，發見了工人的開始離開第二國際的政黨，却在向獨立工黨的黨員說：不行，錯誤的不單是第二國際，而且共產國際也錯誤了的……

這難道不是戴着假面具擁護第二國際的叛變，這當然也已經不能夠公開的擁護的了，——如果不是這樣，那還有什麼別的意思呢？

第二，獨立工黨全國評議會寫給我們的信說：必須「要有統一的國際工人運動的鬥爭，去反對法西斯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而同時，獨立工黨的主席却在寫着文章，那些文章的內容包含着最壞的誣蔑，反對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反對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和共產國際，這是什麼意思？

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和國際的法西主義的大本營；首先

是因爲這個原因，所以帝國主義的政策經常的在反對蘇聯。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每一個人，只要他現在真心要反對戰爭和帝國主義，首先就要反對帝國主義正在準備着的反對蘇聯的戰爭，也就要反對英國和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準備着的反蘇聯的戰爭。然而白洛克威先生在自己的著名的『論德國法西斯主義政變』的文章裏（『New Leader』報，六月十六和七月七日）說些什麼呢？那些文章裏，沒有一句反對英國或是日本帝國主義的話，反而造作些無意識的謠言，彷彿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收買了共產國際的其他政黨，叫牠們出來替蘇聯說好話，主張在遠東『同日本帝國主義講和』，而且說，各國共產黨『幫助了希特勒的勝利』。這樣的造謠誣衊，同英國工會大會上西特林先生的反蘇聯宣傳，簡直沒有什麼區別。

白洛克威先生，用着這樣卑劣的手段，其實不過在暴露自己的絕望的驚慌，因爲他看見：英國工人，特別在最近，越是聽見蘇維埃國家政治上經濟上的偉大勝利，就越發振作了自己的革命的熱忱，而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的榜樣是蘇聯無產階級給他們的。

第三，獨立工黨決定了實行統一戰線以及在全國範圍內同英國共產黨合作，而同時，獨立工黨的個別的地方黨部禁止自己所屬的下級黨部同共產黨實行統一戰線（蘭開夏），或是根本拒絕共產黨代表談起這個問題（南威爾斯），這是什麼意思？獨立工黨全

國評議會寫給我們的信說：「我們準備繼續這個合作」（同英國共產黨），而同時全國評議會的委員孫德赫謨先生却用自己的地方黨部的名義寫出通告來反對這個合作。全國評議會通知我們：獨立工黨有決心幫助共產國際的工作，而同時，全國評議會的代表在巴黎會議上却努力贊助各國獨立社會黨反對共產國際的鬥爭，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那樣的政策不過在左傾的空談上同第二國際的政策有些不同罷了。這又是什麼意思？

請准許我們完全公開說一說我們的意見：這一切的意思是什麼。我們覺得，在你們的黨裏有兩種不同的傾向，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

你們黨內有許多黨員——贊成德白萊大會所規定的新的路線，而許多領袖——却贊成舊的改良主義的路線。你們黨內，許多黨員主張要實行不調和的鬥爭，去反對資產階級，也反對工黨（註七）和國民工黨（註八），而許多領袖却在怠工破壞這種鬥爭，既不願意反對資產階級，也不願意反對工黨等等。你們黨內，許多黨員堅決的擁護蘇聯，而許多領袖却在反對蘇聯，許多黨員贊成同共產國際合作，而接近共產國際，而許多領袖却主張離開共產國際。

簡單些說：你們黨的許多黨員是革命者，而許多領袖却是改良主義者。說得精確些，這是「左的」改良主義者。「左的」改良主義者同右的改良主義者，工黨的領袖或是「國民工黨」，并不完全一樣。「左的」改良主義者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們口頭上贊成革命的政策。而事實上反對革命政策。他們比較起右的改良主義者來，可以接受很急進的政綱。然而他們并不停止在實際上反對黨的政策的革命化。他們高聲大叫喊着無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然而在行動上，却同工黨的領袖妥協，像孫德赫謨等那樣，不斷的怠工破壞統一戰綫，這樣，也就是在幫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註九）。形式上，他們贊成同共產國際合作，而實際上，他們幫助共產國際的敵人，這就是要想造成新的國際，用欺騙的空話和『左的』姿勢——實質上是反對共產主義運動的——來阻擋羣衆實行革命的階級鬥爭。

獨立工黨很久的執行着公開的改良主義政策，贊助着麥克唐納政府等等。這種改良主義政策是不是正確的呢？『左的』改良主義者不回答這個問題。他們只在說，現在他們要執行『新的政策』了，要執行『革命的政策』了，因為現在有了經濟恐慌，然而他們日裏夜裏，一年一年的，在等待着恐慌的完了，那時候就沒有可能恢復自己的舊政策了。這樣，『革命政策』對於他們只是暫時的政策，惡劣的行市所逼出來的，恐慌時期的政策，目的只在於安慰羣衆。

『我們也要社會主義』——『左』的改良主義者說——然而手段却要用『革命的和平技術』。換句話來說，這就是『我們』事實上並不要革命，革命是會發生種種式式的危險的；然而，如果社會主義可以沒有危險和戰鬥而實現——或是經過國會裏的某種草

案的民權主義的投票，或是經過和平的組織合法的「工人蘇維埃」——那麼，「我們」也贊成社會主義……

可是，英國資產階級却堅決的反對和平的解決資本主義運命的問題，英國資產階級強有力的武裝着。他們——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應用着最殘酷的強暴力量。資產階級的政策是血腥的。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表現着他們的階級專政。資產階級的國家代表着階級的強暴力量的機關。

資產階級的階級的強暴力量，不是「和平技術」所能夠摧毀的，祇有用無產階級的階級的強暴力量。英國工人階級在這方面有充分的力量，只要牠的先鋒隊，牠的革命運動，牠的統一戰線加強起來。爲着這個目的必須利用客觀上的一切可能和緊急的事件，選舉運動和國會講壇也在其中，以教育，組織工人階級，使得工人階級積極化，爭取工人階級的決定的級層到革命方面來。

真正的革命政策的路線是這樣的。

改良主義者呢，他們埋怨着現在的政治形勢是「滅亡」的形勢。其中有一些，拋棄了自己的職務（獨立工黨的祕書彼通先生），或是在公開的改良主義營壘裏尋找着自己的位置；另外一些，拚命的裝腔做勢，想要支持到穩定的資本主義的舊時代的恢復。然而他們的計算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破產了。

我們說：政治形勢對於革命工作是有利的。不可避免的歷史公律，已經在推動着爭取政權的偉大階級戰鬥的時代的來到。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極偉大的勝利已經是可以的了。然而一切都全靠今天覺悟的革命者怎樣在準備工人階級去實行這個爭取政權的鬥爭。

爲着這個，首先就必須政治路線清楚而明白。

獨立工黨的道路是前進，而不是後退。後退——那就是回到已經破產的改良主義方面去。前進——這就是向共產主義方面走，共產主義已經在六分之一的地球上，領導着工人從一個勝利進到另一個勝利，而且在世界各國都要發展和勝利的。

我們提議，在英國獨立工黨的一切黨部裏提出下列的問題來討論：

一、有什麼樣的具體的羣衆行動，在英國共產黨和獨立工黨的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可以並且應當在最近期間開展起來，爲着順利的爭取增加百分之十的工資而鬥爭，反對「需要檢查法」以及爭取其他類似的部份要求——英國共產黨和獨立工黨所提出來的？

二、是不是願意英國獨立工黨，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的第十八條，以同情共產主義而取得發言權資格的政黨，加入共產國際？

我們知道，這第二個問題已經有幾個獨立工黨的黨員提出來了。我們認爲現在正是獨立工黨討論這個問題的應當時機。

共產國際執委秘書處

〔註一〕 獨立工黨的「全國評議會」，就是牠的中央委員會的名稱。

〔註二〕 『維也納聯合』就是第二半國際，因為牠的成立大會和執行委員會都在維也納開會的。

〔註三〕 『需要檢查法』，就是失業工人領過一定時期的津貼之後，應當跑到社會局之類的機關裏去受檢查，看他還需要不需要津貼。

〔註四〕 福特，美國的汽車大王，他有一種學說，是主張『保障工人的良好生活，節省工人的精力，也就可以保障資本主義生產的繁榮』。而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却把這個當做『社會主義』，說福特的實際經驗可以證明『階級利益相反』和階級鬥爭』的學說的錯誤。

〔註五〕 英國的工黨的組織是很特別的：一切工會，研究會，小團體多多少少有些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傾向的，都可以以團體的資格加入，或者以個人資格加入。所以有些工會會員，因為他們是這個工會的會員，所以他們自然而然也是工黨的黨員。這種特殊情形，使得列甯認為當時（一九二〇年）的共產主義者可以并且應當加入工會和工黨，為着去爭取工人階級的羣衆。

〔註六〕 『國旗隊』，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武裝組織，同國社黨的挺進隊相類似的，——德國共產黨的這種組織就叫做『紅色戰線隊』。

〔註七〕『英國工黨』，現在的領袖是漢德孫，這是在麥克唐納完全和保守黨聯合之後新改組的工黨，是『正統的』第二國際政黨。

〔註八〕『英國國民工黨』，領袖是麥克唐納，這是最公開的主張同資產階級完全合作，組織所謂『國民』——就是全國各政黨一致的——政府的。這國民工黨比第二國際『還要右些』。

〔註九〕現在的英國政府叫做國民政府，形式上是國民工黨，保守黨，自由黨三黨聯合的政府，——（『國民的National』，在英文德文裏都有『全國的』，『并非一黨的』，或是『民族的』，『非階級的』意思，所以德國國社黨，其實應當譯做國民社會黨或民族社會黨，附及）。而實際上呢，這國民黨政府是保守黨領導的。

（江源譯自倫敦『Daily Worker』報，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 兩年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

中央政府成立到現在，已經兩年了，兩年裏頭革命形勢比以前大不相同。

### 一 蘇維埃區域的發展

中央政府剛成立，中央蘇區就新發展了會昌，尋鄔，安遠，雩都，把許多土匪子打



開，現在成立粵贛省。去年下半年將建甯，黎川，太甯，光澤，資溪，金谿六七縣完全赤化，同贛東北蘇區打通一氣，現已成立閩贛省。福建也擴大了清流，甯化，歸化，連城幾百里地方。遠一點，四川，陝西，以前沒有蘇維埃，去年紅軍第四方面軍去了，有十多縣建立起蘇維埃成立川陝省。湖南，湖北交界的湘鄂西蘇區，湖北，河南，安徽交界的鄂豫皖蘇區，也發展了些新的地方。即是離我們這裏幾千里路遠的東三省，如今在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底下，磐石已經有了革命委員會。

我們蘇維埃不但擴大了，而且比以前更強固。從中央政府成立後，把過去不明顯分清階級的錯誤糾正，把那些冒稱中農貧農的地主富農查出來，把混進蘇維埃，紅軍的壞分子洗刷出去，把地方蘇維埃政府徹底改造，更加使蘇維埃成爲羣衆話事辦事的機關，把劣紳地主富農的土地通通沒收，富農分壞田，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在雇農貧農中農手裏，貧農組織貧農團，很好的和中農聯合一起。工人得到勞動法的保護，工會完全是保護工人利益，領導工人向資本家鬥爭的機關。工會貧農團已經變成蘇維埃最重要的力量。工農羣衆爲本身的利益都堅決擁護蘇維埃。

我們看看兩年來國民黨的地方。國民黨把東北四個半省賣給日本帝國主義，其餘地方因爲國民黨只會剝削，不做地方建設工作，前年，去年今年不是大水災，就是旱災，因爲地主資本家拚命的向工人農民的剝削和壓迫，弄到很多工人沒有工做，農民沒有飯

吃，餓死的，凍死的，不知多少，所以許多地方的工人農民反對國民黨，工人常常罷工，農民不斷暴動，

國民黨的財政困難達到極點，只有加緊對老百姓剝削，各種苛捐雜稅，逼得老百姓活不來，死不去！國民黨內部衝突又沒有辦法解決，像四川，貴州時常發生軍閥同軍閥打仗。南京政府同廣東政府是各自為政，不能統一。各省軍閥又是你戰我奪，整年發生衝突。所以國民黨政權是破敗不堪，走向死路上去的，正像八十歲的老頭子，總是活不久的。

我們從上面的事實，可以清楚的看出來，中國現在是有兩個政府，一個是擴大鞏固，向前進的蘇維埃政府，一個是破敗不堪，走向死亡的國民黨政府。

## 二 蘇區工農羣衆生活的改善

從前祠堂裏，衙門裏都是只有土豪劣紳地主資本家有話事辦事的權，現在蘇維埃政府裏，工農羣衆有話事辦事的自由。從前土豪劣紳地主富農收租放債，現在工農羣衆分得了土地，把加三加四重利的債一概廢除，禁止收高利貸，土豪劣紳地主完全壓在我們的腳下。工人加了工資，實行了八小時工作，有了社會保險，同老板訂了合同，蘇維埃政府免除了工人的累進稅，工會與蘇維埃救濟失業工人，反對資本家打罵，待遇不好，

從前討老婆要錢，現在可以自由結婚，自由離婚，不准男子壓迫婦女，婦女得到了解放。

蘇維埃政府屢次領導群眾加緊春耕，夏耕，秋耕，開荒田，設糧食調劑局，辦合作社，辦學堂，辦俱樂部，這都是爲羣衆改善生活，使羣衆的出產加多，不受奸商富農從中剝削，使生產的東西如谷子，木頭，烟葉，茶油，錫砂賣出去，把現款與鹽，油，布從白區運進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

所以說，革命是把以前的壓迫剝削都推翻了，工農羣衆得到政權，現在蘇維埃政府極力設法使工農生活更加改好。

白區的工農羣衆生活，比我們蘇區的工農羣衆生活，完全相反。在國民黨的下面，只有豪紳地主資本家有自由，工農羣衆一點自由也沒有，不准開會，不准罷工，不准反對帝國主義。前年發大水，中國四萬萬人裏頭有一萬萬人做難民避水災，去年今年又是大水，總有幾千萬人又受水災。北方許多地方還有旱災，一年四季不能下種。這都是國民黨只管賣國，剝削老百姓，不管河道，堤壩的結果。

據現在我們曉得的，國民黨的苛捐雜稅，有一千六百七十八種，四川軍閥收錢糧已經收到一九七二年。豪紳地主的剝削更說不盡。資本家的剝削比以前厲害幾十倍，工資減少每日做工要做十三四點鐘，打罵虐待由他，工人痛苦已極，失業的工人總在二百萬

以上。所以在國民黨底下的工農群衆，唯一的出路，只有鬥爭。

據國民黨的報紙不完全的統計，罷工的工人前年（一九三一年）有七十七萬。去年（一九三二年）增加到一百二十四萬人。農民方面，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只有半年的光景，有九省二十五縣二十萬以上的農民進行抗租抗債，抗苛捐雜稅，搶糧，奪取武裝參加抗日的鬥爭。

這很明白，蘇維埃政權下面工農生活，是一天一天的好起來，國民黨底下的工農生活，是飢餓，失業，死亡。蘇維埃政權給工農羣衆以最大的自由，國民黨下面的工農沒有一點自由。所以只有蘇維埃是工農大家要走的大路。

### 三 紅軍不斷的強大不斷的勝利

從前紅軍很小現在紅軍比兩年以前大了十倍以上。因爲工農羣衆都認識了，只有蘇維埃革命勝利才能使工農羣衆得到完全的解放，才能保障已經得到的土地革命利益，所以工農羣衆大批大批的加入紅軍，爲蘇維埃政權鬥爭。工農紅軍在共產黨與中央政府正確領導之下，兩年裏頭，堅決執行進攻路線，打漳州，打贛州，打撫州，打四川，粉碎國民黨四次「圍剿」把廣東軍閥陳濟棠，福建軍閥蔡廷楷蔣光鼐，張貞，湖南軍閥何健，湖北軍閥何成濬，河南軍閥劉峙，四川軍閥田頌堯，特別是國民黨的大軍閥蔣介石，

打得落花流水，被紅軍消滅和打坍的總在八十師以上，被繳的槍總在十五萬左右，國民黨的軍隊沒有和紅軍打過仗的是很少了。單是今年上半年（從一月到五月）不完全的統計來看，全國紅軍打了一百三十二仗，消滅白軍四十四團，打坍白軍九十多團，繳步槍三萬一千四百多枝，機關槍，自動步槍一千多枝，活捉白軍三萬七千多，捉了白軍師長，旅長，團長二十多隻，打死兩隻師長，紅軍總百戰百勝，白軍總是一打就坍，因為紅軍戰士爲了自己的蘇維埃，白軍是被國民黨強迫來當砲灰，他們自己本來不願意打蘇維埃，打紅軍，蔣介石自己說白軍看見紅軍像人看見老虎一樣，講起紅軍就怕。很多白軍士兵打起仗來，有些把鎗口朝天，有些希望繳了槍發幾塊錢。十九路軍有四團人去抗日，大家威武得很，說開轉來打紅軍，就跑掉兩團多。北方的白軍有四騎兵團完全拖槍投紅軍，此外還有一連一排到紅軍來的很不少，這是證明國民黨統治底下的工農羣衆痛恨白軍，因爲白軍拉夫，強姦，搶劫。大家歡迎紅軍，因爲紅軍紀律好，領導羣衆打土豪分田地。很多地方的羣衆都說：「情願紅軍殺不願白軍紮」，都希望紅軍趕快打了去。

（摘錄蘇區中央局宣傳材料）

## 查田運動的羣衆工作

毛澤東

查田運動是一個劇烈的殘酷的階級鬥爭，必須發動最廣大羣衆熱烈起來參加鬥爭形

成羣衆運動，才能保障階級路線的正確執行，才能達到消滅封建殘餘勢力的目的。一切脫離羣衆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工作方式，是查田運動最大的敵人，查田運動的羣衆工作，主要是講階級，通過階級，沒收分配，及對工會貧農團的正確領導等。

### 一 講階級（做宣傳）

一、查田運動的策略：是以工人爲領導，依靠貧農，聯合中農，去削弱富農，消滅地主，宣傳的內容：就是要向群衆很清楚的說明這個策略。

二、爲了說明這個策略起見，要將什麼是地主，什麼是富農，什麼是中農，什麼是貧農，什麼是工人說清楚，在這個說明中證明地主是封建剝削者，富農是半封建剝削者，因此只有採取消滅地主，削弱富農的政策，才能使土地革命的利益完全落到中農貧農工人身上。

三、但是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份當做地主待遇。

四、對中農的策略——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係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覆向群衆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的絕對不許可的

。爲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利益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他，要着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要揭破地主富農對於中農的欺騙，使中農脫離地主富農的影響，團結在貧農周圍，一致向地主作鬥爭。

五、要揭破地主富農的每一欺騙口號，向羣衆作廣泛的解釋。要注意地主富農利用民族的地方的落後觀念，來對中農貧農進行欺騙破壞。

六、要說明查田運動是粉碎敵人圍剿的武器。因爲把封建殘餘勢力肅清了。去掉了敵人藏在蘇區的搗亂者；廣大羣衆革命熱忱提高了，擴大紅軍，經濟建設等項工作就更加好做。

七、要按照當地環境提出具體口號。如在落後的村子，要找出落後的原因，提出發動羣衆的具體口號。比如該地有反動地主威脅羣衆，因此羣衆不敢積極起來鬥爭，必須提出捉起這個地主的口號，又如當地政府人員犯了脫離羣衆的嚴重錯誤，使得羣衆不滿意，就要從揭發這些人員的錯誤着手宣傳，以發動羣衆鬥爭。

八、以上均是宣傳的內容，以下再說宣傳的方式。查田宣傳的對象，第一要回鄉一級幹部份子（鄉蘇代表各羣衆團體負責人）講話，使他們首先明瞭，經過他們去宣傳羣衆。第二要在工會與貧農團會議上講話，使會員羣衆明瞭。第三要在村子羣衆大會上講話，使每一個羣衆都明瞭。

九、宣傳員。主要由鄉一級積極幹部份子擔當，有佈置的出席羣衆會議上去講話。其次是組織宣傳隊，經過訓練後派往羣衆中去講話。

十、宣傳的方法，第一白頭講話，第二貼佈告，第三寫標語，第四出傳單，第五演新劇，第六牆報上做文章等等。

## 二 查階級

一、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羣衆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二、查階級是查地主富農階級，查剝削者，查他們穩藏在農民中間而實在不是農民的人，查這些少數人。決不是查中農貧農工人的階級，因此不得挨家挨戶去查，挨家挨戶去查要引起羣衆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三、查階級之前，一定要經過宣傳的階段。即講階級的階段。不經過公開的普遍的講階級就動手去查，要引起羣衆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四、查階級要發動工會貧農團的會員及其他羣衆多數人去查，要羣衆查了隨時報告貧農團與查田委員會。不應該只是少數人去查，少數人去查要引起羣衆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五、查階級要查明白。不論是一個地主，一個富農，要把他們過去的剝削情形和生  
活情形查得明明白白，才能使本人服罪，使群眾滿意，如只查了大概就下斷語，那就容  
易弄錯，本人不服，羣衆不滿意，就阻礙了查田運動，對那些中農的成份，更要仔細查  
清了不使中農弄成富農，富農弄成地主。

六、一家階級查出來的材料，要填在一張「階級成份調查表」上，使大家好評論，  
日後好根究。如祇講在口裏記在心上，或只是在簿上寫兩三行，易得遺失，是不好的。

### 三 通過階級

一、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份，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故要十分謹慎。一  
定要是查清楚了才能提出去通過。

二、通過的次序：首先是貧農團，要開貧農團大會。經過大家討論，大多數人舉手  
贊成，才算在貧農團通過了。如有疑問的，移到下次討論，此次不要通過。

三、第二是鄉查田委員會，對於貧農團的意見加以審查，對的通過。不對的，改正  
，懷疑的，再調查。

四、第三是區土地部，區土地部決定不下的，提出於區查田委員會。區查田委員會  
決定不下的，提出交縣土地部。

五、第四是村子羣衆會。一定要在本人村子裏召集羣衆大會，向羣衆報告本人的剝削情形與生活情形，看羣衆贊成不贊成；贊成的通過。不贊成的再去調查，決不可硬要通過。如果硬要通過，就會引起羣衆不滿。這就是命令主義，要堅決反對的。

六、以上通過階級的四個步驟必不可少。特別是羣衆會通過，更加重要，許多地方，不經過羣衆通過就去沒收，是錯誤的。

七、如果過去有通過錯了的，如把中農當富農，富農當地主，地主當富農，應該，推翻原案。要在羣衆大會上說明過去錯誤了，現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羣衆的滿意。

八、過去弄錯了現在翻過來的，如是中農一定要賠他的土地財產，即使田已分了，也要抽出賠他。如是富農，現在有賠則賠，如果實在沒有賠，祇好將來替他別種方法。這種賠還，最能爭取羣衆。如果將錯就錯，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對的。

#### 四 沒收分配

一、沒收地主土地財產，沒收富農土地及多餘的耕牛農具房屋，只有經過村子羣衆大會得到羣衆的同意後，才能實行。決不可不得羣衆同意就去沒收，決不可黑夜去沒收。

二、沒收了地主的財產，除開現款及寶貴物件交政府財政部外，其他一切東西，都

應分發羣衆，這是提高羣衆鬥爭熱情的好方法。

三、趁着開村子羣衆會通過階級的時候，舉出臨時的沒收分配委員會，即刻沒收，當場分配，不得遲延沒收，不得遲延分配，不得把東西挑到政府裏去再講分配。

四、要分配給本村子，不可全鄉平攤（大地主不在此例）。

五、首先要分配給紅軍家屬，雇農，工人，及其他羣衆的貧苦者，不可不分階層同等分配。

六、豬雞等物，煮起來在群衆大會上使大家吃，不可工作人員少數人吃。

七、政府工作人員最好不要要求分東西，以作模範。如果十分缺少用物，要取得羣衆的同意在羣衆大會上通過。要防止工作人員自由拿東西。

八、沒收的耕牛及重要農具，在群衆同意下，由分得的人組織犁牛合作社，共同使用。

九、沒收來的土地，遲延不分是不對的，除開留出紅軍公田及公共事業田外，要迅速分配。首先分給過去那些未分田及少分田的人。再有多時，以村爲單位大家平分。山林，魚塘，房屋，茅廁，同樣要迅速分配給羣衆。

十、在每次分配東西羣衆鬥爭熱忱最高漲時，要適時的提出擴大紅軍，發展合作社等口號領導羣衆熱烈參加革命戰爭，熱烈參加蘇維埃建設。

## 五 工會貧農團

一、所有講階級，查階級，通過階級，沒收分配等許多工作，都只有動員工會動員貧農團才能收得最大的效果。工會應成爲農村階級鬥爭的領導者，貧農團是農村階級鬥爭的柱石。

二、正確的開展查田運動，依靠於工會指導自己的會員加入貧農團，在貧農團內部起積極的作用。

三、要發展貧農團，使貧農團成爲廣大貧農羣衆自由加入的團體。

四、要洗刷貧農團中暗藏的壞分子。

五、貧農團在查田運動中要勤快開會，要抓緊查田運動爲自己的中心工作。

六、要團結中農在貧農團的周圍，貧農團的會議，應該吸引中農來旁聽。

七、工會貧農團領導查田鬥爭工作，不能違背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則。

只有依照上面所述的策略與方法，來動員廣大羣衆，才能使查田運動得到完滿的成績。一切不做宣傳，或宣傳不正確，不認真，不普遍；查階級，通過階級與沒收分配，不按階級路線與羣衆路線，不得羣衆贊助與同意；都不能使查田運動收到成績，反會使羣衆不滿，阻礙查田運動的進行。因此反對查田運動中的侵犯中農消滅富農的左傾機會主義，反對包庇地主富農右傾的機會主義，反對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與工作方法，是正

確開展查田運動的必要條件。

——(完)——

## 爲新區邊區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轉

### 變而鬥爭

羅 邁

中央局二月八日決議着重的提出了鞏固新區邊區的任務，並責成江西福建兩省委對中央局負完全的責任。

這個決議是在衝破四次「圍剿」的決戰當中和開始反羅明路線鬥爭時寫的。

自從中央局領導着江西福建的黨開展反羅明路線鬥爭以來，中央蘇區黨的工作有了極大的轉變。但是新區和邊區工作的嚴重，沒有減輕，江西福建的省委也直到最近才開始在了解新區邊區的落後現象和牠的嚴重性，省委在這一方面是值得執行自我批評的。

在準備力量爭取勝利的衝破五次「圍剿」的前面，擺着克服新區邊區落後的戰鬥任務。我們必須了解，如果沒有羅明路線，衝破四次「圍剿」的勝利會更加廣大，如果我們能迅速地鞏固新的陣地，我們英勇的紅軍將能自由地擺佈敵人。廣東軍閥所以能夠輕易地挺進安遠尋鄔，誇口「安然無事」，以及某些邊境的區委區蘇時常被團匪整個的包

圍與捕獲，事前一點消息不知道，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我們在這些區域裏的工作的落後，克服邊區新區工作的落後，爭取新區邊區工作的布爾塞維克的轉變，應當成爲衝破五次「圍剿」中的戰鬥的口號。

這裏不來羅列一切落後的現象，而只集中討論到幾個基本問題。

### 一 要執行明確的階級路線去爭取群眾

無論在建黎秦，甯清歸樂，宜崇，會尋安以至石城等縣的邊區新區，羣衆的階級鬥爭一般地沒有開展起來，黨和蘇維埃機關不僅沒有堅決地執行階級路線，而且時常發生非階級路線的事實。因爲階級爭鬥沒有開展，所以戰爭的動員如擴大紅軍，籌款和借谷子等，常落在中心區域的後面。過去羅明路線的領袖們不了解「只有羣衆動員的深入，只有澈底的實行土地法與勞動法等以改善民衆的生活，來發展廣大工農羣衆極積性，才能保障這些任務（指戰爭動員的諸任務——作者）的完全實現，」（中局二月八日決議）却大罵新區邊區羣衆悲觀失望，說戰爭動員的一切工作特別是擴大紅軍，在新區邊區沒有辦法。在新區邊區的黨裏面，這種機會主義的觀點並沒有肅清。

關於最基本的土地問題，就常常遇到非階級路線——地主富農路線的擁護者：建黎秦的土地是按照「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分的。崇仁分田除兩抽兩補的辦法外，還

加上「原耕不動」的原則，那裏土地主要部份是產竹木的山場，並且大部在地主手裏，但沒有沒收，房屋都沒有分。宜黃八個新區完全沒有開始沒收分配。革命委員會剛在開始「文明」的調查，甯化的泉上一帶，不分青苗只分谷子，耕者得六分者得四，同樣對於出息比田更多的山地不分。在安遠曾經有分兩等田的辦法，會昌最近查田運動查出來，也有主張不分青苗，只分谷子，留待明年再徹底分配的，很明顯的，由於上述各種各式的非階級路線，新區邊區數十萬以至百萬的工人和基本農民羣衆，還沒有完全得着土地革命的果實，他們的積極性還沒有達到應有的發揚。黨在這些區域，不只在政治上要堅決剷除這些機會主義，執行明確的階級路線，並且在領導方式上要堅決反對那種官僚主義的調查（如宜黃），採取羣衆的路線，即平民式地自下發動當地羣衆自動手地來進行沒收和分配工作。這樣才能把新區邊區廣大的農民羣衆爭取爲蘇維埃和革命戰爭的擁護者。

與土地問題同樣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組織工人鬥爭的問題，所有新區和邊區，不是完全沒有動手組織工人，如現在的宜崇和清寧歸的一部份，就是形式上組織了少數工人，實際沒有實行勞動法，工人經濟鬭爭沒有發動。如果在中心區域曾經發生經濟鬥爭中「左」的傾向，那麼一部分邊區新區還沒有夢想過工人經濟鬥爭，如果蘇區工會的領導機關在最近一時期對於保護工人利益有過某種程度的忽視，那麼在大部份新區和邊區

，保護工人利益的事業是完全被忘記了。這自然使工人階級的積極性和領導作用無從表現出來。反對新區邊區工人運動的取消主義，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在轉變邊區新區工作上要成爲戰鬥的口號。

爭取羣衆中另一個嚴重錯誤。同樣是非階級路線的錯誤。就是所謂「亂打土豪」以及「反水羣衆」一名詞之下把一部份羣衆送給敵人。

本來游擊隊和地方武裝的遊擊，要成爲蘇維埃種子的散播者和土地革命的組織者，可是有許多遊擊隊伍起了相反的作用，打土豪打在貧苦羣衆身上，在蘇區與白區一部份羣衆之間，造成赤白對立的城垣。在敵人挺進邊區我們不得不暫時退却的時候，常常有部份羣衆沒有跟着退到蘇區，這些羣衆在敵人來後受到壓迫摧殘和欺騙，我們正好繼續組織他們爲恢復蘇區的鬥爭，可是我們的地方黨部認爲是「反水羣衆」而歧視他們，還有一種甚至連個別負責同志也沒有認清楚的，就是把同着敵軍退走的羣衆無差別的看作「反水羣衆」。最近清連歸的勝利，邊境羣衆大部份跑光了，敵軍用「大紅軍好，土共來了連掃帚都要過刀」的話威嚇羣衆，無疑義的，閩西一部份羣衆的跑走，主要的因素是由於上面這些錯誤所種的惡果，閩西的黨經過這次苦的教訓之後，應該澈底檢查過去工作中的錯誤，堅決打擊把現在跑到白區去的成千成萬羣衆看作「反水」的觀念，迅速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去爭取他們回來，特別在沒收分配土地的時候，要作出實際的例子



去說服他們回來。閩西的教訓，同樣教訓了其他邊區新區的黨，使牠們警覺到，由於上述的錯誤，我們將遭受何種的不幸與困難！

所以澈底實行土地法，用平民式的手段解決土地問題，立即組織工人經濟鬥爭和工會，實行勞動法，糾正『亂打土豪』和『反水羣衆』的錯誤觀念，執行明確的階級路線去爭取新區邊區和隣近白區的羣衆，是鞏固新區邊區的基本任務。

## 二 要用暴力和羣衆的革命手段肅清反革命

在紅軍勝利中開闢的蘇區，一般地推翻了反革命統治，但祇是推翻了，還沒有肅清，不少的反革命份子趁着革命政權還沒有鞏固，時時刻刻團聚自己的力量，企圖推翻革命政權，在邊區，因與敵軍鄰近，不只每日每時有被敵軍進襲的危險，而敵軍在沒有進攻的時候，即已用盡一切力量與蘇區反革命份子勾結，企圖造成裏應外合的條件，一舉推翻我們，當然在國內戰爭時代，這種危險到處存在着，但邊區新區更是數倍的嚴重，我們新區邊區的黨常常忽略了或忘記了環境的嚴重，例如沒有嚴密的步哨，成了很普遍的現象，在宜崇連肅反委員會都沒有，對敵人的警戒和防禦，是異常鬆懈的，反革命份子和敵探常常可以自由出入。龍佈，小岔和最近的高田事件，都是團匪與蘇區反革命份子勾結佈置得很好，但我們連做夢都沒有想到。

我們在新區邊區工作的同志，沒有了解反革命被推翻以後，要更殘酷的掙紮和反抗，沒有了解專政是階級鬥爭在新的形式下的繼續。沒有了解放鬆反革命，實際是對反革命仁慈，對反革命仁慈便是對革命殘酷，我們必須用大力反對新區邊區黨裏面對反革命「仁慈」的傾向，新區邊區在初期還是革命委員會的政權，革命委員會最大任務之一，便是要以暴力鎮壓反革命，「堅決的肅清反革命陰謀，澈底的掃除統治階級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力。」（六次大會）當革命委員會成立之日，就要組織肅反委員會，就要最嚴密地實行赤色戒嚴，就要對以前的統治階級實行嚴格的檢舉。

在新區邊區工作的幹部還沒有了解，在他們那裏要更廣泛地採用羣衆的革命的手段來處置反革命。他們常常機械地遵守法律，例如宜黃捉了一個敵探要送到樂安縣政府去處置，我們對反革命採取暴力，是倚靠在革命的勞苦羣衆身上的，而不是倚靠幾個工作人員的專斷。尤其是在那些新區，革命前沒有我們的基礎，領導的幹部都是外面派去的，更加只有倚靠羣衆，發動羣衆起來參加肅反，才能有效，羣衆發動得愈寬廣，愈能鎮壓一切反革命的企圖，同時也只有對反革命愈採取無情的壓迫，才能更廣大的發動羣衆，對於顯然的反革命份子特別是羣衆共恨的反革命首領，必須由羣衆大會公開審判，由羣衆處決，而不要機械的經過合法的手續。

肅反工作與農民的土地鬥爭和工人的經濟鬥爭是不可分離的，而且澈底地解決土地

問題與實行勞動法的鬥爭正能摧毀反革命活動的基礎，強大鎮壓反革命的力量，革命委員會必須堅決領導工農群眾的階級鬥爭和肅清反革命的鬥爭，才能團結廣大羣衆在自己的周圍，遂行自己的決議和命令，很快的轉變成正式的蘇維埃政權。

最近幾個月中新發展的區域，如宜黃如福建，革命委員會還沒有普遍的建立，有些革命委員會存在着幾個月甚至一年，但是沒有羣衆的基礎，不能變成蘇維埃，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革委沒有執行右述的任務。

### 三 要最大限度的武裝工農羣衆，創造堅強的遊擊隊

在二次戰役的時候，紅軍主要的戰略是游擊戰爭，沒有一定的後方，紅軍部隊還很小，那時地方的赤少隊和遊擊隊起了英勇的積極的作用。在四次戰爭中紅軍擴大了，紅軍的戰略改變了，於是倚賴大紅軍的心理生長了，『廣泛的發展游擊戰爭配合紅軍主力作戰，是非常的不夠。』這種現象自然最厲害的表現在新區和邊區。依據於環境的需要，新區邊區的赤少隊應該表現出高度的積極性，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四次戰役中擴大的蘇區，赤少隊沒有建立起來，比較老的邊區和新區，赤少隊大部份表現出完全沒有自衛的能力，調動着去配合紅軍作戰，則開小差逃跑。所以在新區和邊區要在『武裝保護蘇維埃』的口號之下，應用最大的努力把廣大工農羣衆武裝起來，進行充分的軍事政治訓

練，創造模範赤少隊，在蘇區的周圍去襲擊敵人，配合紅軍作戰。

說到游擊隊的情形，（除開紅軍直接組織領導的）更是非常之壞的，只有極少的游擊隊（如尋南游擊隊新淦游擊隊等）比較健全，大部份的情形是這樣：（一）游擊隊不僅極少擴大，相反的却是日漸縮小；（如過去的會尋安與現在的宜崇南豐等）；（二）時常發生開小差和拖槍反水；（三）不敢出擊，伸出即縮回；（四）出擊時「亂打土豪」，沒收不分給羣衆；（五）階級異己份子混入在隊伍中，甚至擔任領導工作；（六）不少貪污腐化的現象。因此，有些游擊隊表現土匪主義的傾向，過去的招信游擊隊，完全與土匪無異，並且是公開危害蘇維埃的土匪，上述的情形不僅在游擊隊，獨立營也有發生這種現象的，例如石城獨立營共四連，石城縣委來信說：「獨立營經常土匪行動，不聽命令，經常非階級路線，侵犯中農利益，打地主打富農甚至打中農，現在開口沒有伙食，不去出擊，走到中心區來籌款，並且獨立營裏有小部份地主富農混入隊伍。此外邊區幾個游擊隊同樣不受指揮調遣」。

中央七月二十四日決議指出在衝破五次「圍剿」的決戰中，必須以極大的注意來開展蘇區周圍以及敵人後方的游擊戰爭。這一任務首先落在新區邊區黨的肩上。現在在游擊隊方面最緊急的任務就是要進行澈底的檢舉運動，洗刷階級異己份子，撤換貪污腐化份子，與動搖份子作堅決的鬥爭，輸送最好的黨員和幹部到游擊隊去，「必須保證游擊

隊中堅強的軍事與政治的領導，必須與游擊隊中脫離及違背黨和蘇維埃政策的舉動作無情的鬥爭。」（中央七月二十四日決議）

#### 四 要開展反機會主義的鬥爭和鞏固黨的鐵的紀律

新區邊區大部份曾經遭受過羅明路線的領導，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沒有在那裏真正開展，甚至在部份地方還會經過着機會主義者的抵抗（明顯的例子如閩贛省委成立前的建黎泰），這是這些區域的工作沒有能夠真正轉變的主要原因。閩贛省委在它成立以後，首先打退了余潭鴻同志等的反抗，揭發黎川等地的羅明路線的實質，現在的工作是在轉變中，那裏的轉變是很艱苦的，因為沒有相當的好的幹部和黨的基礎，會尋安在三縣積極份子會議後直到三縣黨代表會議前只有微弱的部分的轉變，最主要的原因是三縣黨的主要領導者對江西總結會議上正確開展了的反羅明路線鬥爭採取了旁觀態度。江西省總結會議後在江西個別的邊區是有了相當的轉變的，如永豐的黨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但大部份新區邊區如宜樂崇，如石城是顯然沒有轉變的。江西省委的領導在總結會議後是有了大大的轉變。可是對於邊區新區所用的力量仍然弱，這由於它曾經認為「新區邊區工作在紅五月中給了總結會議以相當的回答」的原故，這種估計否認了新區邊區深入地開展反羅明路線的必要，例如宜黃縣委宣傳部長「新區羣衆不要蘇維埃」，「八個新

區是白區」以及崇仁書記「國民黨沒壓迫，羣衆在革命後沒錢用沒飯吃」等類等於反宣傳的機會主義糊說，沒有得到省委的及時發覺和打擊，樂安中心縣委和石城縣委主要負責者的機會主義（不止機會主義！）同樣沒有遭受及時的打擊，福建省在臨時代表會議以後在杭永一帶的工作有些轉變的，但在寧化一帶的嚴重情狀直到最近才給了更大的注意。

有些同志說，「我們那裏開展了反羅明路線啊！」對的，他們時常高喊着反對羅明路線，每個會議每個文件都喊着寫着，可是祇是念阿彌陀佛式的空洞的喊着，沒有具體地聯繫到個別工作和個別同志的傾向去開展鬥爭，因此儘管喊得起勁的人。自己還在或多或少的執行羅明路線，這樣反羅明路線的英雄，我們遇着不少，可是阻礙着反羅明路線鬥爭的恰恰是這些英雄們！

與反機會主義鬥爭密切不能分離的一個問題，便是黨的紀律問題。關於蘇區黨的紀律，共產國際會這樣指示我們：

「正在進行着的國內革命戰爭的環境，需要黨在蘇維埃區域實行軍事紀律。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工作的同志對於上級機關指示的執行以及與居民羣衆的相互關係。都要特別嚴格的負責，對於游擊隊和紅軍中的黨更特別重要，黨員領導的隊伍。應當注意到使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革命紀律和對革命事業澈底忠實的模範，關於這一點，必須向黨

員和同情者進行解釋工作，並且在事實上實行爲反對蘇維埃法律的罪過之每個黨員的最嚴厲的個人負責辦法，黨員比非黨的工農更要嚴格的負責。」

大部份新區邊區的黨的紀律離開國際這個指示是很遠的，在那些區域，我們遇到不少作領導工作的同志對上級機關的指示不嚴格負責以至故意違反的，許多在遊擊隊中和作地方工作的同志違反黨和蘇維埃的政策，甚至破壞蘇維埃的法律，貪污腐化，打土豪歸私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在反羅明路線和一切機會主義的鬥爭不深入的地方，這種現象特別厲害，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受着極大的損害，黨與羣衆的關係也因此隔離，黎川，招信，烏鵬泊，宜樂崇和石城的一部份便是標準的例子。

所以新區邊區的黨首先重要的是堅決地具體地開展反羅明路線和一切機會主義傾向的鬥爭以保障黨的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執行，鞏固黨的鐵的紀律，肅清那些安心破壞革命紀律的份子，保障我們的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是革命紀律和對革命事業澈底忠實的模範。」

在堅決進行反機會主義鬥爭與鞏固鐵的紀律時，必須顧到新區邊區黨的組織與中心區域比較要年幼得多，經驗少得多，就是從中心區域調赴新區工作的幹部。也並不都是黨齡較老的幹部，因此在批評某個同志特別是年齡幼稚和少經驗的同志們的錯誤時，要多有忍耐心地去說服和解釋，防止任何懲辦主義的傾向的發生。

## 五 領導機關的視線要注意到新區邊區徵調最好的力量到新區邊區。

中央局二月八日決議着重地提出了轉變新區邊區工作的任務以後，不僅省委，同時蘇維埃，工會，少共和軍區的領導機關都沒有能夠及時的注意到檢查新區邊區工作，改造和加強邊區的領導，直到最近新區邊區的問題才在工會和政府方面被重視。這不能不是新區邊區工作轉變遲緩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切領導機關的眼光應該隨着革命戰爭的開展而轉變，用最大的注意去爭取新區邊區的鞏固。

要轉變新區邊區的工作，首先最重要的是在那些區域建立健全的領導機關。現在大部份新區是從紅軍勝利中取得的，每每要我們第一次在這些區域建立黨的工作，和革命的羣衆工作，同時敵人在退却以後時時企圖反攻，被打翻了的統治階級用十倍的力量企圖復辟，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中從事一切的開創工作，如果沒有健全的領導是不可能的。這種組織任務在新區邊區特別是新區是無力解決的，在第一個時期，只有倚靠中心區域的黨，團，工會，政府和軍區徵調最好的力量去建立黨，蘇維埃和羣衆組織的領導，才能迅速地鞏固新的勝利。但是過去怎樣呢？如前面說過的，從黨，工會，團，政府和軍區同時並舉地徵調力量到新區邊區的事情是沒有過的，而部份的領導機關（例如省委）徵調幹部到新區邊區，又不是選擇最好的力量，更不是有計劃的，一般是臨時發通知，（省委給縣，縣委給區，區給支部）區委和支部常常把質量不好的同志送給縣委省委，



縣委省委無考察地送到新區。今年夏天曾發生調九十六人到南廣，九十三人開了小差，以及工作團小包袱變成大包袱，大包袱變成擔子的現象，這給了我們何等苦的教訓！一切過去的教訓給我們證明，如果把不好的幹部送到新區邊區去不但不能鞏固新的勝利，反妨害了和阻礙了黨爭取羣衆的工作，甚至給敵人以武斷宣傳的口實：「大紅軍好，土共來了，掃帚必要過刀」。這樣徵調幹部的錯誤路線應立刻給以糾正。

除此，在對於惡劣幹部的撤換，也常常發生簡單的調回的辦法，不在工作地發動黨內鬥爭以教育年幼的黨，調來調去只是上級機關知道，當地黨員莫明其妙。因此對於工作的轉變沒有重大的影響，這種辦法同樣是不正確的。

現在在黨，工會，團，政府和軍區的前面，提出了最迫切的組織任務：徵調最好的力量到新區邊區去，不讓一個壞的份子到新區邊區！對於新區邊區縣區兩級和地方武裝的領導幹部要重新審查給以改造。此外要組織百數突擊隊——分配土地的，查田的，工會的，赤少隊的，婦女的，貧農團，以至擴大紅軍等的突擊隊，有計劃有配合的到新區邊區突擊，突擊運動的主要方向從中心區與模範區移向新區邊區落後區去，中央一級的領導機關要幫助省委最迅速的實現上述組織任務。當然在這裏要預防一種傾向的發生，就是新區邊區的黨忘記或忽略自己的根本任務，就是最高限度發展黨的組織與培養本地幹部的戰鬥任務，從中心區派去的工作同志必須了解自己的責任也就是在那裏去完成上

述的任務，這同樣的真理對於少共，工會，蘇維埃也是適用的。

我們要預見到革命戰爭的開展，準備着隨時可以派遣的幹部去鞏固新的領土。並且在一個新的領土爭得時，立即要在當地建立一個在黨領導之下的臨時革命委員會，集中指揮一切工作，這個機關可由省一級的代表團或縣一級的代表團（包括軍區的或紅軍政治部的代表）充當。這種組織在過渡時候是絕對必要的。

『發展蘇維埃的根據地，奪取新的區域，鞏固新的區域，這種區域是要成爲更大的發展的基礎的』。（六次大會）

八月十二日

## 『……是劉湘統一四川，還是紅軍來 建立四川蘇維埃？』

懷 冰

目前的四川是正處在革命與戰爭的火燄中，革命與反革命的決戰正在殘酷的進行，兩個政權尖銳的對立，便是目前四川政治形勢的主要內容！

### 一 工農兵生活的痛苦及其英勇的鬥爭

在整個國民經濟的總崩潰中，四川當然亦不能逃出這一浩劫的魔掌，特別是由於帝

國主義在華勢力的衝突，在軍閥背後的指使和操縱以及封建勢力的割據所造成的中國特產的軍閥混戰，在四川更是最多次的表演着，近二十年來，軍閥混戰已達到四百七十七次，在這樣持久的連年混戰中，一切都為戰爭所摧毀，資本的進攻，在四川是加倍的厲行着，資本家企圖將一切經濟恐慌與戰爭中所受的損害全部由工人身上取回，工資是普遍的太大減少，而且常常拖欠不發，工時是延長了（甚至延長到十七八小時），此外開除工人，縮小生產，關廠，大批的工人被拋到街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都失業了，在業的工人亦是處半失業的狀態中，工人生活的水平已降低到飢餓的線上。政治上的壓迫，嚴厲的白色恐怖更剝奪了工人一切的自由。

農村經濟的破產更是達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不斷的混戰在戰區是赤地千里，廬舍為墟，去年廬城變為焦土，今年新津又完全毀於炮火，在戰區內的農民失去了土地，無法耕種，而非戰區的農民為逃避軍閥的拉夫，多藏於深山中不敢回家，大部份的土地任其荒蕪了。而且一切戰爭的用費都山羣衆身上榨取，成都田賦已徵至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大公報載），而他處更預徵至八十五年（七月三日時事新報通訊），並且有一年徵收十餘次者（見十月七日大公報載川各界致南京政府電）甚至在軍閥地盤轉換的時候，後來的還要將已徵的不算數而重新徵收，而徵稅之重，更是駭人聽聞，如奉節縣（即夔州）正稅一元六角而附加稅反多至十二元二角八分，此外苛捐雜稅的繁多在全國也佔了

首位，如劉文輝兩千餘萬的『國防捐』，劉湘五百萬元『臨時軍費』及最近四百萬所謂『剿赤』軍費，以及藉東北事變而勒派之『抗日捐』，『救濟東北捐』，『革命費』，『勸赤捐』等不下十數種。農民盡一切所有尙不足繳納捐稅，祇有高利向地主借貸，以飽軍閥的貪慾。這樣地主豪紳一隻手被軍閥委任徵收捐稅，而另一隻手則以高利貸的剝削借貸給農民以完稅。農民在這雙重的殘酷剝削與壓榨下，已到了血竭脂枯，榨無可榨的程度，而且在戰爭期間和戰區以內人民的生命財產都由軍官一道命令沒收爲軍隊所有，生命則用爲運輸和軍隊之補充，米穀金錢則由軍隊任意處置，更有所謂『封倉』，即將民衆的谷倉用紙條一封，這便屬於軍隊了，如有藏匿壯丁或米穀，則以軍法從事。更採取搶劫夫役和新兵的辦法，派軍隊至非戰區，趁小鎮趕集之日，實行突然的包圍，將壯丁捉出，強迫入伍，或深夜到旅館或人家包圍捉獲。從戰區逃出成千成萬的災民難民，被統治者藉口防意外統統關起來，每日僅發米一合，失去了一切心身的自由。四川的羣衆是處在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狀態，在人間的地獄中輾轉呻吟。

士兵生活的痛苦更非筆墨所能描畫，普遍欠餉半年，號稱軍費充足的劉湘部隊也欠餉三月，士兵衣不蔽體，食不得飽，且時時有作砲灰的危險，而在連年不斷的混戰中，士兵的疲憊和死亡，是可想而知。僅去年筍子山一役，兩日闔死傷七八千，成都城內十日之戰，死士兵三萬，人民七千，成都皇城中心屍首堆積如山，火焚全城二分之一。劉

文輝敢死隊五十連（每連一百四十人，共七千人）生還者寥寥無幾。在四川大小城鎮中，到處可以看到無數折手斷足的傷兵。全省人口由七千萬銳減到五千萬，而且都成了半生不死與在重重壓迫下。

綜合以上的事實，便解答了目前四川羣衆鬥爭的特別高漲與開展，羣衆對軍閥戰爭的厭惡，對軍閥的痛恨已到了誓不兩立的地步，帝國主義的侵略，軍閥混戰的屠殺，繁重的苛捐雜稅的掠劫，地主資本家的榨取，以及國民黨軍閥所造成的災荒，這一切都成了驅使工農士兵羣衆走向革命道路的動力，紅軍的勝利與蘇區的發展，更給予羣衆以絕大的勇氣與決心，由抗捐抗稅的鬥爭而發展到武裝戰鬥的形式，由打毀稅局，焚燒廢冊，網綁收稅委員等而進到組織十餘縣的抗捐軍與軍隊抵抗，川滇邊峨馬新蘇區的創立，各地農民遊擊隊的發展，田頌堯，劉文輝部士兵大批的譁變投入紅軍與抗捐軍，鄧錫侯部士兵自動張貼發動二次兵變的標語，二十一軍模範師的士兵公開在華西壩張貼反帝標語，質問官長「爲什麼不去打日本而專門打內戰」，以及紅五月間成都兵工廠工人大小七次鬥爭終於發展到全體罷工衝出廠門的更高形式，八月間，火柴廠的工人由攏籤房的怠工而發展全廠的鬥爭，水電工人要求發薪而實行罷工出廠，兵工廠停工後，數百工人向工頭要求發清欠餉的鬥爭，反對田頌堯拉夫的鬥爭，數百羣衆驅走下鄉拉夫的三十名武裝公安隊。南區數百婦女羣衆包圍強收「勸赤」捐的團總及收款委員，并用錐子鑽圖

總，趕走收稅委員，順，內抗債抗捐稅分糧殺豪紳的鬥爭亦在風起雲湧着。這一切都說明了四川羣衆鬥爭的極度開展，與革命形勢的存在，而蘇維埃紅軍更推動了這一廣大革命運動的向前發展。

## 二 川陝蘇區的發展與紅軍的偉大勝利

在這一極端順利的客觀形勢之下，生長而且強大了四川的蘇維埃運動，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推動了羣衆鬥爭的前進，而羣衆鬥爭的開展却又造成了蘇維埃運動順利發展的形勢。這二者是絕不能分離而且相互影響着將川陝的革命運動推向更高的階段。目前四川蘇維埃運動已奠定了中國西北革命運動前進和發展的強固基礎，牠是這一革命運動中的槓杆，牠已成爲團結一切革命勢力的旗子！

英勇的紅四軍，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依據着紅軍的英勇善戰，及廣大羣衆熱烈擁護和積極幫助，在不到一年的短期中，紅軍由萬人左右而驟增至十餘萬人，由通，南，巴三縣而發展到包括二十餘縣的一大片蘇區，計完全赤化的（即縣城在內的）有通江，南江，巴中，營山，渠縣，綏定，宣漢，開縣，萬源，城口，梓潼，蒼溪，鎮巴，西鄉，甯羌（以上三縣在陝西境內）十五縣，此外廣元，昭化，閬中，南部，南充，蓬安，岳池，廣安，開江，漢中，固城等十餘縣除縣城外大部分亦均爲赤色的版圖。紅軍首先

擊潰了田老鼠（田頌堯），繼又打敗了楊森，最近更消滅了劉存厚部，所得的戰利品已多至不可勝數，僅田，楊，劉三部贈送紅軍的槍枝已不下十萬，最近綏定一役，紅軍即得槍二萬，子彈千餘萬發，現款百萬，修械廠全部。現紅軍更乘勝前進分三路進攻，一部沿昭，廣，蒼，保之線向田頌堯殘部攻擊，一部在宣，綏，開江之間與劉湘部對峙，以嚮應大江南岸之賀龍部紅軍，另一部則北出城口向陝南發展（見二十五日申報）。

我紅二軍團賀龍部，亦由利川而進入川東之會陽，秀山，彭水，黔江，石柱一帶，黔江縣城且為紅軍所佔領（據大美晚報載），備受各地羣衆之熱烈歡迎和贊助。現紅軍一路由石柱方面前進，另一路則經安坪向雲陽，奉節（夔州）進攻，威脅着劉湘的後路。這兩部紅軍的行動，隔江相呼應，更造成了目前時時可截斷長江，扼鎖下東口的形勢，而且夔州，鄂都亦發現了紅軍游擊隊在積極活動（大美晚報載），使萬縣，重慶間的形勢更現緊張了。

正是由於紅軍的偉大勝利，給予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以莫大的威嚇，使四川魔王的劉湘馬上結束了軍閥混戰，以全力分六路大軍向蘇區紅軍進攻，並以陳師及唐式遵部嚴防賀龍部，最近因形勢的緊張，又增派一旅前往，而劄子蔣介石更派楊德源，陳醒亞等七人爲川省「勦匪」督察專員，復派陳澤潤爲駐川軍事特派員，又調楊虎臣部赴陝南川北協同進攻，同時帝國主義者，首先是英帝國主義者，亦將大批駐宜昌之兵艦，開赴萬

縣，怡和洋行之嘉和輪運載「剿赤」軍，并派武裝英兵保護，法國商船亦忙着替軍閥運兵去進攻紅軍，以及藍溥森前次去川，英帝國主義最近侵略新疆，西康的加緊，這都是準備直接進攻紅軍的張本。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國民黨在紅軍蘇區猛烈發展而前是如何的慌忙失措，企圖挽救所謂「中國民族最後堡壘」的四川（大公報語）而一致的向紅軍進攻呵！

但是在敵人的內部還暴露着極大的弱點：四川軍閥在連年不斷的軍閥混戰中，雖然互有勝負，然而實力上彼此都受到削弱與損傷，這次所謂「統一」戰爭在表面上雖有統一的形式和宣傳，而實際上聯軍內部的衝突依然存在，而且在日益的加深着，防區制度的割據並沒有消滅，這將繼續牽制各派軍閥，相互削弱自己的力量。且自劉文輝敗退岷江後，川中大軍閥僅存劉，田，鄧，楊及劉存厚五部，所謂進攻紅軍的六路大軍，除田部早已爲紅軍消滅殆盡外，其第三路楊森亦已敗退。第四路劉存厚亦被紅軍擊潰，第一，第二路，鄧李兩部又因軍閥內部的衝突，懷恨劉湘扣留其子彈，亦在觀望不前，同時士兵的動搖，農民游擊隊在各地的活躍，財政的枯竭，都增加了敵人進攻的困難，而楊虎臣對蔣介石屢次剝奪其在陝的勢力，早懷不滿，亦決不肯輕易放棄西安而逕趨漢南，這一切都將更便利於紅軍的進攻和蘇維埃的發展。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而得出敵人因自己的弱點和內部衝突而會削弱了甚至放棄了對紅軍蘇區的進攻的機會主義的結論。正相反



的，各派軍閥爲了和緩其內部衝突解決其內部的矛盾，只有更加緊對蘇區紅軍的進攻，企圖在進攻紅軍中求得一致。

在另一方面使我們看到的是：羣衆擁護紅軍的熱烈和積極。紅軍蘇維埃的勝利和開展，是深深的興奮着和刺激了四川廣大的工農士兵羣衆，在街頭巷尾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和聽到羣衆在聚集着大談其紅軍的勝利和解除川北民衆痛苦的情形，羣衆自動派代表去迎接紅軍，當代表出來宣傳紅軍和蘇區內情形時，每個羣衆都在歡呼鼓舞。成都火柴和生綢廠的工人自己的大會上通過了擁護川北紅軍和東北義勇軍的決議。中江的羣衆自動不繳一文捐稅來「助桀爲虐幫助軍閥進攻紅軍」（中江羣衆的言論）。順慶兵工廠的工人在「不造一槍一彈供給軍閥進攻紅軍」的口號下實行怠工，每日少造一箱子彈。成都失業工人自動組織紅軍預備隊，當賣了衣服作路費到紅軍中去參加作戰，幫助紅軍造槍彈。周口的農民自動暴動起來響應紅軍的行動，結果周口被紅軍佔領，九月間南部河東的農民與紅軍結合驅逐了所有的白軍而變成了蘇區，河西的農民亦起來暴動響應，創造了河西的游擊區，田頌堯部士兵當宣傳員向他們造謠宣傳紅軍是如何壓迫士兵及殺人放火時，士兵大罵：「你曉得？你去都沒有去過，老子在前方打仗還不知道嗎？真是放屁胡說！」嚇得該宣傳員抱頭鼠竄。西充車龍鎮發生一小隊團練自發兵變，及大悲寺個別團練拖槍出來找紅軍，士兵拉住一個在街上寫標語的同志要求加入黨，甚至跪下對天

盟誓表示他要求加入黨的真誠和迫切，諸如此類的事實，還有很多是為我們所不曉得的。羣衆是怎樣在積極熱烈的擁護紅軍呵！

正由於四川紅軍蘇區驚人的勝利和發展，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使帝國主義國民黨嚇得驚慌發抖，齊聲驚呼「全川有赤化的危險」，「四川將變為江西第二」。大公報的記者公開承認「四川的前途實不可樂觀」，對於劉湘的進攻更「深致疑懼」，并作了如下的推論：「……對各軍作平均之抽調，兵質既異，餉給攸殊，指揮勢難統一，勝敗豈能相顧，且雖有敢戰之軍官，其如兵無鬥志何！恐縱令勉能開到前線，難保不以送槍送彈而終……川民被軍閥惡政治之壓迫榨取歷數十年，人心鬱憤，羣情浮動，實為共產思想最易侵入之區域，而其地大物博，又為赤黨勢力最易滋育休養之地。以上兩端，在前方則有為赤軍送接濟之危機，在後方則有為赤黨造同志之隱患……恐不僅綏宣收復之匪易，川東地盤且將窮於自保，綏宣之續，恐猶未有已也。「匪」氛益張，士氣愈墮，而稅收愈減之結果，經濟益窘，推進更難，其勢祇有日即於崩潰之途，萬一劉湘「勦匪」無功，使徐向前輩更得渡越嘉陵，分攻潼順，則成渝危殆，全川變色，設更轉而襲陝，侵甘肅，下鄂西，擾滇黔，藉川省之富源，得進退之便利，其勢恐非今日江西瑞金可比……」（大公報十月七日，十一月四日及二十日社論）。最後，大公報的記者更痛心疾首的太息「凡吾所言，幾不幸而皆中」！法西斯蒂的晨報亦耽心着「蜀地廣二百三

十八萬方里，東控長江流域，西負隴陝山嶺，溢地土肥物富，如此形勢之地，使「赤匪」據有一隅，即足以騷擾全省，威脅中原，今已在巴中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其志諒不在小」，更不得不承認「可怖哉，「匪」勢膨脹之速度也」。大美晚報更尖銳的提出「是劉湘統一四川，還是紅軍來建立四川蘇維埃？」這是統治階級的悲鳴，這是統治階級的失望，讓他們在革命的怒燄面前去發抖吧！

### 三 革命發展的前途與四川黨的任務

明顯的，目前順利的客觀形勢，是便利於我們開展更偉大的勝利，求得更進一步的發展，我們有一切可能來爭取蘇維埃運動在四川全省勝利的首先實現，革命形勢的急劇開展，尖銳向紅軍和四川的黨提出許多艱鉅的迫切的任務，要求黨和紅軍以最大限度的努力來完成牠。

一、採取積極的進攻，并用一切的可能與紅二軍團取得切實聯絡和行動上的配合，造成衝破五次「圍剿」更佔優勝的形勢，只有這樣，才能粉碎帝國主義和軍閥的將來更大的進攻。

二、必須百倍的加強和擴大紅軍，肅清現有蘇區內敵人一切殘餘的力量，使現有的蘇區聯合為一個不隔離的整體，使我們能打碎敵人任何的優越部隊和奪取中心城市。

三、建立和加強各級蘇維埃的工作，堅決執行土地革命的任務。

四、爭取十數縣的抗捐軍的領導，廣泛的發展農民要土地抗捐稅的遊擊戰爭，特別是在川南，和川東的農民中應該加強黨的工作，加強對游擊隊的領導，使其行動更加積極化，以配合紅軍的行動，牽制敵人對蘇區紅軍的進攻，分散敵人的力量。

五、極大限度的開展羣衆運動，加強黨對羣衆日常鬭爭的領導，要建立並加強黨在蘇區周圍各縣的工作，在川南川東各縣的工作，在目前是更加重要了。

六、加緊在自流井，兵工廠，失業工人中的工作，組織和發動他們日常的鬥爭而轉變為政治鬥爭及武裝暴動，有組織有計劃的動員失業工人，組織他們到蘇區紅軍中去。

七、百倍的加強黨在白軍士兵中的工作，特別是在直接進攻紅軍的主力部隊中，組織革命的兵變。

八、廣泛的開展反帝的運動，爭取我們在反帝運動中的領導權，到處建立反帝的羣衆組織，形成廣大的羣衆的反帝大同盟的組織。

九、加緊秘密工作的改善，將對白色恐怖的階級警覺性提到最高的限度。

若拿以上的任務來檢查四川省委的工作時，我們必須嚴厲的批評四川省委在長期軍閥混戰和紅軍到達將近一年的期間中，沒有用一切的可能和應有的努力來進行充分的活動，配合蘇維埃的發展。目前四川黨的領導在許多工作中仍是睡在機會主義的搖籃裏，

一切的工作還束縛於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富農路線中，而遠遠落於客觀革命形勢之後，中國革命發展中的不平衡，現在仍部份的是這樣：一方有羣衆鬥爭情緒的高漲，廣大的蘇區和堅強的紅軍，另一方則有白區黨的薄弱的領導，這在四川更嚴重的表現着。

在許多大的重要的城市和市鎮中，沒有黨的工作，在蘇區周圍和目前最重要的川東川南各縣恰恰是四川黨的工作最薄弱的地方，許多重要陣地中如兵工廠和自流井的工人中沒有黨的工作，或者是失去了，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失業工人中，黨沒有去好好進行工作，黨沒有領導過一次成功的兵變和勝利的游擊戰爭與農民暴動，十幾縣抗捐軍黨沒有絲毫的領導，而且也沒有爭取在黨領導下的企圖，雖然羣衆迫切的需要鬥爭，需要領導，并自動的起來擁護紅軍，響應紅軍參加作戰，不斷的爆發鬥爭，但黨沒有去領導，不能把握着羣衆鬥爭的情緒，組織這些鬥爭使牠發展到更高的階段，以配合紅軍的行動和勝利；而且當羣衆迫切的要求到紅軍中去時，我們的四川省委個別同志可以以最不可允許的官僚主義的「無飛機」三個字來回答區委，結果有些羣衆因此而感到失望，離開了我們。省委更藉口羣衆只需要擁護，不需要反帝，而放棄了反帝運動，實際上反戰擁護紅的工作亦並未有很好的進行。同志認爲工人不夠爲赤色會員資格，而不願發展工會的組織，這種看不起工人的反無產階級的意識，省委並沒有給以最嚴厲的打擊，開展思想上的鬥爭。許多工作的場合與不能開展，都解釋爲由於白色恐怖的嚴厲來掩蓋其對布爾

塞維克艱苦工作的機會主義的消極。對祕密工作的忽視，達到了不可允許的地步。這都是由於四川省委對目前革命形勢的估計極端不足所產生的惡果。

革命形勢的發展，不允許再多一分鐘這樣繼續下去。光榮偉大的歷史任務已經放在四川黨的肩上了。革命要求四川黨來完成牠。澈底的轉變四川黨的工作，毫不疲憊的進行艱苦的布爾塞維克的羣衆工作，將是爭取四川蘇維埃勝利的保障。

(十一月二十五日)

## 德國法西斯蒂選舉的『勝利』和中國

### 的國民黨言論

仁

中國國民黨——這個帝國主義的奴才和走狗——最近看見德國法西斯蒂選舉的『勝利』，就高興得手舞足蹈。他們說：你看希特勒的『剷除階級鬥爭，統一民族意志的計劃』成功了，『這足以證明德意志民族熱烈的擁護國社黨獨裁』（晨報）。國民黨——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政黨，正在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發狂的進攻工農民衆的生活程度，極端殘酷的舉行對紅軍蘇區的五次『圍剿』——就是屠殺中國的革命起來的工農……他們的高興德國劊子手的選舉勝利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他們利用着這個『勝利』，再來武

斷的宣傳「獨裁主義」——「剷除階級鬥爭，統一民族意志」等等。但是，誰也知道他們的所謂「統一民族意志」是要幫助帝國主義實行瓜分共管！是要殺戮幾千百萬革命起來的工農，是要企圖「撲滅」中國的強大的工農紅軍和蘇維埃運動——這個唯一能夠解放中國於帝國主義統治之下而建立偉大的自由的工農的中國的運動！

然而，國民黨高興得太早了。希特勒的所謂「勝利」——特別在中國是一般人民所很容易懂得的。希特勒的選舉是什麼把戲？中國人祇要想一想國民黨的所謂國民會議（一九三一年）國難會議（一九三二年）等就可以了然的。

固然，德國的「國家社會黨」——法西斯蒂黨利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狂妄愛國主義的情緒，會幹許多把戲，例如「退出國聯」，「要求向東擴大德國邊界」（按即進攻蘇聯），「德奧合併」等等。希特勒答應小資產階級恢復德國戰前的地位和光榮。他在選舉之前特別起勁而熱鬧的實行了退出國聯。他絲毫不能滿足廣大羣衆的要求，他就用裝腔作勢的「滑稽戲」來哄騙。他上台之後到現在已經九個月了，失業工人不但不能得到工作，反而更加增多了，他們的津貼大部分停止了，沒有完全停發的，也已經減少到不能維持飢餓生活的程度；農業債務的延緩償付辦法（這是希特勒上台之後欺騙農民的辦法），雖然暫時緩和了農民的困難，然而在十月間這辦法已滿期了，大多數的勞動農民又不能夠不出賣田地房產來還債了。希特勒的要求軍備平等，要求取消楊格計

劃等等的政綱，在帝國主義的矛盾日益劇烈化的環境之中，到處碰壁，沒有一件有實現的可能。廣大羣衆的反抗，甚至於以前發狂似的擁護希特勒的小資產階級的失望的爆發，對於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專政是非常之大的威嚇。因此，希特勒趕緊來一套新的把戲——退出國聯等等。他用這種手段重新煽動狂妄愛國主義的瘋狂的情緒、掩飾自己的無力。要知道『退出國聯』只是一句空話。現在這種形勢之下，沒有戰爭，以及在戰爭中德國帝國主義打一個勝仗，那麼，絕對沒有軍備平等，取消楊格計劃的可能，除非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然而戰爭將引導到德國的崩潰。德國現在的武裝力量是不能夠同法國和其他帝國主義野獸去碰的。因此，希特勒的政策是絕對的必然的在引導到帝國主義戰爭的道路上去，自然，他努力在設法把這個戰爭首先去進攻蘇聯——這實際上完全是血腥的屠殺的政策——這正是中國劊子手，中國的殺人兇犯們——國民黨所最贊成的。這種希特勒的武斷宣傳，也許暫時又蒙蔽了，欺騙了一些德國的市僧和小資產階級。但是，廣大的羣衆已經開始反抗了，將來始終是要推翻法西斯蒂的專政的。將來，就是小資產階級的羣衆也會明白希特勒的騙局，因為希特勒現在退出國聯，答應人民恢復戰前的德國，而結果，必然是經濟財政恐慌的更大的爆發，更不可救藥的崩潰，必然是血腥屠殺的戰爭；德國的『光榮』不但不能恢復，而且大多數人民，連小資產階級在內，都要陷入比現在還要悲慘十倍的地獄。能夠解放德國民衆的，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



，蘇維埃的德國呵！

現在，法西斯蒂黨統治了九個月的德國，已經是個十足的地獄了。法西斯蒂黨怎樣能夠得到這次選舉上的勝利的呢？國會改選的票子總數是四三〇〇七・五七七，贊成希特勒的有三九〇六五五・二八八票；對外政策的投票總數是四三〇四六四・四二〇票，贊成法西斯蒂政府的有四〇〇六一八・一四七票。

這裏，第一，要知道法西斯蒂黨是慣於偽造選舉票的。今年三月五日國會選舉的時候，希特勒就假造了不少票子。那時候，只因為國家黨（「鋼盔隊」）還沒有同國家社會黨「合併」所以希特勒只得了一千七百萬票。這次是以前國家黨的票子都集中在國社黨了，當然，他所得的票數可以增加一些。然而這只證明資產階級的兩個集團，在「形勢嚴重」的壓迫之下，一致聯合着在狂暴的摧殘和屠殺德國的勞動民衆。而爲着欺騙世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民衆，他們就偽造許多選舉票，以表示「民意」贊成希特勒獨裁。

第二，要知道法西斯蒂的偽造選舉票的手段是很粗蠢的。例如，三月五日的選舉時候，在德國波美尼亞地方，選舉票的總數「不知怎的」比當地選舉人的總數多出了六萬二千。這還是偶然被新聞記者發見的，其實，他們偽造了而沒有發見的還不知道有多少！首先使我們懷疑的是這次選舉票的總數。要知道，一九一八——一九二〇年國民會議選舉的時候，德國在革命的初期，正是民衆政治上最積極的時候，選舉票的總數也不過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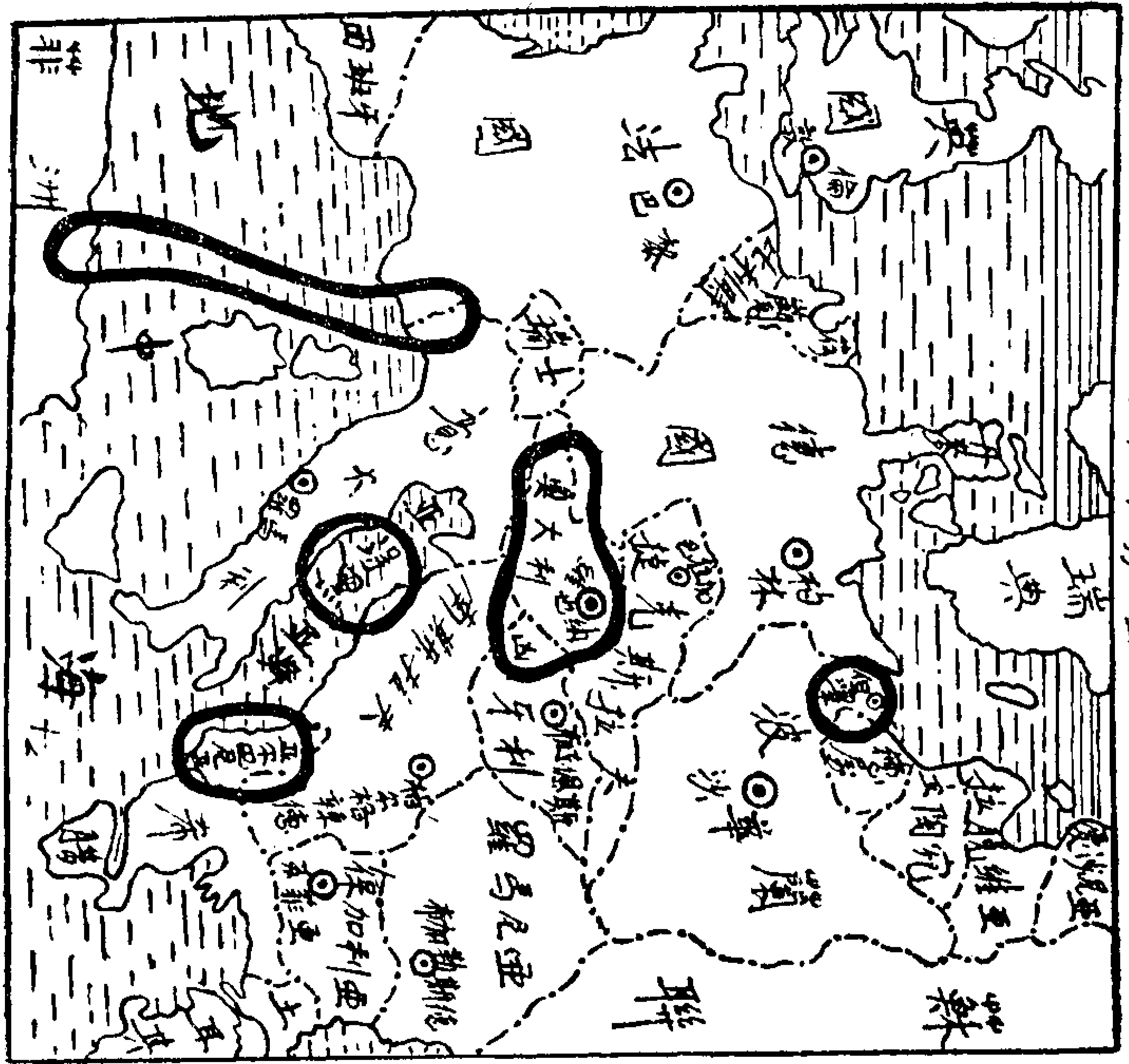
•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三千零四十萬）；就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選舉票的總數也不過三四〇六五一〇〇〇〇票（三千四百六十萬多）。而現在這一次，突然有了四千三百多萬（對外政策的投票者甚至於有四百五十萬光景）。這突然「增加的」七八百萬到一千多萬選舉人是從那裏來的呢！

第三，要知道法西斯蒂專政之下的選舉完全是用一種強迫手段進行的。國社黨的警察和挺進隊要看守在選舉櫃旁邊，看見革命的工人去投票，就捉起來打，而把他們的票子燬掉，另外換上贊成希特勒的票子。例如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東普魯士的一個選舉區域裏，全體的選舉票都是「贊成」希特勒的，但是這選舉區（大多數是雇農）在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選舉時候，還是大多數贊成共產黨的。這裏，法西斯蒂的無恥的作弊再也沒有更明顯的了。

這就是所謂希特勒的「選舉勝利」。這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所最贊成的卑劣無恥的手段，中國國民黨自己也在不斷的幹着這一類假造民意的鬼把戲！然而歷史是不能夠欺騙的，德國的和中國的劊子手，都必然要在勞動民衆的「刀槍投票」之下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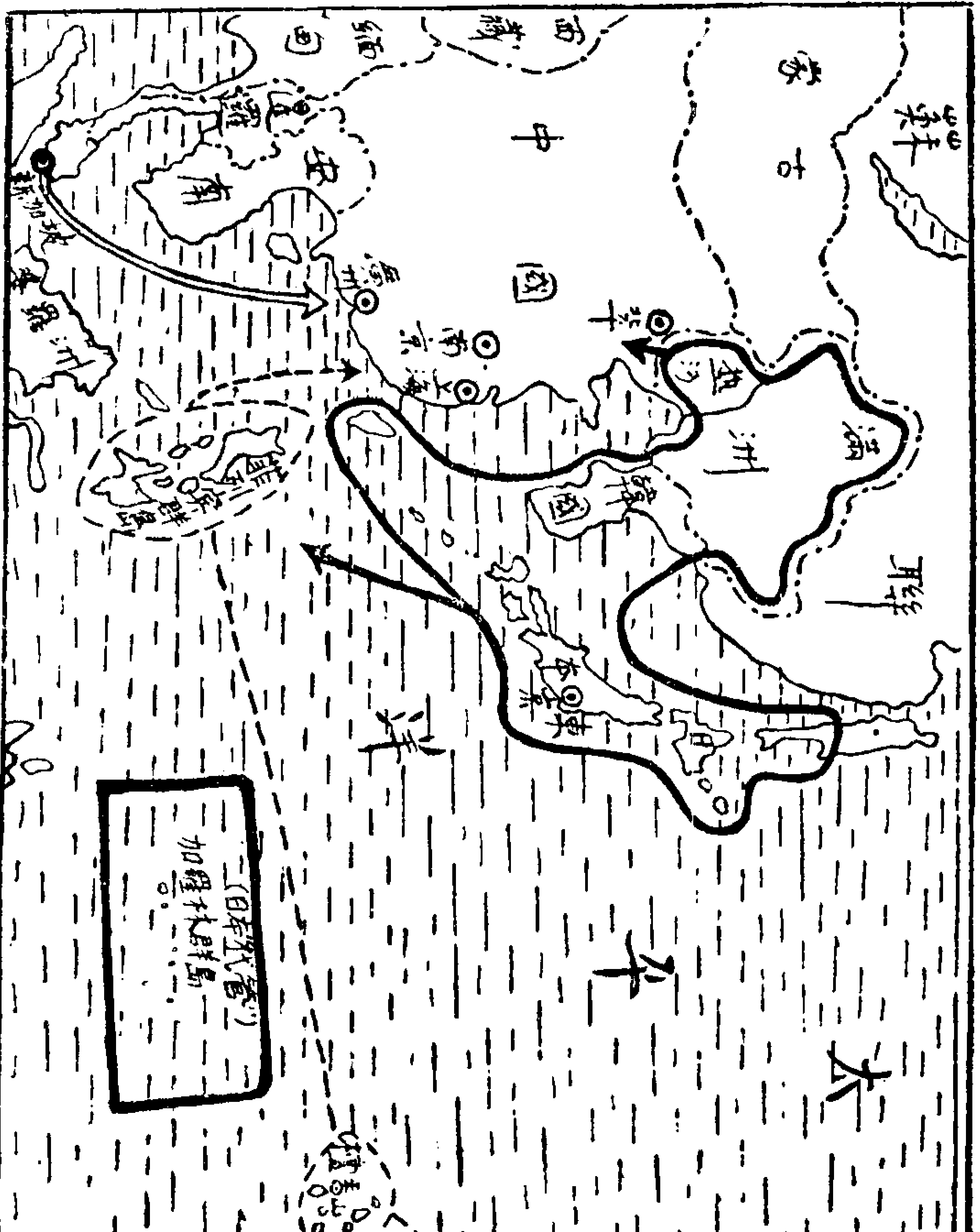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欧洲形势图



图例 ○ 主要的帝国主义冲突地带

太平洋形势图



图例 1. ——— 日本势力 2. - - - - 美国势力 3. <math>\longleftrightarrow</math> 英国势力

# 帝國主義戰爭的形勢略論

江源

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列甯就預言的：「我們不要忽視一個悲哀的可能，如果從這次戰爭裏不生長革命出來，那末，最壞的結果是人類還要經過第二次的帝國主義戰爭」。

現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同社會主義的蘇聯對抗着，而在牠的內部同時發展着劇烈的矛盾和衝突。資本主義的世界已經到了戰爭的前夜。一切都在迅速的向着「新的戰爭和革命時期」轉變。

歐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資本主義的列強重新瓜分了世界：在歐洲是所謂凡爾賽和平會議的條約，在美洲——特別是關於遠東問題——是所謂華盛頓會議的協定。這兩個國際會議所造成的「新的均勢」，現在已經「陳舊了」，已經破壞了，已經同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對比力量不相符合了。用戰爭來第二次重新瓜分世界——成了人類歷史的當前問題。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的公律，在歐戰之後特別有力的表現出自己的作用。不平衡發展的形勢非常明顯的表現在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代之中。而這總危機的第三時期，全世界的經濟恐慌，更加加強了不平衡發展的力量。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末日來到了。鉅

大的互相衝突的力量儘在發展，向着階級之間和國家之間的決戰進行。國外的和國內的矛盾交錯在一起，造成許多矛盾的「糾葛」。這些「糾葛」是解不開的了，只有用「斧頭鐮刀」把他們砍掉！

資本主義的世界在臨死之前掙扎着，對抗着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抗着全世界革命的農工民衆——這是主要的階級矛盾，而資本主義世界的統治階級內部不可避免的開展着自相衝突的鬥爭，不可避免的向着「武力解決」的道路進行。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廣大羣衆的革命鬥爭，武裝暴動，階級的國內戰爭，就沒有任何別的方法可以逃避這「第二次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大屠殺，而且，帝國主義的野獸們正在竭力企圖一致的實行進攻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爭。這種戰爭一天天的接近了。

這裏，我們只想來大概的敘述一下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的總形勢，指出牠們衝突的「糾葛點」。

★

★

★

★

### 資本主義的歐洲

德國法西主義的暫時勝利，更加促進了戰爭和武力衝突的危機。戰爭的導火線已經在燃燒了。法西主義的德國要求改變凡爾賽條約。牠要求把所謂波蘭走廊——但澤交還

給牠。這走廊問題隨時都可以引起戰爭的爆發，因為法國——波蘭事實上的主人，絕對不能夠輕易容許德國在西歐方面又得到一個新的海口，而且那是經濟上的重要區域。

同時，奧國問題也是修改凡爾賽條約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德國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公開的在要求着「德奧合併」（所謂「昂施呂斯」問題）。如果德奧合併了，那末，德國帝國主義就可以伸手攫取巴爾幹半島，以及近東土耳其等的勢力範圍，把捷克斯拉夫三面包圍起來，提起捷克共和國內的三百萬德國人歸併到德國去的問題，而且把匈牙利也完全放在自己的影響之下。所以不但法國資產階級認為德奧合併是「新的戰爭的導火線」，而且意大利的法西黨也表示反對。固然「意大利在其他問題上聯合德國，但是在德奧合併這件事情上，牠就暗中耍着許多把戲，破壞德國的計劃。德奧合併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公開的合併，一種是所謂「一致化」的合併，這就是希特勒派的國家社會黨在奧國取得政權。這兩種方式的合併，法國和意大利都是反對的。

而奧國問題，其實還只是多瑙河問題的一部份。（多瑙河發源於德國，經過奧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而流入黑海）。意大利要想把奧國和匈牙利合併，如果可能，還想合併霍爾瓦地亞（現在屬於南斯拉夫），而把這些地方都放在自己的領導之下。法國呢，想把匈奧歸到小協約國裏去，而造成所謂「多瑙河聯邦」。而匈牙利要求修改特里安農條約；割取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的一些領土。意大利

利是贊助匈牙利的這個計劃的。然而這三個小協約國，靠着法國的勢力不肯對匈牙利讓步。

多瑙河問題同巴爾幹問題是密切聯繫着的。意大利要想分割南斯拉夫，把霍爾瓦地亞割去，奪取達爾馬地亞（亞得里亞海東岸和沿岸的群島），這樣，把亞得里亞海變成意大利的「內海」。

同時，意大利要解決所謂馬其頓尼亞（現在稱爲亞爾巴尼亞）的問題。這是巴爾幹半島上的多年的爭論問題，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希臘之間的衝突問題。意大利主張把馬其頓尼亞交給保加利亞和希臘。

大家知道的，德國和波蘭的爭執但澤、波森，所謂走廊，以及上西里西亞，其實是德國同法國的衝突。同樣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之間的爭執，其實是意大利同法國的衝突。法國同意大利之間的衝突，還有一個北非洲的問題，法意爭奪着地中海的領導權，爭奪着薩沃伊和尼斯（都在法國的地中海邊境），以及近東方面的勢力範圍。

歐洲的地圖上已經畫出了衝突的焦點，帝國主義的列強和牠們的附庸都在瘋狂的武裝着，準備着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澤走廊問題，奧國問題，匈牙利問題，達爾馬地亞，馬其頓尼亞等等，隨時都可以變成戰爭爆發的第一砲。

自然，帝國主義野獸們，同時都企圖把正在準備着的武裝，用來進攻蘇聯。例如德

國在法國帝國主義的監視之下，對於但澤問題暫時「沉默」了，「德奧合併」的阻力是更大，於是德國法西斯的外交部半官報，就公然發表「統一烏克蘭」的主張，牠說：烏克蘭民族同德國有密切的關係，但是，牠現在分成三塊：一塊在蘇聯，一塊在波蘭，一塊在羅馬尼亞；所以德國主張這些烏克蘭人應當統一，組成一個「民族國家」以敖得薩爲海口（現在是蘇聯的蘇維埃烏克蘭的領土呵！），而「爲德國之屏障」。英國的財政資本，尤其是保守黨，在遠東政策上暗中贊助日本的併吞滿蒙，而在歐洲政策上，就贊助德國的反蘇聯的急進主張，牠運用着外交手腕，使得「四強協定」更加明顯而確定的成爲反蘇聯的「四強協定」。

### 太平洋問題

太平洋上帝國主義的瓜分中國已經開始了。

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把中國的滿洲，熱河和察哈爾華北的一部份「奪了去」，（其實是中國國民黨拱手奉送給牠的）牠在中國北部的勢力已經像在張學良時代的滿洲一樣。日本所奪去的中國領土，比日本本國大一倍，而人口在四千五百萬以上。日本并且已經在太平洋裏建築了新的海軍根據地——在牠所「代管」的加羅林羣島上，以及小笠原羣島上，這是華盛頓協定所禁止的。不但如此，日本還在要求廢除華盛頓會議所決定英日



美的海軍比例，就是要求擴大日本的海軍。

英國帝國主義趁勢就更進一步的侵略中國。牠同日本一樣，先用自己的奴才——中國國民黨軍閥割據西南，這裏，以香港為中心的中國西南市場，早已是英國帝國主義的勢力範圍。英國帝國主義並且佔領了（事實上是佔領了！）西藏，而從西藏西康伸手來攫取四川。在新疆，英國帝國主義企圖造成自己的傀儡——「回回國」同時，日本却在企圖造成「東干國」——東干是烏魯木齊（迪化）一帶的一種民族。

很明顯的，這些計劃同時包藏着進攻蘇聯的陰謀：滿洲和新疆都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軍事根據地，狂妄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中東路問題的會議上，公然暗示蘇聯應當一併出賣東海濱省，而說那些海參崴等等「在軍事上看來，是無法保衛的」！而德國外交部部的半官報，竟公開的宣佈德國政府同情於日本荒木貞夫（陸軍大臣）的大亞細亞論——就是併吞中國和西伯利亞！

爭奪長江流域的鬥爭一天天的更加緊張起來。

美國帝國主義已經借了棉麥借款，以及許多祕密的借款給南京政府。國聯決定了給中國「技術合作」。日本就在抗議。

沒有疑問的，這些借款和「技術合作」，日本的侵略和英國的掠奪，首先是企圖「剿滅」中國的蘇維埃革命的。此外，法國帝國主義經過安南，貫穿雲南，貴州，而在四

川南部活動，也同時抱着這樣的目的。

於是太平洋上的海軍「競賽」就大大的緊張起來。英美日本以及法國（雖然法國在太平洋上比較次要一點），一致的反對着中國蘇維埃革命，一致的準備着進攻蘇聯，而互相之間在太平洋上拚命的「競賽着」，美國已經決定在大西洋上建築兩個海軍根據地之外，還要在太平洋上再建築兩個新的海軍根據地。英國在急急忙忙的趕築新加坡大軍港。華盛頓的海軍協定到一九三六年滿期。然而軍備的「賽跑」已經開始了。美國決定趕過英國和日本。英國和日本也不放鬆。甚至於法國也攫取了中國南海裏的珊瑚島（九小島），而在趕緊建築軍事上的「防禦」工程。這種軍備上的追趕不但要「決定」中國的命運——中國的命運只有蘇維埃革命能夠決定！——而且要「解決」菲列濱，海威夷羣島，關島，以及南美洲，古巴等等問題。現在中國已經開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單方面的戰爭」，南美洲的「小戰爭」，不過是很快就要來到的世界大戰的序幕。太平洋上的烽火已經在燃燒着了！

★

★

★

★

日內瓦的軍縮會議破裂了。德國日本都已經退出了國聯。倫敦的經濟會議完完全全破產了。「四強協定」表現了明顯的戰爭工具性的性質，新的經濟戰爭（關稅，貨幣，匯兌，軍事債務，歐戰賠款等問題的爭執和衝突），已經在劇烈的開展着。瘋狂似的在軍

備建設上互相追趕着。經過着鉅大的困難，糾葛和牽掣，可是，帝國主義列強和附庸之間的各個軍事聯盟和集團始終在形成起來，時常遇見內部的矛盾而破壞，但是，這些新的力量的配合和改編，已經明顯的在形成互相準備射擊的陣綫。

新的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經快要開幕了。帝國主義的野獸們都在企圖用一致進攻蘇聯的手段來推遲自己之間的衝突的爆發。而現在，牠們已經動員着一切力量在進攻中國的蘇維埃革命，進攻古巴的革命運動，進攻一切殖民地的反抗運動，進攻自己國內的工人階級。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廣大勞動民衆的反帝國主義革命，能夠挽救「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的浩劫。

## 反對向困難投降的右傾機會主義

亮平

我們已經完全打破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我們的偉大勝利是依據着蘇區工農羣衆，擁護蘇維埃的熱情的激發，英勇紅軍的奮不顧身的血戰，各蘇區的鬥爭行動的配合，白軍士兵的動搖及其對於革命的同情心的增長，白區工農的反帝反國民黨鬥爭的猛烈的開展等，而所有這些之所以能夠開展，正是因為我們的黨，有正確的列寧主義的領導，而且和一切機會主義傾向及路線，進行了殘酷無情的鬥爭。反羅明路線的鬥

爭的開展，這是我們能夠粉碎敵人四次「圍剿」的基本條件之一。

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四次「圍剿」遭受了悲慘的失敗之後，正在用他們的全部力量，來準備向蘇區舉行第五次「圍剿」。

在這五次「圍剿」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是更露骨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力量是更加削弱了，而上述這些使我們能夠取得四次戰爭勝利的條件，在五次「圍剿」中，是更加有力了，我們對於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勝利前途，應有絕對的信心。同時應該毫不放鬆地用一切方法，動員我們的全部力量，來爭取這次戰爭的全部勝利。

在敵人大舉準備五次「圍剿」與我們艱苦的進行動員工作的過程中，一部分無氣節的不堅決的小資產階級份子，一定要在各方面以各種形式表現他們機會主義的動搖，鄧子恢同志便是明白的例子。

首先說鄧同志對於蘇維埃運動的估計。在去年鄧同志就以爲蘇維埃政府把種種負擔加到農民身上，使農民生活「很苦」，而且甚至「比革命前更壞」。這樣的話，不但是絕對錯誤，而且簡直是不顧事實的對於蘇維埃運動的污蔑。分了田，解除了封建半封建的剝削的農民，比較國民黨吸盡農民血汗的劊子手統治下的農民要「更苦」，這種話簡直只有國民黨的擁護者才說得出。鄧同志竟具這樣意見，這明白地指出他對於蘇維埃運動，是不了解的。

因為鄧同志對於蘇維埃運動具着這樣的估計，所以鄧同志對於工農羣衆力量有始終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的，鄧同志在負責領導財政部工作的中間，始終不知道發動群衆來做籌款工作，以爲在蘇區內豪紳地主早已完全打盡，再無餘款可籌了，可是查田運動的經驗，完全證明鄧同志這樣不信任羣衆，不知發動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觀點，是完全破產的了。

鄧同志對於羣衆力量既採取這樣態度，所以遇到財政問題上的某種困難，就會使他對於蘇維埃運動的勝利，發生動搖，在他所作的關於籌款及紙幣的文件中，以爲向富農籌款不到，就會使紅軍給養沒有辦法，紙幣跌落，就會使蘇維埃經濟坍台，這真是不得了！但幸而鄧同志的這些話，都是不對的。自然向富農籌款的計劃，沒有實現，會使蘇維埃財政受到影響；紙票跌價，會使蘇維埃經濟受到損害，我們應該想各種方法來進行籌款工作，應該用一切力量來鞏固蘇維埃金融，可是像鄧同志那樣誇大的估計只會使羣衆對於上述問題發生不正確的了解，而妨害籌款工作及鞏固金融工作的正確的進行。

對於羣衆力量的不信任，對於困難過份的誇大，自然會使鄧同志投降屈服於困難面前，使鄧同志覺得手足無措進退維谷，於是悽切地喊出「沒有辦法」「沒有辦法」——「一個『沒有辦法』！而身負蘇維埃財政責任的鄧同志，竟對於蘇維埃財政上的重要問題（如收支不敷的彌補等），從沒有加以思索，『沒有辦法』的態度，使鄧同志對紅軍猛烈

擴大的光榮成績，感覺到討厭，在中央局及中央政府會議上，他屢次着重的提出紅五月擴大紅軍向財政部提款的不該，因為這會增加鄧同志在財政工作上的麻煩，紅軍的猛烈擴大，對於廣大的工農羣衆，是最大的歡喜，可是對於鄧同志却成爲無限的悲哀。照鄧同志的意見，蘇維埃政府最好不要多用錢，不要多擴大紅軍，這樣鄧同志可以過他恬靜的生活，可以做他甜蜜的好夢，至於什麼敵人的五次「圍剿」，什麼加緊動員工作，對於鄧同志是不在心上的。革命的勝利對於鄧同志是茫然的了，這就是鄧同志向困難投降的真像。

鄧同志對於困難的屈服投降，使他在財政工作上不知從積極方面設法（向白區豪紳地主及蘇區內豪紳地主殘餘，發展國民經濟等等）而專注意於消極方面的加稅發紙票等。『向容易的方面做去，眼睛向着石印機購準』，這就是在困難面前投降的鄧同志的財政政策。至於這一政策會如何影響工農的生活，和蘇維埃的經濟與金融，那鄧子恢同志是不在心上的。鄧子恢同志的財政政策，是機會主義的財政政策，牠是與共產國際所指示的工農民主專政下的經濟政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的。共產國際明白地指出：「蘇維埃區域內一切經濟的設施，應該根據工人階級與農民聯合的觀點」（見國際路線五五頁），所以蘇維埃經濟政策中的重要一部分——財政政策的決定，應該以這一觀點爲基準，可是這一基本的觀點，像我們在上面所可以看到的，正是鄧子恢同志所忘記或是不了

辯的，列甯主義的財政政策，指出『應該將捐稅的重擔移在最有財產的階級身上』（同上，五六頁），經過正確的租稅政策，蘇維埃可進一步鞏固工農聯合，削弱有財產的階級的力量，而鄧子恢的機會主義的財政政策，則以爲蘇區內豪紳地主殘餘，已經打盡（查田運動中所開展的向豪紳地主殘餘籌款的工作，對於鄧子恢是一種『大發明』）以爲白區籌款工作，應由作戰的紅軍，全部負擔，而鄧子恢同志日夜所思的所忙的，祇在怎樣企圖加重農民的負擔，以削弱工農的聯合。列甯主義的財政政策，要求蘇維埃政府從提高蘇區各業生產發展蘇區全部經濟的基礎上，來根本解決財政問題，而鄧子恢的機會主義財政政策，則對於發展蘇維埃經濟是採取放棄和忽視的態度。列甯主義的財政政策，指出『對於發行紙幣的問題，則應該非常謹慎，應該盡可能的避免紙幣的跌價』（同上五六頁），而鄧子恢的機會主義的財政政策，則總是眼睛望着石印機。關於鞏固蘇維埃金融的問題，可以在他的財政工作報告中，一字不提。列甯主義的財政政策，要求蘇維埃在各方面發展銀行的事業，『國家銀行可以而且應該幫助合作社運動和一般提高農村經濟的設施』可是鄧子恢的財政政策，將把國家銀行所應盡的任務，完全不管，國家銀行變成了簡單的財政部的出納科。列甯主義的財政政策，是建築在工農基本利益的保障與工農羣衆熱烈的擁護與實行之上，而鄧子恢的機會主義財政政策，則是根本忽視工農利益，不信任無產階級領導下的羣衆的力量，用濃厚的官僚主義脫離羣衆的方式，來進

行他的工作。所以總結起來說，在我們的工農民主專政之下，列寧主義的財政政策，是在進一步鞏固工農聯合，削弱有產階級的力量，促進蘇維埃的經濟的發展，從這上面來進一步鞏固蘇維埃政權，來解決財政問題，而鄧子恢的機會主義的財政政策則是不把捐稅重擔放在最有財產的階級身上，加重農民負擔，削弱工農聯合，妨礙蘇維埃經濟的發展，因之就必然要增加蘇維埃財政的困難，使澈底解決蘇維埃財政問題的路線，不能勝利地實行。機會主義的財政政策，是與列寧主義的財政政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的。

在這樣的機會主義財政政策的立場之上的鄧子恢同志的工作方式，自然不能不是最典型的官僚主義（譬如自己下令把公穀買去而又寫信要公穀，明知支庫沒有錢，而簽發空頭支票來敷衍塞責，不去提拔新的幹部，而空喊沒有人可派）。鄧子恢以蘇維埃財政部長的資格，而終日所忙的，祇是賬房先生式的算花邊的事務主義，這種沒有計劃，沒有正確階級路線的過一天算一天的財政部的工作，自然不能不引起蘇維埃財政的更大困難。

所以鄧同志的錯誤，不是個別的，而是一貫的機會主義性質的，而且最危險的還是鄧同志對於自己錯誤的兩面派的態度。在中央局嚴厲的揭發了鄧同志的錯誤之後，他在會場上口頭上雖然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可是在以後一個多月中，鄧同志非但在工作上絲毫沒有轉變，而且把中央局的指示簡直是拋到九霄雲外了。在中央政府黨團檢閱工作時



，鄧子恢同志竟對中央局的指示一字不提，而且堅持自己在稅率問題上的錯誤意見。（更有趣的是鄧同志因為怕反對到他自己，所以在財政部內竟沒有開始中央局所嚴厲指出的反官僚主義的鬥爭）。黨的指示對於鄧同志，簡直是耳邊風。對於自己的錯誤採取這樣態度，自然只會增加鄧同志的錯誤，妨害鄧同志所負擔的財政部工作的轉變。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并用全部力量來糾正自己的錯誤，這種布爾塞維克的態度，是鄧子恢同志所完全沒有的。黨對於他自然不能不有必要的糾正。

當革命的洪潮湧前進民族革命戰爭猛烈開展之際，困難，而且更大的困難，是不能免的，可是這種困難，只是發展的困難，在這些困難本身中間，就包含着克服困難的可能，適時的提出這些困難的問題，細心分析困難的原因，正確的認識困難的內容，而運用全部力量，想出一切方法以布爾塞維克的堅決性頑強性來克服這些困難，這是布爾塞維克對於困難的鄭重的革命的態度。布爾塞維克不是諱避困難忽視困難，置困難於不談，同時更不是畏懼困難誇大困難，向困難屈服投降。布爾塞維克是從克服困難中鍛鍊出來的，布爾塞維克是不怕困難的，誰要是怕困難，誰就不配做布爾塞維克。我們應該而且能夠勝利地克服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切困難，可是為要完善地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應該無情地克服這種向困難投降的機會主義的動搖。

火力向着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不要絲毫放鬆空談革命勝利放棄動員工作的「左」傾的

宿命論者，這種兩條戰線的鬥爭的開展，是我們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基本條件之一。

新的形勢不可免的要產生許多新的困難，可是同時又與發許多新的力量與條件，來克服這些困難。在黨的進攻路線之下以布爾塞維克的鐵腕以全部的力量來克服這些困難，我們一定能獲得新的更偉大的光榮的勝利與成功。

（八月四日）

## 答楊幼麟同志

——關於轉變存在着革命形勢為勝利的大革命及對富農的策略問題——

幼麟同志：

來信收到了因為你來信中所提的，兩個問題極端重要，一個是關於我們目前基本的總的路線的問題，一個是關於對待富農的策略問題；而且你在信上亦說到「一些同志的解釋亦不一致」，（雖然，很可惜，你並沒有告訴我，一些同志是誰，而且解釋不一致是怎樣的不一與差別在那裏，同樣，你說你對這兩個問題「認識模糊」，可是我很想知道，到底你怎樣認識這些問題的。這樣，當然使我回答時發生一些困難。在我看來，如果你能夠公開直接的說出你的意見及別的同志的不一致的解釋，比像來信所用簡單的國會式疑問的方法，對於問題之正確解答要更有益一些。）所以我覺得在黨報答覆你更好一些。

一、革命形勢的存在與大革命是否有分別？

這是你的第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提法，我覺得是十分奇特的。因為將存在着的革命形勢變成爲勝利的大革命，這是共產國際與我們黨提在全黨面前戰鬥的總任務。也許你是對於這個總的路線是有多少不同意？或者你認爲革命形勢與革命是一個東西；因之，將革命形勢轉變爲勝利的大革命是一句無稽的空談？假如你或『一些同志』這樣想的時侯，那不能不說這是極大的錯誤。這種觀念與馬克思——列甯主義沒有絲毫相同之處。

引起你提出這個問題的動機或許是針對着今年春天我在紅軍學校報告的一段話罷，在那個報告中我曾說：「在中國正當着革命形勢已經存在着的時侯……都在我們黨面前提出，開展各個戰線上的布爾塞維克的進攻，來把革命形勢迅速的變成爲勝利的大革命，來爭取工農民主專政在全中國的勝利及迅速的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這個總的進攻路線。包括着蘇區和非蘇區的黨，用一切力量來奪取群眾，組織羣衆，準備羣衆，領導羣衆，在政治和經濟的鬥爭中間提高他們的革命的積極性，和準備他們爲着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而鬥爭，爲着全中國的在蘇維埃形式之下的工農民主專政而鬥爭」。（鬥爭三期四頁）

我想，即使這些文句太「歐化」了一些，（像你信上所說的）但是基本的思想是很明白的，這裏說明革命形勢與大革命是有分別的，不然，當然談不上將革命形勢迅速的變

成爲勝利的大革命，或者，問題不是在文句的「歐化」與「文藝化」，而在你對於這個說法，根本上抱着另一種見解，不同意我這裏所說基本思想，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可是應該告訴你，這種觀點，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而僅僅是列甯與共產國際指示的一種複述。

列甯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中說：

「絕對沒有出路的情況是沒有的。資產階級像昏頭的強盜一樣，他做許多蠢事，一件又一件，使情況更加尖銳化，加速自己的死亡，這是對的。但絕對不能「證明」，資產階級不能以某種讓步，安靜某一部份的被剝削者，及他不能鎮壓某一部份的被剝削者及被壓迫者的暴動與運動。企圖預先「證明」「絕對的」沒有出路，這是空洞的玄學或者觀念與辭句之說弄。只有實際是這個以及其他相類的問題的真正的「證明」。世界資產階級制度正經受着最大的革命危機。現在應得以革命政黨的實際來證明這些政黨有充分的覺悟，組織性，與被剝削羣衆的聯系，堅決性及善長，能夠利用這個危機爲着成功的勝利的革命」。（列甯選集第五卷第五百一〇頁）

在更早些，列甯在「第二國際的破產」一書中，在指出革命形勢的三個主要的表誌（即下層不願照舊生活下去，上層不能照舊統治與中間階層之最大的動搖）以後，曾

經說不是每一個革命形勢都能轉變爲革命的。要使革命形勢變成爲勝利的革命，除了上述的條件以外，還須要先鋒的階級有充分的力量，去打倒在動搖崩潰中的統治階級，因爲統治階級不會自願的讓位於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除非打倒他。（請原諒我，因爲手頭沒有原文不能直接引用列寧的明確的語句）

列寧這個極重要的策略的指示，對於我們今天有極大的意義，根據這個列寧的指示共產國際十二次全會在分析目前的情況曾指出：

「掌握資本主義社會全部經濟的獨佔資本之統治，使依照自由競爭時代，資本主義所常用的方法去克服經濟恐慌，已成爲極端的困難。……但這不能得出資本主義會自動崩潰的結論。只能說，革命的高漲要不可避免的更加成長，以及一切基本矛盾之更進一步的尖銳，將驅使資產階級向國內國外以暴力去解決這些矛盾」。（國際形勢與共產國際各支部的任務。四——五頁）

正因爲如此，所以，共產國際最尖銳的提出：爭取危機中的革命的出路，反對危機中之資本主義的出路，根據這個列寧的共產國際的立場，我們黨明顯的提出，爭取中國的蘇維埃的道路，反對殖民地的道路，這個問題，特別在最近關於粉碎五次「圍剿」的決議中，提得明顯而尖銳。大概你是同意這個決議的總的路線的吧！那麼，應該明白明白自己問一下：到底什麼叫做爭取獨立自由領土完整的蘇維埃中國？難道這不就是把目

前存在着的革命形勢變為勝利的大革命麼？

目前中國局勢之顯明的特點：一方面全國存在着革命形勢，同時蘇維埃革命已經在一大部份的中國的土地上勝利了，蘇維埃革命之勝利是中國革命形勢存在的最好的表誌之一，正因為這個，所以將全國革命形勢轉變為勝利的大革命不能與鞏固發展聯合蘇區與創造新蘇區的任務分開來，所以，中央關於粉碎五次「圍剿」決議，說明五次「圍剿」是帝國主義經過國民黨將中國殖民地化的最具體與兇惡的步驟，而粉碎五次「圍剿」的鬥爭，即阻止危機中的帝國主義殖民地化的出路及為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而鬥爭，這是我們在將革命危機轉變為勝利的大革命中光榮任務。

根據以上所說，我想你可以了解革命形勢與革命是不能混為一談的。對於第一個問題，我的答覆就是這樣。

二、米夫同志做的文章對富農的策略是准許他可以賣買租佃及雇用勞動，這與目前我們策略是否有不同的地方？

我想，應該明白確切的回答說，黨目前對富農的策略與米夫同志文章中所說策略是沒有任何差別的。米夫同志並沒有推翻黨目前所採取的對富農的策略而恰恰相反只有批准了這個策略。只有失魂落魄的反蘇維埃的富農及其應聲蟲，才會企圖利用米夫同志的文章作反對黨目前所執行的策略的旗幟，但是這種投機之必然要遭受可憐的失敗，那是

不卜可知的。

也許你不十分相信我的說法，那麼，將米夫同志的論文與黨和蘇維埃最近重要文件，簡單的對照引證。就可以完全明瞭。

米夫同志在自己的文章中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共產黨必須負起補救蘇區經濟政策，……這些辦法是：不迫切需要的地方，共產黨提議禁止屢次分配土地。一直到最近有許多地方，在三五個月後又重新分配土地。這個新政策應當使土地的分配成爲固定，因此可以使農民能更努力耕他的土地。」（鬥爭二十三期）中央局在六月二日的查田運動決議中着重的指出：「除了個別例外的情形外，一般的不應該採取全盤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必須使已分好的土地，在農民手中穩固起來」（中央政府印查田運動指南第四頁）八縣蘇維埃負責人員查田運動大會的結論上亦着重的指出：「查田的目標是查階級而不是再分田」（參閱查田運動指南第一五——一六頁）

米夫同志又說：「還有黨提議不能無區別的完全沒收富農的財產，只能沒收參加反蘇維埃活動的人們的財產，其他一切忠實份子可以自由在市場交提他們的生產品」。所謂無區別的完全沒收富農的財產，就是說消滅富農，這當然是很明顯的。

黨在自己的決議中指出：「必須把地主和富農分別清楚，在無情的消滅地主殘餘的鬥爭中，決不能允許任何消滅富農的企圖。當然我們應對富農竊取土地革命果實的企圖

應給以嚴厲的打擊。沒收他們多餘的農具與好的田地，分給他們以壞的勞動份地」（同上）。至於一切參加反蘇維埃活動的富農份子完全沒收他們的財產，這裏用不到再引證的了。

我想除了文句的差別外，在策略方面任何差別在這裏是沒有的。

其次米夫同志又說：「黨的新的指示指出不應當禁止小康的農民購買和租任其土地及雇用工人，爲要發展生產，必須允許出租與購買土地雇用工人，自然地方蘇維埃要監督這些行動，才不會使以前的封建關係和剝削復活」。

這裏關於土地的出租和買賣的問題，從第一次蘇維埃大會通過的土地法以後，我們沒任何新的限制與增加，因爲那裏已經明白確切的指出：「現在仍不禁止土地的出租與土地的買賣，蘇維埃政府同時應嚴禁富農的投機與地主買回原地」。

關於雇用工人，那更明白，黨和蘇維埃從沒有禁止過富農僱用工人。

所有這些我們就足夠證明這兩者之間，是完全相同，要在這裏去找尋差別出來，我想是最徒勞的，正如要想在雞蛋殼上找出縫來一樣。

當然我並不否認這些黨和蘇維埃最近的指示，有許多黨的地方工作人員沒有深刻的了解，正像你完全沒有了解一樣，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做了許多錯誤，但是要告訴你，黨對於這種傾向正做着殘酷的鬥爭，中央局在查田運動第二次決議中：「同時把富農當土



主打的事實也個別的發現，對反動富農的判斷，也有不估計到他在反革命組織中地位的重要與否，不估計到他在革命以後是否遵守蘇維埃法律而只要凡是在革命前參加反革命組織的（如收三成租之類）都當作反動富農沒收。這種對富農的過火政策同樣要危害與中農的聯盟都應該糾正過來。」同時在黨報上更加通俗與詳細的解釋了這個問題（參閱鬥爭二十四期毛澤東同志的文章），如果你能夠仔細研究共產國際及黨與蘇維埃的文件，那這類問題也許不會有吧——對第二個問題的答覆就是如此。

（對於這個回答，如果你覺得不滿意，那麼請你直接的說明你的意見，而不必再提出一些外交式的疑問，因為這樣，對於我們的討論要更好一點。 順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博古 十月十五日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每期大洋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中華書店

出版者 中華書店

發行者 中華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 五洲大藥房

冬令藥品展覽會

購以供採	登於下	隨時換	將品名	備帶茲	庭行旅	甚合家	力安速	純正效	皆取方	餘種俱	凡三百	用良藥	各科家	孺內外	補身婦	製治病	家匯精	廠於徐	設製造	本藥房	
喉症福民片	凍瘡已潰藥	清爽凍瘡藥	益兒代乳粉	調經養血丸	巴旦杏仁露	五洲白松糖漿	咳嗽化痰丸	潤肺止咳藥	葆肺哮喘藥	小瓶二角	小瓶二角	小瓶四角	小瓶一元二角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二角	每瓶二角半	小瓶二角	每瓶一元五角	小瓶二角半	小瓶三角	每瓶五角	小瓶二角	小瓶四角	每瓶五角	小瓶二角	小瓶二角	小瓶四角	小瓶一元二角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每瓶一元	

◀ 贈即取索書南指生衛印詳藥各 ▶

設分有均埠各省各及埠本店支路馬四海上店總

## 上海肺病療養院

大西路四號附設

## 愛克司光診療院

蘇司海博士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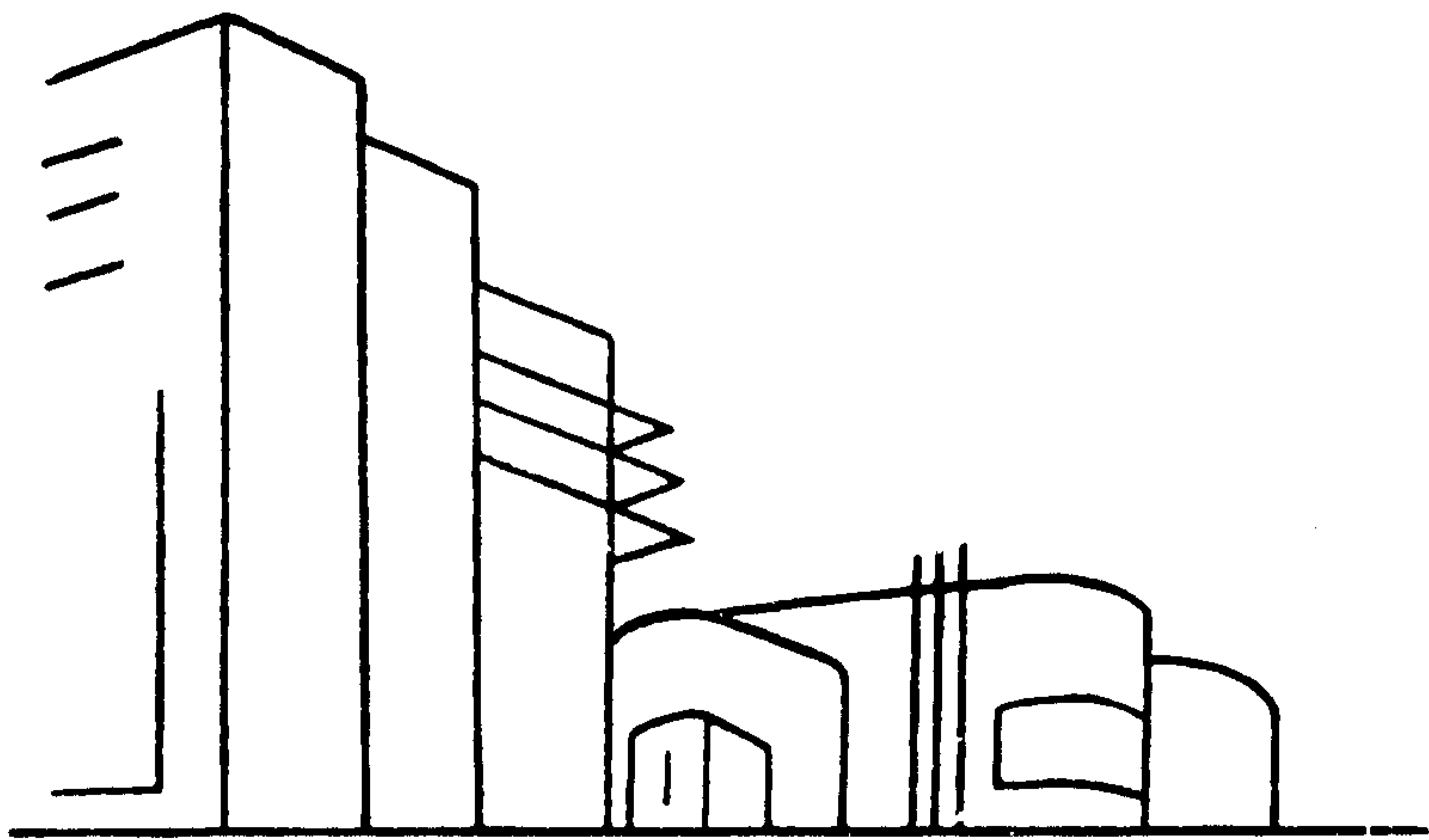
（一）本院為預防肺病及早期診斷特由德國運到最新型愛克司光機現經裝完竣由醫學博士蘇司海氏主任凡一切肺部檢查及診斷均於每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內為診察時間收費自十元起特此通告

（二）此外凡有胃病心臟腎臟膀胱囊十指腸脊骨頭腦骨折等症本院均有特殊X光設備以診斷之

電話二六六六

建築師

ARCHITECT



NO 64

中國建築學會出版

# 紅 旗 第六十四期

## 目 錄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

論國民黨的四中全會

堅決反對「中國論壇」上偷運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提綱）

農業工會十二縣查團大會總結

合作社怎樣工作

一九三三年白區農民鬥爭的形勢與我們今後的任務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

## 代表大會宣言

全中國的民衆們！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召集，是中國蘇維埃革命大踏步前進中的偉大成功，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蘇維埃的旗幟，已經成了千千萬萬中國勞苦羣衆求得的民族的與社會解放的旗幟。

自第一次蘇大會到現在兩年來的鬥爭歷史，完全證明蘇維埃政權已經成了不能戰勝的民衆的政權。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不僅不能暫時阻止蘇維埃運動的進展，而且在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四次「圍剿」中，蘇維埃政權又得了許多光榮的勝利，使蘇維埃政權得到了新的發展，與使蘇維埃政權走向爭取全中國蘇維埃革命勝利的大道。

帝國主義國民黨是在蘇維埃革命發展的前面顛抖着。爲了消滅蘇維埃政權，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在帝國主義直接領導之下，瘋狂的動員牠的一切力量，向蘇維埃與紅軍進行牠的五次「圍剿」。百萬以上的軍隊的進攻，飛機大砲的轟炸，慘酷的非

人的屠殺，是爲了要把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蘇維埃政權浸到血海中去。

然而帝國主義國民黨的這次「圍剿」，由於蘇區以及全中國民衆的擁護，由於我們紅軍的英勇善戰，以及蘇維埃中央政府正確的領導，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之前，已經受到了第一次的嚴重打擊與失敗。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開幕的時候，正是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國民黨蔣介石在五次「圍剿」中受到第一次嚴重打擊與失敗之後，重新佈置他的武裝力量，從三方面向我們中央蘇區繼續他的五次「圍剿」與大舉進攻的時候。帝國主義忠實的走狗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代表者蔣介石，像兇惡的獵狗一般尋找着牠的犧牲品，他決不會一刻放鬆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進攻。在國民黨政權與蘇維埃政權尖銳的對立之下，和平共存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稱，在全中國民衆面前放着一個絕對的兩條道路：或者是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道路，或者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殖民地的道路，中間的道路是沒有的！

在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賣國賊統治下，日本帝國主義不但併吞了整個滿洲與內蒙，而且還要佔領整個華北。在日本與其他帝國主義的進攻之下，中國將完全變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在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吮血蟲統治之下，國民經濟的總崩潰將更進一步的深刻化，地主資產階級空前的殘酷的剝削，將更其加重失業、失地、飢餓、疾病與死亡的非人的生活，威脅着全中國每一個勞苦羣衆。

現在每一個中國的民衆都會了解，國民黨最近在南京四中全會上叫喊着的「統一與建設」的真正意義：國民黨的所謂「統一」，事實上即是把中國出賣給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幫助帝國主義瓜分中國，向蘇維埃與紅軍進攻；國民黨的所謂建設，即是加緊對於中國民衆的剝削，促使中國國民經濟走到空前的浩劫。

國民黨賣國賊曾經有計劃的企圖把賣國的罪名推到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身上，然而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曾經兩次向全中國任何武裝部隊在停止進攻蘇區與紅軍，并給廣大羣衆以言論、集會、結社、罷工、示威、與武裝的自由條件之下，願意同他們訂立作戰的戰鬥協定，去共同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保衛中國領土的完整。然而國民黨對於蘇維埃與紅軍的宣言的回答，是更其加緊的出賣中國，從帝國主義那裏取得新的借債和武器向蘇維埃紅軍進行新的進攻。

在國民黨區域內，國民黨對於羣衆抗日，與一切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採取了最殘酷的白色恐怖；他解散中國各地羣衆的禦侮自救會，與領土保障同盟會，抗日組織，逮捕與屠殺一切抗日的革命領袖與羣衆，他最無恥的聯合日本帝國主義和滿洲國



的軍隊「圍剿」抗日的東北義勇軍，並且斷絕中國民衆的一切對於義勇軍的援助。

但是在蘇維埃區域內，則早已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勢力的存在，蘇維埃政府對於全中國民衆的抗日反帝運動給了有力的實際的援助。

國民黨吮血蟲曾經企圖把中國國民經濟的總崩潰歸罪於蘇維埃與紅軍；然而事實證明：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羣衆的生活是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並且即在國民黨軍閥的對於蘇區的不斷進攻與經濟封鎖的條件之下，蘇維埃的經濟建設獲得了極大的成功；蘇維埃區域的工業與農業的生產力，是大大的提高了；在蘇維埃政府下羣衆爲了自己生活的改善是發展着他們空前的勞動熱忱與生產戰綫上的新的創造。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稱：只有蘇維埃政權能夠挽救中國於淪亡，使全國的民衆得到澈底的解放。蘇維埃政權以革命的手段，把地主階級的土地給農民，把八小時工作與工人監督生產給工人，把一切民主的權利給羣衆，把民族的解放給所有一切被壓迫的中國人與中國境內弱小民族。自第一次全蘇大會到現在，蘇維埃政權的一切設施充分證明，蘇維埃是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他在全中國民衆面前清楚的指出，蘇維埃的道路，是中國民族與社會的解放的唯一道路。

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的派別，如生產大眾黨、第三黨、社會民主黨、A B團，一直到托陳取消派，在福建曾經進行了在殖民地道路與蘇維埃道路中間找尋第三條道

路的嘗試；但是這種嘗試是完全失敗了。這些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曾經在福建企圖拿一些左的革命的辭句，來欺騙民衆，阻止民衆革命化，用更巧妙的方法來維持帝國主義與整個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然而鐵的事實完全證明了一切改良主義者的幻想，宣告了他們的死刑，不到二個月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存在，給一切反革命的改良主義者以深刻的嘲弄與諷刺。

全中國的民衆們！同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的新的決戰，是在我們的前面！這是一個殘酷的決鬥！這是決定蘇維埃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生死的鬥爭！動員與組織全中國民衆的力量，造成堅強的鐵的紅軍，來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與新的大舉進攻，根本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建立獨立自由的蘇維埃的新中國，是我們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光榮的歷史使命！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全中國的民衆，自動武裝起來，開展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與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的革命兵變，遊擊戰爭，與武裝暴動，來響應蘇維埃與紅軍的勝利的進攻！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號召全蘇區的勞苦羣衆，用一切力量擴大我們的工農紅軍，發展廣泛的遊擊戰爭，健全我們的赤少隊與地方武裝，為保護蘇區的每寸領土，為發展與鞏固蘇區而鬥爭！把我們的一切工作服從於革命戰爭，把我們的一切供

獻給革命戰爭！我們必然是要勝利的！

第二次全蘇大會堅信，從反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中所產生的民衆的力量，是蘇維埃政權的不能戰勝的力量源泉；民衆的力量是帝國主義國民黨飛機大砲與一切現代武裝所不能戰勝的力量。反之民衆的革命的力量，將戰勝全世界！

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與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

打倒出賣中國造成中國國民經濟空前浩劫的國民黨！

澈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與大舉進攻！

創造一百萬鐵的紅軍，打倒帝國主義與國民黨！

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萬歲！

蘇維埃新中國萬歲！

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萬歲！

一九三四年一月

# 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

弋 廷

——並斥晨報，申報——

聯共十七次代表大會已於一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開幕並於本月十一日閉幕了，這一大會不僅對於蘇聯而且對於整個世界，對於處在戰爭與革命火燄中的中國都具有非常偉大的政治意義。從十六次大會到十七次大會經過了三年有餘的時間，在這一時期中，在蘇聯在資本主義世界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都經過了異常重要的歷史階段。

在這一大會上斯達林同志——世界無產階級偉大的領袖給目前國際形勢與蘇聯的狀況以精確透澈的分析，這一報告不僅對於蘇聯的無產階級與集體農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指示，而且是全世界的工人和勞苦羣衆的偉大的革命的指南針。

斯達林同志的這個報告發表之後，在全世界，無論是蘇聯的朋友和敵人都起了深刻的反響，在中國自然不會是例外，中國的共產黨及其領導和影響之下的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已經而且正在執行着斯達林同志的指示，爲着蘇維埃的道路而鬥爭。

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喉舌——晨報和申報向來是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最忠實的工具，他們沒有法子來完全否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功，和阻止廣大工農勞苦羣衆對於蘇聯的同情和擁護，也正如他們的主子——帝國主義一樣，因此便想盡一切卑鄙

醜惡的方法來污蔑蘇聯和斯達林同志，最近他們對於斯達林同志的報告的「批評」！正是這種最可恥的表現之一。

晨報社論開頭便說斯達林的報告不過是「安內」「攘外」的論調，在這裏我們暫且不來指斥他對於這一報告的「批評」！只指出這種卑鄙的企圖是在把這一報告與他們的「安內攘外」的無恥武斷宣傳并列以便利用斯達林同志報告的威權來掩蓋他們的賣國罪惡。但是這種企圖是不會成功的，人人都知道國民黨的「安內」，就是進攻中國的工農紅軍與蘇區，瘋狂的屠殺和剝削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國民黨的「攘外」，就是出賣中國給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

在十六次大會的時候，斯達林同志分析了蘇聯經濟的蓬勃發展指出工業發展的水平仍然落後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時經三年在蘇聯各部份的生活中都發生了最偉大的革命，建設了最偉大的五金，電氣，化學與機器製造的工業，其中有不少的工業且遠遠超過於歐洲的技術，今日之蘇聯實已走上先進的工業國家之前列。

即在資本主義昌盛的時代，其工業發展的速度，也萬難與社會主義的工業相比較。蘇聯的機器製造工業是執行全部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其發展是非常驚人的，若以生產量說牠已佔着全世界的第二位。至於農業機器的製造工業，則不僅生產

量就是技術的水平也已佔着全世界的第一位。這一首屈一指的工業，實已實行了蘇聯共產黨歷史的口號『趕上與超過』資本主義先進的國家。

農業機器製造工業的突然猛進絕不是偶然的，在十六次大會與十七次大會中間，聯共中央集中了全力來消滅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與散漫的小農民經濟之間的矛盾，爲着執行這一任務，若無先進的工業在廣大的範圍內生產複雜的農業機器與耕種機器是不可能的。現在在社會主義的田畝中正在使用着成千成萬的耕種機與複雜的農業機器。集體農莊的建設已經勝利了，牠已在基本上消滅了富農階級。革命的犁已把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根柢最後的摧毀了，根據斯達林同志的提議所組織的政治部，農業機器耕種機站與蘇維埃農莊已保證粉碎了富農的殘餘并造成社會主義農業繁榮的鞏固基礎，成千成萬的集體農莊已在實際中執行着偉大領袖斯達林同志的口號『使每個集體農莊成爲布爾塞維克的，每個集體農民成爲小康的』。

這一偉大的勝利不僅完全粉碎了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及一切資產階級的走狗關於『一個國家內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胡說，而且使一切反蘇聯的份子不能不找出其他方法來繼續其反蘇聯的狂吠：

反動的國民黨法西斯蒂的晨報沒有法子來否認蘇聯五年計劃的偉大勝利，因此不能不跟着他的主子——帝國主義說蘇聯建設的成功『其方法實無異從工人之足奪去皮

鞋，從農民之口奪去麵包」，這般腥穢的東西，沒有任何的根據能夠否認蘇聯的工人和農民的物質文化地位已有驚人的改善，剝削制度已經消滅，城市失業與鄉村貧困已經絕跡。只有帝國主義國民黨天天高喊「建設救國」但實際上却把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都陷於飢寒交迫流離死亡的苦境，他們不僅沒有任何的「建設」，而且在瘋狂的毀滅和破壞人類已有的「建設」，使成千成萬的工人農民完全變成災民難民和失業者。

同時，反動的晨報因爲在中國土地革命面前發抖，於是便狂吠共產主義者關於土地革命的理論的「錯誤」，說蘇聯的集體農莊沒有任何的成績，但這種狂吠實在是「可憫」得很，不僅蘇聯的集體農莊已經把他打得粉碎，就是中國土地革命之偉大勝利與發展不是早已使得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日夜徬徨向帝國主義表示非常「可憫」的樣子嗎？

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蘇聯的國防與國際地位大大的加強和提高了，在最近幾年特別是最近一年蘇聯的和平政策獲得了偉大的勝利，蘇聯與許多國家訂了不侵犯的條約，并與最頑固的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國恢復了邦交，這種勝利完全證明蘇聯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力量的偉大，全世界勞苦羣衆對於蘇聯的擁護和同情的增長以及蘇聯真正澈底的爲着總的和平而鬥爭與善於利用帝國主義的矛盾。

然而這絕不能絲毫減弱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恰恰相反，在目前世界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解體與蘇聯社會主義正在蒸蒸日上時候，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從來沒有比現在還要緊張的，一切資產階級的政客和軍閥不是正在迷戀於從戰爭中找出危機的出路嗎？

我們不必多舉事實來證明反蘇聯戰爭的危險，僅以帝國主義及其豢養的走狗對於蘇聯和平政策的態度已經足夠警覺全世界的勞苦羣衆，擁護蘇聯的任務是萬分迫切的，繼續在我們的目前。

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及其報紙早已在執行着帝國主義的命令向蘇聯的和平政策繼續不斷的狂吠。國民黨及其報紙在「九一八」事變以後會不斷的狂吠蘇聯的和平政策是「墮頭的外交」是「不抵抗主義」，企圖在這種狂吠之下來掩飾他們向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的投降和出賣的罪惡並以掀起反蘇聯的戰爭，但是這種狂吠是完全被蘇聯的和平政策和社會主義建設偉大的勝利，國防力量的增長以及全世界和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擁護蘇聯的熱烈粉碎了，這般可恥的東西們沒有法子再繼續狂吠蘇聯的「不抵抗主義」，因此便從相反的方面來攻擊蘇聯。例如晨報在同一社論中說：斯達林是「挑戰」者便是明證。這不僅證明這般東西已不能照舊狂吠蘇聯的「墮頭外交」，而且證明國民黨法西斯蒂正在瘋狂的執行他與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所訂的反蘇聯的軍事同盟的密



約，準備旦夕爆發反蘇聯的戰爭，企圖以這種無恥的狂吠來掩飾他們反蘇聯的罪惡，並求得全世界與中國的勞苦羣衆對於他們這種犯罪的行爲的饒恕，同時申報的社論也說「蘇聯已與各國修好，進攻之說已成過去」，并狂吠蘇聯的和平政策是「違背」了世界革命的利益！這種無恥的狂吠雖然在表面上與晨報的社論有些不同，但實質是完全一樣的，同樣是企圖鬆懈全世界與中國的勞苦羣衆擁護蘇聯的熱忱，並想將他們反蘇聯的罪惡轉架於真正爲和平而鬥爭的蘇聯身上，以便早日爆發反蘇聯的戰爭。可是這種企圖是不會成功的，全世界與中國的勞苦羣衆完全能夠看透這些劊子手們的肺肝，我們相信蘇聯與中國的工農紅軍以及全世界與中國的勞苦羣衆在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侵犯蘇聯的時候一定能夠執行莫洛托夫的口號「完全瓦解敵人，紅軍獲得大勝」！

x  
x  
x  
x  
x  
x  
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完全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於資本主義，證明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根本消滅一切危機，在目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正在瓦解的時候，只有蘇聯是在飛快的蒸蒸日上，這不僅是一切蘇聯的朋友所承認的事實，而且是一切蘇聯的敵人所不能否認的。但是這種勝利只有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基礎上，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與布爾塞維克黨領導的條件下才有可能，絕不是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僥倖成功的。在蘇聯五年計劃開始進行的時候，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都在預言蘇聯社會主義

的建設將遭「失敗」！但時至今日，這種預言是完全被鐵的事實粉碎了，因此一切反蘇聯的分子不能不想出其他的解釋說蘇聯的勝利是由於施行「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的結果，同時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由於自己陷於深刻的危機，於是便異口同聲的高喊實行「計劃經濟」「統制經濟」以「挽救」資本主義的厄運，例如西歐各國所喊的「統制經濟」，羅斯福的「復興計劃」以至國民黨的「五年計劃」「十年計劃」「建設救國」等等皆是。可是這些「計劃」不僅沒有能「挽救」他們的厄運，而且更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使整個資本主義結構急劇瓦解。另一方面他們所喊的「統制經濟」其實質不過是準備戰爭加緊剝削工農勞苦羣衆的辦法，至於國民黨法西斯蒂所喊的「統制經濟」！那最明顯不過的就是爲着掩蓋自己賣國的罪惡，向中外資本家大借款，增加苛捐雜稅，加緊剝削工農勞苦羣衆以實行其絕望的對紅軍蘇區的「圍剿」，而使中國更陷於民族危機和經濟的浩劫，爲帝國主義爭取中國殖民地化的道路的實現。

x

x

x

世界革命的危機已在成熟着，而這種成熟的主要因素，就是社會主義已在蘇聯得到了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中國蘇維埃與紅軍英勇的勝利的鬥爭，西班牙革命危機的深入，資本主義的和殖民地的國家裏革命高潮的增長以及勞苦羣衆反對飢餓，失業，法西斯蒂忿怒之增長等等。很明顯的蘇聯的勝利就是全世界工農勞苦羣衆的勝利，

也就是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增長，蘇聯已經成爲爭取全世界十月革命勝利的堅固的柱石了。正因爲如此，一切資產階級國家及其走狗，從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以至血腥的國民黨都在狂吠蘇聯的建設「與世界革命無關」，斯達林的領導「違背了馬克思列甯主義，違背了國際主義」等等，企圖以這種狂吠來抹殺蘇聯對於世界革命的偉大意義和減低全世界工農勞苦羣衆對於蘇聯的同情，企圖以這種狂吠來抹殺斯達林同志在領導世界革命與建設社會主義中的偉大作用。但是這種企圖是不會成功的，蘇聯的勝利已經成爲世界革命危機成熟中的一個主要的因素了，難道一切資產階級的走狗與國民黨的狂吠不是充分的表示他們對於逼近的世界十月的恐怖嗎？現在國際的形勢已經逼近的走到新的戰爭與革命的週期，馬克思主義已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得到了偉大的勝利，世界無產階級與勞苦羣衆的革命力量在共產國際與斯達林同志——世界革命偉大的領袖與導師——領導之下已經大大的團結和強固起來了，他們正在爲着保護蘇聯和爭取世界革命的勝利而鬥爭，他們的團結和奮鬥已經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偉大的勝利。我們相信全世界的工人階級與勞苦羣衆必能執行列甯和斯達林的指示以革命的努力來證明資本主義沒有出路而實現共產國際的中心口號「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

x

x

x

x

三年以來的事實更加證明了共產國際與斯達林同志對於中國革命領導的正確，完全證實了「只有蘇維埃能夠把中國從最後的崩潰和貧困中挽救出來」（斯達林同志在聯共十六次大會的報告）。「中國革命已經成爲世界革命驚人的因素了」，中國目前兩條道路的鬥爭——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化的道路——已經成爲中國政治鬥爭主要的內容。

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在蘇維埃紅軍偉大勝利的面前發抖，他們不能制止中國蘇維埃運動的發展，因此他們除掉動員一切力量拚命進行其絕望的對於中國蘇區和白區勞苦羣衆「圍剿」和屠殺以外，便瘋狂的向蘇聯，共產國際以及斯達林同志狂吠。最近在斯達林同志報告發表以後，反革命的申報又在其社論中大大的狂吠，說共產國際領導中國革命「錯誤」及斯達林同志「干涉中國內政」等等，這種最可恥的武斷宣傳早已被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揭穿了，而且中國革命的勝利和發展早已粉碎了這般狗東西們的胡說，同時誰人不知道干涉中國內政的正是國民黨的主子爺——帝國主義及其一切代理人，在南京政府內不是充滿了國聯技術合作的委員與日德英美的顧問嗎？更不要說的就是申報又在社論中宣傳國民黨的腥臭不堪的「三民主義」，可是申報的記者太落後了，連福建「人民政府」的政客都不如呵，因爲這般政客和匪徒們早已把「三民主義」宣判死刑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三民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牠的「民族

主義』就是投降出賣把中國完全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民權主義』就是瘋狂的厲行白色恐怖，剝脫民衆一切的自由，『民生主義』就是造成全國國民經濟的浩劫，使千百萬的工農勞苦羣衆凍死，餓死，難道還不明白嗎，這就是申報記者所謂孫中山的『明訓』的內容！

我們相信中國的工農勞苦羣衆在共產國際與斯達林同志領導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一定能夠最後的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奠定全中國的蘇維埃政權，并完全實現『中國與蘇聯的勞苦羣衆兄弟的聯盟』的口號。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日

## 論國民黨的四中全會

孚

數次延期和準備多時的國民黨四中全會，已於一月二十日開幕，經過五六天的會議之後，於二十五日宣告閉幕了。

四中全會表示了國民黨的新出賣。這次的四中全會，亦如過去國民黨所開的三全，二全及其他的會議一樣，把賣國問題擺在議事日程第一位，使會議之後可以按『預定計劃』將中國賣給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二中全會曾經是出賣東三省與上海的會議

，三中全會曾經是出賣山海關，熱河，察哈爾和河北等的先聲，而這次四中全會，無疑的將是出賣察，綏，華北和西北以至於全中國的信號。所不同的，只是以前的出賣是在「長期抵抗」或「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掩蓋之下，現在的出賣已經是在「誰敢言抗日則格殺勿論」公開形式之下進行罷了。

國民黨準備四中全會，是與日本準備「滿蒙帝國」，侵略察綏華北，英國在西北積極活動，英美日派艦到福建等同時並進的。四中全會開幕之日，正是日本對察哈爾新進攻在軍事上「準備完結」的時候，正是日本所組織的孫馬軍閥混戰正酣的時候，正是英國傀儡——南疆「獨立政府」出現的時候。四中全會的主要任務之一，就在於解決這個新的出賣的問題。雖然在報紙上說，在四中全會上關於外交問題「提案不多」，但是黃郛、何應欽輩已經在華北大做買賣交易，郭泰祺、顏惠慶等已經在倫敦作了出賣的勾當，四中全會只是「完全予以追認」（黨務組審查報告決議）而已。於是，新的投降出賣，便是四中全會的一個標誌。

四中全會最中心的問題就是如何更加反對蘇區紅軍，準備更大力量來進行五次「圍剿」。為貫徹其實際投降與使中國完全殖民地化的政策，國民黨必須首先加緊進攻唯一反帝到底的工農紅軍和民衆的蘇維埃政權。國民黨已經宣佈了一九三四年為「剿赤年」，並且動員一切軍事財政，「輿論」等等來進行絕望的五次「圍剿」。國民黨四

中全會集中其注意力於反對紅軍蘇維埃。無論在汪精衛賣國賊的開會詞上，無論在四中全會的決議，宣言上都表示了他們爲「清除共匪」和「勦匪宣傳」賣氣力。四中全會特別組織了「迎蔣大會」，慶祝蔣介石劊子手屠殺民衆的功勞，並贈給這個劊子手「慰勞旗」。四中全會極力團結一切反動力量來反對紅軍，首先決定以最著名的賣國賊張學良爲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在四中全會後便立即命令發表了。在四中全會上討論所謂福建「善後問題」，其實就是積極與日本帝國主義合作，在福建形成新的進攻紅軍的陣線，而福建問題比較快的解決，更加證明劊子手蔣介石已與日本帝國主義訂立出賣福建和「勦共」的新密約，不是偶然的，日本國會恰恰在最近公開宣稱福建蘇區的存在是破壞過去日本與中國關於福建所訂的條約。隨着四全會而來的上海各銀行的四千萬元的借款，顯然是用以進攻紅軍和蘇區的。法西斯蒂的機關報——「社會新聞」已經公開的說，什麼日本的瓜分中國，什麼「滿蒙帝國」都沒有關係，唯一的就是「勦匪」！該報說：

「我們姑且幹我們的！橫豎問題是力的問題，我們要解決這問題，自然要等到國力集中之後，而「勦匪」是集中國力的前提，我們大家只有先去「勦匪」再來攘外了」（「社會新聞」二月三日社論，「傀儡新變形」）。

法西斯蒂盜匪們又在重復早被揭破的什麼中國「沒有力量」反對帝國主義，什麼

「攘外必先安內」等等的武斷宣傳，企圖掩蓋他們無恥的出賣民族利益與屠殺民衆的罪惡。

於是，更瘋狂的進行五次「圍剿」，便是國民黨四中全会另一個主要標誌。

四中全会又表示了國民黨的法西斯蒂化。爲順利的出賣中國，鎮壓一切革命運動，特別是反對蘇維埃運動，國民黨逐漸讓位於法西斯蒂來支持自己的垂死血腥統治。在四中全會上除了「完全追認」蔣介石南京的親日政策，與「嘉獎」蔣介石反對蘇區紅軍以外，又完全通過了法西斯蒂的公開綁架學生和革命羣衆以及禁止一切言論出版自由的所謂「文化統制」。四中全會的決議說：「今後對全國之新聞界及出版界，應作有效之統制」。同時又通過所謂「改革省制案」，實行「省長制」，以便利法西斯蒂的獨裁。四中全会指出「民衆運動指導委員會」的「努力」，以稱贊國民黨法西斯蒂壓迫工農勞苦羣衆反帝反國民黨的鬥爭，屠殺罷工、罷課、抗捐稅、集會、示威等的參加者。在四中全會之日，正是國民黨賣國賊集中最大力量去鎮壓與屠殺唐山數萬工人同盟罷工，以保護賣國的和賣工人的塘沽協定，保護英日帝國主義的「特權」的時候，正是國民黨在各地實行「冬防」與戒嚴的時候，白色恐怖比任何時候都更加瘋狂了。於是國民黨的法西斯主義化，是四中全會一個標誌。

最後，四中全会表示了國民黨統治更加崩潰與瓦解，國民黨各派與軍閥間的衝突



更加尖銳。不管帝國主義國民黨如何企圖團結一切反動勢力一致的來壓迫中國革命與進攻紅軍蘇區，並在這個基礎上來解決或緩和他們之間的矛盾，然而，在革命運動的蓬勃生長，紅軍蘇維埃的偉大勝利，國民黨統治便日益崩潰與瓦解，使得帝國主義者不能完全相信國民黨保護自己利益的「能力」，他們爭先恐後的來瓜分中國。這個分贓的鬥爭，加劇了他們內部的衝突，於是早已分裂的國民黨及其各派軍閥間的衝突，隨着他們的主人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的生長而劇烈起來。在四中全會的前夜，十九路軍閥利用士兵與福建勞動羣衆的抗日反蔣情緒，而成立了所謂「人民政府」，企圖在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化道路之間找尋第三條改良主義道路，以挽救反動統治，這使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內起了新的分裂。現在「人民政府」雖然瓦解了，但是南京與廣東之間的矛盾又增長起來了。藍衣社的「社會新聞」也不能不承認西南「反四中全會的活動」（見四全會後的新國民黨企圖，一月三十日）。其次，孫馬在甯夏的戰爭正在這時爆發起來和劇烈起來。這次的軍閥戰爭是由日本組織起來，以實現其併吞西北和中國，進攻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等的政策。但是，無疑的孫馬戰爭又加強了反動統治內部的「爭論」，反動統治內部的「爭論」與衝突，不是爲着什麼「原則問題」而只是關於誰應當有賣國的「優先權」，誰在賣國中應得更多的贓物問題。

於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更加崩潰與分裂，便是四中全會又一個標誌。

從上述一切可以看出，以蔣介石爲首的南京國民黨，更加投到日本帝國主義懷抱中，成了日本最忠順的工具，更加採取法西斯蒂的盜匪政策以鎮壓一切革命運動，用全部力量來進攻紅軍，爲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作清道夫。

國民黨的賣國與反動的面目，從來沒有像現在表現得更明白了。國民黨的統治只有把中國引到完全殖民地的道路。廣大的工農勞苦羣衆是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血腥統治，爲獨立自由領土完整的蘇維埃道路而鬥爭的。風起雲湧的工人罷工鬥爭，普遍全國的農民抗捐稅，搶糧分糧，遊擊戰爭，義勇軍，士兵，勞動羣衆的英勇的反日反帝鬥爭，尤其是紅軍蘇維埃的偉大的勝利，證明中國革命形勢往前發展。只有在革命中才是中國民衆的唯一出路。兩個政權的鬥爭是更加尖銳了。

我們必須以國民黨四中全會上所表現的具體事實，來告訴廣大的勞動羣衆，國民黨統治對他們的代價是什麼，號召與組織羣衆反對國民黨的賣國分贓的四中全會，反對國民黨的新出賣，反對法西斯蒂的恐怖，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以民族革命戰爭來驅逐日本和一切帝國主義，收復東北的失地，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福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走狗蔣介石，消滅軍閥戰爭，爲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而鬥爭，爲蘇維埃中國而鬥爭！

與國民黨四中全會相對立的，有中國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和聯共十七次代

表大會，這兩個大會都有莫大的國際意義，這是世界革命危機正在成熟的國際環境中極大的政治事變。我們應當開展廣泛的羣衆運動來慶祝與擁護這兩個代表大會，動員一切工農勞苦羣衆來

保衛蘇聯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 堅決反對『中國論壇』上偷運反革命

### 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提綱）

一、在中國階級鬥爭的尖銳化，已進到了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公開的國內戰爭，兩個政權——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與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國民黨政權作生死的鬥爭。在這種情形之下，原來是階級鬥爭一種表現的思想鬥爭，自然而然的劇烈起來。近來國民黨用以摧殘一切進步思想與文化及維持中世紀奴隸制度的所謂「文化統制」之實施，藍衣社劊子手用以貫徹其賣國政策和屠殺民衆的所謂「法西斯主義」之猖狂，以至於地主資產階級的所謂在野反動派別與思潮，如國家主義，社會民主黨，A B團，第三黨，托陳取消派以及其他民族改良主義等之積極化，一切這般反

動派別異口同聲的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唯一的代表者中國共產黨作絕望的攻擊，都是目前階級鬥爭發展中所固有的現象。革命運動愈發展，反動統治愈崩潰，則一切反動派別益兇猛愈表示其臨死的最後掙扎。

二、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國民黨統治的破產，蘇維埃紅軍的偉大勝利，全國工農勞苦群衆的鬥爭與反帝運動的高漲，以及共產黨在廣大群衆中的威信之絕大提高，在這一革命與戰爭的火焰中證明祇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是中國革命唯一的理論與策略，才能使工農勞苦羣衆獲得民族與社會的最後解放。反之，孫文主義，法西主義以及其他反動思潮，只有把中國引到完全崩潰與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中的一切派別之反動性，在群衆的目光中日益明白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在中國獲得了絕大的勝利。

三、「托洛斯基主義老早已經不是共產主義派別了」，而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斯達林的話），反對共產黨，反對蘇維埃革命，替國民黨服務了。事實上，誰提出「國民會議」口號去幫助國民黨愚弄群衆？這是托洛斯基主義。誰認爲紅軍是「土匪」給蔣介石等劊子手以「圍剿」的借口？這是托洛斯基主義。誰認爲「工農民主專政是反動」給國民黨反對蘇維埃政權的「論據」？這是托洛斯基主義。誰在滿洲事變以來，誣蔑蘇聯與日本「勾結」而給一切反動派別反蘇聯的武器？這是托洛斯基

基主義。誰在革命工會內組織「反對派」來破壞工人運動？這是托洛斯基主義。誰向國民黨告密來破壞革命的組織和逮捕共產黨員？這是托洛斯基主義。正因為這樣，所以資產階級的律師，如章士釗之流，在國民黨面前替托洛斯基主義辯護，稱頌他們服務地主資產階級統治，反對共產主義和革命運動，擁護三民主義等所盡的功勞。

四、「中國論壇」是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建立的，由於中國廣大群眾的擁護，和革命團體的幫助，逐漸成了羣衆的刊物，現在每期已銷到三千份以上，各地有代派處，且有「讀聯會」的組織。該報所以能夠在羣衆中獲得這種影響，完全是因為廣大羣衆的日益革命化，迫切要求革命的刊物，和共產黨的政治影響的擴大。「中國論壇」在其存在的兩年過程中，雖然作了一些反對白色恐怖，反對法西斯主義，揭破國民黨的投降出賣等工作，但是牠沒有站在革命的路線，去宣傳與組織羣衆，以盡革命的羣衆刊物所應起的作用，反之，牠在各個基本問題上，有系統的偷運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來和革命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對立。

「中國論壇」的主筆伊羅生，是美國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出身於資產階級的隊伍，受了資產階級的教育，沒有任何革命的經驗，只在最近幾年對於中國革命才感覺興趣。像伊羅生這樣的新聞記者，做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傳播者與擁護者，當然不是偶然的。伊羅生在美國托洛斯基主義者領導和影響之下，在「中國論壇」的篇幅上

企圖暫時躲在革命旗幟下來鼓吹托洛斯基主義，來麻醉羣衆。爲了影響羣衆，伊羅生不能不做些有益於革命的工作，因爲赤裸裸的把已經破產而遭了羣衆堅決反對的托洛斯基主義全盤托出，立即被揭破了。伊羅生的陰謀就在於：當其揭破國民黨法西斯蒂的時候，他暗中就偷運了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

五、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偷運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並且對於某些讀者公然宣傳托洛斯基主義，雖然這宣傳遭了堅決的打擊。伊羅生的托洛斯基主義觀點在下列的問題上表現出來：

第一，關於蘇聯的問題。伊羅生從托洛斯基所謂「一個國家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理論出發，始終拒絕在「中國論壇」上傳播蘇聯社會主義建設與五年計劃的偉大的歷史勝利。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甚至許多資產階級的報紙也不能否認的，因爲這是鐵的事實。這種事實最無情的打擊了托洛斯基主義關於蘇聯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胡說，揭破了托洛斯基關於「蘇聯經濟危機」的武斷（見一九三三年四月大公報）。在這種情形之下，托洛斯基主義的信徒伊羅生認爲爲擁護破產了的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最好是不談蘇聯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因此在「中國論壇」上幾乎唯一的關於蘇聯的論文——「由十月革命向世界革命」（第三卷一期）一文中，伊羅生無所不談，但是關於現在五年計劃與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却一字不提，至於蘇聯社會主義建

說勝利的國際意義，這些勝利是在以斯達林同志爲首的聯共之正確領導，克服了托洛斯基主義，右傾，調和派反列寧主義思潮等的條件之下而獲得的，那是伊羅生所不願意說的。不管廣大羣衆如何願意了解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不管「論壇」的讀者，屢次寫信要求登載關於蘇聯的文章與消息，伊羅生終竟置之不理，而且他認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是「國家主義的」，他不肯發表斯達林同志最近在聯共十七次大會上的報告，認爲應當加以「批評」。試問伊羅生與藍衣社「社會新聞」，「晨報」以及其他反動報紙上攻擊蘇聯的「國家主義」政策，「批評」斯達林同志的報告有什麼分別呢？絲毫沒有的。

列寧曾經說過：「目前我們用自己的經濟政策，來對國際的革命加以主要的影響。一切都向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注視着，真是世界一切國家中的一切勞動者，并沒有一個例外，而且這絲毫也不是誇張。這一層是達到了……：在這種角逐場上的鬥爭轉而及於全世界的範圍。我們一解決這個任務，那時候我們在國際的範圍，也一定會完全得到勝利。因此，經濟建設的問題，對於我們是帶有非常重大的意義」（見列寧全集二十六卷）。列寧這一段話的正確性，特別在五年計劃的完成上面表現得更明顯。五年計劃的完成，有莫大的國際意義，不但鞏固世界革命大本營——蘇聯的地位，而且具體地指示了世界無產階級與勞苦羣衆唯一的革命出路，具體的告訴他們什麼是

社會主義。只有無產階級的敵人，只有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才能說蘇聯的經濟政策是「國家主義」，才能抹煞社會主義勝利的意義。

與前一問題有連帶關係的，就是伊羅生對蘇聯的和平政策的態度。誰都知道，只有蘇聯才是澈底採取和平政策的。這種政策是列甯在「甯少勿濫」一文中所規定的。這種政策的目的，是為延長社會主義建設所需的「休憩」，盡可能的推遲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時間。由於這種澈底的政策，由於蘇聯力量的壯大，由於全世界勞動者對蘇聯同情心的增進，由於蘇聯善於利用帝國主義營壘中的矛盾，使蘇聯在外交的戰線上得了許多的勝利。如與許多國家訂了不侵犯條約，侵略國界說，最近與美國復交，都是蘇聯和平政策勝利的顯明事實。蘇聯和平政策的勝利，一方面使世界勞動者日益同情蘇聯，他方面使那些與蘇聯簽定各種公約的資本主義列強在進攻蘇聯上在某種程度內發生困難，雖然他們不能和不願意停止反蘇聯戰爭的準備，尤其是日，英，德等國的反蘇聯的武裝干涉危險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尖銳與迫近。因此，蘇聯的和平政策的意義是異常偉大的。

在抹煞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及其勝利的伊羅生看來，蘇聯的和平政策是漠不關心的。在「中國論壇」的篇幅上，找不到一篇介紹蘇聯和平政策文章，有時提到蘇聯的問題也不願意說明蘇聯的和平政策。不僅如此，伊羅生認為蘇聯的和平政策是對帝國主



義「屈服」或「求助」於法西斯主義和美國的復興，他和某某讀者的談話中說到「能挽救蘇聯的，不是德國法西斯蒂，也不是羅斯福，而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這裏，伊羅生一方面重復着托洛斯基所謂「沒有西歐無產階級革命，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就會失敗」的謬言，他方面附和着托洛斯基與中國藍衣社和一切反動派別的武斷宣傳，以爲蘇聯與德國延長條約是幫助德國法西斯蒂政府，蘇聯提議出賣中東路是「承認」滿洲國和幫助日本帝國主義，以此來污蔑和反對蘇聯。

第二，關於國際問題。列甯主義根據目前國際情形的分析指出：世界經濟危機之深刻化，資本主義內外矛盾的尖銳化，世界革命危機正在成熟，蘇聯社會主義驚人的勝利，中國蘇維埃革命的往前發展，使世界走近了革命與戰爭的新週期。托洛斯基主義伊羅生是不能了解目前這種國際形勢的。他在「中國論壇」上從來沒有指出世界革命的高漲，他所看到的只是法西斯蒂與反動，殊不知法西斯主義之瘋狂又是無產階級革命威迫的表徵。伊羅生否認世界革命危機的成熟和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無非爲擁護托洛斯基及其同盟者——社會法西斯蒂關於國際形勢的估計，以爲現在是「法西斯蒂與反動時代，企圖以此使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不去準備決勝負的鬥爭，奪取政權。

關於帝國主義戰爭，首先是帝國主義干涉蘇聯的危險，伊羅生是不願意看到的。「由十月革命到世界革命」一文，完全不說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的準備和國際無產階

級與勞動羣衆保護蘇聯的任務。伊羅生做了一篇關於蘇聯公佈日本掠奪中東路的文件，只是簡單描寫「蘇聯態度轉趨強硬」，「紅軍已有了準備」，「蘇聯氣沮了日軍閥」，「所以日本沒有再向蘇聯邀戰了」，在他看來，日本帝國主義反蘇聯戰爭危險已經「沒有」了?!有的就是蘇聯的「強硬」，紅軍「氣燄迫人」，蘇聯是「勇狗」，這顯然替帝國主義反蘇聯的陰謀作辯護，是完全污蔑蘇聯的。難怪伊羅生不肯提出擁護蘇聯的任務呢!正因為這樣，伊羅生認爲上海去年的遠東反戰大會是「沒有意義的」!雖然在論壇上登載過反戰大會的文件，然而這是違反他的意志的，由羣衆所要求的。

在德國問題上，伊羅生明顯的表現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他毫不掩飾的擁護托洛斯基的污蔑，以爲德國法西斯主義能夠掌握政權，不是由於社會民主黨與資產階級的擁護，而是德國共產黨政策的「錯誤」。這是最無恥的武斷宣傳!事實上，德國希特勒的上台，正是因爲社會民主黨分裂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拒絕和破壞共產黨所號召的總同盟罷工，以其全副力量和整個政策替法西斯主義做清道夫。只有共產黨才是徹底反對法西斯主義與一切形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爲無產階級專政和蘇維埃德國而鬥爭。由於德國共產黨正確的領導，英勇的站在戰鬥的地位，所以德國無產階級雖因社會民主黨的出賣而不能不暫時退却，但現在德國又開始新的革命高漲。伊羅生和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對共產黨的污蔑，無非爲社會法西斯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罪惡辯護的。

因爲上述的原因，伊羅生始終不肯在論壇上來記載德國的情形，說明德國工人階級與勞動群眾的革命鬪爭，揭破與反對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主義，雖然他自己自稱爲反對白色恐怖與法西斯蒂的。在希特勒上台以後，德國成千成萬的工人，勞動者與反法西斯蒂的革命戰士，被捕被殺和送到囚犯集中營內，這引起了各國勞動者堅決的反對，而進行了同情的援助。中國的勞苦羣衆爲了援助德國革命戰士舉行了募捐與反法西斯主義的運動，論壇的讀者也自動的進行募捐。但是，伊羅生對於無產階級這種國際團結顯然不表同情的，他不但不去號召讀者與羣衆來擁護德國革命戰士，反而拒絕登載援助德國政治犯的募捐消息。

第三，關於中國問題。首先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對中國目前形勢的估計，完全重複托洛斯基取消主義的觀點。以爲中國是處於反動時代，革命遭了失敗，沒有革命形勢。「中國論壇」在國民黨法西斯主義的白色恐怖之前表示惶恐，把反動的力量估計得太高，完全看不到革命力量，尤其是沒有了解蘇維埃紅軍的勝利的意義。當伊羅生論及「九一八！反帝國主義戰爭！」時，他絲毫沒有說到滿洲，華北的義勇軍，游擊隊，人民革命軍的英勇的抗日反滿鬥爭，各地工農勞動羣衆反帝鬥爭的高漲。當伊羅生親自到了福建「實地考察」回來寫了福建事變的文章時，他完全不提福建勞苦羣衆與十九路軍士兵抗日反蔣的情緒與決心，蘇維埃區域在福建的擴大，這些情形對於福

建事變有決定的意義，不管十九路軍閥們和反動政客如何企圖利用這些情緒來達到他們自己的反動目的。在伊羅生看來，福建事變只是「軍變政變」，群眾只是「瞧着」，「等着」，「浮沫」，「貢獻自己的血肉」，這種污蔑羣衆，把羣衆當作是「消極」，抹煞他們的英勇鬥爭的取消主義，是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標本。儘管中國每年有數十萬百萬的工人罷工，無數的農民抗捐抗稅，搶糧分糧，游擊戰爭，與武裝暴動等，而伊羅生祇能看見「中國羣衆現在仍被浸沉在愚昧與迷信的鎖鏈之下」，中國農民「仍要俯伏在少數地主的高壓之下任其剝削」，這顯然是對羣衆革命情緒的污蔑的估計。

其次，在中國革命性質問題上，伊羅生完全站在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上，以爲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不管這種似乎「左」的估計，如何早被揭破，被視爲是不願意解決目前一個最基本的土地問題，放棄無產階級最大的同盟者農民，實際上是擁護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統治的，然而伊羅生還在「中國論壇」上一再重複托洛斯基主義觀點。在「十六年的俄國——今日的中國！」一文中，伊羅生把現在的中國看作和沙皇的俄國「一樣」，來否認帝國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區分，企圖來證明只有「無產階級革命可以解放全民族」，認爲目前的中國革命就是「十月革命」。在九一八紀念的論文中，伊羅生引證了列寧的「以無產階級革命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的提綱以後便得出結論說：「以無產階級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這是整國被壓迫民族爭求脫離帝國主義束縛解放歷史中一個極明白的教訓」，托洛斯基主義者伊羅生絕不能了解列寧這個提綱是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言的，至於落後國：在封建殘餘佔着優勢的國家，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是帶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的。這個革命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經過各個階段是要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這當然不是像托洛斯基派所主張的一開始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而跳過必經的階段。試問伊羅生有什麼權利來「引證」列寧的話呢？這只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欺騙把戲而已。

托洛斯基曾經在「無產階級革命」的「左」的假面具之下，來掩飾他的民族改良主義的面目，他認為中國的反帝鬥爭，是要求「關稅自主」，至於如何在經濟上政治上消滅帝國主義的統治，是「不重要的」。伊羅生也是一樣，當他論福建事變時，把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要求縮小為「實現關稅自主」，「廢除不平等條約」。這一方面是曲解我們主張，另一方面表現出他的托洛斯基主義的反帝的立場。在九一八紀念論文中，伊羅生甚至根本否認了反帝鬥爭，他說：「對於中國，「反帝國主義戰爭」這一口號的意義是怎樣的呢？這種反帝國主義戰爭鬥爭在中國應是反反動的國民黨」。這樣一來，伊羅生的反帝國主義不是反對帝國主義，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試問這與我們的「以武裝民衆的民族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走狗國民黨

統治」的主張有相同之點嗎？沒有的。不僅如此，伊羅生又否認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干涉。例如在福建事變論文中，伊羅生說「帝國主義者在上海港內的砲艦非常鎮靜；：。他們并不派砲艦往福建去」，又說「閩江裏的外國砲艦仍鎮靜的拋着錨，伏着不動」，他以此來判斷人民政府是否反帝的。殊不知帝國主義的干涉首先是干涉勞苦羣衆，干涉革命運動，而這個干涉是正在進行的，如英、日、美等帝國主義軍隊在福州登陸，就是準備這種干涉的，難道這就證明人民政府是反帝的嗎？完全不是的。伊羅生的觀點，實際上是否認了帝國主義干涉福建與中國，因此，他就不願意提出反帝鬥爭的任務了。

復次，伊羅生既然看不見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力量之強大，所以他認為中國的前途就只有「被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直接公開殖民地化」，沒有看到中國發展的另一個前途，即蘇維埃中國的勝利，中國民衆之民族與社會的解放。現在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內容，就是中國兩個絕對相反的道路的鬥爭，而蘇維埃紅軍的偉大勝利，就是阻止中國殖民地化，爭取中國獨立解放與領土完整的基本力量。所有這些是伊羅生所不能了解的。伊羅生對讀者說：蘇維埃是「農民的」，牠只有「幾個鄉村」，是「沒有辦法」的。然而列甯早已說過，蘇維埃又是「工農民主專政的現成的形式」，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經驗也證明，蘇維埃政權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

民主專政，其中無產階級的先進代表佔絕大多數，它的存在它的強固與發展，它獲得全國廣大羣衆的熱烈擁護，屢次戰勝自己的敵人，所有這些完全打破了伊羅生的悲觀失望的估計。

自然，悲觀失望和被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恐怖所嚇倒的伊羅生，完全看不到紅軍蘇維埃和革命羣衆的力量，因此也就不願意做擁護紅軍蘇維埃的工作。在「中國論壇」的篇幅上有系統的對蘇區紅軍的發展與實際情形宣傳怠工。現在紅軍爲衝破敵人五次「圍剿」的鬥爭中獲得了許多光榮的勝利，蘇區的建設各方面有了莫大的成績，蘇區的工農勞動羣衆的生活與文化已經大大的改善與提高了，而這在論壇上完全沒有反映出來，不管羣衆和論壇的讀者多次要求介紹蘇區的情形。甚至論壇的讀者自動的募捐援助紅軍並向論壇提議進行擁紅擁蘇的號召和運動，而伊羅生完全拒絕了。

最後，在「中國論壇」上沒有反對中國所謂在野反動派別，首先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這些反動派別，所以特別危險，因爲他們之中有些在「左」的「革命」詞句，甚至在「馬克思主義」招牌之下來欺騙羣衆的。如果伊羅生要使「中國論壇」成爲真正革命的羣衆刊物，就要堅決的來擁護革命思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揭破一切反動思潮，特別是托洛斯基主義。然而托洛斯基主義信徒伊羅生是不願意這樣做的。他在馬克思逝世五十週年紀念論文中除抄了甚至反動報紙都已發表過的恩格斯的演

詞之外，對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目前勝利的情形，特別是列寧逝世後斯達林同志擁護與發展列寧主義的歷史功勞是不願意說的。伊羅生在關於福建事變的論文中，對於陳銘樞，李濟琛，社會民主黨，第三黨等則加以批評（雖然是不正確的，認為他們是小資產階級的派別，而不是地主資產階級中的各種集團），但對於他們最親近的同伴托洛斯基派却默而不言，這都不是偶然的。

六、根據以上的敘述，顯然可以看出，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偷運了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私貨，在各個基本問題上擁護了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伊羅生已經公開對讀者說過，托洛斯基主義是「很革命的」。但是，每個覺悟的工人和革命者都會了解，托洛斯基的「革命」是在於反對蘇聯，反對各國共產黨，反對共產國際，反對中國的蘇維埃紅軍，破壞工人運動，與社會法西斯主義合作，與資產階級的報紙取一致行動，直至變成國民黨的偵狗——這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先鋒隊」。現在托洛斯基主義已成了共產主義的直接敵人，且為國際無產階級所唾棄了。這又可以說明為什麼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擁護托洛斯基主義要採取偷運方法。這就是托洛斯基主義現在的陰謀。

七、中國是處在革命與戰爭環境中，這不能不使理論戰綫上開展殘酷的鬥爭，這個鬥爭反映着兩個政權的血戰，紅軍與帝國主義國民黨在前線上的戰鬥，義勇軍，革



命士兵和勞苦羣衆反日反帝的民族革命戰爭，工人反對資本進攻的罷工與失業騷動，農民，飢民的反對地主豪紳的掠奪的遊擊戰爭與土地革命。一切反動派別的武斷宣傳——從日本在滿洲所標榜的什麼「民族自決」，國聯在中國所鼓吹的什麼「技術合作」，國民黨法西斯蒂賣國賊所採取的「攘外必先安內」，「文化統制」，「經濟統制」，以及在野反動派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欺騙，他們一致的反對共產黨與蘇維埃革命，表示出中國兩條道路——殖民地化的道路與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蘇維埃道路之間鬥爭的尖銳化。在這種情形之下，反革命資產階級先鋒隊——托洛斯基主義之積極化，是毫不奇怪的。目前托洛斯基主義除了公開的詛咒與反對共產主義和破壞革命運動以外，又企圖隱藏在革命隊伍中來偷運已經腐臭的私貨，來影響一部份不覺悟的羣衆，準備把「中國論壇」成爲公開的托洛斯基主義機關報，把讀者聯合會成爲托洛斯基派的組織，以實現其反革命的陰謀。然而伊羅生這種企圖是不會成功的！中國的勞苦羣衆在革命鬥爭火燄中已經有了這樣的鍛鍊，這樣的階級覺悟，他們已經把托洛斯基主義從自己隊伍中滾出去了，一切托洛斯基主義的新欺騙與陰謀，必然會而且正在被揭穿。現在許多讀者已經表示反抗「中國論壇」上的托洛斯基主義觀點而擁護革命主張。

八、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決勝負的鬥爭，就在前面。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動，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有利於革命。我們的任務在於動員與領導千百萬羣衆反對帝國主義瓜分

中國和反蘇聯戰爭的瘋狂準備，反對國民黨法西斯蒂的賣國與血腥統治，為革命的勝利，為蘇維埃中國的勝利而鬥爭。為達到這個目的，必須緊張我們一切力量開展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各方面的進攻，反對一切反動派別，肅清他們在羣衆中的影響，首先是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這是目前最猖狂的法西主義的工具。我們應當以馬克思列甯主義來武裝一切勞苦羣衆，給他們以革命的人生觀和革命的訓練，揭破「中國論壇」上反革命托洛斯基主義的觀點，反對伊羅生的一切陰謀，在一切革命刊物上，羣衆會議上，在廣大的羣衆中來開展反對托洛斯基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別的思想鬥爭。「論壇」的讀者和革命羣衆應當起來堅決糾正「中國論壇」上的一切錯誤，澈底改造牠，使牠成為真正革命的羣衆刊物，能滿足讀者與羣衆的要求。如果伊羅生在「中國論壇」上繼續偷運與宣傳托洛斯基主義，那麼用羣衆力量來毀滅牠，代以羣衆自己的革命刊物。為革命的刊物而鬥爭，為革命的理論而鬥爭，這是每個勞動羣衆的任務。

我們的戰鬥口號是：

打倒反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法西主義和一切反動思潮！

高舉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旗幟為蘇維埃中國而鬥爭！

一九三四年一月

## 農業工會十二縣查田大會總結

劉少奇

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前面，在中央蘇區查田運動得到了初步的偉大勝利的前面，農業工會十二縣的查田大會舉行了。農業工人是土地革命的先鋒隊，無疑的，這次大會對於十二縣查田運動更大更正確的開展，澈底肅清封建勢力與澈底解決土地問題，是有極大的推動。對於鞏固蘇維埃政權，更廣大的動員羣衆粉碎敵人的五次「圍剿」，是有極重大的意義。

在查田運動大規模開始的階段，各級工會組織對於這一殘酷的階級鬥爭，是沒有抓緊去領導的，沒有將農村工人在土地鬥爭中先鋒的積極作用，最大限度的組織起來。許多地方的工會，只是形式的派了一個代表去參加查田委員會，沒有在一切鄉村中去動員工人僱農來調查階級，團結貧農，通過階級以及沒收分配等。許多地方的工會，與蘇維埃沒有能夠取得一致——一方面工會沒有動員會員羣衆積極參加蘇維埃所領導的查田運動，另一方面許多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沒有經過工會來發展與組織工人羣衆的積極性，使他們成爲查田運動的先鋒。一切調查階級，通過階級以及沒收分配等，完全沒有經過工會，以至有個別區鄉，發生了工人對於蘇維埃在查田運動中的不滿這些現象，在大會上開展了自我批評，指出了參加和領導查田運動是鄉村中工會

組織目前的中心工作，各級工會組織尤其是鄉村中的工會支部，必須召集各種會議，採用一切方法，來動員工人雇農。同時與蘇維埃取得密切的聯系，向地主富農進攻，一個不留的完全清查出來。因此大會更具體的決定了，各縣蘇維埃的查田工作團，工會必須派二三個代表去參加，一切階級成份調查表，必須經過工會支部主任及貧農團主任負責的審慎的檢查後簽字蓋章證明。各縣工會必須經常檢查各區鄉工會在查田運動中的工作，並給下面以具體的領導。在大會上對於到會的五百七十多個工會支部主任，是很大的鼓勵和提高了他們的積極性。

查田是查階級，因此怎樣分析階級？是查田運動中最須澈底弄清楚的問題，大會是化了最多的時間最充份的討論了這個問題，同時也是代表們最感興趣發言最多的問題。結果，他們中間的大多數，是懂得如何分階級了。他們不祇是一般的懂得中央政府「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這一文件，而且他們提出了許多意見補充與修改了中央政府這個文件。如果大會教會了五六百個雇農積極份子分析階級，那末，將更有保證的使查田運動更正確的開展起來。因為在查田運動中發生錯誤最多的，就是分析階級的錯誤（如將中農當作富農侵犯他們的利益，將富農當作地主消滅等）。大會是清楚的解釋了過去分析階級的錯誤方法，——有三種剝削（即所謂土地剝削，勞動剝削，經濟剝削）的叫地主，有兩種剝削的叫富農等……。使每一個代表

都懂得，在分析階級的時候，注意到剝削分量與時間，如果自己已不勞動，專門靠剝削別人過活的，即是一種土地剝削也叫地主。如果大部份靠自己勞動過活，剝削別人的分量很少，即是所謂三種剝削都有。也是富農甚至有時可以是中農。

大會發覺了過去在查田中侵犯中農利益與消滅富農的錯誤，是嚴重的。差不多每個代表都帶來幾張寫好了的階級例子要求大會分析，而這些例子大多數，是把中農當作富農，把富農當作地主打了的，他們懷疑，所以他們帶到大會來分析。

從這些例子中看到，有些是把僅僅放幾百毫子債，請過年把長工，或收幾擔租穀，而極大部份是靠自己勞動過活的中農，當富農打了，有些甚至完全沒有剝削別人，僅僅是多有幾十担田山，生活比較豐裕的中農，也當富農打了。這次中央政府提出剝削分量超過全家總收入百分之十五或百分之三十者為富農的標準，是得了大會一致的擁護。

從這例子中，還發現了有些地方把手工業主，商人，「流氓」，地主富農打了，例如博生淇田區新全鄉李年四，無田屋，自織夏布，請了一二工人幫織，革命後分了田，現在打了地主全家沒收。又瑞金下肖區胡令羣，無田，做瓦鉢為生，請了四五個工人，革命後分了田，現在打成了地主全家沒收。西江縣，洛口區劉既福，無田屋，靠賭為生，放債五百毛，打了「流氓兼地主」。這類的例子還很多。

還有不少的例子，把稍爲放點債，收點租，而大部份靠出賣勞動力爲一家生活來源的工人當地主打了。許多同志分析階級的時候，把出賣勞動力，或幫人家作手藝不算作「勞動」。例如博士生城市王盛耀，在茶館作工十餘年，因爲放了點債，家中收藏了千多毛現金，打成了高利貸。又博生流南區陳視全，幫人作紙十八年，因爲收了八担租穀，作地主全家沒收了。還有，把作了二三十年長工或手藝的工人雇農，因爲放了幾百毫子債，收了幾担租穀，當作地主或高利貸沒收了。

過去我們僅僅告訴人家分析什麼叫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因此，許多下面的同志遇着了鄉村中的手工業主，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家。小販，游民無產者及商人，紳士等，就不好叫他們作什麼。如是也把他們叫作地主富農或者中農貧農，以至弄出了許多錯誤，因爲在同志們的腦筋中是沒有更多的東西來叫他。但是在這次大會上，告訴了許多同志來正確認識貧民，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智識份子，宗教職業家及游民無產者等，以及對付這些社會成份的正確策略。

正確的分析階級，無疑的這次大會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而且在查田運動中執行明確的階級路線，這次大會也是有很大進步的。到會的代表差不多個個都懂得地主爲什麼要澈底消滅？消滅富農的傾向爲什麼在目前階段上是錯的？侵犯中農的利益爲什麼不能允許？以及用什麼策略對付資本家，手工業主，自由職業者，智識份子及游民無

產者等。

動員羣衆繼續開展查田運動，是大會的第一個任務，但是大會同樣注意到了如何在中央政府新的決定之下來糾正過去查田運動中的一些錯誤。工會應用一切辦法協助政府來重新審查以前所通過的階級，工會支部主任與貧農團主任並須負責簽字證明階級成份調查表上所列各項的實在。同時工會要進行許多羣衆工作，在自己的會員大會上，在貧農團會議上，來解釋中央政府對於階級的新的決定，對於那些弄錯了階級的中農貧農工人，尤其要向他們解釋清楚，鼓勵他們來擁護中央政府，並按照正確的手續變更他們的階級成份，但在這裏要嚴格的防止真正的地主富農利用我們過去的錯誤來反攻。

有些地方進行查田運動，因為恐怕本村子的人對地主富農有包庇，如是實行了村與村交換查階級的辦法。即這個村子去查那個村子的階級，那個村子來查這個村子的階級。太會是詳細解釋了這種辦法的不正確，可以引起地方與氏族的鬥爭，主要的首先要發動本村的羣衆來清查與反對本村的地主富農。

大會同樣着重的討論了工會支部工作與貧農團工作。很明顯的，在查田運動中，貧農團是佔着最主要的作用。而貧農團又必須在工會支部的親密領導下，才能正確的發揮他最大的作用。大會批評了過去工會組織不注意貧農團工作的錯誤，並決定了全

體會員加入貧農團，吸引全鄉的貧農加入貧農團。帶領貧農到貧農團的大會，工會支部委員會必需有一個委員專門參加貧農團的工作，支部中并須分派在十多個積極的會員來擔負貧農團的各種工作，而貧農團每次大會之前，支部委員會必需預先開會討論，吸引貧農的積極份子參加。準備具體意見到大會提出，取得大多數貧農的贊成通過。但在貧農團裏面必須執行充份的民主，工會不應該去命令貧農團。

大會並聯系着討論了擴大紅軍與經濟建設的工作。在軍事委員會的代表報告之後，即有博生十多個代表報名當紅軍。並決定動員四十歲以下的會員全體加入赤少隊。動員每個會員都去擔負擴大紅軍優待紅軍家屬的工作。在經濟戰綫上特別着重的討論了冬耕運動與發展手工業生產的計劃。在各鄉完全執行中央政府冬耕運動大綱，發展合作社，并每鄉為中央國民經濟部至少找一個店員或會寫算的工人農民。

大會是順利的成功了。兩次大會都經過了五天的時間，每個代表都熱烈發表意見，傾聽一切的報告與發言。精神是特別好。大會之後，各級工會必須經常去檢查與督促大會一切決議的執行。組織與發展所有農村工人的積極性，使他們成為查田運動中的先鋒。使查田運動迅速的得到徹底的勝利。

十一月五日



# 合作社怎樣工作

亮 平

——壬田區消費合作社工作的檢閱——

在合作運動中，瑞金的壬田區，是模範的一區，雖然在他的工作中還有許多缺點和錯誤，但壬田區合作社的工作，已能使我們得到許多經驗與教訓。壬田區合作社並沒有辜負中央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所給與他的模範區的任務。

## 壬田區合作社發展的歷史

壬田區合作社於一九三二年二月開始籌備，當時壬田區群眾還不大瞭解合作社的任務與利益，所以在籌備會議上，全體負責人作了一個衝鋒精神的競賽，向羣衆作一回廣大的宣傳鼓動，指出奸商富農對於工農的剝削情形以及合作社對於勞苦羣衆的利益，於是迅速地就集股東二百五十元，同時借來三百元，共五百五十元，立即開始往筠門嶺與其他地點辦貨，並於三月間正式成立。當時並在價格問題上，由合作社負責人與區蘇各部同志開會討論，決定賣與羣衆的價格比市價較低。對於社員與紅軍家屬，紅軍機關及紅軍各部隊，更較賣與普通羣衆爲低。在開始營業後，羣衆到處傳說

合作社貨價比市價便宜，同時區鄉負責人亦能儘量宣傳，所以合作社的貨物，有應接不暇之勢。不久羣衆入股日漸增加。在營業五個月後，結算賬目，除修理購置，及其他開銷外，共得淨餘大洋二百五十一元。此時即照章召集社員大會，報告工作，並改選管理委員會審查委員會，各社員進行競賽，介紹新社員入社，並決定三個月結算一次賬目。在十二月底總結，計社員已增加到五百餘人，股金八百三十九元。九個月營業的結果，共得盈餘大洋三百六十四元。在這社員大會上，很多社員提出：爲加緊對非社員宣傳，並吸收新社員起見，應該分配紅利，結果除撥出一部份爲獎勵金外，依照社員股金，平均分配，每一股（二元）得紅利小洋七毫。餘大洋五十三元作爲公積金。當分紅利時，召集全體社員吃東西，情形非常熱烈。在一九三三年上年的六個月中，社員發展很少，只七十餘人。據合作社負責人報告，是因爲受了糧食困難的影響，（自然這理由是不充分的。）在今年七月八日結算時，除開支外，共得盈餘五百三十九元。經社員代表大會決定不分，作爲公積金以充裕資本。在八月以後，特別在經濟建設大會以後，新社員發展很快，在八九兩月中增加新社員八百另三人，（超過以前一年半發展的數目。）共計現有社員一千三百九十二人，股金二千零七十三元。在今年並且洗刷了富農十一人，其股金二十七元，無利退還，此外又洗刷了地主土豪及「反動富農」十人，股金沒收。這是區分社的發展情形。此外在王田區還有五個鄉，有

丁鄉支社，正在開始營業中。

#### 壬田區合作分社工作的狀況

壬田區合作分社社員代表大會，產生了管理委員會九個人，審查委員會三個人，在管理委員會以下，分設營業，宣傳，文化，調查統計等部，營業部下設立了採辦，發賣，保證，會計等股，現在設立了兩個商店，一個商店買賣油，鹽，布疋紙張文具以及其他一切日常用品。另一個商店，買賣藥材。所賣貨物，是用紙票，從黎川，江口，門嶺，福建等處買來的，並不一定要現金。羣衆向合作社買貨，比市價稍低。社員買貨，除得優先購買權外，價格還比普通羣衆便宜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五（例如布便宜百分之五，藥材便宜百分之十五），而且在藥店內聘請醫生，免費給社員看病。紅軍家屬買貨，也得到差不多與社員相等的優待。現在不但社員，就是普通羣衆也很踴躍的向合作社買貨。區分社每月營業約計有大洋二千八百元，至於營業部工作人員，則每月除伙食外，尚有五元以下的津貼。壬田區合作社，自開辦以來，能夠經常的以比較便宜的價格，供給社員以及羣衆以鹽、布等必需品。壬田區合作社社員，從來沒有感覺買不到鹽、布的困難，所以合作社在羣衆中，起了很大的信仰，以致羣衆有的說：「甯願賣了自己的衫衣來加入合作社」。

### 壬田區合作分社工作給予我們的經驗與教訓

壬田區之合作分社，所以能夠得到這樣的成績，是因為他們：

第一，能夠以衝鋒競賽的精神，向工農羣衆作廣大的深入的宣傳，使羣衆了解怎樣去抵制投機商人與富農剝削來踴躍地加入合作社。

第二，能夠在實際工作中，證明合作社的好處（如經常供給必需品，價格比較便宜，分紅利，免費看病等），更增加羣衆加入合作社的熱情，對於紅軍家屬的優待，更給羣衆以很好的影響。

第三，對於各種比較重要的問題，管理委員會能夠經常詳細的討論，定出自己的工作方針與計劃。

第四，能夠發動社員羣衆，來經常監督合作社的工作。審查委員會經常開會，檢查賬目，三個月算一次總賬，所以沒有發生貪污的事情。

壬田區合作社工作，雖有上述的成績，但是還有重大缺點甚至錯誤。

第一，壬田區合作社工作對於戰爭動員的聯繫，還是很少。例如抓住優待紅軍家屬買貨的事實，來加緊宣傳擴大紅軍，動員合作社社員挑勝利品，發動社員慰勞紅軍等等的工作，壬田區合作社是做得很少的。甚至召集社員分紅吃飯，與高采烈的時候

，也沒有能夠乘機把合作社的成績與前方紅軍的勝利與戰爭動員的工作很好的聯繫起來，以進一步提高社員群眾參戰的積極性。這一合作社工作不能與戰爭動員密切相聯的錯誤，不但是壬田區，而且是許多其他合作社的共同的錯誤，這一錯誤，是應用大力量堅決地糾正過來的。

第二，壬田區合作社，對於文化教育工作，可說還沒有着手去做，還沒有能夠利用文化基金，並發動社員羣衆，來建立俱樂部，夜校，識字班等等，對於社員的教育工作，是非常不夠的。這也是我們許多合作社所共有的而應該努力糾正過來的缺點。

壬田區消費合作社，雖然還有這些錯誤和缺點，但它已經能夠在自己的工作中，使壬田區廣大羣衆，瞭解集體經濟（現在大部份還祇是流通方面）的好處。在合作社工作中，我們能夠切實的鞏固工農聯合，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隨着革命戰爭的猛烈擴大，以及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合作運動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這種小生產者集體經濟的發展，正是保證我們民主革命將來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有力槓桿之一。

# 一九三三年白區農民鬥爭的形勢與

## 我們今後的任務

弋廷

爲着說明白區農民鬥爭的高漲及其原因，不能不簡單的說一說：今年中國農村經濟破產及毀滅的情形，由於帝國主義積極的侵略與國民黨最無恥的出賣造成的民族危機，由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浩劫，由於地主資產階級殘酷的剝削與壓榨，使中國農村破產與衰落更趨向於毀滅的悲慘狀態。這首先表現在農村生產極端的縮小與個別部門的毀滅，全國食糧的恐慌已達到異常嚴重的程度，許多省份的農民，差不多沒有任何可以果腹的東西，洋米洋麥的進口數量較之去年更加驚人，而少數所謂豐收的產米的省份亦因洋米洋麥的傾銷，與國民黨棉麥等大借款以及各地關卡捐稅之繁重，使少數區域剩餘之米無法轉運他處，形成所謂「穀賤傷農」的現象，更加促進農村的破產。同時中國出口的農產品及工業原料（如絲茶棉麻）已降落到異常悲慘的境地，許多經營絲茶的農民都已完全破產，許多的桑田茶地都已毀去改種其他農作物。其次，是普遍

全國的災荒，較之去年更加嚴重，單就今年黃河的大水災已可見其梗概，據最近報紙的記載，直豫魯三省被災的區域至今仍然一片汪洋，究竟毀壞多少房屋田產，淹死了多少人畜，誰也無從清算。至於帝國主義侵略與軍閥戰爭所造成的災荒以及旱災，蝗災，黑霜災等等更無須描述了。第三是農民的失業與死亡，實已達到異常驚人的數目與狀態，據說陝西過去有二千多萬人口，現在只有八百多萬了，在魯西黃河決口就有四百多萬人淹死，滿洲與華北的農民死於日本帝國主義炮火和鐵蹄之下也不知有多少千萬，至今各地餓死凍死的和流離失所的農民災民更無從統計，許多地方設立入市，甚至發生人食人的現象。廣大的失業農民與災民跑到城市中來，形成廣大的產業後備軍，打擊着在業工人的生活水平，資本家便乘此向工人階級實行殘酷的進攻，另一方面，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則驅使大批的災民飢民爲他們的牛馬奴隸，充當砲灰與強迫勞動，建立兵營，公路與飛機場等等，日本帝國主義最近更設立「人當」，將活人當去，兩月後死當完全由牠支配，其狀之慘，真是不堪敘述。第四，便是全國耕地的縮小與荒地的增加，廣大的農民失掉土地，這裏一方面由於帝國主義軍閥的砲火與普遍災荒，使農民不得不離開他依以爲生的土地；另一方面，由於農民受赤貧與飢餓的逼迫，不得不將土地賤價出賣和抵押，更有因不堪苛捐重租之搜括不得不放棄土地者，例如陝西農民有將田契貼在門上逃跑以卸租稅之重担。至於日本帝國主義之強迫移民

，困田，以及軍閥豪紳 霸佔強奪農民土地，更使大批農民失其生活的依據。第五，便是耕牛耕具與種籽的缺乏，使許多農民完全失去再生產的能力，這裏一方面由於農民受飢餓所迫與捐稅租課之催逼，不得不將這些東西拿去賤賣和抵押，同時由於農村金融的枯竭與農民的赤貧化，已完全失掉任何購買的能力，例如江浙許多養蠶的農民，由於繭價的低落虧本，甚至連買蠶種的一塊大洋都沒有。

## 二

在這一農村經濟破產與毀滅的條件下，廣大的白區農民與鄉村無產階級受蘇維埃運動之偉大影響與城市工人鬥爭以及反帝運動之激刺，就開展了普遍的革命鬥爭與暴動以尋求他們的出路。對今年一年的農民鬥爭，雖然我們還沒有精確的統計與研究，但這種運動的高漲與發展是毫無疑義的，僅根據通訊社的一月至八月的統計與我們所知道的幾個鬥爭，已可略見今年白區農民鬥爭的一般形勢（自然有許多地方的鬥爭為報紙所未登載，及與我們沒有關係的還很多哩！）。我們不想一一重復去年中央在決議中所指出的特點，只從這些鬥爭中着重的提出幾點：今年的農民鬥爭雖然仍然是不平衡的，但却是普遍於全國的，在這些鬥爭中，我們看到了一些特殊的不同的特點，同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共同的特徵。第一，我們要指出的在我們的統計中，江浙的農



民鬥爭的數次幾乎佔了一半，這些鬥爭十分之九是由抗捐抗稅引導到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與暴動，不久以前（十一月廿一——廿二）逼近江蘇省會的楊中縣還發生了兩三千人的農民暴動，爲着反對國民黨苛徵暴斂，暴動的農民與政府軍警血戰了兩晝夜，燒燬了許多國民黨官僚的住宅，結果因得不到正確的領導與敵人的血洗而鎮壓下去。在這裏，我們必須指出江浙是比較富庶的省份，而且是國民黨南京政府的支柱，但由於農村經濟的破產與地主資產階級的殘酷榨取，已使廣大農民無以爲生，而更加速了農民革命化的速度，假若去年我們已經指出搶糧分糧的鬥爭充滿於江浙，那今年的鬥爭是更加普遍與深入了。這證明革命危機的深入，在江浙的農村中，亦已走上更高的階段。第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侵略與屠殺和國民黨最無恥的出賣與漢奸作用，不僅滿洲熱河的農民早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即整個華北的農民亦已成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牛馬及炮火下的犧牲者，自榆關失守以後，直到今天也不知有好些千萬的農民死亡殘廢，至於受飢，受凍奄奄待斃，更是觸目皆是。在這一悲慘死亡的情況下，不僅滿洲早已掀起廣大的義勇軍運動，即在華北亦在許多地方揚起了反日反國民黨的大纛，根據我們的統計和材料，我們可以看見今年在河北的許多農民鬥爭，差不多是十分之九是爲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國民黨出賣，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直接與賣國的國民黨開火，反對國民黨藉口抗日增加捐稅，在察哈爾事變前後，廣大鄉村勞

苦羣衆與前線士兵結合起來，形成廣大的抗日隊伍，他們不願日本帝國主義的屠殺與國民黨的出賣錢壓與敵人血戰了幾個月，若不是張金刃等右派分子的葬送與一切反動軍官和派別的出賣，以及我們工作的薄弱，那無疑的一定走上北方新蘇區的創造，即至現在，那裏的力量仍然非常偉大的。至於滿洲的農民鬥爭與義勇軍雖然有日本帝國主義天天在那裏剿滅，但是廣大農民仍然風起雲湧的起來反抗，到處生長着游擊隊反日會與義勇軍的勢力。一年以來，由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影響與領導作用之擴大，在滿洲已經形成了人民革命軍，奠下了最堅強的抗日基礎。從這裏可以證明廣大的白區農民羣衆，首先是在滿洲和華北已經直接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和賣國的國民黨作戰。這就完全粉碎了『農村中不能反帝』的機會主義的理論。第三，由於紅軍蘇維埃偉大發展與勝利，由於他們對於白區農民的革命影響與領導作用日益擴大，各地白區的農民不僅普遍的開展着革命的鬥爭而且在許多地方在紅軍蘇維埃直接領導和影響之下，形成了大規模的武裝隊伍，配合紅軍作戰，成爲紅軍有力的助手，成爲新蘇區的創造者與紅軍的前身，這特別可以從四川福建河南陝西幾省的農民鬥爭中看得出來：有名的四川十九縣的抗捐同盟軍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當紅四軍在川北積極活動與迅速開展的時候，在四川邛崃雅安等十九縣好幾萬的農民組成了抗捐同盟軍，直接響應紅軍，打败了大批四川軍閥的軍隊，支持了好幾個月，直至現在仍然分散在各處行動，

形成許多游擊隊，有的而且完全參加紅軍；其次如福建白區的許多遊擊隊，豫南礮山等處的游擊隊，以及陝南的許多游擊隊，都是在紅軍直接影響或領導之下生長着，他們都是紅軍最好的助手與補充者。第四，由於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重重壓迫和剝削，在中國境內的許多弱小民族（如苗、瑤、回、蒙古人、韓國人等等）在中國蘇維埃運動影響之下，已在各地樹起解放鬥爭的大纛，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行進殘酷的戰爭，根據路透社的報告，今年春在雲南廣西貴州邊境曾發生極大的少數民族的暴動，參加暴動的戰士曾達到五萬人，而且說這次暴動是共產黨所組織的和領導的；其次是新疆回民，一年來轟轟烈烈的鬥爭與暴動，直至今日並沒有停止，最近報紙又傳雲南黑夷小民族又在暴動；至於內蒙與滿洲許多弱小民族的鬥爭更其不用說了。職是之故，中國境內弱小民族的鬥爭已引起帝國主義與國民黨極大的注意，他們爲着鎮壓中國的蘇維埃，爲着侵犯蘇聯，企圖用極大的力量來鎮壓和欺騙這些暴動的小民族，英帝國主義派了極大的力量到新疆去，日本除與英帝國主義爭取新疆的領導權外，積極慫恿內蒙王公獨立，國民黨則爲效命牠的主子，一面高唱大西北主義，派它的爪牙到甘陝，新疆按捍勢力，一面則向蘇聯狂吠，企圖燃起反蘇聯的戰爭。從上面的事實，可以看見，爲着勝利的戰勝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爭取中國蘇維埃的道路的實現，加緊領導小民族的解放鬥爭，把這種鬥爭與中國蘇維埃運動聯繫起來的任務，已經異常緊迫的擺在中國共產

黨的面前了。第五，從今年的許多農民鬥爭中，我們還必須指出個別省份的特殊性，假若在全國範圍內，我們要說今年農民抗捐抗稅的鬥爭是更加普遍，那麼，在四川白區這種鬥爭是特別瀰漫和深入了，除掉上述的抗捐同盟軍外，我們看見全川都是充滿着農民抗捐抗稅的鬥爭，幾乎沒有一縣沒有農民暴動與遊擊的發生，其蓬勃高漲的程度，即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報紙，亦無法掩蓋其事實，這固然一方面是由於川北蘇區偉大的發展與紅軍勝利的影響，燒起了四川農民革命鬥爭的火焰，另一方面四川軍閥之非常剝削與搜括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職是之故，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四川紅軍勝利的前面，驚懼着全川農民白熱化的鬥爭亦不得不怨聲載道，時時向四川軍閥敲着驚鐘，要他們警惕着『第二個江西的赤禍』。其次，如陝西因為該省連年的災情特別較他省嚴重，廣大的農民完全陷於絕境，故除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先後形成紅二十六軍二十九軍與游擊隊外，全省幾乎沒有一鄉一村不在日裏夜裏發生搶糧分糧的鬥爭，僅僅根據陝西黨的零碎報告，我們完全可以看見那裏從十人以至幾百人的搶糧鬥爭已經成爲家常便飯。對於各地這些鬥爭的特點，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

除掉上面所述的各點以外，我們還必須說一說今年農民鬥爭幾個共同特點以爲補充：第一是今年的許多農民鬥爭都帶着很大的羣衆性，許多鬥爭的參加者都是從幾百人以至幾萬人；但這裏，我們必須指出陝西許多農民鬥爭有不少是幾十人以至幾百的

人，因此個別同志便認爲是完全離開羣衆的狹隘的行動，當然是不正確的，他不能了解一個鬥爭是否羣衆性，不能僅以參加鬥爭的人數來決定，尤其重要的，我們要看牠與羣衆的實際聯系，是否是爲羣衆直接要求和擁護的。第二，從今年許多鬥爭中完全可以看出鬥爭帶着極大的堅持性與頑強性，如四川十九縣的同盟軍從二月堅持到六月，其他許多鬥爭都是連續着發生，不達要求不止，又如最近江蘇楊中縣的鬥爭雖然第二天早上被國民黨軍警開槍打擊，因受犧牲太大，不得不暫時退却，但在當天晚上又動員了大批的農民向縣政府進攻，直至江蘇省政府派大批保衛團來血洗鎮壓死傷了幾十人以後，才暫時隱沒下去了，而且據大公報說，這一次的暴動已經是一九一二年以來的第九次了。第三，就是農民鬥爭的組織性，與要求領導，這一方面可以從四川的大同盟軍清楚的看出，另一方面從許多鬥爭中可以看到他們急需要領導，而且積極的找尋共產黨的領導，例如豫南確山，因爲一個動搖的領導者懼怕鬥爭的開展而逃跑，該地的農民因一時失掉領導，無從着手，急得派人四出來找這一個領導者，他們很了解沒有領導是不會勝利的。第四，許多鬥爭的形式差不多一開始就是暴動；武裝衝突與遊擊戰爭，很少用和平的請願的方式，這裏從通訊社農民鬥爭的統計表中完全可以看出。第五，從今年的農民鬥爭中雖然可以看出共產黨的影響與領導作用是很大的增長了，但大多數仍然是自發的，沒有黨的領導，在這些鬥爭中，地主富農份子與一切

反動派別的影響仍然很大，有一些鬪爭仍然是帶着很濃厚的原始的宗教色彩（如湖北歸歸的神兵與山東沂水縣的黑旗會，五旗會等）。職是之故，許多農民鬥爭雖然異常尖銳，但是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仍得以血洗鎮壓的方法與經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控制，愚弄，把他們鎮壓與緩和下去。此外，我們不想再述今年農民鬥爭的特點，去年中央決議中所指出的各點都仍然保存着。

### 三

帝國主義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派別在中國蘇維埃運動偉大勝利的面前，看到白區廣大農民鬥爭的高漲與開展，不能不更更驚懼，採取一切方法來企圖消滅廣大農民羣衆的鬥爭，阻止他們走上『赤化』的道路。這裏最主要的方法當然是最殘酷的血腥屠殺與鎮壓，首先是派遣大軍『圍剿』和封鎖蘇區，在紅軍退出的區域與蘇區的周圍大施火殺，據說鄂豫皖紅軍退出的蘇區，差不多已經殺得十室十空，連小孩子都完全屠殺乾淨，以實行他們的『剷草除根』的方法。對於其他的白區則利用民團與一切地主豪紳的武裝以及保甲清鄉的方法來剷除所謂農村中一切『不良的分子』。至於在農民鬥爭和暴動發生的地方，那自然是不惜一切的派遣大軍去勦滅和屠殺，甚至將整鄉整鎮燒光也是常用的方法。這些事實是人所共知，用不到多加解釋，只就通

訊社的統計表中也可一看即知。

然而由於蘇維埃運動與白區農民鬥爭極大的開展，地主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派別爲着挽救他們的垂死的統治與阻止農民的革命化，還大規模的散佈一切武斷宣傳和欺騙的方法，最近一年來這種工作是更加積極了，這裏最明顯的就是他們所大吹大擂的農村復興計劃與一切反動派別所提出各種救濟農村的方案。總括起來，他們的內容，主要的不外是：（一）處理匪區的土地；（二）設立農民銀行與合作社；（三）辦理鄉村自治；（四）實行統制經濟；（五）救濟災荒與興修水利；（六）保護中國的絲茶，（七）征收洋米稅與調劑糧食的價格；（八）澄清吏治，廢除苛捐雜稅等等。這裏最主要的當然是土地問題了，也們因爲在蘇維埃政權面前發抖，於是不得不提起這一個根本的問題，想一切欺騙的方法來愚弄農民，如「耕者有其田」「計口授田」的口號皆是，甚至他們放出「承認匪區土地現狀」的空氣。更不要臉的如孫科則說「共產黨所以得農民的擁護，就是因爲偷了孫中山的政綱」。現在我們不來詳細批評他們的這些「條例」和「口號」，實際上都不過是把農民在蘇區所分的土地交給地主，恢復和增加一切封建的剝削與統治罷了。就是單拿「鄂豫皖匪區土地處理條例」來看，那也是再露骨沒有的了。如該條例第四條說：「農村復興委員會處理被匪分散之田地及其他不動產所引起之糾紛，一律發還原主確定其所有權爲原則」（點是我加上的），在

其他各條中則更說明了凡逃走地主之土地均一律由該委員會暫管，一直等到地主回來發還為止。實際上，還不止此。因為復興委員會的委員都是本地的地主豪紳，他們恨農民入骨，不但要退還一切土地和不動產，而且要懲罰農民，追繳和加增一切租稅的剝削。至於福建「人民政府」的「計口授田」，其實質不過是拿這一口號來與蘇維埃的土地革命對抗，阻止農民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罷了。其餘一切的方案實際上都是增加對農民的剝削與壓迫的方法。至於廢除苛捐雜稅更是自欺欺人的鬼話。現在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不是正在計劃征收各種特稅嗎？職是之故，河北磁縣的農民當着蝗災遍地不願意去報告，而唱出以下的歌謠「寧願蝗蟲咬，不願官來擾」，這並不是什麼奇怪的呵！

雖然國民黨及一切反動派別各種欺騙的結果是很微小的，然而用力揭穿這些欺騙，舉實際的例子，教育廣大的農民，仍然是黨絕不可忽視的任務。

但是地主資產階級不僅用盡一切屠殺鎮壓和欺騙的方法，而且還經過一切反革命分子與反動派別來直接控制緩和和出賣農民的鬥爭，這些分子利用我們在鄉村中工作的薄弱，與農民組織鬆懈，盡力混入農民鬥爭的隊伍奪取領導來出賣和消滅農民的鬥爭，阻礙農民走上土地革命的道路。



因此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鬥爭的領導與孤立和消滅一切反革命分子在農民鬥爭中的影響是黨目前非常重要的任務。

研究一年來白區的農民鬥爭與白區農村黨的狀況，我們首先應該承認在許多地方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這首先表現在對於農民鬥爭領導的加強和政治影響的擴大，滿洲河北加強了對於廣大反日義勇軍與游擊隊的領導，河南，陝西領導了許多農民搶糧分糧的鬥爭，四川黨領導了許多抗捐抗稅的鬥爭，福建的黨也同樣的領導了許多農民的鬪爭。第二，建立了許多農民的組織（如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災民會，反日會等等）。第三，農村黨不僅有了新的發展，而且開闢了一些新的陣地，在鐵路公路的旁邊也建立了一些工作，在成份上雇農貧農也有顯著的增加。第四，雇農，苦力工會已在農村中開始建立（如江蘇，綏遠）。第五，武裝組織的增加，四川，福建，河南，建立了一些遊擊隊，滿洲且有人民革命軍的創造。第六，遊擊區域的增加，如滿洲，河南，福建，四川，都有一些新的區域。第七，與士兵工作的聯繫有新的進步，這特別明顯的是河北黨在前線與京東的工作。第八，農村中婦女的組織有一些發展。由於以上的成績，白區廣大農民的鬪爭，的確給了蘇維埃與紅軍的發展以很大的幫助。

然而這並沒有減少黨在農村中工作的嚴重性，不說別的，就以大多數農民鬥爭的自發性與得不到領導而失敗，已足夠警惕全黨對於農村工作的注意了，同時即在我們所領導的和有聯繫的一些鬥爭中也暴露出許多重要的錯誤與缺點。這主要的表現在：第一，對農民的鬥爭估計不足，許多在我們影響之下農民醞釀着鬪爭，我們不清楚，以致臨死發生我們沒有任何準備的工作；第二，對於農民日常鬥爭與土地革命聯繫的問題發生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方是把農民鬥爭僅限制於抗捐抗稅搶糧分糧的階段，不號召農民為土地而鬥爭，沒有盡量宣傳蘇維埃，介紹蘇區工農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忽視搶糧分糧的鬥爭，認為這是『經濟主義』。第三，對農民鬥爭與反帝運動聯繫的不足與錯誤，認為『農村中不要反帝』，把反帝運動與農民運動機械的分開（如滿洲），不會根據農民切身的利益提出各種反帝的口號。第四，在武裝農民的問題上有兩種不正確的傾向，一方面是非武裝不能鬥爭，忽視其他一切任務，一方面則在反對『槍桿主義』的名詞之下取消和減輕武裝農民的迫切任務。第五，在鬥爭中組織的工作極端不夠，往往鬥爭一來，聚集成千成萬的農民，鬥爭一去，又完全失掉關係。第六，在鬥爭中動員羣衆反對一切反革命分子破壞與緩和鬥爭的企圖做得異常薄弱，時常在我們領導之下的鬥爭，亦被反革命分子所出賣。第七，在領導農民鬥爭中仍然沒有肅清立三路線的殘餘（如四川）。

正因為我們沒有爭取大多數的自發的白區農民鬥爭的領導，正因為在領導的鬥爭中還有這些嚴重的缺點與錯誤，所以白區農民鬥爭雖然異常高漲和尖銳，但我們還沒有能夠把牠造成一個有力的革命的巨流來配合紅軍蘇維埃的發展，迅速摧毀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其所以致此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目前白區農村中黨的組織和工作，還有以下的嚴重現象和弱點：（一）大多數黨的領導機關都是極端不健全的，有的根本沒有形成集體領導，有的領導機關完全為地主富農份子所把持，形成極嚴重的現象（如山東萊陽一縣有幾個縣委，完全為一些反革命分子所把持，他們互相鬥爭，以致用武力解決）。（二）幹部的嚴重，由於過去黨很少注意提拔和培養農村的幹部，許多組織總是依靠幾個老的分子，而這些分子其中就有不少是很壞的分子（這當然不是否認農村中許多好的老幹部），同時，提拔一些新的雇農和貧農的分子，因為比較幼稚得不到堅強的領導，仍然要受他們的支配。（三）農村支部的渙散與鬆懈，許多地方黨與羣衆的組織完全混在一起。（四）在農村中征收黨員沒有很尖銳的注意社會成份，爭取雇農苦力貧農為主幹，農村支部有時因為鬥爭硬把整村整戶的農民吸收進來，突然增長很大，過一時又大批的流動出去，在許多地方就很難形成堅固的農村支部的核心。（五）農村黨的組織一般的與上層機關的聯繫非常惡劣，時常一年半載失掉關係，得不到任何的指示和領導，看不到任何黨的文件。（六）農村中黨的組織對脫

密工作異常忽視，所有的幹部差不多都是公開的，因此在白色恐怖加緊的條件下便很難存在，今年有不少的地方受到很大的破壞（如陝西，鄂豫邊等處）。（七）黨所領導的農民羣衆組織都還是很薄弱和散漫，有許多還是有名無實，沒有經常的生活，缺乏黨團的領導與鬥爭綱領和行動。（八）黨在雇農苦力的工作，只在個別地方有些萌芽，在許多地方還沒有開始，至今並沒有很大的雇農工會的组织。（九）黨沒有根據目前戰爭與革命的環境，在一切重要的地方進行特殊的堅苦的工作，因此許多鄰近蘇區和接近大城市的地方反而在農村中的工作異常薄弱，甚至根本沒有。（十）黨沒有用一切力量去打進農民原始的組織和土匪的組織、奪取他們的領導。（十一）黨在災民難民中的工作異常薄弱。（十二）黨沒有將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與農村的工作很好配合起來，利用城市的工人與學生幹部去加強或開闢農村中的工作。（十三）黨對各地的農民鬥爭異常隔膜，就是黨所領導的鬥爭也沒有加以研究和討論，以便吸收各種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十四）黨沒有充分的開展思想上的鬥爭與工作的檢查來消滅一切地主富農的影響與各式各樣的機會主義的動搖（如限制農民鬥爭走向較高階段的右傾機會主義與立三路線盲動主義的殘餘）以及實際工作中的消極與放棄鬥爭。

所有這些，都是農村工作中最嚴重的問題，如不加以澈底轉變是沒有法子保障對於廣大農民鬥爭的堅強領導。

我們不想在此把中央去年在決議中所提出的任務一一加以重複，我們認為根據目前戰爭與革命的環境與衝破五次「圍剿」的中心任務，黨對白區的農民鬥爭必須有最大的注意，嚴格檢查和執行中央的決議，澈底轉變黨在農村中的工作。這裏，有幾點建議寫在下面：

第一，需要集中我們的力量在蘇區的周圍，大城市與交通要道的附近，敵人重要的後方與反日的前線開展堅苦的工作，領導農民鬥爭與創造新蘇區和游擊區域。

第二，在個別省份，我們認為必須加以特殊的注意，對於滿洲的農民鬥爭，必須特別注意對於反日遊擊隊與義勇軍的領導，尤其滿洲的人民革命軍。對於川陝兩省應特別注意那裏普遍開展着的抗捐抗稅搶糧分糧的鬥爭，把這些鬥爭與紅四軍和紅二十六軍的發展配合起來，對於福建的農民鬥爭必須針對着「人民政府」的「計口授田」的口號，組織廣大農民的直接行動，揭穿這一口號阻止土地革命的企圖，對於江浙因為牠是南京政府的腹心與蔣敵的重要後方，必須開展極大的農民鬥爭，給紅軍衝破五次「圍剿」以極大的援助。

第三，必須立即根據國際關於「共產黨在農村中的組織任務」決議，詳細檢查和討

對中國黨在白區農村中的工作，製出詳細的指示，在全黨中開展極大的鬥爭來爭取白區農村中工作的轉變，各省對農村工作應有專人負責。

第四，在中央和全總督促與領導之下必須立即開始和加緊白區農村中的雇農工作，廣泛的組織雇農工會，樹立雇農在一切農民組織和鬥爭中的領導。同時爲着加強大產業無產階級對於廣大農民鬥爭的領導，一切大城市中黨，團，工會的組織必須動員大批工人同志以及許多失業工人到農村中工作，並要加強鐵路公路與礦山中工人的工作，使牠與農村中的工作很好的配合起來。

第五，蘇區和白區的黨必須採取一切的方法替農村的組織培養大批的幹部，同時要在農村中大批的徵收雇農苦力貧農入黨，造成鄉村無產階級入黨的潮流。

第六，各級黨的領導機關必須採取一切有力的方法加強對農村支部的領導和密切與農村組織的聯繫，保證巡視交通經常的派遣和文件的輸送。

第七，爲着喚起全黨對農村工作的注意與反映農村中的工作，中央，全總應有關於農村的刊物，黨報應闢專欄經常登載關於農民鬥爭和農村工作的文章，有系統的研究一切鬥爭的經驗與教訓。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出版

每期大洋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中華書店

出版者 中華書店

上海博物院路  
二百九十五號

發行者 中華書店

上海博物院路  
二百九十五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6 1 - 6 4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正文